

ECRITS SUR LE CAPITALISME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

资本主义论丛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良 张慧君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新世纪学术译丛

资本主义论丛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北京商学院



09703294

中央编译出版社

资本主义论丛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良 张慧君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权)图字:01-97-0192号

FERNAND BRAUDEL
ECRITS SUR LE CAPITALISME

Edition Flammarion

Cet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bénéficie du soutien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u Service culturel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本书出版列入法国资助出版计划,并得到法国外交部以及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大力协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论丛/(法)布罗代尔(Braudel,F.)著;
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3
(新世纪学术译丛)

ISBN 7-80109-175-2

I.资… II.①布…②顾…③张… III.资本主义
-研究-文集 IV.K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2778号

资本主义论丛

费尔南·布罗代尔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250千字 印张:11.5

版次:199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18.40元

译者的话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派”第二代宗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论文集，其中收录的5篇论文，分别选自以下的出版物：

“什么是资本主义”：《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一堂历史课》(Une leçon d'histoire de Fernand Braudel)，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6年版，第87—158页；

“资本主义的活力”：同名小册子(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0页；

“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史论文集》，卷一(Ecrits sur l'histoire I)，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314页；

“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史论文集》，卷一（*Ecrits sur l'histoire I*），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3页；

“1450至1750年欧洲的价格”：《史论文集》，卷二（*Ecrits sur l'histoire II*），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65页。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大名今天在我国学术界已不再陌生。他的两部力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已分别由北京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于1992和1994年陆续出版。值得指出的是，布罗代尔著述的一大特征是切磋和论战，其对象不仅有本国的和外国的史学同行，而且有社会科学众多门类的专家。实际上，本书收录的5篇论文无不是某个研讨会上唇枪舌剑的产物。译者没有能力以译注的方式，为读者提供过于庞杂的背景材料。这里仅提醒诸位，有关资本主义的论题，还必须阅读《形形色色的交换》一书（《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第1版）的前言及第3、4、5章，和《世界的时间》（同书，第3卷）的结论。更进一步说，以上列举的这些篇章不仅可为读者解疑释难提供几把必要的钥匙，而且本身就是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

本书的标题（《资本主义论丛》）及选材系经作者遗孀保尔·布罗代尔夫人首肯后确定的。本书的翻译出版取得了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出版资助以及布罗代尔夫人和弗拉马里翁出版社非专利版权的无偿转让，这里谨一并致谢。

顾 良 张慧君

“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史论文集》，卷一（*Ecrits sur l'histoire I*），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3页；

“1450至1750年欧洲的价格”：《史论文集》，卷二（*Ecrits sur l'histoire II*），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65页。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大名今天在我国学术界已不再陌生。他的两部力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已分别由北京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于1992和1994年陆续出版。值得指出的是，布罗代尔著述的一大特征是切磋和论战，其对象不仅有本国的和外国的史学同行，而且有社会科学众多门类的专家。实际上，本书收录的5篇论文无不是某个研讨会上唇枪舌剑的产物。译者没有能力以译注的方式，为读者提供过于庞杂的背景材料。这里仅提醒诸位，有关资本主义的论题，还必须阅读《形形色色的交换》一书（《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第1版）的前言及第3、4、5章，和《世界的时间》（同书，第3卷）的结论。更进一步说，以上列举的这些篇章不仅可为读者解疑释难提供几把必要的钥匙，而且本身就是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

本书的标题（《资本主义论丛》）及选材系经作者遗孀保尔·布罗代尔夫人首肯后确定的。本书的翻译出版取得了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出版资助以及布罗代尔夫人和弗拉马里翁出版社非专利版权的无偿转让，这里谨一并致谢。

顾 良 张慧君

目 录

译者的话	I—II
<u>什么是资本主义</u>	1—62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	2
资本主义在游戏中作弊了吗?	9
资本主义:延续或突变?	13
1800 年以前亚洲的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	16
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因素	24
巴西的资本主义:增长或发展?	26
技术、科学和社会	29
资本主义是市场的敌人吗?	33
为发展经济史而努力	38

中世纪的工业革命	45
资本主义:见风转舵的结构	47
资本主义与经济世界	50
国家与资本主义	54
印度的例证	56
对未来的预卜	57
资本主义的活力	63—120
第一章 关于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再思考	64
第二章 形形色色的交换	81
第三章 世界的时间	100
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	121—171
一. 文明和文化	124
词的起源和风行	124
定义的尝试	131
二.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历史	150
必要的牺牲	151
必要的标准	153
为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对话而努力	157
打破专业隔阂	159
寻找文明的结构	160

三. 面对现时的历史	161
文明的长寿	162
同一性和多样性在世界永远存在	164
革命是当今时代的特征	167
文明的彼岸	169

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

173—204

一. 历史与时段	176
二. 短时间的争论	184
三. 信息传递和社会数学	188
四. 历史学家的时间和社会学家的时间	198

1450 至 1750 年欧洲的价格

205—359

一. 货币、货币金属及汇兑	213
三言两语谈汇兑	224
贬值与短期经济形势	229
二. 百年趋势	230
麦	233
绘制价格地图的尝试	237
百年趋势的涨潮、退潮和息潮	242
麦价以外的其他价格	253
两种重要的食品价格:葡萄酒和肉	254

非食品价格	265
居住	266
砖	266
木料	268
穿	269
重工业崛起前的欧洲	274
铁	276
锡	276
铜	277
价格、价格指数和工资	278
三. 短波: 周期及周期运动	285
季节运动	288
有没有基钦周期?	289
朱格拉周期及其他周期	290
周期的和非周期的解释	295
投石党运动和克伦威尔统治期间的整个欧洲	296
周期相随而不相似	298
四. 结论及一般性解释	300
货币数量理论	301
价格、工资与资本主义	310
价格史和系列史	313

什么是资本主义

1985年10月18至20日,在法国夏托瓦隆会议中心,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用3天时间,分别对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的特性》这3部巨著各抒己见,会议纪录以《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一堂历史课》为题,由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于1986年以小册子形式出版。这里仅将19日的发言(见该书第87—158页)译出。除费尔南·布罗代尔(以下简称布)外,在会上发言的学者还有:保尔·法布拉(以下简称法,法国《世界报》总编辑助理);钱拉·若尔兰(以下简称若,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研究员);阿尔培托·特南蒂(以下简称

特,意大利人,大不列颠科学院院士);K. N. 乔杜里(以下简称乔,英国人,伦敦大学教授);巴伦德(以下简称巴,印度人,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切尔索·富尔塔多(以下简称富,巴西人,巴西前文化部长、驻欧共体大使);拉兹洛·马凯(以下简称马,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布达佩斯大学教授);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以下简称沃,美国人,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

法:今天能够坐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身边,我感到既荣幸,又高兴。他的名字代表着天才和博学,所以听众如此之多,也就毫不奇怪的了。来自印度、巴西、美国、匈牙利和法国等不同国家的杰出学者,其中包括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将面对大家,并与大家一起进行对话。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

法:今天讨论的主题将是“资本主义”的概念。费·布罗代尔自己说过,他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曾经有所犹豫,因为“资本主义”一词的分量并非无足轻重。该词的表述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定义。不久前还多少带点贬意,今天它对某些人来说却成了一面旗帜。资本主义确实往往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混淆,甚至相等同;出人意外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目前似乎正春风得意。

费·布罗代尔写道:“交换与人类历史同样古老”,但在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却是应与“市场经济”严格区分的一种上层建筑。

在《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三大本书里，作者指出了 15 至 18 世纪期间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并强调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现象的不同地位和本质区别。正如所有解释性模式一样，这一论断所提出的问题却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费·布罗代尔告诉我们，一个模式就像是在陆地建造的一条船，能否浮上水面，能否顺利出航，都还有待接受考验。那么，由他提出的模式能否站得住脚呢？

对这个问题，大家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的答复，既然作者在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中，表现得如此出类拔萃。

他对我们说，在过去（即使是极其遥远的过去）和现时之间，从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断裂。为此，他在发掘大量历史素材的同时，挥洒自如地向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证据。布罗代尔的才华堪称与米希勒相媲美，他像一位杰出的节目主持人，善于唤起读者的激情，使他们享受一种类似动态的美感。如果我们至今找不到另一个词，可以描绘正在创建中的美好未来，我们又怎能说明依旧存在着各种丑恶、天灾乃至市场失控的世界秩序？

费·布罗代尔使我们知道了资本家扮演的奇特角色，这些资本家在中世纪时代，即早在近代崭露晨曦时，已是极其能干的大商人、大实业家和大金融家，他们的特征之一正是善于在最有利可图的投资中作出选择，他们的经营已远远超出了城邦（布鲁日、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等）的范围，在宽广辽阔的领土国家中编织起一本万利的交易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总和构成世界经济）。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就这样落入了资本主义的罗网，迅速处于资本主义自上面下的操纵之下。作为市场经济的原始范本，众多小制造商和小手工业者正是在交易会上交换各自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对经济生活的以上描述的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一旦把它用于证实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明显区别,有人便开始表示怀疑。原因难道不正是,在展示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时,人们偏偏对交换缺少一个明确的概念吗?

布罗代尔在究竟是供应或是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就是一个实证。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正是因为经济内部存在着某种原动力。这就要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李嘉图、亚当·斯密、让-巴蒂斯特·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交换的分析,以及萨伊阐述的所谓“生产自行创造销路”的定律。这条定律无非表明,在交换过程中,供应先于需求,因为假如事先没有货物的供应,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拍板成交。

费·布罗代尔毫不犹豫地写道,凯恩斯借口“产品与产品相交换”,“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业已为李嘉图接受的萨伊定律,这是认定供应高于一切的最彻底的方法。事实上,问题不在于这条定律在近代已遭到人们的批驳,而是人们对这条定律在指导国家经济事务中产生的严重后果视而不见。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可以不断刺激需求,而不必诉诸供应。换句话说,似乎能够让分配的收入总额始终高于生产部门以工资、税收和红利等形式提供的收益(从而造成长期的预算赤字)。

在我看来,人们不难证明,忘记由市场法则以低级形式体现的供求关系是导致目前严重危机的各种混乱的起因。

人们难道没有发现,人应该首先是生产者,然后才是消费者吗?

我们还要对布罗代尔的解释作更加深入细致的验证。布罗代尔不但接受了约翰·加尔布雷思关于大企业有能力“管理”市

场的论断,而且也要我们这么做,他甚至写道:“经济规律对大企业来说是不存在的”。他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性”(与市场经济相比)的论点,归根到底正是以这个说法为理论根据的。

确实,在费·布罗代尔的心目中,市场经济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在某种意义上,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还必须考虑产品的使用价值。资本主义则不然,它只关心交换价值。布罗代尔的观点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以上认识难道不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间接颂扬吗?布罗代尔正确指出,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透明度。

可是,说到底,经济进步无非就是交换不断带动生产的增长,而经济进步本身又是劳动分工促进劳动专业化和企业多样化的结果。难道事情不正是这样吗?为了从成本差价中获得最大好处而分散工厂和车间布局的跨国公司堪称是要这类把戏的行家里手。在了解大企业是否真能摆脱市场法则以前,我们不能不承认,大企业的存在正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市场法则的基础之上。这一现象逃不过费·布罗代尔的眼睛,但他对现象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却像是在兜圈子。在费·布罗代尔看来,市场经济处在竞争的影响之下,而资本主义则由于拥有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能够放手地从事“赌博、冒险和作弊”。布罗代尔解释的说服力怎能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竞争最激烈的场所难道不正是大企业展开活动的国际市场吗?根据布罗代尔的理论,民族市场的竞争纯属小店铺的事情,甚至连“超级市场”也置身事外。作者写道,对于“留给小到微不足道的企业去进行”的这种竞争,垄断组织又何必降格以求?这里所说的竞争究竟指什么?能否认为布罗代尔所用的

竞争概念有点自相矛盾,感情色彩多于科学的严谨?

布罗代尔对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论(周期至少长达40年)寄予极大的重视,这难道不也是同一种浪漫主义的表现吗?一位历史学家可能对某种经济分期情有独钟,这不难理解,但布罗代尔是否应该赋予康德拉捷夫的假设(多数经济学家对此假设持有异议)某种真实和近似的品格,并据此展开一系列的推理和归纳?

无论如何,布罗代尔的著作揭示了为职业经济学家所忽视的一个层面。他率先指出了大城市的组织功能——首先是中世纪的大城市,如威尼斯和热那亚,接着是16世纪的安特卫普,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以及后来的伦敦和今天的纽约——,因为经济世界正是在这些大城市周围逐渐形成的。布罗代尔当时分析了这些没有强大国家为依托的城市(美国属于例外)怎样把某种秩序强加于经济生活。他提供的答案也许是十分含蓄的,至少据我看还不够明确。这些城市之所以在没有强大国家为依托的情况下也能推行自己的意志,这也许因为交换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凡与城市打交道的地区,包括周边地区在内,城市都为它们的利益效劳。

历史事实表明,等级制现象普遍存在于按照所谓“经济世界”的格局实行地区划分的经济之中。每个经济世界都各不相同。可是,根据经济理论,市场却又促使成本和利润趋向均衡化。布罗代尔在推出资本主义这个新概念时,无疑部分地考虑到了这里的矛盾,因而他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承认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上的交换最终导致了不平等。但我们难道应不加讨论就接受这样一个认识,即认为周边地区注定要比中心地区穷吗?我觉得这种看法至少部分地是与事实

相矛盾的。在今天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几乎已赶上了美国,有些国家甚至还超过了美国。

这里的危险是,“布罗代尔主义”很可能堂而皇之地和轻而易举地为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依旧藕断丝连的和企图重振左翼的知识界人士提供某种安慰。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以下假设令人神往:市场经济的胜利可能预示社会主义的前奏(即排斥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似乎越是把布罗代尔的论断推向乌托邦,这种论断就越有价值,我觉得这是荒唐的。难道让全部经济活动受竞争法则的支配才是最可靠的合理保障吗?难道大企业的始终存在和集团化兼并对寻求最高劳动生产率必定有所损害?这些问题今天似乎还有待澄清。

布:为了研讨一部作品,有成百上千条途径能够引人登堂入室,即使对作者也是如此。人们可以从窗口进去,也可以从旁门进去,而您却选择了大门。您的问题提得很好,不是所有的问题,但我以为最重要的问题,都已经提出来了;特别是,您已为我证明,一位经济史学家不可能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同样,经济学家而又兼顾历史的实属罕见;因为这很不容易……我并不是说,我没有读过经济学家的鸿篇巨著,只是我并不始终把这些著作认真看待罢了。我宁可观察真实的经济生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只承认事实,试图分析摆在眼前的东西,不轻易相信经济学家的理论,即使对供求关系这类老生常谈也是如此。您曾经提到让-巴蒂斯特·萨伊,您有理由为他辩护。我认为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地位就像传统历史中的“马莱-伊萨克”¹一样重要,但我责备他缺乏冲动和胆识……

也许出于好意,您没有明白指出,对我来说,资本主义是上层建筑的现象,少数人的现象,是高海拔的现象。每当我考察商

人、银行家等大资本家时,我都不无惊讶地看到,他们的人数竟是如此之少。在1840年,法国银行由40个家族所包揽,也就是说,老小加在一起,也不超过200人。夏尔·卡里埃尔考察的马赛批发商,18世纪那时,不过80人。客观地讲,真正从事资本主义活动的人实在少得可怜。

但我特别想要强调,物质生活应划分为三个层次。在我看来,市场犹如地球的赤道;位于赤道以南的是南半球,即物物交换和一般交换;资本主义位于赤道之上,处在北半球。南半球,物物交换的层次,也就是意大利文所说的“初级经济”(economia sommersa);如果事实并非如此,由我设计的建筑也就自动坍塌。

您曾多次说过,一本书如果真想说明某个道理,作者势必既十分自信,又有点担心,这话说得很对。然而,当我着手撰写这本厚书时,担心的分量肯定要比自信沉重得多。我应该说,这似乎让人很难理解,尽管我自己心里十分清楚,因为写这部著作原是出于别人的要求,而不是出于我的自发选择。友好地给我下命令的人正是吕西安·费弗尔,对我影响最大和最受我喜爱的人。他当时准备出版一套通史丛书,名为《世界的命运》。在他1956年去世后,我只得勉为其难把这项任务继续下去。吕西安·费弗尔打算亲自写出《15至18世纪西方的思想和信仰》一书,作为由我撰写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伴侣和补充。可惜,我的书已永远丧失了这样一个伴侣,它只是谈到经济生活的一面,此事说来让人感到十分痛心。保尔·法布拉,您试图用经济法则来解释交换的不平等,这是经济学家很容易犯的毛病。您的主张是某种“内因论”解释,而作为历史学家,我却宁愿走出经济学的大门,到外边去寻找解释。我之所以撇开经

济不平等的概念,因为我发现,经济不平等纯属社会不平等的翻版。据我所知,人类社会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我在当今的世界上,在历史学家拥有的浩如烟海的人类经历中,从来就没有见到过平等的社会。在人学领域中,也许甚至在实证科学领域中,提出和解决一个问题总是要带出另一个问题。吕西安·费弗尔说得好:“提出问题是任何历史研究的开端和归宿。没有问题,也就没有历史。”回过头来再看社会的不平等,我以为早在史前时代的原始社会中,不平等就作为“社会兽性”的一个基本问题被提了出来。大家且别发笑,请听我解释,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集体的受害者;没有不平等,没有等级制,集体也就不可能存在。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必然后果。

我想说的暂且就说到这里。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加以说明,但我先让大家发言,然后我再进行辩白!

法:钱拉·若尔兰将接着讲话。我提醒诸位,他是一位哲学家,他讲的题目是“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游戏中作弊了吗?

若:我想谈谈费·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所作的区分问题。与保尔·法布拉相反,我觉得这一区分是无可厚非的。不仅历史学家承认以上的区分,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对完整的竞争和不完整的竞争,即所谓“自由贸易”和“垄断性竞争”

作出区分。费·布罗代尔说得好,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换是平等的,而资本主义则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从而造成交换的不平等。这种区分是否能反映欧洲统治者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的不平等呢?借用费·布罗代尔的话来说,欧洲统治是“世界历史的症结……世界近代史的根本问题”。

因此,我们就要知道,世界的不平等是否由资本主义通过作弊而建立起来的,或者说,不平等交换是否等于名副其实的作弊,即在游戏中玩了花招。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像资本主义这样一种长时段结构,怎么可能建立在作弊的基础之上。一句美洲谚语说:“欺骗一个人,可以骗一世,但若要骗所有人,至多只能骗一次,不能永远骗下去。”世界的不平等是一个历史问题,一项历史事实,作为历史事实,我们就能找出一个具体的日期充当佐证。在这里,我想借用保尔·贝洛什的估测。他指出,在1800年,世界各地(欧洲、中国、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几乎都在200美元上下,到了1976年,人均国民收入在欧洲达到2325美元,而中国和第三世界仅为350美元。换句话说,在一个半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平等的状况变成了巨大的不平等。这些日期十分重要,因为它们表明,世界的不平等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人们所说的工业革命。

什么是工业革命?怎样理解工业革命?我想借用费·布罗代尔的形象化解释:工业革命就是从木柴和木炭的文明过渡到铁和煤的文明。两个数字——也从布罗代尔那里借来——足以说明问题:在1789年,欧洲共烧2亿吨木柴,到1840年就只烧1亿吨;此外,欧洲铁产量1790年为60万吨,1810年为110万吨,1840年为280万吨。这一切当然都应归功于技术的变革,

但如果利用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建造的模式,大家就不难明白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库兹涅茨叙述了在前工业社会(19世纪以前)和现代工业经济之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简单地说,在前工业社会中,积累起来的资本全部是“毛资本”;而在当今的西方经济中,积累起来的资本却全都是“纯资本”。毛资本和纯资本之间的差别,那就是价值的降低。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应与我们一样,从消费中取出同样多的财富积储起来,并非为了扩大今后的财富,而只是为了保持生产器材的现状。以上的经济分析有力地证实了我们的直觉:在前工业社会中,各种生产工具都是木质工具,既不结实,又容易损坏;在工业社会里则相反,生产工具十分耐久,因而它们的经济生命比技术生命更加短促。今天,当人们在工厂中安装一台机器时,机器完全可以使用50年以上,但8年过后,就被淘汰了,并非因为机器不能再用,而是因为有了体现技术进步的新机器。结果是更换设备导致生产能力的增长。正是固定资本的这一变更和转化使18世纪前以商业和金融活动为主的资本主义得以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从而基本上以“内在”的方式完成资本积累。

向铁器文明的过渡标志着重大的变迁,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已如上述,但这一变迁本身就有经济原因。事实上,人们在18世纪开始用煤炭炼铁,原因是在那时的英国,用木柴充当燃料的陈旧生产方式使炼铁成本变得过分高昂。垄断着优质铁生产的瑞典,开始成为在波罗的海上咄咄逼人的强劲对手。英国必须设法摆脱瑞典的垄断。这正是所谓垄断性竞争的一个典型事例。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中存在着一种竞争方式,即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争夺霸主地位。

在所谓“棉花革命”中,大家可以发现完全相同的现象。为

什么在棉纺织业中采用机器？因为当时印度居纺织品生产之首。英国工人的工资较高，且反对降低工资的斗争层出不穷。为了抗拒印度的竞争，英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采用机器。这又是垄断性竞争的一个典型事例，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欧洲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印度纺织品不是由印度人，而是由欧洲人自己推销的。他们是英国和荷兰的进口商。同样，今天第三世界一些新兴工业国家也正是在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唆使下，展开着激烈的竞争。

那么，难道是资本主义在游戏中作弊促成了世界的不平等？我以为不是。应该说我们文明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才产生了这种不平等。无论在工业革命以前和以后，资本主义都以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形式存在着，并且遵循着相同的游戏规则。

我觉得，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所玩的并不是同一种游戏。如果参照游戏的数学理论，人们或许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中，所玩的是一种任何人都不占优势的、完全凭运气决定输赢的、公平的游戏，而在资本主义中，游戏是不公平的，因为玩游戏的熟练程度在这里起作用。大家知道，在后一类游戏中，只有极少数最熟练的“玩家”才有取胜的把握，而玩游戏的其他人则完全听天由命。我因此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实际上要比费·布罗代尔所分析的更加显而易见。

法：我感谢钱拉·若尔兰作了如此简洁、明确的发言。阿尔培托·特南蒂接着开讲的题目是“对前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否有助于对随后几个历史时期的分析？”

资本主义：延续或突变？

特：我们都在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圈子，我这里将侧重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问题，并将完全采用布罗代尔的术语说明自己的见解。对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概念，我不想多谈，因为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有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在座。但我要强调指出，对费·布罗代尔说来，每个经济世界都各有自己的资本主义，既然历来存在——即使不是历来，至少也是很久以来——几个经济世界，也就可以认为历来就有几个资本主义。

我并不是对经济世界的概念感到犹豫或有所怀疑。在我看来，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与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系的问题上来：历史和现时的关系不是一种虚假的关系，而是我们亲身体会到的、并且将贯穿在我们毕生经历之中的一种富有喜剧性的关系。

费·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及其中心区和边缘区等）和资本主义既然早已存在，他就竭力要搞清它们的孕育过程，从而确定资本主义的历史沿革和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他看来，不论在13世纪的佛罗伦萨，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或者在今日的世界各地，均可见到资本主义的活动。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没有阶段可言，尽管他有时谈到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态。

请允许我逐字逐句引证他的原话：“资本主义是一种历时已

久的冒险行径。当工业革命开始时,资本主义已有很长的生活阅历,而且并不只是从事经商。”他虽然注意到资本主义具有多种形态,但他始终不与“真正的”资本主义打交道,因为“真正的”资本主义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不断演变着;因此,他决不能相信,我们只能被一种资本主义所迷惑,而不被其他资本主义所吸引;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形态从不是相同的,虽然资本主义的本质却始终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之争论不休的资本主义现代形态,不论其存在历史似乎多么久远,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他资本主义形态不仅过去和现在有,今后大概还会有。是否有“真正定型”的资本主义呢?布罗代尔作了否定的回答,而且它还反对关于资本主义从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不断进步的观点(直到全部控制生产,真正的资本主义方才形成)。

换句话说,有人认为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还不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而布罗代尔对这种看法持反对的态度。

这一认识把我们引向文明史,使我们回到过去,面对过去的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根据费·布罗代尔的见解,早在工业革命以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业已存在;而且今后还将存在,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始终是等级制的反映,而等级制又并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说到这里,针对工业革命,我想向费·布罗代尔提出以下一个问题:“他是否认为资本主义现阶段(继其他阶段之后,现阶段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不管他是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是彻底改变经济和社会生活格局的一次断裂?”

在三卷集的最后一卷《世界的时间》中,费·布罗代尔有时似乎赋予工业革命决定的作用,并把世界的时间划分成两个阶段,即18世纪前和18世纪后。为此,他曾谈到工业革命以前和以

后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工业革命显然不是一个历时很短的事件，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历史方向的一次转折。布罗代尔还对我们谈到近代的增长和传统的增长，特别是倾其全力优先发展工业生产的新型工业资本主义的诞生。

我们由此遇到另一个问题：能否承认为当今世界开辟道路的资本主义与以往时代的资本主义具有相同的性质？这里涉及的显然不是数量和比例的问题，而是本质的问题。如果在当今资本主义中存在的要素和成份就是以往资本主义的要素和成份，那么我们就能与费·布罗代尔一起确认，工业革命后出现的资本主义本质上与其他时代的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在形式上以崭新的面目出现。

我想强调的是，费·布罗代尔毕竟赋予工业革命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他拒绝认为工业革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诞生的标志。毫无疑问，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这决不等于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从此改变了性质的一条理由。

布罗代尔的以上命题具有许多不言自明的内涵：我们的现时代以及在我们看来纯属现时的特性，由此被引伸到一个非时间的空间中去。这正是布罗代尔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他说：“我试图向你们展示从日常生活到交换以及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已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地点得到了验证，并且正在和还将继续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场合得到验证。”

我们不应被现时所迷惑，因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恒在结构，一个过去从未能摆脱得了和今后将永远摆脱不了的结构。

法：谢谢阿尔培托·特南蒂的精彩提问，费·布罗代尔肯定会

饶有兴趣地作出回答。我们有幸请到两位印度历史学家与会，他们提出的问题将不再以欧洲为中心。乔杜里先生将向诸位谈谈 19 世纪前商业资本主义以及亚洲工业生产的问题。

1800 年以前亚洲的 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

乔：关于欧洲工业革命前亚洲的工业演变、经济组织和社会结构，整个情形至今还没有被写成历史书。

然而，工业生产的问题，不论涉及哪个历史时期，都特别适用于比较研究，因为这些问题比其他问题较少受时间的制约。

根据亚洲经济史学家的观察，农业的发展势必导致劳动的原始分工：在亚洲绝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往往兼顾土地耕作和纺织，而木匠、铁匠、制陶等手工业者也抽部分时间参加农业劳动。

经济专业化在乡村社会极其少见。即便在使用原始技术的条件下，工业生产也要求具有一定规模的规模经济。亚当·斯密在一句常被引证的名言中正确指出：如果村子的集市过小，全天做工的工人或工匠就不能单凭自己的手艺挣钱养活自己。此外，剩余土地的存在使他们能够应付需求的突然变化，一旦生意清淡时，便转向农业活动。甚至在实行种姓制度的印度族居民中，这种情形也得到证实，尽管种姓制度把社会的全体居民区分为不同的集团，并禁止一切纵向的社会流动。以劳动谋生的人，

不论是纺织工或耕作者，社会地位都十分低下。根据我的推测，促使土地经营、食物生产和工业活动均衡发展的这一模式适用于整个亚洲地区，无论是近东、印度、东南亚、中国或日本。

体力劳动者社会地位的低下，与经济考虑一样，对确定劳动报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伊斯兰国家，手工工匠与统治集团的精英处在尖锐的对抗之中。大部分城市劳动者并非阿拉伯后裔，这无疑使他们与一个建立在政治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始终格格不入，即使他们接受伊斯兰的教义，他们的法律地位与异教徒也完全相同。

似乎只是在中国和日本，手工工匠的社会职能多少受到官僚的重视。因此，层出不穷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使亚洲工业始终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下，并迫使工匠在危机岁月弃工从农。

此外，还必须对地方性生产与销售市场广、服务对象多的工业性生产作出区分。地方性生产的产品很少远销 15 英里（24 公里，相当于步行一天的路程）以外的地方。相反，对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商品来说，运输距离就要长得多。印度东部达卡生产的细布，中国长江三角洲生产的丝绸都得翻山涉水，行程数千公里，方能抵达伊斯法罕和巴格达等富庶之乡，以及日本的京都和江户。距离和时间构成联结商业资本主义和出口工业产品之间的不可或缺的生命线。非农业财富的增长，货币经济的扩展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活动如何开拓本地以外的市场。约在公元 1000 至 1750 年间，以出口为主的工业在亚洲许多地方蓬勃发展。只是从 1800 年起，欧洲才能在制成品的工艺技术、生产效率、成本和供应等方面，对亚洲的传统优势提出挑战。

我们由此就要考察以下的问题：印度和中国这两个贸易大国通过什么经济途径在工业领域取得优势地位？目前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原始工业化的讨论在多大程度上能说明亚洲的经验？近30年以来，有关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著述多不胜数。人们为分析马克思的历史生产方式理论作了有益的尝试；1972年后，随着原始工业化概念的问世，这个老问题又以新的形式被提出来讨论。由于研究17和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度纺织品贸易，我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门德尔和马克·埃尔温对考察原始工业化问题作出了不可埋没的贡献。我仔细研究了这两位历史学家提出的两种历史理论。我今天想结合我个人的研究，对这两种理论作一番评价。

原始工业化理论实际上是以欧洲历史中的两个具体实例为依据的。首先，在14至15世纪，欧洲的呢绒工业纷纷从行会控制的城市迁往乡村地区；其次，以“外包工制”（法语中称作“家庭劳动”或“来料加工”）形式出现的乡村工业则被视为完全受商业资本的控制。原始工业化理论针对的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欧洲的情形。如果拿它来解释亚洲，就有破坏自己的前提假设的危险。

商业资本主义对发展出口型工业生产究竟起什么作用？马克思在分析工业革命前的历史状况时指出，生产具有两个必备的条件。首先，马克思对供生产者自己使用的产品和专供交换的产品（即他所说的“商品生产”）作了区分；其次，在他看来，以资本家身份出现的商人在组织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亚洲经济发展之所以不同于欧洲，原因不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方式理论，这要用远程贸易演变的条件来解释。三大类亚

洲工业产品(纺织、五金、陶瓷)在整个印度洋地区开展大宗贸易,甚至远销地中海。商人在远方市场和地方性生产之间起着必不可少的纽带作用。但是,不可能把商人和工匠之间存在的十分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归纳为马克思规定的从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的公式。此外,棉织和丝织业、五金制造业和陶瓷业同时分布于城乡各地。在亚洲工业史上,对手工业产品的商品需求从没有导致从城市向乡村迁移的浪潮,我们现在再来研究亚洲商业资本主义的特征和生产的地区布局。

亚洲国际经济关系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的间隔性所决定。商品从生产者转到消费者的手里,要经过地理空间和时间的双重过滤。这个特性使商业变成一种必须积累和使用巨额资金的经营活动。在活动空间极其有限的封闭性经济制度下,商人必须发展一种复杂的资本流动渠道。就地区间贸易和远程贸易而言,没有资本更是寸步难行。从商人最初出资收购产品,发运货物,送往远方市场出售,直到收回本利,这一段时间也正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地方经济对更广大的交换系统的一体化程度同时取决于贸易的内部发展和对外扩展。从宋朝起,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大帆船的海上贸易在亚洲社会中起着重大的文化作用。金银、剑盔、生丝、平纹细布、香料、乳香和纯种马均被视为雅致和奢侈的生活方式所不可缺少的高级商品。但是,欧亚之间的洲际贸易并不只是运送珍贵物品。为了给远洋帆船压舱,必须在价昂的轻载货物之外再加上价值低廉的重货。印度洋的许多地区从其他地区进口剩余农产品,以补充本地食品的不足。谷物和食品贸易十分活跃,使一些经常缺粮的地区得以专门从事工业品生产,特别是需求稳定的工业品生产。这

些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不仅受当地地理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而且也以远程贸易的规模为前提。在红海和波斯湾,某些居民点的日常生计仰赖于从印度和埃及进口食品。甚至在盛产稻米的中国沿海各省,16世纪那时的人口也已如此密集,以至不得不从东南亚人口较少的农业区进口稻谷。亚洲的历史学家认为,作为远程贸易的先决条件,资本与商人之间不言而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至于我,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商人这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必定要成为资本的合法所有者、经营者和获利者。

过去的亚洲商人承担着资本主义的众多职能,但在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的压力下,商人同资本家以及同其他社会集团的分离却长期存在着。近东、印度、中国和日本虽然已有前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但在这些国家,商人和银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护 and 受国家鼓励的公共事业中进行投资。欧洲商人出资认购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和尼德兰共和国发行的债券,虽然不免冒点风险,但这些债券受到法律的承认,并且有抵押的价值。印度和中国商人也向权贵放款或协助后者代征捐税,而他们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商人力求攫取更多的利润,但与世袭的官僚和地主相反,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

在亚洲各国的社会里,土地和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是可以分割的——只要拥有足够的购买力,就能购买土地和雇佣劳工,唯独商业资本却完全掌握在商人的手里。亚洲的统治者似乎并不考虑这样的问题:授权臣民进行商业投资,使国家取得经常性收益,这比直接向商人征税更加有利可图。1800年前亚洲的商业资本主义确实十分强大,但他们的法律地位并不确定,而且不受社会的重视。印度洋的远程贸易显然是一种资本主义活动。从事养蚕、缫丝、织布、金属冶炼、香料种植等活动的报酬都

与左右商品交换的价格机制相联系。此外,在亚洲,国家很少顾及批发商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商人经常利用有关商业契约和债务的法规来控制 and 压迫手工业者,但官吏很少利用职权来支持商人,除非其中夹杂着他们的私利。1742年,在印度西部的苏拉特港,政府与当地的棉布织工发生了冲突,全体印度族织工举行罢工,拒绝履行他们对商人的承诺。商人最终不能强制织工复工。

由此可见,亚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不可能与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相同。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依我之见,所谓手工业者受批发商统治的见解,不完全适用于亚洲的情形。至于商业资本和工业生产之间的联系,根本的原因实际上不在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相辅相成,应该到别处去寻找理由。亚洲商人直接参与工业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市场的特殊需要:工业产品的相对成本、品种和特征,交货时间,运输,资金和劳动力的供应以及商业风险。相反,手工业主何以从当地自给自足的生产体系转而开辟外地和外国市场,说明他们的动机势必更要困难得多。在欧洲的工业历史上,破除封建生产方式可以充当这个问题的答案。适用于亚洲的解释模式则不同:一方面,伟大的亚洲文明在历史上很早就发展了专供出口的工业产品,并积极参与了国际贸易和经济交往;另一方面,亚洲国家以农户为基础的地方经济主要生产日用消费品。这些手工业生产达到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平衡,劳动者亦工亦农的双重身份正是这种平衡的反映。如果以上停滞不变的形象果真符合历史实际,人们就无从理解为什么手工业者竟要受商人的控制。实际上,就工业活动而言,亚洲地方生产系统的形象不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因此必须看到,究竟是什么历史因素能够影响商业和工业之

间的交换机制。

至于手工业者向城市的迁徙,原因之一就是人口激增和耕地不足。这里特别值得查考的是,究竟在什么历史时期,半工半农的不熟练手工业者逐渐演变成脱离农业生产的熟练工匠。只是因为工艺高超和产品优美,织锦、象牙雕刻或瓷器制品才受社会的赏识。

每一个社会,不论其价值尺度如何,无不追求高质量的产品。某些社会集团对不在当地生产的奢侈品的偏爱构成远程贸易的温床。例如,15世纪日本贵族对中国丝绸的向往,使葡萄牙商人得以建立起远东最有利可图的商业网。然而,奢侈工业品贸易本身还不足以说明手工工匠的专业化以及手工工匠进入商品交换的领域。在整个亚洲地区,经营粗布、陶器、铁器和铜器等一般物品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富人和普通人都得购买这些日用必需品。吉达和麦加一年一度在朝觐期间举办布市,埃及和印度西部的廉价纺织品极其畅销。对工业品的这一巨大需求导致了大规模的定期海上贸易,其原因显然来自社会方面:根据传统,穆斯林朝圣者在向圣地进发前,必须身穿专门的白色衣服。事实证明,朝觐期间的棉织品贸易为古杰拉特和德干地区的许多城乡织工提供就业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向红海出口的专用布料在印度国内也有销售市场。因此,棉布生产者推销自己的产品有两个市场可供选择。还有别的例子也能说明以上事实。布帛在中国是一种财源,政府用以支付实物工资,向部队供应军服,或向北方边境地区出口,换取游牧部落的马匹和牲畜。

对外封闭、丰衣足食的村社形象一度使19世纪欧洲的观察家为之神往。马克思曾经说过,印度和亚洲的生产方式建立在

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在印度，村社赖以存在的基础还要加上土地公有制（村社制起源于中国）。事实今天已经证明，村社制的形象是由历史学家和殖民主作为诞生中的工业社会的对立面制造出来的。杰出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莎兰认为，即使在石器时代，交换价值和商品交换已是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的观点，我将试图作一大胆的归纳。在我看来，熟练的手工工匠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劳动形式，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手工业者的社会价值在于他能生产手艺很高的产品。为此，他不仅要具备相当的天赋，而且还要经过长期和精心的培养。潜在手工业者的家庭或种姓为传授这些手艺提供必要的环境。战争、饥荒、瘟疫等偶然因素破坏着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赖以存在的基础，恰恰也正是这些天灾人祸迫使某些手工业者为维持生计而从事半工半农。在亚洲历史上，手工业者的流离颠沛和苟且偷生是十分常见的事。在19世纪初，当清政府下令禁海和关闭厦门港时，受洋人商船吸引的丝绸和瓷器制造商迅速南迁广州。迁移的原因正是为了躲避天灾和政治压迫，或者由于经济机遇的减少。

近几年来，历史学家正讨论在亚洲手工业生产中是否以“外包工制”（putting out system，法语中又称“家庭劳动”或“来料加工”）为主的问题。

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历史时期内，人们找到市场的两种组织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独立生产者自主经营，自冒风险，产品通常出售给经纪人或批发商，价格由双方自由议定。第二种形式是手工业主从商人那里接受预付款或原料，约定期限，提供一定数量的产品。不论产品用于出口或供应当地市场，手工业主都

需要事先知道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在当地的集市(每天一集或每周一集)上,消费者的偏爱既为大家所熟知,五金和陶瓷工匠可以确定自己的产品规格,并利用既有的经验,控制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但是,对当地销路有限、主要供出口的产品,风险就由批发商承担。在细布、丝绸和精瓷的生产中,经常采用预付金制度。直接参与制造全过程的手工业主善于挑选和鉴别质量最好的棉纱、蚕丝和瓷土,而批发商或中间商则不具有这样的技能。

亚洲采用的预付金制度不同于16世纪欧洲呢绒业的“包买商制度”(Verlagssystem)或“外包工制度”(putting out system)。预付金制度起源于亚洲经济的商业结构,而并不是生产方式或统治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

总之,我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在亚洲,正是批发商和中间商为前工业时期的工业生产长期提供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法:谢谢乔杜里的精彩发言。我们将继续谈亚洲,请加尔各答的巴伦德教授对印度资本主义的原始时期作进一步介绍。

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因素

巴:我法语讲得不好,只能介绍当今印度史学界探索中的几条路线。

印度资本主义是个与现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概念。而现时与过去的历史延续性却往往不被人们所看到;显而易见的理由是殖民统治的影响。可是,根据印度的历史分期,人们可以认

定,12至17世纪期间正是印度资本主义的原始时期;印度资本主义不仅是殖民制度从外部引入的,而且也是在印度屈服于殖民统治后,经过内部演变而产生的。

印度历史学界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有的已经公开发表,其他的尚待发表),提供了许多为欧洲历史学家通常不了解的新材料,这些极其独特的材料——行业工会中资本积累的方式(穆尔塔哈尼银行家),孟加拉、印度南部、德干、拉贾斯坦等地区商业网——堪与同一时期的欧洲进行有益的比较。工业家、银行家和商人向手工工匠提供一定的贷款,后者从事小型的作坊生产,其产品如织物、硝土、鸦片、药材等则在广大的市场销售。所有这一切都是与欧洲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具体素材。

我请诸位注意苏联历史学家切希洛夫关于恒河平原商业基础系统和沿海地区交换体系的研究。这项研究正在进行之中,旨在揭示印度次大陆手工业生产和远程贸易之间的紧密联系,与欧洲同期的情形恰相一致。

我们还想到“城市”商人和大地主阶级之间的抗争,特别是在17和18世纪的改革期间,我认为这段历史应作为封建的反扑而加以考察,它与欧洲的历史十分接近。

再说,即使在英国的殖民时代,印度的商人和银行家为维持自己的地位而组织了起来,因而在依附殖民制度的同时,仍保留着对许多重要部门的控制,特别在公共工程(道路建筑等)部门,委托代理制使他们得以从事地产投资和在地产转让中获利。随着印度城乡手工业在欧洲的竞争下纷纷破产,他们趁机在加尔各答、孟买、德里等大城市建立起工业网。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专家们认为,以上情形使土生土长的印度资本主义具有买办性。我的简短发言是想说明,印度商人和资本家对世界殖民体系的

依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的连续性。

法：我们就此告别亚洲，转而以布罗代尔十分关注的巴西为例，介绍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迟缓发展”。现在请巴西驻欧共体大使切尔索·富尔塔多讲话。

巴西的资本主义：增长或发展？

富：在巴西，人们普遍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是社会异质性扩展的结果。这个论点与今天上午谈到的论点恰好相反。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并没有铲除社会不平等——不平等过去存在，现在依旧存在——，但资本主义同时带动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工资的提高。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过程。在巴西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滞后的国家，人们观察不到社会同质化的趋势：正因为如此，研究巴西的特例可以使我们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

作为巴西战后发展的重要因素，工业化并不是推行一项有的放矢的政策的结果，而是为维护传统结构采取的临时措施促成的间接后果。巴西政府大量收购咖啡，加以储存和销毁，人为地制造国内市场需求和防止国外市场的削价，这一切使巴西在30年代迎来了工业的巨大高涨；到了50年代，巴西政府又进一步在进口问题上采取了歧视性措施，对进口货物作出“重要”和“不重要”的区分，为巴西的工业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工业化过程伴随着传统出口业的危机,由此便带来了各种负面后果。例如,初级产品的出口使经济基础迟迟不能适应工业化的要求。战后立即制订的第一项投资计划——旨在发展医疗卫生、食品和运输等基础设施——因资金不足而搁浅。一直等到1955年,终于创办了一家发展银行,为建设运输和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同样,只是在50年代末,人们才注意克服因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而日趋严重的地区差异(贫困地区的境况更加恶化)。

最严重的后果无疑是收入的两极分化。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优惠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没有适当的税收政策,贫富悬殊突出地表现为高收入阶层的铺张摆阔,而平民大众的生活条件则止步不前。

巴西的工业化过程固然改变了社会的结构,但它在政治上也引发了种种困难。直到1930年,巴西的社会结构与上个世纪殖民时代末年没有很大的不同。国民经济始终建立在出口热带产品的基础之上,主要财政收入始终仰赖外贸。全国4/5的居民生活在各大种植园中,直接受大地主的支配。只有集中在城市中的少数居民能在大地主之外参与政治生活。选举实行公开投票,仅具象征性价值。包括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在内的行政当局全都置于地方权贵的严密控制之下。作为地方权贵利益的代言人,各州政府决定共和国总统的人选。更何况,掌权的人拥有维持自己地位的各种手段。以上正是30年代以前巴西的情况。

然而,近50年以来,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国营企业比重的增长,传统政治体制的基础开始动摇。由于城市区域的文盲率较低,大部分选民在选举中不再受传统权贵的有效控制。这种倾向在1946年选举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而代议制民主的建立又进一步强化了以上的变化,直到1964年发生军事政变为止。1946至1964年期间,行政权掌握在一些新型政客的手里,他们依靠的选民各有自身的利益,因而在政治上采取相对独立的立场。然而,这些政治新贵从未取得传统的统治阶级的承认:由此出现了种种尖锐的冲突,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就是热图利奥·瓦加斯的自杀(1954年),雅尼奥·夸德罗斯的辞职(1961年)和若奥·古拉特被武力推翻(1964年)。

近几十年来巴西政治生活的极度动荡,原因正在于我刚才提到的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对顽固守旧的统治阶级,新兴工业家对大政方针的决策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确实,工业为支付进口的设备和中间产品,所需的外汇长期要靠出口部门予以提供,而投资的资金又需国家筹措。最后,工人阶级的态度又使工业资本家不能为所欲为。与19世纪的欧洲不同,巴西的城市化进程并未随着工人人数的迅速增多而加快产业结构的改组,产业工人的素质良莠不齐。工业化没有导致传统手工业的解体。第一代巴西工人没有意识到工业化给他们带来了社会地位的下降。他们出身于十分落后的农村,相反为自己登上中产阶级的第一级而感到庆幸,他们的阶级觉悟十分低下。

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大中城市,很多城市居民由无业游民所组成,他们四处打杂,特别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这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低于市区的法定最低工资收入者。如果不考虑巴西乡村结构的特征,人们很难解释这些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的原因。

除个别地区例外,巴西的农业技术水平十分低下,随着土地天然肥力的衰竭,农产品成本日趋增加,特别在远离主要消费中心的农业地区,运输不便更相应地提高了农产品成本。

根据 1975 年的普查,平均占地面积为 3.45 公顷的小农户约占农户总数的 52%,但他们拥有的土地仅为全国耕地面积的 2.7%。大中型农庄的种植面积仅为所占土地面积的一部分,而绝大多数乡村居民却处于无地或少地的状态。从 1950 年普查到 1975 年普查,人们注意到,小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减少 25%,而小农户在农户总数中的比例则由 34% 上升到 52%。由此可见,大部分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因而纷纷涌入城市另谋生路。

社会基础的大变动造成了传统的统治阶级与成份不一的城市大众的对抗,这不能不导致巴西政局的动荡,并为 1964 年 3 月的军事政变提供温床。军政府既没有触动土地结构,又没有改变政体框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也始终原封未动。“奇迹”时期的经济增长,加上外债的激增和收入的两极分化,使巴西在朝稳定的社会形态方向前进的道路上更加步履维艰。可见,巴西的实例表明,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同时,人们为着经济增长而牺牲了社会发展。

法:感谢切尔索·富尔塔多作了以上的发言,现在请匈牙利历史学家拉兹洛·马凯谈谈他对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

技术、科学和社会

马:费·布罗代尔说过:“历次经济或社会大发展都以技术为

支柱,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是女王:技术改变世界。”他又说:“技术贯穿于全部人类历史。所以即使研究技术史的专家也几乎从未完全掌握技术史。”他随后又问:“是否有纯技术的存在?”他的答复是否定的。

可以肯定,具体的技术仅在农庄、作坊和工业企业中才能让人用眼睛看到和用手摸到,但农庄、作坊和工厂这些组织对特定社会关系的依赖却要胜过对技术进步的依赖。费·布罗代尔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为此写道:“技术如果不是从一场革命向另一场革命前进,它就停滞不前。从种种迹象看来,减速因素似乎不断在起作用,我很想进一步强调减速因素的影响,但这又谈何容易!”

以上含意深远的论断为研究技术在文明历史和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开辟了崭新的前景。如果说技术在进步中会遇到障碍,那么,因遇到障碍而放慢了前进步伐的技术,一旦摆脱了束缚以后,就会以革命的形式释放出潜在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在全部人类历史上,技术始终是个独立的存在,但如果只注意技术实践,而不注意人类社会实践,只看到障碍,而看不到潜能,人们就不可能完全认识技术本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外化(通过从劳动动作到工具和从思维到有声语言的转化,人补充和强化自己的生理机能)使劳动与具体的个人相脱离,并成为可以转移、交换和积累的客体。头脑中的信息与记忆留下的信息完全相同,而信息则通过书写、印刷、录音机以及计算机转化成为客体。

信息因此进入了技术领域。在与技术的相互影响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外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 展演变的主要手段。与历史上所有的长时段相比,技术的寿命最长,因为技术发展过

程同时又是人作为主体和客体的演变过程。

可见,技术进步的永恒性和持久性是毋庸置疑的。费·布罗代尔写道,总有成千上万种潜在的革新在睡大觉,有时被视为儿戏,有时被当作空想。为此必须找出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障碍首先来自社会方面。为了克服某些原材料不足的困难,必须寻找新能源和发明适用的工具。没有人口因素或社会因素的驱使,技术将停滞不前。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情形是个极好的例子,直到欧洲殖民主抵达前,当地土著人只会使用最简单的工具,而早在新石器时代,弓箭已在各地得到发明和广泛应用。技术停滞不前的另一典型例子是1348至1351年黑死病猖獗后的100年期间,恰巧是布罗代尔在《物质文明》三卷书中论述的那个历史阶段的初期。当时,尽管在机械和能源方面已经万事俱备,但由于社会条件尚未成熟,工业革命迟迟未能发生。技术革新的重大成果集中在军事艺术和传播领域,如火炮、印刷、航海、拖车等。当时的资本主义由战争和贸易所供养,从城市和港口出发,进而向周边的市场扩展影响,最终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费·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的活力”一文中写道:“科学只是后来才慢慢成为技术的上层建筑;科学尽管姗姗来迟,但每次都应邀赴约。”

然而,到了17世纪,科学就不再姗姗来迟了,而这又全靠技术的帮助。确实,伽利略、托里拆利等当时的大学问家同时也是精通技术的大发明家。他们发明制作了研究工具、钟摆、温度计、晴雨计、望远镜以及各种计量工具。正是通过对物质和能量的正确计量,人们终于实现了半自动化和自动化机械的标准化;可见,精确计量器械的发明是成批生产的先决条件,是培育资本

主义成长的真正温床。

布罗代尔说,技术是女王;借用这个比喻,我想补充说,“若不是与女王相匹配,科学还将迟迟不肯展露风采”。17世纪正是技术和科学订婚的年代;二者只是在19世纪才正式结婚。布罗代尔断言,工业革命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他说得一点不错。但工业革命也同样不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是在中世纪技术革命影响下自发出现的。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在资本一手操持下生产和科研喜结良缘的时代。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礼拜堂日趋没落,实验室欣欣向荣。”就在这个时候,技术才真正是女王;她与科学的喜结良缘,使她得以改变世界。今天的科技革命正是这对夫妻的婚生子。科学在实验室里变成了技术。而技术则在理工大学中变成科学。在由此建立的君主立宪制王国中,社会扮演议会的角色。在布罗代尔看来,社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宰着技术和科学。不过,社会的需要依旧听命于社会的上层阶级,也就是登上社会巅峰的资本家。

法:感谢拉兹洛·马凯对布罗代尔在技术问题上的见解作了分析。现在,纽约州立大学布罗代尔中心主任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将介绍布罗代尔的著作以及他对认识资本主义方面作出的贡献。

资本主义是市场的敌人吗？

沃：在 40 年以前，市场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似乎是相当清晰的。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要素，市场规定着资本主义本身；不仅如此，人们照例拿资本主义与两个小前提相比较：一方面，封建主义位于市场的上游；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位于市场的下游。人们往往称封建主义是前市场体系，而社会主义则是后市场体系。

今天，我们再也不能拿这个粗浅的公式当作分析的基础了。并非因为这个公式过分简单化，而是因为显然大错特错，理由至少有以下三项：

自 1945 年以来，对封建社会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种种事实表明，人们不能把封建社会看作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框架中完全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结构。实际上，市场遍布各地。作为一个历史体系，封建社会自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而市场经济则与这种逻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制显然与资本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商品经济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一般说来，市场或者有很大的地方局限性，或者面向远程贸易，区域性的市场网络实属凤毛麟角。大宗贸易以奢侈品为主要对象。然而，随着人们仔细观察市场现象，在封建社会中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差异就显得不是那么鲜明了。

同样，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近几年来对市场颇多器重，其表

现有以下两方面。首先,越来越多的分析家一致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或共产党国家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其次,在社会主义集团中,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曾就开放国内市场的利弊进行过长时间的辩论;“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也由此而问世。

总之,封建制也罢,社会主义也罢,实际情况都与以往的理论模式相违背;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现实也表明,这个理论模式是错误的。布罗代尔的著作在这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物质文明》三卷集的要害所在正是作者把经济实在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而使用市场一词仅限于三者之一。尤其,他还对市场和垄断之间的关系重新作出阐述。人们通常把竞争和垄断视为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非此即彼的两极。布罗代尔则不然,在他看来,竞争和垄断是势不两立的两种结构,而唯独垄断才称得上是“资本主义”。

他因此颠倒了争论的命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历史体系的核心因素不是市场,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对市场的垄断,如果说真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恰恰就在这里。布罗代尔的这个见解确实称得上是一场革命,可惜至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与布罗代尔的见解殊途同归。其中最根本的共同点之一正是认为资本主义竞争是合乎规范的,而垄断则纯属例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必须说明垄断的本质;必须反对垄断。在人们的头脑里——不仅是普通百姓,而且是专家——,这一意识形态至今还根深蒂固。

但是,从统计的角度看,完全不能说垄断是稀有的现象。只要读布罗代尔的书,有关事例多不胜数:垄断不仅在资本主义条

件下始终存在,而且起着第一位的作用。更何况,资本积累得越多,资本家实施垄断的能力就越大。几乎可以说,资本家积聚资本的能力建立在他们组织垄断的基础之上。

我以为,通过阅读布罗代尔的著作,人们可以得出与先人为主的成见针锋相对的三项重要的教益。第一项教益关系到资本家的分门别类:商人、工业家和金融家。在近代历史上,为了揭示不同部门在不同时期的统治,已经打过不知多少笔墨官司,而且笔墨官司还将继续打下去。人们仿效自然历史,炮制出所谓从商业资本发展到工业资本,然后再发展到金融资本的理论模式。由此对农业资本家的作用便产生许多模糊观点,甚至对农业资本家的存在与否也都搞不清楚。

然而,这一切都是无的放矢。布罗代尔清楚地指出,大资本家从不作茧自缚,很少专门经营某个行业,总是力图囊括一切,兼顾商业、生产和金融等领域。惟其在这方面都站稳脚跟,资本家才有攫取垄断利益的希望。不具备以上条件的人才专门经营某个行业,从而成为单一的商人或工业家。

因此,值得加以强调的并不是在商人、工业家、金融家等行业之间的区分,而是在专业化的下层和非专业化的上层之间的区分。当然,在两种区分之间——第一种是行业的区分,第二种是规模的区分(大的和小的,地方的、民族的和国际的)以及垄断和竞争的区分——,也有着十分紧密的相互关系。

在这一见解得到确认以后,其他几个无的放矢的问题也就不攻自破:资本国际化的具体日期(垄断历来就是国际性垄断);资产者的“见异思迁”(面对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资本随垄断的逻辑,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至于英国为何于18世纪末发生所谓工业革命,对这个问题就要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

换句话说,怎样说明当时纺织品生产所得的垄断利润足以对大资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第二项教益并不纯属布罗代尔的功劳;但他的著作确实使我们能够打破矢口否认垄断具有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倾向。没有政治作后台,谁也不可能独揽经济,更不能有驾驭市场的能力。为了对经济活动设置非经济的栅栏,为了让桀骜不驯的价格唯命是从,或为了保障非优先项目的采购,必须由某一政治权威施行强制。所谓没有国家为后盾或与国家作对的资本主义,纯属无稽之谈。我这里所说的国家不一定是资本家所在的那个国家,有时正相反,是别的什么国家。

如果以上阐述合乎事实,现代世界中左翼和右翼的党派斗争的全部意义也就发生改变。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党派斗争从不围绕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是否合法的问题来进行。由于国家是资本主义体系得以运行的基本因素,争论的焦点就无非是谁在国家的干预中直接受益而已。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不受党派争论的迷惑。

最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绝大多数追随者对科技进步趋之若鹜,而布罗代尔却告诫我们对这种狂热持克制的态度。每次科技大跃进都给垄断追加动力。而在与垄断的不断较量中,市场赢得的每一个回合(扩大竞争领域,降低成本、价格和利润),又势必要求科技实行新的跃进,以便重新开创一个在30年内可获高额利润的垄断部门,使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和资本家的大公司重整旗鼓,再展宏图。

以上都是我对布罗代尔的赞誉。现在我想强调,布罗代尔的论断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有危险。一不小心,人们很容易想入非非地误认为这是自由自在的小人物对仗势欺人的大人物的

反抗,由此向新布热德主义演变,也就只剩一步之差了。

为了避免达到这样一个倒霉的结局,我主张应回到法国大革命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口号上来(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一书中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人们总是把这个三位一体的口号当作三个不同的概念来分析。将近 200 年以来,人们为这三个概念究竟有多大的兼容性而争论不休。自由和平等难道不会导致博爱的反面吗?如此等等。

我们或许可以借鉴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重新考察这个三位一体的口号。既然市场(小人物的天地,自由的天地)不断与垄断(大人物以强凌弱的领域)较量,而垄断的存在又全靠国家撑腰,反对不平等的斗争岂不同时关系到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垄断集团的统治在经济上否定自由和平等,势必也要在政治上和在文化上否定自由和平等。因此,赞同布罗代尔含义上的市场经济,我以为归根到底也就是为争取世界的平等、人类的自由以及人类的博爱而奋斗;根据逻辑推理,开展这样的斗争,就不允许存在上等人 and 下等人的区分。也许,布罗代尔所说的市场的胜利不但不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反倒是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如果这是对布罗代尔思想的一种歪曲,这种歪曲该是多么好呀!

显而易见,我们现在讨论的内容不再是以往的历史,而是正在建设中的未来。正是在这里,通过阅读布罗代尔的著作,我们可以得出最后一项教益。要让市场获胜,这是天大的难事。在某种意义上说,近 500 年来的历史是市场节节败退的历史。布罗代尔告诉我们,市场如果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构成市场的人始终没有认输。他们每天早晨都卷土重来,坚持不懈地与垄断作斗争,破坏垄断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迫使垄断集团就范。

法：谢谢。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的讲话引起了全场极大的轰动。现在请费尔南·布罗代尔回答今天上午大家直接地或间接地对他提出的问题。

为发展经济史而努力

布：保尔·法布拉，我先从您开始。您试图对所谓经济世界的概念提出异议；简单地说，因为这个说法不是经济学家的惯用术语。我身边就有一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他会为我辩护。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和我本人，我们所说的“经济世界”，是指本身构成一个经济整体的独立世界。决不可把经济世界和世界经济相混淆。当然，世界经济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经济世界。您上午说，我认为在任何经济世界中，周边地区注定要比中心穷。今天，西方国家就构成一个经济世界，这个经济世界的结构相当严密，其中心暂时位于纽约，欧洲的位置不在周边，但在中心的外围。保尔·法布拉以为抓住了一个有力的论据，他说：“欧洲地处外围，而其生活水平赶上了美国，这与您提出的论断相矛盾。”我觉得您的论据不太好，因为您只提供了一个指标：欧洲的生活水平与美国人不相上下。我承认德国、瑞士甚至法国的情形确实是如此，但英国则肯定不是。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这究竟是属于长时段的现象或者暂时的现象。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违背游戏规则的水平差异是否能够持久。对经济世界的判断是要在长时段中作出的。您如果能对这些问

题作出答复,我将不胜荣幸。

法:承认您说得有理,这对我是件高兴的事。

布:我希望大家也让我感到高兴。

法:您的论据太巧妙了,因为我不能作出答复,而您自己也回答不出。

布:不,我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现在还不到作出定论的时候。要等50年以后再看。

法:如果必须等50年以后再看的话……

布:我很有耐心。我能够等上50年!对法布拉这样一位可爱的同事,真不该找他的麻烦,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说的并不完全有道理。

法:我同意。

布:不,您不必轻易就同意……如果经济世界不是长时段的结构,那就应该把它搁在一边。

法:我有一个说法或许可以调和……

布:不,我宁愿各人坚持自己的立场……

法:在经济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生活水平高于外围,更高于更远的周边地区;产生这种水平差的原因也许是外因作用的结果(所谓外因也就是非经济因素),而经济因素则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市场起着一定的作用。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记者时,人们对共同市场有很多议论。当时,反对共同市场的重要论据就是不可能把荷、比、卢和鲁尔等经济繁荣的地区同法国和意大利等落后地区网罗在一起;否则只会拉大二者之间的差距。皮埃尔·孟戴斯-法朗士甚至预见会有大批法国工人向鲁尔地区迁移。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差距反而有所缩小。

布：您把共同市场当作一个经济世界，其实共同市场只是经济世界中的一部分。中心在哪里？西德在共同市场各国中当然扮演着主角，但其原因还在于它同纽约的关系较近。

法：您的论据里有一点让我觉得别扭。如果过50年后，果然发生了水平差，或者说，如果西欧的生活水平那时低于美国，这就证明您说得完全有理。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形，您就会说：经济世界改变了中心。总之，说来说去，总是您有道理。

沃：不，问题不是这么提出的。这里需要问的是，过50年或100年后，经济世界的结构是否会发生彻底的变化。保尔·法布拉，根据您的展望，各行业、各地区的生活水准将产生某种趋同的倾向，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理论则认为等级制和两极分化仍将存在。至于某些地区的更换角色，这丝毫也改变不了结构。即使欧洲的地位变得比美国更加重要，只要还有中心和周边的存在，经济世界的理论还始终有效。当然，这一理论也说明更换角色的理由。

布：保尔·法布拉，您对“外因”一词的用法让我有点吃惊。您似乎在说，当非经济因素在经济中起作用时，这些因素便是外因。显而易见，人们可以说，决定欧洲在经济世界中的地位并不取决于非经济因素，而是取决于经济整体。经济世界中心的地位始终高于其他地区。这不等于说，美国的平均生活水平高于欧洲。对于高级地区，我们的提问方式应不同于外围或周边地区。

我们现在再谈钱拉·若尔兰在同一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我和他是老相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我从没有听到他作过像今天上午那样的精彩发言。但这不等于说我完全同意他的见解。他从我这里借用了“作弊”一词。他认为作弊是资本主义作

为上层建筑所具有的特征之一。资本主义在作弊时简直不择手段。但使用作弊一词,似乎隐藏着道德判断的含义,这并不恰当;该词最先是我想用的,过错也应由我承担。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任务既不是要判断资本主义的好坏,又不是要认定它守规矩或玩花招,而是要认识它和理解它。

若:我用了“作弊”一词,正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您曾多次说过:“资本主义是作伪的游戏”。

布:“作伪”一词也有道德判断的含义。

若:当然是的!

布:我们不如说,资本主义玩的是另一种游戏。在经济的三个层次中,一个玩多米诺骨牌,另一个玩轮盘赌,第三个玩扑克。三种玩法各不相同。至于我,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我玩的游戏不能同洛德希尔特相比。洛德希尔特并不针对我而作弊,只是我不可能像洛德希尔特那样玩游戏而已。

若:千真万确,我完全同意……

布:先别说同意!

若:我发言的目的是要指出,根据游戏理论去思考经济,确能给人有益的启示:根据数学随机理论的规定,赌博可分为两种,一种赌博全凭运气(输赢机会从长期看是稳定的和公平的),另一种则是技巧也起一定的作用(输赢的概率是不稳定的);这种区分可以照搬过来说明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区别。

布:你对游戏理论的借鉴十分合理,因为它不包含任何道德判断的内容。

回过头来再谈保尔·法布拉。据他说,真诚的和透明的竞争(这是德国经济学家的用语)就是我所说的市场,但竞争在顶层——即在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也同样存在,因为即使强者也

不得不屈从于政治经济学的倾向性规律。

法：您坚持认为，在您所说的市场这个层次，竞争是透明的，但在更高一级，竞争就不透明了。在一定限度上，难道人们不能提出相反的见解吗？事实是，初级市场并不存在很多的透明度：在大多数市场上参与竞争的小企业甚至都没有帐目。在大企业里，人们可以说，至少帐目的透明度是相同的。

布：这是帐目的透明度，但不是游戏的透明度。帐目是恢复游戏本来面目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也可以说是一份文书。

法：依我之见，作为最高层次，资本主义善于运用和利用市场法则；它明白能从市场法则中获得什么好处，由此再说资本主义接过这些法则，为己所用，不过一步之差……我并不因此跨出这关键的一步。我只说，跨国公司完全懂得市场的运作机制，它们有能力分配自己的投资和生产项目，从而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丝毫不等于说，它们凌驾于市场法则之上，我们今天经历的危机足以证明，跨国公司竟是多么脆弱。

布：是呀，因为您认为市场既在经济的最高一层，又在中间一层。

法：确实，成问题的正是市场的这种分身术，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交换经济”，因而也是市场经济。

布：我们且更换市场一词。我们由此可以说，过去曾有过一种交换经济——我认为是透明的——，由交易会和集市为代表，随后又有一种不透明的交换经济，由阿姆斯特丹、威尼斯、安特卫普、马赛等地的大商人为代表，而大商人则利用灵通的消息……

法：这正好证明，当时的市场还不十分完善，相当简陋。信息流通不快。

布：消息只在少数人中间流通。

法：说到底，总应该承认，伟大的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演变都有了清楚的认识。就以大卫·李嘉图为例，我认为他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当然您不十分喜欢他……

布：不，我喜欢李嘉图；我不喜欢的那位是让·巴蒂斯特·萨伊。

法：李嘉图曾说过，所有的市场都带垄断性，不过在短期内而已。据他看，产生竞争的根据是，从交换开始的那时起，这种垄断地位便不能维持下去。一些人保留垄断的时间可能长些，但其他人只是几天乃至几小时。

沃：在短期内获得的垄断利益并不仅仅能保留几天，不如说能保留几十年。就拿钢铁为例。钢铁在 100 年前还是垄断性很强的产业部门；“卡特尔”一词恰恰来自这种生产性垄断。某些大公司垄断着当时的钢铁生产，并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但是，钢铁市场既广，对钢铁的需求随之增加，所有人都开始生产钢铁：首先是印度，接着是韩国。因此出现了名副其实的竞争局面，钢铁的赢利日趋减少，美、法、英、日等国的大公司纷纷撒手，让别人去搞了。今天，计算机技术还是一种垄断，明天说不定是生物工程或别的什么部门。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人们势必危及垄断，但在丧失垄断时，人们累积的利润已经相当可观了。

布：沃勒斯坦的表述是我的表述，而不是您的表述。保尔·法布拉，您借用市场一词来反驳我们对垄断的论述，但这不能帮助您理解我们的论述。

法：不是反驳，而是同你们一起探讨。从你们选择的长时段视野看，照你们的说法，垄断与市场法则并非绝对矛盾。以钢铁生产为例，垄断延续了 50 年乃至 100 年，这就表明，先垄断后市

场的格局(为李嘉图所默认)终究得以反复出现。

沃:市场再次产生垄断!此外,还有资本的积累……

法:至于资本的积累,一部分钢铁生产者蒙受了损失,这要怪他们自己没有本事。

布:请看工业革命时的情形。这一现象并不是在经济的上层,而是首先在下层出现的。纺织业的革命几乎自动形成,资金全靠企业主自己筹集,只是在1830年前后,伦敦资本家才开始控制纺织工业。当他们发现纺织业的利润不够丰厚时,他们便放弃纺织业,改营铁路运输。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特征,正是它有从一种垄断转向另一种垄断的可能。

保尔·法布拉刚才提到,我感兴趣的历史是长时段的历史。长时段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并非因为我感兴趣,而是因为它构成人类历史的深层,正是深层的历史决定着历史的结构。长时段是我划定的坐标轴线,我提出的这个或那个问题无不与这些轴线相比较。一种垄断不再时兴了,新的垄断又重新出现!资本主义不免一死,但祖父和父亲死后,子孙辈仍将生息繁衍。

资本主义的好处和优越,正是它有多种选择的可能。至于跨国公司,它们今天并不代表着“出类拔萃”的经济活力,而只反映着资本主义大企业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顶点。大企业从不是具有最深远意义的技术变革的发源地,这些技术变革全都来自基层。大企业知道技术变革的存在,但只要旧技术能使它们获得丰厚的利润,它们就决不会使用新技术。

中世纪的工业革命

现在我想对我的朋友拉兹洛·马凯发难。你对我说了那么多的恭维话,而我偏想同你逗趣,这委实太不讲道理了……同某些经济学家(法国的或别国的)一样,你对技术革新的社会起因不闻不问。你是中世纪史的专家,而中世纪史的学者正起劲地宣扬中世纪的工业革命。你相信真有中世纪的工业革命吗?

马:是的,但这是一场技术革命。

布:我可不再相信了。真正的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因为它接二连三地推出了众多的革新。换句话说,只有当革新导致连锁反应时,才能算是工业革命。风磨和水磨在被模仿的过程中虽然有所改进,但其他技术还留在原地不动。正如纺织技术和焦炭炼铁技术一样,我们至今还大体上停留在当年英国的水平。18世纪的工业革命没有促成某种平衡,平衡几乎是自动打破的。

马:依我之见,技术革新的社会起因正是技术进步本身,技术进步自发地存在着。至于技术演变中的社会因素,那就是制约的因素。

布:是的,但遗憾的是技术今天不再受社会的束缚,或者束缚力很小。一项革新等上三、四年时间,就再也束缚不住了。

马:确实,在11、18和19世纪等危机时期,社会因素的束缚比技术进步本身显得重要得多。但技术演变是自发产生的,几

乎可以说是人的生理反应。无论想要做成什么事,人总是在换新花样。您甚至说过,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上,始终存在着各种潜在的革新可能。例如古希腊的发明家希罗,文艺复兴时代的列奥纳多·达·芬奇……革新是幻想,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出现的游戏。资本主义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无非是使技术摆脱这些社会束缚而已。

法:如果我对讨论的议题没有搞错,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中世纪的技术革新能否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

布:挽牲畜的颈轭和肩轭,船舶的舵舵,这些新技术的出现,都不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依我之见,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其力量之大,不仅能打破旧的平衡,而且还为今后的变革开辟道路。

法:“工业革命”只是一个比喻,因而有其局限性。但事实已经作出了回答。可以肯定,200年前开始的革命今天继续在进行,并且不断在加快节奏。在已知的人类历史上,我们难道能见到有什么东西能够同它相比拟吗?

布: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只有新石器时代能与工业革命相比。这场讨论本可以长时间地继续下去,但我想告诉我的朋友马凯,如果他对社会的束缚感兴趣,而我却偏偏对社会因素的促进作用感兴趣。今天,大家不再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社会对技术革新并不始终制造人为的障碍:机器人正顺利地被运用到工业活动中去。

资本主义：见风转舵的结构

布：在座诸位都是我的朋友，可我对朋友的态度简直坏透了：不但不说你们的问题提得有理，却是想方设法在证明自己有理。阿尔培托·特南蒂，您刚才作了一番精彩的论证，我不知道是否真正抓住您的意思。您似乎对我说：“资本主义不是有一个，而是有几个”。我想提醒您，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诞生的日期十分犹豫。他把这个日期定在16世纪，因为当时正值大西洋的远洋航线开通的时候。但他也曾经考虑，在12或13世纪，意大利城邦是否有过某种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我没有搞错，阿尔培托·特南蒂，您曾责备我套用旧模式来谈论新现实。

特：不，我可没有犯这一过错，但我犯了其他的过错。我曾问您：为什么资本主义只有一个模式……

布：您是说过的，“只有一个模式”。

特：此话是您说的。

布：您还说没有说过吗？在辩论中不必如此字斟句酌，到底说过还是没有说过？

特：我是在转引您的话时说过的。

布：您说只有一个模式。

特：不，我们还是把话说清楚了。我说过，您主张用一个模式去理解资本主义，而且您在解释中就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一个模式。我没有说资本主义只有一个模式，我说的是，您认为资本

主义只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基本模式。

布:对了,但不要忘记,必须用红墨水把重要的观点突出出来。我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只有一个基本模式。

特:那么,照您说,它的时间定位应该在哪里?

布:让我先把我设想的资本主义模式解释清楚。如果说我所使用的模式在弗朗索瓦一世那时、在阿尔芒·法利埃尔那时和在勒内·科蒂那时都是相同的,这里必须同时具备几个条件。我坚信这几个条件凑巧全都具备了。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是: 1. 它是一种上层建筑; 2. 它由少数资本家所组成; 3. 这些资本家拥有选择的可能,就是说,他们可以放弃某个行业,转身去搞另一个行业。

今天的资本家也好,昨天的大商人也好,他们的特征正是从来都不干相同的行当。

特:您一方面认为工业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却似乎说,工业革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性。因此,在您看来,工业革命并不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崛起。

布:这是马克思的观点。

特:不,这是您的观点。

布:不,您在为马克思的观点辩护,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若不是这一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也遵守旧规则的话,您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向您请教,因为我觉得难以接受的是,过去的资本主义怎么能与我们现时代的资本主义相提并论。

布:我曾以 19 世纪 50 年代前的法国资本主义为例。在七月王朝期间,法国工业正借鉴英国的经验开展技术改造,并且取

得了成功。技术改造早在复辟王朝那时已经开始,到路易-菲利浦当政时仍继续进行。工业家们除自有资金外,借不到贷款。他们不得不相互融资,弥补自有资金的不足:工业家在拍板成交时,给予买方一定的支付宽限,从而既使企业得以生存,又使资金有了着落。这种状况在我国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大银行才慢慢向工业投资。大银行只是从50至60年代起,开始对工业发生兴趣,法国的工业由此将改变性质。

既然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上层建筑,它势必要向下延伸,它并不离群索居,故意让自己孤立起来。资本主义有时候扩张起来,就会侵占市场经济的领地。这样说,大家都同意了吗?

沃:我们都同意。

布:真麻烦,所有的人都同意了,唯独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阿尔培托·特南蒂除外。

特:我只想知道,您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自圆其说。

布:光是做到自圆其说,还不等于言之成理。关键要看是否符合实际,要看我使用的模式是否适用。

特:对于这个模式是否同等地适用于各种经济世界和各种资本主义,我总是有点怀疑。规模的悬殊,社会政治影响的差异毕竟是如此之大,因而必须提出以下的问题:难道能把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和今天的资本主义并列起来吗?或者相反,是否存在着足以打破这种并列的一次转折?

布: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形成的资本主义与拿破仑第三那时的资本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就其结构而言,资本主义像是变色龙;变色龙改变了颜色,但还是原来的变色龙。

沃:您有点避重就轻……

布：不错，如果设身处地，您该作何答复？

沃：人类历史上曾有过几个经济世界，每个经济世界都包含某种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只有一个经济世界得以绵延长存和强化了资本主义结构。它终究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经济世界，因为它活的寿命之长，足以使真正的资本主义结构茁壮成长。

资本主义与经济世界

布：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曾与我一起讨论过好几个小时。我们的意见并不相同，我曾相信已经说服了你。但我遗憾地发现，你到头来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沃：我也希望自己的观点符合实际……

布：我没有丝毫的把握。假如能让历史重新开始，把所有事情都恢复原状，历史将成为科学，可惜历史不是科学。

诸位一定对伊玛努埃尔和我的重大分歧感兴趣。他受教于马克思，认为16世纪标志着资本生涯的开端：以损人利己而发财致富的欧洲把采用奴隶劳动经营采矿业和种植园的周边地区置于依附地位。在他看来，从16世纪起，就有一个欧洲经济世界，而这个经济世界全靠资本主义才可能存在。这是您的观点吗？

沃：不，我并不认为这个经济世界全靠资本主义才可能存在，我说的是：“经济世界本身应该有一种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就叫资本主义。”还在10年以前，我当时不认为存在若干个经济

世界,是您说服了我。今天,我承认在16世纪以前已有若干经济世界的存在,但我认为,由于其结构的内在矛盾,其他经济世界或者解体,或者演变成帝国。由于某种奇特的而又必须作出解释的原因,唯独在16世纪形成的欧洲经济世界经历了另一种命运;由此可见,正是从16世纪起,真正的资本主义才茁壮成长。

布:早在香巴尼交易会那时,随着汇票、资金借贷等经济活动的发展,欧洲已出现了资本主义。我持以上见解,自有一定的道理。说来也许会让诸位见笑,我曾读过许多生物学著作,但是毫无用处。在读的时候,我似乎全都明白,每当我想把所学的东西用到我自己的研究中去时,它们就像水一样从我的手里流走,再也别想抓住。但我总算记住了“生物进化”这个说法,历史进化很可能同生物进化一样是不可逆转的,简单地说,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

举个例子来讲,哺乳类过去是海洋生物,它们可以从海洋生物进化为陆地生物,但人们从没有见过反方向的进化,从没有见过一种哺乳动物转化成海洋生物。如果事情就是如此,那么,在海洋生物向陆地生物的进化中,陆地生物必须先期存在。由此可见,如果进化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于16世纪咄咄逼人地冒出来的资本主义必定早就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了。

切尔索·富尔塔多不仅是前部长和巴西大使,而且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经济学家,我能鲁莽地对他提点要求吗?请您告诉我们,根据您对巴西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在我们各人的发言中,到底哪些见解比较合理,特别是对我。

富:我很高兴能参加这场动人心弦的讨论;我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的问题发表意见,不仅基于本国的经验,而且还因为我在这

里与费尔南·布罗代尔已有多年的交往。

我觉得我们对概念的使用偏于模糊。对我们来说，“市场”一词可以涵盖几种不同的事实。市场显然不等于交换，布罗代尔说得对，交换是始终存在的。即使巴西的野蛮人也从事交换，随着技术的精益求精，交换已成为人际关系中的准则。但市场是一种与货币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复杂交换，这里不仅指我们日常使用的货币，而且指货币的间接形式。从货币问世的那一天起，市场的本质便发生改变；货币贯穿于交换的全过程。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的进化，人们看到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地区普遍出现了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就在那时，对交换的认识发生了全盘的改观，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之上；这种市场就是等价交换的市场。当市场实行等价交换时，生产系统由社会加以调节。社会给每个人在生产系统中安置一个活动位置。随着市场体系的普及，劳动力从此可以买卖，在交换中追求合理和精于计算的可能也就迅速得以扩张；正是在那时候，资本主义终于站稳了脚跟。可以肯定，资本主义始终存在着，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布罗代尔的意见；当有一种权力主宰市场时，那就是资本主义，因为在市场上进行的是不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之所以存在，正如弗朗索瓦·佩鲁所说，这是因为市场受少数人的控制。控制起因于革新、信息以及其他因素。然而，从市场原则得到普及那时起，控制市场的现象将逐渐普及和推广。在社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资本主义因素从此将转变成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而在中世纪，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能上升到统治的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确立起统治地位，资本积累过程便开始启动；由于与欧洲历史相联系的复杂原因，资本的积累将促成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

最后,我想就技术进步问题谈一点看法。我十分同意马凯的见解:技术进步的可能几乎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之中,但布罗代尔说得对,由可能变为现实必定与某些社会因素相联系。我们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刺激技术发展的因素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并驾齐驱。科技进步之所以构成我们时代的标志,恰恰因为它取决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市场的全面普及。

布:切尔索,我请您作为朋友帮我点忙。您应该说:“布罗代尔说得对,巴西资本家的人数极其有限。”在巴西的经济中心圣保罗,人们称资本家是“人精”(gran - finos),您知道“人精”的意思是什么,我于1939年曾见过这些高贵的人,他们财大气粗,讲究排场,少数人拥有天方夜谭般的财富。他们今天可能不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但这种状况对我是十分有利的。此外,还有另一种情形: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您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知道,巴西长期可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区域:沿海地带经济活动极其活跃,内陆却是一片荒漠。这正是经济世界体系的典型表现。

富:我运用您的长时段观点考察巴西。在文明发展的特定阶段中,正如与欧洲一样,某些因素在巴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就是对外国的依附。如果不以这个特点为出发点,人们就不能理解长时段在巴西的表现。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科技爆炸。科技的需求究竟来自哪里?显而易见,正是全球化进程刺激着对科技的需求。近30年以来,是谁为电子工业和许多其他领域付出巨额投资,从而促成了技术爆炸?

可见,在我们所处的文明阶段,技术革新的决定因素受到军

事预算的支配,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更公正的文明。

布:谢谢阁下对我的支持。现在我想挑起另一场争论。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这次请您帮我。请先说为什么国家对资本主义是不可缺少的,然后我再从反面作出回答。

国家与资本主义

沃:我相信,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这种帮助以不同的形式而出现。或者国家公开扶植垄断,压制国内外的各种竞争;或者国家帮助创建新技术部门,然而放手让资本家从中谋利。国家有几种可能,帮助大资本家建立他们的垄断。我最近见到一份统计报告,说巴西已是计算机生产的世界第三大国。因此,美国联邦政府便动用各种力量,旨在破除巴西的贸易保护,因为巴西已成为美国真正的竞争对手。美国政府能否帮助美国公司打开局面?我不能肯定,但无论如何,没有国家,IBM公司也就成不了气候。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或者利用国家给予的帮助,或者绕开国家设置的障碍:二者必居其一。

布:应该看到,社会总是一分为二: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从今天的国民收入来看,法国也是一分为二:国家和市民社会各占国民收入的一半。我并不说市民社会就是资本主义。但是,如果进行历史追溯,人们就会发现,凡在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

资本主义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法兰西王国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处:国家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在路易十四时代。在萨缪埃尔·贝尔纳(1651—1739)那时,本应该成立法兰西银行。但银行没有及时成立,因为资本家害怕至此通过税收获得财源的政府对银行资本也打什么坏主意。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乃至法国阔步前进,这是因为在一个重要历史发展关头,市民社会破除了封建制国家。这一破真是破得妙极了。当然,在今天,人们还能发现有不可容忍的新封建制的存在,但以往的封建国家业已被破除。不事先彻底摧毁国家——无论是封建国家或非封建国家——,资本主义永远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中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相反,封建制根深蒂固的日本彻底摧毁了国家,而在封建制的废墟上,资本主义——香花也罢,毒草也罢——终于得以茁壮成长。

法:听众用纸条传给我几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些问题。其中有一个是向富尔塔多先生提出的,与我们刚才的议题有关。“巴西的现状究竟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或者是因为政府当局没有及时推行改革和作出必要的裁决?”

富:我不清楚,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否暗示巴西的外债或别的什么问题。巴西的现状十分复杂,国家并不是置身于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当盘根错节地扎根于农业之中的旧势力和旧结构有国家为它撑腰时,人们不能想象国家会推行以发展工业和改良社会为中心的政策。巴西的工业化进程与传统经济的解体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传统经济的解体又与1929年以来的世界性危机分不开。近几年来,巴西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切都是工业化的产物。

法:另有三个问题要请印度历史学家回答。第一个问题是,

在印度次大陆,城市是否像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那样对经济增长起着发轫开闢的作用。

印度的例证

巴:南亚地区的城市没有起到欧洲城市那样的作用,根本原因之一是这里不存在独立的城邦。印度不承认城市自由的概念。城市实际上作为国家的政治代表,起着镇压乡村的堡垒作用。一位印度历史学家称这种组织形式是“上层的封建主义和下层的封建主义”,也就是说,大城市控制小城市,而小城市则控制乡村。当然,城市中也有集市;至于集市所起的作用,我在前而的发言中已作了阐述。

法:另一个问题请乔杜里回答:“你是否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未能在印度和整个亚洲出现,是因为一种真正的资本主义形态在当地业已发展了起来?这种状况能否与后来在日本、韩国或台湾发生的事相比较?”

乔:我在上午的发言中强调了工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区别。亚洲当然确实曾存在商业资本主义,但这种资本主义的法律和社会基础不同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所以它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转化成为欧洲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至于日本和韩国的实例,这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就两国的情形而言,与其说它们像19世纪的欧洲那样在内部滋生了工业资本主义,不如说那里发生了一场适合当地条件的科技革命。

法：另一个问题是对巴伦德先生提出的：“西方资本主义因素对印度原始资本主义的嫁接最终是否成功？嫁接是否产生积极的后果？”

巴：对这个问题，我很难直接回答。我的立场大致可陈述如下：在殖民主义到来前，从印度市场中破土而出的、内在的原始资本主义从没有能够占据统治地位；在 18 世纪时，它们始终与印度的统治者有矛盾，而印度的统治势力却甘愿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此外，英国殖民主义并不满足于扶持“俯首听命”的原始资本主义的发育成长，同时也破坏了它们的手工业基础。印度民族资本主义正是在扶持和破坏的交替之中发展了起来。这样一种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辩证法本身不是消极的，但很难说一定是积极的。没有英国人从中插了一手，人们很难想象印度会走什么道路。总之，已经发生的事都已经发生了。

法：另一个问题是对布罗代尔和我本人提出的：“时至 1985 年的今天，人们可以看到，过去遗留下来的经济模式似乎底气不足，甚至已露衰败之态。到 2000 年，人类的要求将不再是满足物质的需要，而是更多的文化需要和道德需要。凭借您的明智和对长时段历史的认识，您对未来作何预卜？”

对未来的预卜

布：这是一个绝妙的问题，但必须请天父上帝才能作出回答。可以肯定，现有的经济模式与当今的现实不再适应。经济

学家正挖空心思在找出路,但事情又谈何容易。他们注意到,一个模式行得通或行不通,要受实践的检验。目前,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只要危机尚未消失,正在试验中的各种复苏模式都并不合适。人们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颇多指责,据我看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换了别人,同样也不会成功。明天,如果国际形势发生改观,如果危机终于消失,所有的政府,即使是不很得力的政府,也会有所作为。

在对我提出的问题中,似乎说到我的“明智”。严格说来,人可以有自知之明,——对于我,是否有自知之明,我尚感怀疑——;要有知人之明,那就更难了;不用说未卜先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十分明白,我们的社会需要有一种精神食粮。天主教的没落——暂时的或长期的——制造了一个可怕的真空;无论好坏,总要找点什么东西来填补真空。人不能没有一点精神;人不能停止向往和憧憬,不能丧失其生活在世上的理由;诸位可以放心,只要有人的存在,就会有对理想和善良的追求。谁又能提供这些十分宝贵的东西呢?要靠社会,靠文化去创造。相信文化,或者不相信文化,二者必居其一。

是的,这是十分棘手的事。我现在正研究法国宗教史。宗教史表明,每当一种宗教搁浅时,总会有什么东西充当替补。人能不能在一种理性主义宗教中生活呢?这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是否可能,我还感到怀疑。我是悲观主义者。请看,我的“明智”不过如此而已。

法:关于经济模型陈旧和人类文化需求的问题,现在轮到我来回答了。经济学理论目前正关注在经济模型中供应和需求孰先孰后的问题,这的确是十分必要的。19世纪末以来,近代经济学始终认为是需求先于供应,因而对防止市场经济或资本主

义经济的最大危险丝毫不放在心上；这种危险就在于，人们想把人类的全部活动以及个性组成部分统统置于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之下。用通俗的话来说：只要肯出价钱，一切都能买卖。市场经济的丑恶一面也许就在这里，资本主义之所以处处让人产生不信任，这是因为我们心里在想：“在这金钱统治的制度下，归根到底还不是一切全凭有钱人的支配。”如果确实认为经济模型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岂不可以毫无阻拦地为所欲为！

相反，如果认为经济建立在供应（即人的劳动或人的努力）的基础之上，人们就能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得出一个更具建设性的结论：只有人的劳动产品才受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经济，两种说法可以任选一种）的支配，这就把市场经济的活动范围限制于商品，即由人力劳动制造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必须说明，这里用的是经济学含义上的“劳动”一词，特意为文化需求或道德需求留下足够的余地。

所以，如果要对未来持不太悲观的观点，如果愿意认为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的拦路栅栏，我们就应看到，经济生活不论多么重要，终究只管“填饱肚子”，正是在经济理论中，人们才能找到扼制经济企图主宰一切的手段。

布：我要感谢保尔·法布拉，您对问题的回答比我要好得多，但我希望作一点补充：假定供应增加了，需求立即会增加。需求能够吞下一切，因而未来的危险将莫过于空闲太多。人生来就是劳碌命！劳动之苦让人忘记人的苦命，一旦没有这层保护，一旦空闲太多，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若是用一种文化政策来指导娱乐，我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我对人为制造的文化十分害怕。关于这个绝妙的问题，恐怕应该单独举办一次研讨会。

法：还有另一个问题是针对布罗代尔的：“当您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上层建筑，这里使用的是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

布：对我来说，“结构”一词，无论是上层建筑或下层基础，都是长时段的社会、经济或文化现实的反映。例如，宗教就是一种长时段现象。但我不同意马克思的见解，因为他轻视上层建筑的作用。在他看来，似乎下层总是真理在握，情绪高涨，至于上层就不那么通情达理了。我对上层和下层不加选择，一律接受。

沃：您使用的上层建筑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在您看来，上层建筑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你们用的是同一个词，但并不包含相同的意思。

布：依我之见，结构的现象是长期存在的现象。这同列维-斯特劳斯及法国社会学和哲学中的结构主义毫无关系。

我面前还摆着听众提出的两个问题，问题提得很聪明，而且也很有趣。下面看第一个问题：“据您说，资本主义是少数人的现象，又说，由于人是社会的动物，既然社会不平等始终存在着，人就只能接受经济的不平等。难道我们应该逆来顺受吗？在分析了事实的基础上，一名历史学家除了对自己的思考进行验证外，难道不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吗？”确实，在我的一生中，我个人只有一两次曾主动投入到现实的政治中去。确认历史事实毕竟还是靠不住的，历史教训对现时并不始终有效，历史不贯穿于现时的全过程。为了求得大家的原谅，我愿向诸位承认，我对让-保尔·萨特十分敬仰。我不认为他的处世行事都有道理，每当我仔细琢磨他的思想时，我发现他的想法往往是错的；对他始终介入政治，我十分钦佩。我的情况与他不同，我承认这是个缺

点。

我回答第二个问题：“对历史经验的回忆是否制约着我们的未来？”个人的未来，社会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未来究竟指的是什么？在涉及一个范围较广的人类集团时，无论人们付出多少努力，不惜做多少次尝试，抱着多么善良的愿望，又无论进行什么改革乃至革命，未来像是在江河中随波逐流的一只独木船。河水流动不快。假如流动得快，人们早已会发现历史暗流的存在了。但人们没有见到过这种暗流，因为河水的流速之慢几乎很难被人所察觉。在我提出的概念和理论中，令我感到痛心的是我的立场始终与所谓人类有广阔自由的立场相左。每次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我觉得人的自由正日益缩小。遗憾的是，我真怕自己的想法并没有错。

注 释

1.“马莱-伊萨克”是法国 50 年代风行一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以叙述清晰和知识扎实而著称，但布罗代尔认为，编者的历史观点偏于陈旧，这里作为一个比喻，暗示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经济学著作仅具通俗读物的价值。

资本主义的活力

这本小册子转载了 1977 年我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作的三次演讲。文章曾以《关于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再思考》为题译成英文；随后又译成意大利文，标题是《资本主义的活力》。这次出版的小册子对演讲的原文不加任何修改；读者想必知道，演讲是在阿尔芒·科兰出版社出版《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1979 年版）前发表的。在该书行将撰写完毕时，我接到了邀请，要我对该书作概要的介绍。

费·布

第一章

关于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再思考

为了《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雄心勃勃的长篇论著,我在1950年就开始了构思,算来距今已经多年了。当时,吕西安·费弗尔正筹备出版一套题为《世界之命运》的通史丛书,是他向我推荐了或毋宁说友好地指定了这个题目。当丛书主编于1956年去世后,我不得不勉为其难,把他撂下的担子挑了起来。吕西安·费弗尔本打算亲自撰写《15至18世纪西方的思想和信仰》,他的书和我的书本应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和互相呼应;不幸的是,他的书将永远出版不了。我的书也就永远丧失了伴侣。

虽然本书总的说来仅限于经济领域,但它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因为需要拥有的资料极其庞大,主题本身——经济显然不能单独存在——又惹起众多的争议,正在不断演变中的历史学——历史学势必要兼并其他人文科学,虽然兼并过程相当缓慢和不无阻力——又制造无穷的麻烦。这种尚待分娩的历史学每年都有花样翻新;我们在后面紧紧追赶,打乱习惯的工作程序,尽量去适应不断变化中的要求和怂恿。至于我,听着航船的汽笛鸣叫声,真是感到十分高兴!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航船却迟迟进不了港口,让人等得心焦。撰写《地中海》一书大概花了我25年时间,《物质文明》也将近有20年。真是拖得太久了,实在太久了。

所谓经济史至今还处在草创阶段,难免要遇到一些偏见的反对:经济史的身份不高贵。高贵的历史是吕西安·费弗尔建造的那条船,船主不是雅各布·富格尔,而是马丁·路德,还有弗朗索瓦·拉伯雷。无论高贵或不高贵,或不如别的高贵,经济史迟早要提出我们历史行业必定遇到的所有问题。从某个角度看,经济史包括人类的全部历史,它既是雅克·克尔、约翰·劳这类公认的大人物的历史,又是重大事件、机遇和危机的历史,最后还是在长时段中演变的、有结构的深层次历史。我们的困难就在这里:这段历史牵涉到四个世纪和整个世界,怎么可能把如此众多的事实和解释组织起来?不能不有所取舍。我选择了长时段的内在平衡和不平衡。因为,在我看来,前工业化时期经济中最重要的东西,正是迟钝刻板的初级经济与范围狭小、但又生气勃勃的现代化发展同时并存。一方面是村庄中的农民,他们几乎过着自给自足、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如油珠一般向四处扩散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造业的逐渐发展开始显现今日世界的雏形。可见,这里至少有两个天地,两种不同的、但在总体上又互为解释的生活方式。

我决定先从迟钝的一面着手:乍一看来,混沌的历史还处在人的清醒意识之外,人类行为的被动胜过了主动。本书的第一卷正是试图说明这种状态。当该卷于1967年首次出版时,我曾想用《人在应付日常生活时的可能和不可能》充当标题,后来才

改作《日常生活的结构》。标题并不重要。这是一次成败未卜的探索,其中可能存在许多缺点、疏忽和误解,但研究的对象却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这里使用的语汇——无意识、日常生活、结构、深层——本身确实都很含糊。尽管本书会涉及到心理分析的无意识,并且需要发现某种集体的无意识——无意识的实在曾使卡尔·古斯塔夫·杨格伤透脑筋——,但这里从事的研究却不可能是无意识。从细小的方面去研究一个大题目,至今还是少有的事,这件事正有待历史学家去做。

在我这方面,我遵循了一些具体的准则。我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是我们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地遵守的习惯或者例行公事,即不下决心、不加思考就到处风行和自动完成的成千个动作。我相信人类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泡在日常生活中。无数流传至今的和杂乱无章、不断重复的动作正帮助、束缚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出人意外的是,这些冲动、激励、榜样、行为或义务往往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时代。亘古至今的生动现实,犹如流入大西洋的亚马逊河一样,滔滔浊浪,千古不尽。

我试图用物质生活一词概括所有这一切。正如其他含义过广的词一样,这个词的使用虽然比较方便,但有不够贴切的缺点。无论是创造发明或墨守陈规,物质生活当然只占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这种被动甚于主动的生活,我最初并不想确定它的范围或本质,我只想观察、研究、熟悉和展现它那平凡、宽广和通常被忽视的历史。

只是在进入了历史海洋以后,走出历史的时机方才来到。我从这次海下探索中得出了一个直接而深刻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的古老是无法用年代计算的;二、三百年或一千年以前的事,我们今天有时候也能够亲眼目睹。我所说的这种物质

生活已在以往的历史过程中被纳入到人类的生活之中,就像腑脏生在人体内一样;对人说来,过去的经验或感受已经变成了生活中屡见不鲜、势在必然的习惯。任何人对此都不加重视。

二

以上是我的第一卷书的基本思路;其目的是为了进行一次探索。各章的内容从小标题就能看出,这些小标题罗列了推动物质生活进步的各种隐蔽力量,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建筑在这些隐蔽力量的基础之上。

第一章讲的是人口数量。如同所有生物一样,人类的繁殖主要靠生理力量的推动,即乔治·勒费弗尔所说的“春季的向性运动”。但也还存在别的推动力,别的决定因素。不断更替中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整个活着的人的命运,虽然具体的个人并不能意识到。在这样或那样的一般条件下,人口有时太多,有时不够多,人口运动趋向平衡,但很少真正达到平衡。欧洲自1450年起人口急剧增长,因为黑死病当时已经过去,上个世纪的巨大损失有加以弥补的必要和可能。复原过程将一直延续到下次退潮。这种在历史学家看来似乎可以预测的潮汛运动直到18世纪依然有效地存在。只是到了18世纪后,不可能的界线终于被突破,至此不可逾越的顶点终于被超过。从此,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再也没有出现过停滞或倒退。今后是否将会出现倒退呢?

总之,到18世纪为止,人口体系被关在一个几乎密闭的圆

圈里。刚要碰到圆圈,马上又出现退缩。恢复平衡的方式和机会真是不少:匮乏、灾荒、饥饿、生活困苦、战争,尤其是一系列的疾病。疾病今天还在危害人类;它在过去曾是可怕的灾难:定期流行的鼠疫只是在18世纪才向欧洲告别;斑疹伤寒在寒冬把拿破仑大军困在俄国;伤寒和天花经常肆虐;原在乡村流行的结核病于19世纪在城市猖獗,成为不折不扣的浪漫症;最后是性病,自从美洲被发现后,由于几种病菌相汇合,梅毒突然又重新冒头。卫生条件差和水质恶劣导致了其他疾病。

人刚出生时抵抗力很弱,难以躲过疾病的袭击。婴儿死亡率很高,某些不发达国家至今仍是如此;那里的一般健康状况也很差。我们拥有16世纪的几十份病历。那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躯体畸形,皮肤坏死,寄生虫在肺部和内脏繁殖,这类情形能使今天的医生惊诧不已。可见,直到不太遥远的过去,不卫生的生活条件仍无情地支配着人类历史。人们不禁要问:当时的人口是多少?生的是什么病?能不能制止疾病的危害?

随后几章提出了其他的问题:当时的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为了回答这些棘手的问题,我们必须作一次探险旅行;大家都知道,在传统历史的书本上,人是从来不吃不喝的。虽然有人在很久以前曾说过:“什么人吃什么东西”,但这句成语也许主要是利用德语的方便玩一次文字游戏而已。我以为不应该把糖、咖啡、茶、烧酒等许多食品的出现贬低为生活细节。它们分别体现着无休止的重大历史浪潮。当然也不应该夸大在过去食物中占主要地位的谷物的重要性。小麦、稻米和玉米是经过以往无数次试验才终于作出的选择,作为千百年“左右摇摆”(法国伟大的地理学家比埃尔·古鲁的名言)的结果,它们

已变成了文明的选择。小麦十分消耗地力,迫使土地定期休息,畜牧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必要和有了可能:假如没有家畜以及畜拉的犁和车,我们怎能想象欧洲的历史?稻米是一种园田式集约耕作的产物,人不给牲畜留任何草地。玉米种植最为简便,也最容易让人填饱肚皮;由于农闲时间较多,农民就以劳役形式从事美洲的庞大建筑。剩余劳动力被社会所吸收。我们还可以讨论当时的粮食消费量及其提供的热量,研究各个时期的食物匮乏以及饥荒的演变。与查理五世皇帝的命运和所谓路易十四的盛世(昙花一现的和很不牢靠的辉煌)相比,这些题材难道不同样令人振奋吗?我们的讨论具有深远的意义:烧酒、烟草是自古已有的毒品,它们的历史,特别是烟草的风行全球,难道不预示着今天出现更危险的毒品吗?

在技术问题上,也必定得出类似的认识。这确实是一部美妙的历史,它与人类的劳动,与人在同外界和同自身作斗争中取得的点滴进步不可分割。人类自古以来的一切努力——突飞猛进的和不厌其烦的努力——都是技术,不论是用石、木或铁制造工具和武器。技术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一种本质上保守的、变化缓慢的活动;作为技术的上层建筑,科学只是后来才慢慢置于技术之上。大规模的经济集中需要技术手段的集中和技术的发展。例如15世纪威尼斯的兵工厂,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英国。科学尽管姗姗来迟,但每次都前来赴约,它是被强力拉来的。

各种技术和各种科学因素历来都周游列国,互相交换,不断传播。但是,艏舵、搭接式船壳、船载火炮和远洋航行这类组合技术却很难传播,总括种种工艺、技巧、习惯和成就的资本主义也同样如此。欧洲霸权的确立正是由于远洋航行和资本主义没

有得到广泛的传播,难道事情不就是这样简单吗?

大家或许会问:为什么你在最后两章写了货币和城市?我确实不想把这两个问题留给下一卷。但单说这个理由显然是不够的。其实,货币和城市的发源地既在遥远的古代,又在不久前的近代。作为促进交换的手段,货币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发明。没有交换,就没有社会。至于城市,它在史前时期业已存在。货币和城市几千年来始终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又是能够适应变化和有力地推动变化的加速器。也许可以说,城市和货币制造了近代生活;按照乔治·古尔维奇喜爱的相互性法则,近代的生活浪潮反过来又促进了货币的发展,巩固了城市的专横统治。货币和城市同时是发动机和指示器,是变化的动力和信号,而且也是变化的结果。

三

作为“历史的缺席主角”,习惯和常规是个范围不易确定的辽阔王国。习惯侵入整个人类生活的领域,犹如夜色布满整个画景一样。但是,这个无记忆、无意识的阴影同时包含着黑暗程度不一的几个区域。关键在于如何在黑暗和光明之间,在照章办事和清醒决定之间划条界线。有了界线,观察者就能区分上下左右。

不妨假设一个特定地区,它所拥有的初级市场如同成群的细小黑点分布在宽广的地面上,每个市场的营业额往往不大。横在生产 and 消费两大领域之间的交换(即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

正是通过这些众多的渠道进行。在 1400 至 1800 年间,旧时代的市场经济尚不完备。至于它最早的起源,在时间的夜幕下显然已不能辨明。市场经济至今也还不能把全部生产和全部消费连接起来,相当一部分产品由生产者及其家庭或本村人直接消费,不进入市场流通。

在正确地看到这种不完备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市场经济正在发展,它在城镇之间建立的联系足以开始组织生产,并指导和决定消费。事情当然需要几百年时间才能做成,但在两个世界——生产和消费——之间起着联系和推动作用的市场经济,却将在它那狭窄而又活跃的区域里,造就出种种动力和活力,种种新事物、新觉醒和新主意,进而加速经济的增长和进步。我喜欢卡尔·勃林克曼的说法,虽然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经济史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从产生到将来可能结束的历史。

因此,我长时间地观察、描绘和再现我能接触到的初级市场。初级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门槛。留在市场之外的一切产品只有使用价值,进入市场大门的一切产品具有交换价值。生产者个人是否进入交换或经济生活的范围,就看他站在初级市场的此岸或彼岸。我使用了经济生活一词,这是为了把它同物质生活对立起来,为了把它同资本主义相区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走街串巷的流动工匠和修椅子、捅烟囱的小手艺人尽管省吃俭用,仍然属于市场的世界,因为他们必须从市场购买每天的食物。他们与农村保持联系,收获季节回乡下去干农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走出市场的世界。甚至农民也把部分收获作为商品出售,转而购买用具和衣服,这里又属于市场的范围。去镇上卖掉几个鸡蛋或一只家禽,换得的钱用来纳税或购买犁铧,这只是沾了市场的边,但还留在自给自足的大范

围内。在街上或乡下出售零碎商品的小贩应列入交换一栏,他们必须计算盈亏,无论交换和盈亏的数目是何等的微薄。店铺不折不扣地属于市场经济。出售自制产品的铺主叫做工匠主;出售他人产品的铺主进入商人的行列。店铺总敞开大门,有随时都能从事交换的好处,而集市则每星期只交易一、二天。尤其,店铺意味着交换加信贷,铺主进货和售货时都行赊欠。这里的交换还搀杂着一系列债务和债权问题。

在市场和初级经纪人之上的交易所和交易会(前者每天开业,后者定期举行,历时数天,会址固定,间隔时间较长)起着更高一级的作用。一般情况下,交易会也对小商人开放;但它毕竟像交易所一样受大商人所控制,这些大商人不久被称作批发商,不兼零售业务。

在本书的第二卷(题为《形形色色的交换》)的前几章里,我冗长地描绘了市场经济的这些不同成分,并尽可能把事情解释清楚。我也许过分地乐此不疲,读者大概会觉得我有点噜苏。历史应着重描绘、观察和分类,而不应先入为主,这样难道是不对吗?力求观察和展现,在可能条件下,做到亲眼目睹: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一半。我敢向诸位保证,在欧洲——我说的不是美国——的城市里,还不难看到以往的店铺或街头集市的外貌,不难听到小贩讲他如何到处兜生意,不难见到交易会或交易所。诸位不妨去巴西内地的巴依亚,去卡比利亚或去黑非洲,那里可以亲眼看到古老的市场。如果愿意阅读,还有成千上万件文献谈到以往的交换:城市档案、公证文书、警察局的卷宗以及众多的游记,画作还不包括在内。

举威尼斯为例:在这个奇迹般得以完好保存的古城市逛上一圈,再在档案馆和博物馆停留一段时间,过去的景象几乎全都

再现在你的眼前。威尼斯如今没有交易会,或不再有商品交易会;耶稣升天节的“桑萨会”是个节日,圣马克广场摆满了临时货摊;沿圣尼古拉海滨,人们佩带面具,奏着音乐,举行总督和大海的传统婚礼。圣马克广场设有几个市场,主要出售珍贵的首饰和裘皮。但是,大商业过去和现在都集中在与“贸易货栈”(今天的威尼斯中心邮局)隔桥相望的里亚托广场。1530年前后,家门面对大运河的阿雷蒂诺以观赏过往船只为乐,这些满载甜瓜、水果的船从近海各岛驶往市中心;里亚托广场(有新旧里亚托广场之分)是市内最活跃的商业中心。广场上摆满了喧闹的货摊;离广场不远处是建于1455年的商会,当地大商人每天上午在这座交易所里洽谈航运保险、运费和各项贸易业务,有时也与外国商人签订合同。往前走两步就到门面很窄的银行,那里随时可用转帐方式当场结清货款。菜市和鱼市也在附近,就在今天这个老地方。再往前一点的街区是肉市,附近有肉铺店主光顾的圣马蒂奥教堂,在19世纪末已遭破坏。

我们对17世纪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嘈杂声或许不太习惯,但今天的经纪人如有兴趣阅读霍赛·德拉·维加的《混乱中之混乱》(1688年),我想他会毫不困难地注意到,在当时买空卖空的股票交易中已出现签发期票、溢价贴现等近代的复杂花招。在伦敦交易所街的著名咖啡馆里,也可见到同样的狡诈手腕和侥幸弄险。

我们的罗列就到此为止。为简单起见,我们把市场经济分成两类:低级的一类包括集市、店铺和小贩;高级的一类有交易会和交易所。作为本次演讲的结论,我想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些交换手段何以能帮助我们概略地说明15至18世纪期间欧洲经济的曲折进程?第二个问题:通过比较它们的相

似处或不相似处,这些手段何以能向我们显示至今还不甚了解的非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方式?

四

首先,关于西方在 15、16、17 和 18 这四个世纪里的演变。

在 15 世纪,尤其在 1450 年后,由于工业品价格上涨和农产品价格下跌或保持原状,城市经济有了普遍的恢复,城市的恢复比乡村更加迅速。当时,工匠铺和城镇集市,尤其是后者,无疑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这次经济复苏在经济生活的底层表现得特别突出。

到了下个世纪,由于经济发展恢复了原有速度(黑死病发生前的 13 和 14 世纪曾是加速发展的时代),由于大西洋经济的扩张,经济结构正变得更加复杂;推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那时是国际交易会:安特卫普、贝亨奥普佐姆、法兰克福、坎波城和里昂都有交易会,里昂一度曾是西方的中心。后来,还有 1579 至 1621 年间的贝桑松交易会,特别新奇的是这个所谓交易会只做现金、信贷和期票的生意;在这 40 多年里,热那亚人曾是国际货币活动无可匹敌的主宰。生性谨慎的雷蒙·德·罗佛平时很少以个别推断全面,但他毫不犹豫地声称,16 世纪是大交易会的鼎盛时期。16 世纪的经济高涨,说到底,意味着交易会和交易所的生意兴隆;美洲贵金属的来到,汇兑体系的建立,更促进了这一上层建筑的繁荣和发达,推动了大量信贷证券的流通。热那亚银行家的这一杰出成功十分脆弱,后由于种种原因于 17 世纪 20

年代土崩瓦解。

17世纪的经济生活在摆脱了地中海的诱惑后,开始向广阔的大西洋地区发展。人们往往把这个世纪说成是经济停滞或倒退的时期。这个说法显然必须加以修正。毫无疑问,16世纪的突飞猛进虽然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已经停止,但阿姆斯特丹的惊人高涨毕竟不是经济萧条的表现。历史学家无论如何以下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经济生活仍然活跃,只是市场经济又回到了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原有基地;从这一决定性转变中,荷兰及其船队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得益匪浅。交易会的地位被交易所和商埠所替代;交易所和商埠与交易会的不同正如普通店铺与市镇集市的不同一样,换句话说,前者具有连续性,后者则是间隔的会面。这是众所周知、极其普通的历史常识。但是,问题并不仅仅涉及交易所。阿姆斯特丹的光辉很可能使我们看不到较为平凡的成果。17世纪实际上也是店铺繁荣兴旺的时期。作为连续性的另一次胜利,店铺在欧洲成倍增加,形成了密集的购销网。洛普·德·维加(1607年)在谈到黄金时代的马德里时说:“那里的一切都变成了店铺。”

到了经济全面高涨的18世纪,所有交换手段理所当然都被派上用场:交易所正扩大活动范围,后起的伦敦交易所力图取代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并逐渐变成专营国际信贷的金融中心;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担风险的活动,巴黎也积极响应,金钱和信贷的流通因此变得愈加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交易会自然就日趋没落;交易会的产生便于利用税收等有利条件活跃传统交换,当交换和信贷变得十分方便的时候,交易会也就丧失其存在的理由。然而,交易会在经济生活活跃的地区虽然开始没落,但在传统经济迟迟得不到改变的地区,就不但能继续维持,而且相当

兴旺。历数 18 世纪各交易会的名称,等于是指出欧洲经济中的次等地区:法国的博盖尔地区,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地区(博尔扎诺)和南部地区;此外还有巴尔干、波兰、俄罗斯以及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

在消费和交换均有增长的这个时期,市镇的初级市场和店铺无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村庄里开始开设店铺,小贩的生意也成倍增加。总之,英国历史学家所说的“私下交易”正发展起来;公开交易要受当局的严密监督,相对而言,所谓私下交易则不受市镇当局的监督。早在 18 世纪前,私下交易已在整个英国直接收购产品,商人往往以预订的方式在市场外向农民收购羊毛、小麦、布匹等,这是违背市场传统规范而建立的一系列独立的和长距离的商业网络,他们肆无忌惮地利用商品的这种自由流通谋取利益。他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些网络,既由于自身的效率,也借助于军队和大资本需要大宗货物的供应。作为大商业中心的伦敦和巴黎在这方面起了巨大的变革作用。总之,在 18 世纪的欧洲,各种经济形式都得到了发展,包括“非市场交易”在内。

这一切在欧洲都是事实。我们至今仅仅谈到欧洲,并非因为我们为贪图方便,想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硬把一切向欧洲的特殊生活靠拢。原因仅仅在于历史科学在欧洲比较发达,而历史学家又都着重研究本国的历史。近几十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印度、日本、土耳其等国的文献资料已得到系统的利用,我们开始不再依靠游记或欧洲史学家的著作去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有关的知识已允许我们提出以下的问题:我们以上仅就欧洲情形所讲的交换各环节在欧洲以外的中国、印度、日本和整个

伊斯兰地区是否也同样存在？我们是否能作一次比较分析的尝试？如果能够的话，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同欧洲的比较，大致确定非欧洲的位置，然后再观察二者之间于 19 世纪逐渐加深的鸿沟在工业革命前是否业已存在，欧洲当时是否已走在世界其余地区的前面。

我们得到的第一个认识：市场到处都已存在，即使在黑非洲刚开化的社会中或在美洲的印第安文明中也无不如此。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社会更是布满着初级市场。只要作一点努力，这些市场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依然充满活力或不难辩认。在伊斯兰国家，城市几乎剥夺了乡村的市场。如同在欧洲一样，城市吞噬了这些市场。最大的集市设在城市的大门口，城里人和乡下人就在这块既不属城市又不属乡村的中立地带碰头会面。集市甚至还进入城市，设在街头巷尾或狭窄的广场上：顾客在那里可买到当天烤制的新鲜面包，某些小商品以及许多煮好的菜肴（这同欧洲的习惯恰恰相反）：肉丸子、烤羊头、油饼、糕点。大商业中心兼有集市、店铺和欧洲式菜场的职能。一句话，是无所不包的大商场，例如伊斯坦布尔的比费斯坦商场。

我们注意到印度的一个特点：没有一个村庄不拥有自己的市场，原因是村社必须在市场上通过捐客把实物换成现金，以便向大莫卧儿君主或向后来的王公交纳贡赋。至于大批乡村市场的存在原因，是否应认为印度的城市对乡村控制不够有力？或者相反认为捐客在村庄直接收购产品是一种“私下交易”？这确实是个问题。

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称中国，那里几乎可以根据确定的地理位置量出市场的数量。一个市场就是一个集镇或一个小城市。请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点，在点的四

周有六至十个村庄,距离正好够农民在一天内打个来回。这个几何图案——中间一个点,四周十个点——的中心点是我们所说的集镇(或称区),四周则是集镇的延伸地区。市场其实就设在集镇的不同街道和广场上,与杂货铺、高利贷者、代笔先生、小吃店、茶馆和酒店相结合。威·斯基纳说得对:农业中国的缩影是区,而不是村。大家不难看到,几个集镇团团围着一个城市,向城市供应产品,并通过城市与外地贸易,取得当地不生产的产品。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这从以下事实可以说明,历书为各城镇确定的集日互相错开。商贩和工匠不停地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赶集;中国的工匠挑担流动,在集市接活,修锅匠和剃头匠甚至为顾客上门服务。总之,集市网络分布在和活跃在辽阔的中国,互有联系,并受到严密的监视。

店铺和商贩数量也很多,多得简直密密麻麻,但交易会 and 交易所的高级市场形式却又太少。在蒙古边界有几个交易会,规模不大,广州交易会的对象是外国商人,这也是监视他们的手段。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政府敌视交换的这些高级形式,或者是初级市场的毛细血管足以保证商品畅通,中国经济不再需要有动脉和静脉。无论由于一种原因或两种原因,交换总是只有底层,没有顶层;我们在下一次演讲里将谈到,这一状况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具有重大的影响。

日本拥有组织健全的大商业网,交换的高级形式显然已经出现。南洋群岛也是如此,在这个古老的商品集散地,没有经常性的交易会或15至16世纪欧洲相类似的交易所,当地大商人后来甚至天天会面。例如,爪哇的万隆长期是该岛最活跃的城市,甚至在1619年巴达维亚建国以后也是如此,那里的大商人

每天在集市结束后就在市内的一个广场会面。

印度是个交易会盛行的国家,这种大型集会兼具商业和宗教的双重性质,因为它们往往在朝圣地举行。交易会能使整个半岛为之震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令人咋舌,但这种现象不正好表现了传统经济的特征和对过去的恋恋不舍吗?伊斯兰世界则相反,那里虽然曾有交易会存在,但其数量和规模远不如印度。也有一些例外,如麦加朝圣,但这无关宏旨。高度发达、充满朝气的穆斯林城市具有高级交换形式的结构和手段。在直接使用现金的同时,支票也像在印度那样畅通无阻。信贷网沟通着穆斯林城市与远东的关系。一名英国旅行家于1759年从印度返回,准备经巴士拉前往君士坦丁堡,他不愿把钱存在苏拉特的东印度公司,便把二千皮阿斯特现金交给巴士拉的一家银行,后者给他一张用“法语”书写的凭证,据此可前往阿勒颇一家银行取款。从理论上讲,他本该从中得到一笔利息,但他并未得到他所希望的那么多。谁也不能保证每次都有利可图。

概括地说,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经济发展较快,这似乎应归功于经济手段和经济体制(交易所和各种信贷形式)的优越。但是在欧洲之外,交换的方式和技巧毫无例外地都可找到。只是发展和使用的程度不同而已,人们在这里可以发现一个阶梯:几乎达到最高等级的有日本,也许还有南洋群岛和伊斯兰地区,印度肯定属于最高等级,那里有掮客的信贷网,有向投机事业贷款的惯例和海上保险;下一等级是历来自给自足的中国,再下个等级是许多处在原始阶段的经济。

对世界各种经济加以归类并非没有意义。在下一章里,当我估计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各自的地位时,仍将念念不忘这个阶梯。这种排列方法将使分析得出结果。在日常物质生活的广

阔基地之上,市场经济铺开了和保持了形形色色的交换网。资本主义一般就在市场经济之上繁荣起来。人们几乎可以说,在一张真正的立体地图上,整个世界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第二章 形形色色的交换

我在上次演讲里曾指出,15至18世纪期间存在一种与交换没有任何关系的、广阔的自给自足经济。即使在最发达的欧洲,直到18世纪乃至以后,也还有一些零星地区很少参与全面的生活,孤独地坚守那种几乎闭关自守的生活。

今天,我想谈谈交换自身的范围,即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说法表明,我们打算把两个不可混淆的领域区分开来。让我们重申,直到18世纪,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两类活动尚属少数,人类的多数活动仍停留在或淹没在物质生活的汪洋大海中。市场经济正在发展,正在覆盖广大的地域,并取得可观的成功,但它往往还缺乏深度。至于旧时代存在的所谓资本主义(我用的这个术语是否合理姑且不谈),这种高级经济形式虽然新奇和引人注目,但它的规模还小,控制不了整个经济生活;除个别例外,它不构成独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自发地普及和推广而已。这种资本主义通常被称作商业资本主义,它远不能操纵和控制整个市场经济,虽然市场经济是它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然而,资本主义已明显地起着全国性、国际性和世界性的作用。

我在第一章里已经谈到，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状况看得比较清楚。历史学家已赋予它崇高的地位。所有人都对它特别关心。相比之下，生产和消费却是尚未认真勘测的大陆，这方面的计量研究还刚刚开始，认识这些世界殊非易事。相反，市场经济不断被人挂在嘴上。有关的档案材料连篇累牍，如市镇档案、商人家庭的私人档案、司法和警察档案、商会的会议记录、公证人的簿籍等等。人们怎么能不注意市场经济呢？它始终占领着舞台。

危险显然是仅仅看到市场经济和过细地去描绘它，这样会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市场经济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实际上，由其本质所决定，市场经济只是整个经济的一部分，只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着联络作用；19世纪前，它只是一个坚实的、厚薄不均的（有时很薄）普通层次，在它的下面有着日常生活的汪洋大海，资本主义过程则间或从上面操纵它。

只有少数历史学家清楚地意识到市场经济的这种局限性，并能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真实作用，维托尔德·库拉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不被市场的价格运动牵着鼻子走，不过分看重价格的起伏、危机、相互联系和协调趋势，也就是说，不拘泥于促使成交额正常增长的因素。借用库拉的一个形象说法，关键是要始终看到井底，看到水下的物质生活，市场的价格虽然影响物质生活，但并不始终参与和推动物质生活。因此，经济史如果不记井底和井口这两笔帐，就可能很不全面。

这且搁下不谈,在15至18世纪期间,市场经济的活动范围不断在扩大。其征兆和证据是:在世界各地,市场价格正发生连锁性变动。价格在全世界一起变动,不仅在欧洲(有关记载不可胜数),而且在日本、中国、印度、伊斯兰地区(土耳其帝国)以及贵金属开采较早的美洲地区,即新西班牙、巴西和秘鲁。这些价格变动的相互联系有紧有松,衔接有快有慢;在欧洲各国,由于相互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价格差距几乎看不出来;但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印度,价格变动与欧洲相比至少落后二十年。

总之,一条经济纽带把世界各地的市场联结了起来,尽管联系的程度有松有紧;这条纽带仅仅涉及几种特殊的商品,但其中也包括业已在周游世界的、到处受欢迎的贵金属。用美洲白银铸造的西班牙本洋通过地中海或土耳其帝国和波斯来到印度和中国。1572年后,美洲白银又以马尼拉为中转站,渡过太平洋,最后到达中国。

这些至关重要的联系、环节、交易和运输怎能不吸引历史学家的注视?他们对此简直着了迷,就像身临其境一样。任何一名经济学家如果不研究市场的供求关系,还有什么可以研究?城市的经济决策人如果不关心市场以及供应和价格,又有什么可以关心?君主在推行一项经济对策时,难道能不关心如何保护本国的市场和本国船只装载的货物,如何促进与国内外市场相联系的民族工业吗?正是在市场这个敏感的狭小区域内,经济政策才合理地有可能发挥作用。生活实践表明,市场对经济措施具有反作用。因此,人们终于盲目地相信:交换本身起着决定性的平衡作用;交换通过竞争平抑物价,调整供求关系;市场是隐身行善的上帝,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按照

“听之任之”的经济学说,19世纪自动调节的市场已使经济发展到了顶点。

这里,真理、误会和幻想的成分兼而有之。人们不能忘记,市场被绕开或被改变性质,价格被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垄断机构所任意确定,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事。尤其,在承认市场的竞争效能(“为人类服务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同时,我们至少还应该指出,介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市场仅起不完全的乃至部分的联系作用。我们要特别强调“部分的”这个词。我确实相信市场经济具有重大效能,但我不认为它真正万能。在离我们不远的过去,经济学家曾经完全从市场模式和市场规律出发去思考问题。杜尔哥认为,流通就等于整个经济生活。过后很久,大卫·李嘉图也同样只看到市场经济这条狭窄而湍急的河流。近五十年来,虽然经济学家在经验的教育下,不再坚持“听之任之”、市场自动调节这类主张,但在今天的公众舆论和政治辩论中,神话仍然没有完全破灭。

二

平心而论,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还立足未稳,我之所以在辩论中最后抛出了“资本主义”一词,原因主要是我需要用另一个词来确指不同于市场经济的一些活动。我的意图当然不是要把狼引到羊群中来。我完全意识到——历史学家曾重复过多少次——该词含义模糊,带有强烈的时事色彩,很有可能被认为颠倒了时序关系。我冒险给它开了大门,理由是很多的。

首先,在 15 至 18 世纪期间,某些过程需要有个特殊的名称。仔细观察起来,简单地把它们归入市场经济,这几乎是荒唐的。人们本能地会想到“资本主义”一词。假如你讨厌它,把它逐出门外,它马上又从窗口跳了进来,因为你找不到恰如其分的替身,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说,不论“资本主义”一词怎样遭人毁谤,使用该词的最好理由是人们终究找不到其他词可作替代。当然,用了它也有带来种种争论和纠纷的缺点。不论这些争执有无道理,我们确实不能躲开了事,不能置之不理,或只当它们不存在。更糟糕的是“资本主义”一词还有很多含义使人联想到今天的生活。

“资本主义”的广义出现在 20 世纪初。恕我武断,我认为是在威纳尔·桑巴特于 1902 年出版的名著《论近代资本主义》中,它才真正出笼。马克思实际上对该词的这种含义一无所知。可见,我们面临的直接危险就是犯下颠倒时序关系这个弥天大罪。有一天,一位还很年轻的历史学家高声喊了起来:工业革命前没有资本主义,“资本是有的,但资本主义绝对没有!”

然而,在过去(即使遥远的过去)和现时之间,决没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不连续或互不干扰。以往的经验不断在现实生活中延伸和扩展。因此,许多有相当名望的历史学家今天发现,工业革命的号角在 18 世纪前很久已经吹响。为了明白这个道理,最好的办法也许只要看到,今天的一些不发达国家试图按照以往成功的经验从事它们的工业革命,但无不受到挫折。总之,这个不断引起争议的辩证法——过去和现在,现在和过去——很可能就是历史本身的核心和存在理由。

三

为了确定“资本主义”一词的用法和含义,为了把该词用来解释历史,你没有别的办法,除非真正把它置于“资本”和“资本家”之间,这两个词是它的词源和含义的依据。资本是可以捉摸的实体,是不断运动着的和容易辨认的手段;资本家是把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主持人,而在所有的社会里,资本注定要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因此,大而化之(但仅仅是大而化之),资本主义就是通常为着利己目的把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方式。

关键的词还是资本。在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文中,资本一词具有“资金”的含义;它不仅指积累的金钱,而且指以往完成的一切可被利用或已被利用的劳动成果:一所房屋是资本;入仓的小麦是资本;一艘船、一条路也都是资本。可是,只有参加再生产过程的资本才是名副其实的资金:存着不用的金钱、不加开发的森林就不再是资本。在此条件下,据我们所知,有哪一个社会不积累或没有积累资金,不把资金正常地用于生产并通过生产收回资金和取得利润? 15世纪西方的偏僻村庄也有道路,虽然不铺石子,也耕种土地,经营树林,也有用篱笆围起的菜园和果园,还有磨坊的水轮和存粮的谷仓……据计算,在旧经济体制下,劳动一年的毛收入与原有的资金总额(即法语所说的“本金”)约为一与三或一与四之比,这和凯恩斯计算的当今社会的比例大致相同。可见,每个社会都把相当于三至四年的劳动成果作为资本积累起来,留在今后的生产中使用,这笔“本金”也只是部分地

用于生产,显然从不完全用光。

这些问题且搁下不谈。对这些问题,诸位同我一样是清楚的。真正需要我加以说明的只是下面一个问题:怎样确有根据地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区分开来?

当然,大家并不希望我武断地下个结论,说什么一方面是水,水上面是油。经济实体从不是单一的物体。诸位或许可以同意,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看由市场经济建立的人与人关系以及经济和社会关系,就不难分辨出市场经济至少具有两种形式(甲和乙)。

在第一类(甲类)里,我想应该包括正常的集市贸易和地方性的短途贸易,如运往附近城市的小麦和木材。定期的、有计划的、例行的和对大小商人全都开放的贸易,即使距离较远,也属于第一类,例如15世纪但泽经波罗的海运往阿姆斯特丹的粮食,南欧向北欧出售的食油和酒,我还想到每年前往伊斯特拉贩运白葡萄酒的德意志马帮。

这类交换不但公开进行,来龙去脉都很清楚,而且没有大起大落,有限的利润几乎可以推算出来:集镇市场是个很好的例子:光顾集市的人主要是生产者(包括农民、农妇、工匠)和顾客(包括本镇的和附近村庄的)。间或也有二、三名商人前来,他们是介于顾客和生产者之间的第三者。这些商人有时能扰乱和控制市场,用囤积手段抬价;即使普通的买卖人也能不顾市场的规定,前往村口截住农民,低价收购他们的产品,然后再卖给顾客:这种初级的欺诈手段在各集镇,特别在城市四周普遍存在,有时能使物价上涨。因此,在我们假设其存在的理想集镇上,除了堂堂正正按市场规定进行的交易(如德语所说:“眼睛看着眼睛,手

拉着手”)外,也还存在逃避检查的、不公开的交换,即第二类交换(乙类)。活跃于波罗的海的小麦贩运同样属于正规的、堂堂正正的贸易;但泽起运时的价格和到达阿姆斯特丹时的价格同步升降,利润不大,但很可靠。当1590年地中海地区爆发饥荒时,一些国际商人摇身一变成为小麦的大主顾,他们让运麦船改变习惯的航线,把货物运到里窝那或热那亚,使价格提高了二至三倍。这是甲类经济被乙类经济代替的另一个例子。

随着交换登上更高一级,乙类经济也就取得主导地位,并在我们眼前展现一个显然不同的“流通领域”。从15世纪开始,英国历史学家指出,在传统市场的公开交易之外,所谓私下交易的地位正日趋重要;为了突出二者的区别,我主张称之为“市场外的市场”。私下交易不正是为了摆脱传统市场种种规定的束缚吗?一些走街串巷、从事收购的商贩来到生产者家里,直接向农民购买毛、麻、活牲畜、皮张、燕麦、小麦、家禽等。他们有时甚至预购羊毛和青苗。在农庄或村内旅馆签一张支票,买卖就算成交。随后,他们用役畜、车辆或船只把产品运往大城市或出口海港。这类事例无论在巴黎和伦敦的四郊或在世界各地都可见到;塞哥维亚的羊毛、那不勒斯附近的小麦、普利亚的油料、南洋群岛的胡椒都属这种情形。如果流动商人不去农庄,他便在市场外另找地方与生产者会面,往往就在旅店里耽着;旅店同时是货运站。这类交换终于脱离了集体市场的正常活动,买卖双方完全根据各自的意愿讨价还价;在英国,销售契约曾引起了众多的诉讼,这无疑是个证据。这类交换显然是不平等的交换,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竞争——在这里不占主要地位,商人拥有两项优越条件:他切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只是商人分别与链条的两端确定交易的条件,并从中谋取利润),他拥有

现金,这是他的主要理由。因此,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横贯着很长的商业环节;商业环节的确立,原因肯定在于它们的效率,特别是对大城市的供应,当局因而闭上眼睛或至少放松检查。

这些中间环节愈是延长,它们就愈是脱离种种习惯的规定和检查,资本主义过程的出现也愈加明朗。这一过程突出地表现在长途贸易中,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它达到了交换活动的顶点,持这种看法的人还并不仅仅是他们。长途贸易不折不扣地属于自由贸易,路程使贸易得以躲避或逃脱一般的监视。商人可能从科罗曼德尔海岸或孟加拉流域把货物运往阿姆斯特丹,又从阿姆斯特丹转销波斯、中国或日本。在这广阔的活动范围中,商人有选择的可能,而他的选择总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如果安的列斯群岛的贸易利润不大,这并没有关系,因为同时进行的东西印度间的贸易或对华贸易能保证双倍的利润。只要把枪换个肩膀就可以了。

巨额利润导致了巨额资本的积累,尤其因为长途贸易被少数商人所控制,不是任何人都能插手的。相反,地方性贸易由许多商人分散进行。例如,16世纪葡萄牙的国内贸易规模很大,成交额远远超过胡椒、香料和药品的贸易。但这种国内贸易往往停留于物物交换(商品仅具有使用价值)的阶段,而香料贸易则直接进入货币经济的范围。仅有少数大批发商从事香料贸易,并集中掌握巨额的利润。以上情形对笛福时代的英国也同样适用。

在世界各国,一些大批发商已从普通商人中脱颖而出,他们一方面人数不多,另一方面始终同长途贸易有着联系(同时还从事其他活动);这一现象的出现决非偶然,而且早有征兆:德意志在14世纪,巴黎在13世纪,意大利各城市在12世纪或者更早。

早在西方大批发商出现前,伊斯兰地区的“塔伊尔”是派遣经纪人外出活动、自己在家坐镇指挥的进出口商人。他们与“哈旺迪”(阿拉伯市场的店铺主)已没有任何共同之处。1640年间,在印度的大城市阿格拉,一位旅行家注意到,当地的“索加图尔”“在西班牙被称作商人,但某些索加图尔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叫作‘卡塔里’,那是这些国家中从事商业活动的拔尖人物,专指信誉卓著的富商巨贾”。西方国家在用词方面也作出类似的区分。卡塔里在法语中即为批发商,该词出现于17世纪。在意大利,零售商与批发商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同样,零售商与批发商在英国也大不一样,后者主要在英国港口从事出口贸易和长途贸易;在德意志,一方面是零售商贩,另一方面是富商巨贾。

无论在伊斯兰地区或基督教地区,这些资本家自然都是王公的朋友,与国家结盟或参与国事。他们很早超出本民族的界限,与外国商人合伙谋利。他们操纵信贷和货币交换,用各种手段在金融活动中谋得有利地位,使金银铸币通过大宗贸易积累成资本,而把次等铜币用于日常开支和发放工人的微薄工资。他们拥有信息、智慧、文化等优越条件,对四周的土地、房产、年金等等,凡能夺到手的,一律夺过来。他们掌握的雄厚实力和垄断手段足以使竞争不起作用。有谁还会对此产生疑问呢?一名荷兰商人给他驻波尔多的代理人写信,嘱咐后者对他们的计划保守秘密,并说:“无论这件事或其他的事,一旦出现竞争,也就没有油水可捞了”!最后,资本家正是依靠他们的雄厚资本,才能保住优势和独占当时的国际贸易。一方面因为当时运输缓慢,大宗贸易的资本周转期必定很长,需要几个月乃至几年方能连本带利地收回现金。另一方面因为大商人通常不仅使用自己的资本,而且还通过信贷利用别人的金钱。最后,资本能转移地

点。佛罗伦萨附近普拉托地方有一位名叫弗朗赛斯科·迪马可·达第尼的商人,他的档案表明,早在14世纪末,意大利各城市与欧洲资本主义的热点——巴塞罗那、蒙彼利埃、阿维尼翁、巴黎、伦敦、布鲁日——之间常有期票往返。但这些活动不为普通百姓所了解,正如今天设在巴塞尔的国际清帐银行的业务往来极端秘密一样。

综上所述,商品的世界或交换的世界分成严格的等级,包括从手提肩背到车装船载的低级商贩、普通出纳、小店主、各种名目的经纪人、高利贷者,直到批发商为止。奇怪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加剧的专业化和分工虽然影响到整个商业社会,但高踞商业社会之上的批发商资本家却是个例外。分工日益细密的现代化过程首先和仅仅表现于社会的底层:行业、店铺和商贩正在分门别类,但金字塔的塔顶却并非如此;直到19世纪,大商人从不局限于一种活动。他当然是商人,但也可以说,他从不仅限于经商,根据不同的情况,他同样可以是造船主、保险承包人、借款人、贷款人、金融家、银行家甚至实业家和农场主。18世纪巴塞罗那的小店主总是专营一行,或者卖布,或者销售呢绒,或者经营杂货……一旦因发财而成了批发商,他立即变专营一行为兼营多行。从此,他就搞各种力所能及的赚钱买卖。

这种不正常现象经常被指出,但一般的解释却不能令人满意。有人说,商人同时参与几个部门的活动是为了减少风险:如果颜料买卖亏了本,他可从香料贸易中赚回;一旦经商不利,他可从事期票交易或借钱给农民坐收年金……总之,他听取了法国谚语的劝告:“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只篮子里”。

依我之见,应该看到以下的事实:

——商人不专营一行,这是因为任何一行都不足以容纳他的全部活动。人们往往认为过去的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不足而规模很小,必须经过长期积累才能广为发展。可是,商业通信或商会记录往往告诉我们,有的资本竟找不到可以投资的地方。资本家于是就用来购买土地,保住资本的社会价值,有时也经营土地,取得丰厚的收入,这种情形在英国、威尼斯和其他地方都可见到。资本家还用资本从事城市地产投机,或者多次谨慎地侵入工业领域,例如15至16世纪期间的矿产投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个别例外,资本家并不关心大生产系统,满足于通过家庭劳动系统控制手工业生产,以便更好地保证生产的商业化。由于手工业方式的劳动的存在,制造厂直到19世纪还只占生产中的很小部分。

——大商人经常变换经营活动,这是因为大笔利润不断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转移。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之一至今仍是它的适应性和可变性。

——一种专业化倾向有时以金钱贸易的形式在商品生活中表现出来。但金钱贸易从来都不那么一帆风顺,似乎经济大厦不能为这种高级经济形式提供充分的财力。一度取得辉煌成功的佛罗伦萨银行于14世纪随同巴迪家族和佩吕齐家族一起破产,又于15世纪随同梅迪契家族一蹶不振。1579年后,热那亚的皮亚琴察交易会几乎成为欧洲所有期票的清偿中心,但热那亚银行业的兴隆维持了不到50年时间,到1621年即告结束。阿姆斯特丹于17世纪曾在欧洲信贷流通方面独占鳌头,但也于下个世纪以失败而告终。金融资本要等到19世纪的30到60年代后,当银行把工业和商品全都抓到手时,才取得稳定的成

功。那时候,整个经济就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持金融业了。

概括说来,有两种不同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交换,带有竞争性,因为是公开的;另一种是高级的交换,带有欺骗性和独占性。两种交换的活动方式和经纪人各不相同。资本主义不属于第一种交换,而属于第二种。我并不否认,乡村中也可能存在狡猾、残忍和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据达林教授告诉我,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旦开放乡村的自由市场,就有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我也并不否认,小店主是一种微型资本主义;格尔肯克隆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就从那儿产生。为资本主义奠定基础的力量对比可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形成和起作用。但是,早期资本主义终究要在社会的高层显现自己的存在和力量。只有在巴迪、雅克·克尔、雅各布·富格尔、约翰·劳、奈克尔的上层社会中,才有希望找到早期的资本主义。

人们通常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加区分,这是因为二者自中世纪以来始终齐步前进,因为人们往往把资本主义当作推动经济进步的动力或经济进步的结果。其实,物质生活是一切的基础:一切进步取决于物质生活的膨胀,市场经济本身也依赖物质生活而迅速膨胀,并扩展与外界的联系。在这一扩展中,得益的始终是资本主义。我认为约瑟夫·熊彼得没有理由把企业主当作“机器神”¹。我坚信,整体运动起着决定作用,任何资本主义首先是以其经济基础为尺度的。

四

如果没有社会的积极配合,少数资本家要独占利益,那将是

不可思议的事。资本主义势必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甚至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文明,因为整个社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但是,情况又并不始终如此。

任何人口密集的社会都分成几个“集合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阶梯。经济只有与其他“集合体”相联系才能被理解,因为它既分散在其他“集合体”之中,又包含着其他的“集合体”,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资本主义作为经济“集合体”的这种特殊的局部的形式只是通过相辅相成的关系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并在这种关系中显露自己的真相。

现代国家并未创立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这一遗产,国家有时给它提供方便,有时给它制造困难,有时任其发展,有时挫伤它的活力。资本主义的胜利取决于它是否由国家所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在17世纪的荷兰,摄政和贵族为了批发商或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一百年:随着1830年七月革命的发生,商业资产阶级终于稳掌政权。

因此,国家根据自己的平衡和抵抗力决定对金钱世界采取赞同或敌对的态度。文化和宗教也是如此。代表传统势力的宗教一般反对市场、金钱、投机、高利贷等新兴力量。但这里也有妥协。宗教虽然不断反对,但它终将接受时代的迫切要求。总之,它将同意实行某种现代化。奥古斯丹·勒诺代曾指出,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最早提倡现代化,并取得了成功。宗教(以及文化)虽然很早撤除了障碍,但它在原则上仍然强烈反对有息借贷,并斥之为高利贷。有人甚至不无牵强地认为,这些顾忌只是在宗教改革期间才被消除,这是资本主义在北欧国家兴

起的内在原因。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是基督教甚至清教的产物。

所有的历史学家全都反对这个精巧的论断,虽然他们无法彻底抛弃它;它不断改头换面地重现在他们的面前。然而,这个论断毕竟是错误的。北欧国家只是取代了长期由地中海占有的资本主义中心的地位。无论在技术方面或在商业方面,它们没有任何创新。阿姆斯特丹是威尼斯的翻版,正如伦敦是阿姆斯特丹的翻版,纽约又是伦敦的翻版一样。世界经济中心的每次转移都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并不触及资本主义内在的或隐秘的本质。16世纪末年世界经济中心由地中海向北海的迁移是一个新国家对一个旧国家的胜利。这也是一次级差性变化。随着大西洋的崛起,交换、货币储存等经济领域都有所扩大,市场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这一切汇集到阿姆斯特丹,恰好使它承担起扩大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总之,在我看来,马克斯·韦伯的错误主要在于他一开始就夸大了资本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催化作用。

但根本问题还不在这里。资本主义的真正命运在社会等级面前早已被确定。

任何文明社会都承认几个等级,也就是人们脱离开威纳尔·桑巴特所说的“基本大众”面向上爬的阶梯:宗教等级、政治等级、军事等级和各种金钱等级。根据不同的时代和地点,等级与等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对立、妥协或同盟,甚至几种状态的混杂。在13世纪的罗马,政治等级与宗教等级相合流,但在城市四周,土地和畜群正使一个危险的大领主阶级得以产生,而锡耶纳市的银行家已爬上很高的地位。在14世纪末的佛罗伦萨,原有的封建贵族和新兴的大商业资产阶级组成了最有钱的富人集

团,并合乎情理地夺得了政权。相反,在其他政治环境下,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等级:中国明清时代的情况便是如此。旧时代的君主制法国也是如此,虽然没有那么明显和连贯:即使富有的商人也长期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而贵族总是出任显赫要职。在路易十三时期的法国,通向权力之路便是向国王和宫廷靠拢。黎塞留原是穷乡僻壤的吕宋主教,他在事业上真正走出的第一步是担任了太后玛丽·德·梅迪契的亲随神甫,从而得以进入宫廷和混迹于权贵的小圈子。

对个人说来,有多少种社会,就有多少条向上爬的道路和多少种成功的类型。在西方,个人的成功虽然并不少见,但历史却反复不断地念同一本经,就是说,个人的成就几乎始终应归功于到处钻营、力图逐渐扩大其财产和影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野心,在耐心的配合下,长时间地延续下去。难道应该为名门世家的代代相传歌功颂德吗?对西方说来,这是为了醒目地展示所谓资产阶级的历史(资产阶级一词很晚才被人们所接受)。孕育着资本主义过程的资产阶级创造了或利用了坚固的等级制,后者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支柱。为了巩固财富和实力,资本主义同时或先后依靠了贸易、高利贷、长途贸易、行政官职和土地;土地是尤其可靠的价值,土地拥有者在社会享有的声望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高。如果注意到了名门世家的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的缓慢积累,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变得不难理解。封建制是一种有利于贵族家庭的分配地产的稳固形式,也是一种具有固定结构的等级制。在几百年内,资产阶级一直寄生于这个特权阶级,留在它的身旁,危害它,利用它的错误、奢侈、闲散和缺乏远见,往往通过高利贷攫取它的财产,最后挤进它的行列,并跟着它没落。另一些资产者接着又冒了出来,重新开始同

样的斗争。总之,这是长时期的寄生现象:资产阶级不断为自身的利益而损害统治阶级的利益。但资产阶级的上升是长期的和缓慢的,父辈的野心传给儿子,再传给孙子,子子孙孙地往下传,永无穷尽。

从封建社会中派生出来的这种社会本身还是半封建社会,财产和社会特权相对地受到保护,名门世家还能相对平静地坐享其成,由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各人基本上仍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必须确立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局面,才能使资本得以积累,使名门世家得以绵延长存,使资本主义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终于降临人间。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破坏着上层社会的某些堡垒,建设起有利于自己的、同样牢固的其他堡垒。

金钱家族的这一长期孕育过程终于取得令人眩目的成果:无论在以往或现代,我们对此已如此熟悉,因而很难想到,这其实是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只有在陌生的地方,看了欧洲以外的各个社会的不同情景,才能猜出其中的奥妙。在这些社会里,资本主义(根据我们给它的含义)往往遇到不易克服或不能克服的社会障碍。这些障碍从反面把我们引导到作出全面解释的道路。

我们把日本社会放在一边不谈,那里的发展过程与欧洲大致相同:封建社会日趋没落,资本主义社会终于脱胎而出;在日本这个国家里,商人世家的历史最为长久:诞生于17世纪的某些世家至今仍然兴旺。但在社会比较史上,唯有西方和日本是几乎自动地由封建制向金钱制过渡的社会。在其他地方,国家、出身特权和金钱特权各自所占的地位很不相同,而我们正是从这些不同中吸取教益。

下面谈中国和伊斯兰地区。我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不完

整统计数字给我们这样的印象,那里的社会纵向流动性似乎比欧洲大,稳定性比欧洲小得多。科举制度意味着人人都有当官和升官的门路。虽然考试并非绝对没有舞弊,但它在原则上对各社会阶层全都开放,其门户远比 19 世纪的西方大学开得大。科举给人担任高官的机会,这实际上是社会机遇的再分配,也就是牌局中的重新发牌。但是,新登高位的官吏仅仅及于自身。他们在职期间积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欧洲那样的大家族。何况,财势过大的家族通常招致嫌怨,因为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所有,唯有国家才能向农民收税,国家又严密监视各项商业和工矿企业。尽管商人和贪官在地方范围内有所勾结,中国国家却不断阻挠资本主义的繁荣,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这里的极权主义没有贬意)。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仅在中国之外立足,例如南洋群岛,那里的中国商人可以自由行动,自由发展。

在广大的伊斯兰地区,特别在 18 世纪前,私人占有土地只是暂时现象,因为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君主。历史学家认为,那里只有过去欧洲的所谓“封地”(即赐予个人终身享用的产业),而没有世袭采邑。换句话说,如同过去加洛林王朝那样,国家分封的领地(即土地、村庄、土地年金)在领主去世后由国家收回。这是君主用以收买和笼络士兵和骑兵的一种方式。领主死后,他的领地和产业一概交还给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或德里的大莫卧儿。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君主在位期间能像更换衬衣一样改变统治集团和上层阶级,他们有时果真这样去做。社会的上层经常在更新,家族就没有立足的可能。关于 18 世纪的开罗,最近有一份研究材料告诉我们,那里的大商业往往只能传到儿子一代,很少再能往下传给孙子,它将被政治社会所吞噬。印度的

商业生活之所以比较稳定,因为它的发展超脱不稳定的上层社会,并得到商人和银行家种性制的保护。

至此,对于我提出的论点,诸位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个论点是简单而可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成功需要具备某些社会条件,需要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的中立、宽容或软弱。即使在西方,这种宽容也有程度的不同;由于种种有历史根源的社会原因,法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始终不如英国那样有利。

我想这个观点不会引起什么争议。但在另一方面,一个新的问题又自动产生。资本主义需要有等级制。但等级制又究竟是什么?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上出现的社会数以百计,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等级制,都有少数特权者和负责人高高在上。过去是如此:18世纪的威尼斯,旧时代的欧洲,梯也尔先生时代的法国或1936年揭露“二百家族”统治的人民阵线时代的法国,还有日本、中国、土耳其和印度。现在也依旧如此;即使在美国,资本主义只是利用了等级制,却并没有发明等级制,正如它没有发明市场或消费一样。在历史的远景中,资本主义犹如晚到的来客,当他到达时,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换句话说,对资本主义说来,等级制是个不依它意志为转移、事先规定它必须接受的自在现实,因为非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取消等级制。

这个观点又涉及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我在书里试图一一加以介绍,但没有作出结论,因为这是个关键问题或问题的关键。是否应该打碎等级制和取消人对人的依附?让-保尔·萨特于1968年作了肯定的回答。不过,难道这真是可能的吗?

第三章 世界的时间

在前两章里,我已把七巧板或者一块一块地或者分组地向诸位作了介绍;为了解释的方便,分组时的次序是随意排列的。现在再把七巧板重新搭起来。这是本书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的目的所在。“世界的时间”这个标题足以表明我的宏愿:把资本主义及其演变和手段同一部世界通史联系在一起。

一部历史也就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系列形式和经验。世界的整体是指15至18世纪期间形成,并逐渐对人类的全部生活,对世界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明施加影响的那个统一体。可是,世界具有不平衡的特性。目前存在的以富裕国家为一方和以不发达国家为另一方的形象,大体上也适用于15至18世纪。从雅克·克尔到让·博丹,到亚当·斯密和凯恩斯,富国和穷国当然并非一成不变;历史的车轮已向前滚动了。但世界的规律没有多少变化:它在结构上仍分成富国和穷国。世界是同普通社会一样的等级社会,普通社会可以从中看出自己放大的形象。宏观和微观最终都有相同的结构。为什么?这正是我试图要说明的问题,但是否能够做到,我还没有把握。历史学家往往着重观察事情的经过,很少问为什么,往往考察重大问题的结果,但不追究其原因。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应该以更大的热情去发现经常被他忽略和轻视的根源问题。

——

这里有必要再次把术语确定下来。我们必须使用“世界经济”和“经济世界”两个词,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加重要。“世界经济”是指整个世界的经济,或用西斯蒙第的说法,“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世界”是我根据德语的“Weltwirtschaft”生造出来的,这里的经济只占世界的一个局部,但又单独构成一个整体。很久以前,我曾写道,16世纪的地中海是个独立的经济世界(Weltwirtschaft),也可以说,是个自在的世界(用德语是: ein Welt für sich)。

经济世界是个具有三重意义的现实:

——经济世界占据一定的地域,并有一定的界限,界限的变化相当缓慢,但毕竟有变化。每隔很长的时间,界限甚至必定被打破。15世纪末以后的地理大发现可算是一个例子。1689年,在彼得大帝的推动下,俄罗斯对欧洲经济的开放也是一个例子。今天,假如中国和苏联干脆、全面、彻底地实行经济开放,西方经济世界的界限也将会被打破。

——经济世界总有一个中心或极点,这在过去是城邦,在今天则是都市(指经济都市,在美国是纽约,而不是华盛顿)。同一个经济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两个中心并存:奥古斯都、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时代的罗马和亚历山大;基奥贾战争(1378—1381年)期间的威尼斯和热那亚,18世纪荷兰灭亡前的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两个中心必有一个要被淘汰。1929年,经

过短期的游移,世界中心毫不含糊地从伦敦迁到了纽约。

——任何经济世界都分层划区。腹心层是指中心四周的地区,如17世纪阿姆斯特丹充当世界中心时的联合省(不是联合省的全部);1780年伦敦彻底代替了阿姆斯特丹后的英格兰(不是英格兰的全部)。随后是环绕腹心层的中间层。最后是广大的外层,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外层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而不扮演伙伴的角色。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往往过着炼狱或地狱一般的生活。它们的地理位置足以说明其原因。

以上过分简略的陈述显然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论证。我的第三卷书正是做了这一件事,但诸位也可在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的《近代世界体系》(1974年在美国出版,后由弗拉马里翁出版社以《15世纪至今的世界体系》为题在法国出版)中看到一個确切的概貌。对这位作者的个别观点和一、二条主线,我并不始终同意,但这并不要紧。我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在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看来,除欧洲外,别无其他“经济世界”,欧洲经济世界建立的时间是在16世纪以后,而我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

这些共存的经济世界天各一方,极少交往,因为每个经济世界各有其辽阔的边缘地带,为从事贸易而穿越边缘地带一般无利可图。彼得大帝登基前的俄罗斯就是这些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世界之一。截止18世纪,无边无际的土耳其帝国也是一个经济世界。相反,查理五世皇帝或非力浦二世时代的德意志帝国虽然幅员广大,却不构成一个经济世界,从帝国诞生起,它就包括在活跃的欧洲经济的范围之内。早在克里斯托弗尔·哥伦

布 1492 年的旅行前,欧洲加上地中海及其向远东伸出的触角已经构成了一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它将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扩大,吞并大西洋诸岛和沿岸,逐步深入美洲内陆,并将与印度、南洋群岛和中国等依然独立的经济世界加强联系。同时,在欧洲内部,经济中心将由南向北迁移,先后转到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请注意,并非转到西葡帝国的中心塞维利亚和里斯本。

因此,我们可以在世界的历史地图上放一张透明纸,用铅笔大致描出每个特定时期中各经济世界的区划。由于这些经济世界变化缓慢,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去研究它们,观察它们的活动方式和掂掂它们的分量。这些经济世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奥秘。我们将仅仅回顾这一历史奥秘,因为我们的任务只是指出,欧洲从开始对外扩张以后历次建立的经济世界何以能说明或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活动及其自身的活动。我们首先想说,这些典型的经济世界曾是欧洲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母型。总之,我将朝这个方向一步一步地慢慢进行解释。

二

我们不是去发现历史的奥秘,而是去说明它。用吕西安·费弗尔的话来说:“我们赋予历史以尊严。”这已经很不容易。我这里着重分析经济世界中心的转移和区域划分,正是出于这个道理,想必诸位是明白的。

每次中心需要转移,都有新的中心形成,似乎经济世界没有中心就不能生存。但是,正因为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很少发生,它的意义就尤其重大。以欧洲及其附属地区而言,14世纪80年代形成了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1500年前后,中心突然从威尼斯跳到了安特卫普;接着于1560年左右又回到地中海的热那亚;最后,于1590至1610年间迁往阿姆斯特丹,欧洲地区的经济中心将在那里稳定两个世纪。1780至1815年间,中心再转到伦敦。它于1929年越过大西洋迁往纽约。

在欧洲世界的时钟上,命运的钟声曾响过五次,每次中心转移都是在斗争、冲突和强烈的经济危机过程中实现的。一般说来,总是经济恶化给了已经岌岌可危的旧中心致命的一击,并确认新中心的出现。这一切显然没有数学规律性可循: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是一次考验,强者经受得住,弱者支持不下。中心并非在一次危机的打击下立即垮台。相反,17世纪的危机往往最后对阿姆斯特丹有利。我们近几年来正经历着一场强烈而持久的危机。假如纽约在考验中倒下(我个人并不这么想),世界将会制造或找到一个新的中心;如果美国能像预料的那样经受考验,它将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在我们经历的恶劣环境中,其他国家的经济遭到的打击可能比美国更大。

总而言之,似乎中心的转移一般与持续的全面经济危机相联系。因此,我们显然必须透过这些危机去研究中心转移如何进行这个难题,而整个历史进程也正取决于中心转移的方式。为了避免过于冗长的说明,我们不妨比较仔细地分析一个例子。由于安特卫普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并不巩固,在政治上接连遇到打击和挫折,地中海地区于16世纪下半期又重新扶摇直上。在这以前,从美洲矿区运来的大批白银主要从西班牙经大西洋

转运佛兰德；1568年后，白银改道运往地中海，热那亚又上升为经济中心。从直布罗陀海峡往东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经历了一次经济复兴。但所谓的“热那亚时代”为时很短。局势接着开始恶化，在半个世纪内曾是欧洲商业中心的热那亚皮亚琴察交易会于1621年已丧失其主角地位。地中海再次沦为二等地区，这在地理大发现后是十分合理的，地中海后来也长期停留在这个地位。

在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探险后一个世纪，地中海终于没落，间歇期之长令人惊讶，这正是我在很久前出版的关于地中海的一部厚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开始走下坡路的日期应该定在哪一年？是1610、1620还是1650年？没落的经过又怎样？依我之见，这后一个问题更加重要。理查德·拉普在一篇文章里（1975年在《经济史杂志》发表）正确而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多年来我读到的最漂亮的文章之一。文章向我们证明，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地中海地区受到了北方商人的骚扰和劫掠。北方商人没有依靠印度公司和远洋冒险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他们覬觐地中海的现成财富，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他们让廉价产品，有时让冒牌货涌进地中海，故意模仿南方的优质纺织品，甚至盖上世界公认的威尼斯商标，送到威尼斯的普通市场上销售。地中海的工业在这一打击下同时失去了顾客和信誉。诸位不妨设想，假如一些新兴国家有可能向美国倾销它们打着“美国制造”招牌的产品，夺走美国的国内外市场，过二、三十年或四十年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总之，北方商人的胜利并非因为他们会做生意或是工业竞争的自然结果（虽然工资低廉对他们是个有利条件），也不是因为他们走上了宗教改革的道路。十分简单，他们的政策就是夺

取原来的优胜者的地位,暴力也是手段之一。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谴责了瓜分世界,但这种瓜分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是件新鲜的事,这在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个现实。在中心或在中心附近生活的人总是对其他人拥有种种权利。

这里提出了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任何经济世界都分成几个向心区,离中心愈远,条件愈差。

华贵、财富和幸福集中在经济世界的腹心。那里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有高价格、高工资、银行、高档商品、有利可图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农业;那里是长途贸易的起点和终点,也是贵金属、硬通货和金融期票的汇集处。那里有遥遥领先的现代化经济。15世纪的威尼斯,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的伦敦或今天的纽约都是这样。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科学十分普及。“自由”业已建立,既不完全是神话,又不完全是现实。诸位可以想到所谓威尼斯的自由、荷兰的自由或英格兰的自由!

与腹心地区相邻的中间地区是腹心地区的竞争对手,那里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一级:自由农民和自由人的数量较少,交换尚有缺陷,银行和金融组织不够完备,往往受外界控制,工业还停留于传统形式。18世纪的法国就是如此,生活水平不能与英国相比。大腹便便的约翰牛吃的是肉,穿的是皮鞋,而瘦小的笨伯雅克吃面包,穿木屐,面目黧黑,未老先衰。

边缘地区的情形更不如法国。以1650年前后为例,世界的中心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中间地区或二等地区包括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英格兰、莱茵河和易北河流域的德意志、法兰西、葡萄牙、西班牙、罗马以北的意大利。边缘地区是北欧的苏格兰、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汉堡和威尼斯一线以东的欧洲,罗

马以南的意大利(那不勒斯、西西里);欧洲在大西洋彼岸占有的美洲也是典型的边缘地区。如果加拿大以及英国早期的殖民地不算在内,整个新大陆当时实行奴隶制。同样,中欧的边缘地区,直到波兰甚至更远,属于“农奴制的第二期”,就是说,那里的农奴制在与西欧的农奴制一起废除后,于16世纪实行了复辟。

总之,作为经济世界,欧洲于1650年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从荷兰的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农奴制社会,以及最低级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同时性或共时性构成所有问题的关键。资本主义其实就靠这种阶梯为生:外层地区供养内层地区。特别是腹心地区。所谓中心,难道不就是整个建筑的拱顶,就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吗?从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心依靠外围的供应,但外围又屈从中心的需求。正是欧洲在新大陆复活了和推行了古代的奴隶制,并根据自身经济的需要,“诱使”东欧推行“二期农奴制”。由此可见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的论断的重要性:资本主义是世界不平衡发展的产物,它必须在国际经济的配合下才能发展。地域的广阔无垠,条件的优劣不一,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如果在狭小的地域内,资本主义就不会如此茂盛地生长。如果没有别人为它充当奴仆,它也许会寸步难移。

这个论点改变了解释资本主义何以产生的习惯模式:奴隶制被农奴制所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它提出了同时性和共时性,这个别出心裁的解释确实具有重大意义。但它不说明,也不可能说明一切。至少不能说明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我想说的是欧洲经济世界以外的情形——这个我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确实,直到18世纪末出现真正的世界经济前,亚洲也曾出现过几个稳固、强盛的经济世界,我这里想到的是中国、日本、印

度加南洋群岛,以及伊斯兰地区。可以说,这些经济世界同欧洲之间的联系不多,仅涉及几种奢侈商品——胡椒,香料,特别是蚕丝——,而且用现金支付,交易额在当时的整个经济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重。这些交易虽然数额有限,但全都置于大资本的集中控制之下,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偶然的。我甚至认为任何经济世界往往要受外界的影响。欧洲的大事记特地记载了以下的日期:华斯哥·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卡利卡特;荷兰人科内利乌斯·豪特曼于1595年在爪哇大城市万隆停泊;罗伯特·克莱夫于1757年在普莱西取得胜利,孟加拉从此落在英国手里。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记载有什么不对。命运长着一步跨七里的长腿,它能从远处施展影响。

三

我已经向诸位谈到欧洲的经济世界以及先后创立和活跃这些经济世界的中心。应该指出,在1750年前,这些中心始终是城市或城邦。人们完全可以说,于18世纪仍主宰着经济世界的阿姆斯特丹是作为历史极点的最后一个城邦。在它背后的联合省不过是个影子政府而已。阿姆斯特丹自行其事,并像灯塔一样照亮从安的列斯群岛到日本海岸的整个世界。随后,从启蒙时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个不同的新时代。作为新的主宰,伦敦不是一个城邦,而是大不列颠诸岛的首都,民族市场赋予它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里涉及到两个阶段:城邦的建立和统治;民族国家的建立

和统治。有关事实这里将一笔带过,不仅因为大家都已了解,我在前面也已谈到,而且因为在我看来重要的只是要观察事实的整体,并通过这种观察,以新的方式提出和说明资本主义的问题。

截止 1750 年前,欧洲总是围着一些主要城市(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转;由于它们扮演的角色,这些城市也就变成庞然大物。然而,其中任何一个城市在 13 世纪都还不能主宰经济生活。这不等于说,欧洲当时不是一个有结构、有组织的经济世界。一度被伊斯兰征服的地中海已对基督教重新开放,与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使西欧得以建立起向远方扩大其影响的据点,没有这样的据点,显然就谈不上名副其实的经济世界。两个先进地区分别形成,各据一方:南方的意大利和北方的尼德兰。整体的重心介于两个地区之间,就在中途的香巴尼和布里,那里的交易会加上一个大城市(特鲁瓦)和三个中等城市(普罗旺、奥伯河畔的巴尔、拉尼)构成了人为的城市群。

说这个重心悬在空中,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它的位置离巴黎不远,当时正值圣路易王朝盛世,巴黎不但是重要的商埠,那里的大学也大放异彩。研究人文主义的史学家朱泽培·托发南以《没有罗马的时代》为标题写了一部书,他用这个书名没有错,这是指 13 世纪,罗马已把文化王国的地位让给了巴黎。但在当时,巴黎的光辉显然与香巴尼热闹、活跃、几乎接连不断的国际交易会有关。北方尼德兰地区——即从马恩河畔到须德海的广大地区——用家庭作坊生产的棉麻毛织品换取意大利商人的胡椒、香料和钱财。这些交易虽然仅限于奢侈品范围,但也足以开动商业、工业、运输和信贷的庞大机器,并使这些交易会成为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

香巴尼交易会于13世纪末日趋没落,其理由很多:地中海和布鲁日之间于1297年实现了直接通航,海上运输从此压倒了陆上运输;辛普朗和圣戈塔山口为德意志城市开放了南北通道;意大利城市的工业化:这些城市原来仅仅为北方的呢绒坯料染色,如今开始自己制造,佛罗伦萨的毛织业日趋兴旺。尤其重要的是,伴随着黑死病的流行,14世纪的严重经济危机将席卷欧洲:香巴尼交易会上实力最强的意大利将胜利地经受这场考验。它重新成为欧洲生活当之无愧的中心。它将主持南北之间的各种交换,远东的货物通过波斯湾和红海来到了意大利,来自东地中海的商队优先为它打开欧洲的各个市场。

意大利的领先地位实际上长期由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四大城市所分享。只是于1381年热那亚战败后,才确立了威尼斯并不稳固的统治。这个地位维持了一百多年时间,威尼斯当时是与东地中海贸易最主要的商埠,欧洲各国纷纷涌向那里,以取得远东的稀有产品。安特卫普于16世纪代替了圣马克城(威尼斯别名)的地位:这是因为葡萄牙取道大西洋进口大批胡椒,货栈设在安特卫普,斯凯尔特河口的海港就成了大西洋和北欧贸易的主要中心。后来,由于种种政治原因,中心又转往热那亚;这些原因与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战争有关,说来就一言难尽了。圣乔治城(热那亚别名)的福运不靠东地中海的贸易,而靠与新大陆和塞维利亚的贸易,美洲源源不断运来的白银使该城成了欧洲的白银集散地。阿姆斯特丹终于使人人都能满意:它的领先地位持续了150多年,影响所及从波罗的海直到东地中海和马鲁古群岛,原因主要在于它一方面牢牢控制着北方的商品,另一方面又迅速占据桂皮、八角等细香料在远东的所有产

地。这些接近垄断的贸易使它几乎能为所欲为。

我们且把这些城邦搁下,赶快来谈谈有关民族市场和民族经济的大问题。

民族经济是国家根据物质生活的需要和改善,把一块政治地域改造成成为统一的、协调的经济地域,使各项活动都朝同一个方向发展。最初只有英格兰取得了这项成果。谈到英格兰,人们总要想起种种革命:农业革命、政治革命、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在这张单子上,应该再加上一项,即创造民族市场的革命,无论用什么名称都可以。奥托·兴茨在批评桑巴特时首先强调了这一变革的重要性;原因在于国土狭小的英格兰拥有较多的运输手段,除近海航运外,还有密集的内河和运河网以及众多的车辆和役畜。英格兰各郡通过伦敦互换产品或出口商品,因为英格兰的内地税卡很早已被撤消。最后,英格兰又分别于1707年和1801年与苏格兰和爱尔兰实现了统一。

人们或许会想,同一成果在联合省也已实现,但联合省国土逼仄,甚至养不活本国居民。荷兰资本家完全转向国外市场,不把国内市场放在心上。至于法国,它面对着太多的障碍:经济落后、国土辽阔、收入微薄、内部联系困难,中心尚未完全形成。可见,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领土过大的国家势必极其分散。爱德华·福克斯在一部引起众多争议的著作里,曾不太费力地证明,当时至少有两个法兰西:一个是沿海的法兰西,在18世纪经济高涨的鞭策下,它表现十分活跃和机灵,但与内地联系不多,注意力转向外部世界;另一个是内陆的法兰西,它恋土守旧,目光短浅,对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无动于衷。照例总是这第二

个法兰西掌握政权。处在内地的巴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却不是经济中心;自从里昂于1461年开办交易会后,它长期扮演了经济中心的角色。16世纪末,中心曾开始向巴黎转移,但没有成效。只是在1709年萨缪埃尔·贝尔纳破产后,巴黎才成为法兰西市场的经济中心;接着,巴黎交易所于1724年改组,法兰西市场开始发挥作用。时间已经晚了,尽管马达在路易十六时开始快速开动,却已经不能左右整个法兰西的局面。

英格兰的情形要简单得多。那里只有伦敦一个中心,从15世纪起,在迅速形成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同时,伦敦得以自由支配英格兰市场,换句话说,能根据本国大商人的需要安排英格兰市场。

另一方面,岛国地位帮助了英格兰脱离外国资本主义的干预。由于托马斯·格雷欣于1558年创立了证券交易所,英格兰摆脱了安特卫普的牵制。自从1597年封闭了汉萨同盟在伦敦的商行和取消其特权后,英格兰便抛开了汉萨同盟。1651年颁布的航运法又使英格兰脱离阿姆斯特丹。当时,阿姆斯特丹基本控制着欧洲贸易,但英格兰拥有对它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由于风向的关系,荷兰帆船总是需要在英国港口停靠。这显然是荷兰不得不接受英国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原因。总之,英格兰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保护其民族市场和新兴工业。英格兰对法兰西的胜利很早已露端倪(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于1786年全面暴露(艾登条约),于1815年达到登峰造极。

随着伦敦地位的上升,欧洲和世界的经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因为英格兰确立的经济优势(进一步扩展到政治优势)标志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长达几个世纪的时代里,世界被分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几个经济世界,尽管欧洲野心勃勃和跃跃欲试。

它毕竟不能操纵世界的其他地区。英格兰成功地代替阿姆斯特丹的地位,已不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对过去的超越。

英国在征服世界途中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和波澜,但它保住了优势,克服了障碍。欧洲的经济世界在把其他经济世界挤垮的同时,终将称霸全球,并且以世界经济的身分出现,地球上任何障碍都将在英国人面前,甚至在欧洲人面前退让。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14年。生于1875年的安德烈·齐格弗里特那时已有25岁,他随身只带一张名片充当身份证,竟得以周游世界;事后很久,世界已边界密布,他回忆这段往事,感到十分有趣。这是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奇迹,相当多的人显然为此付出了代价。

四

我们下面还应该谈谈英国的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给岛国带来了青春和新的活力。诸位不用担心,我不会莽撞地陷进这个至今困扰着我们的历史大题目中去。工业革命始终以咄咄逼人的气概变革着我们周围的一切。请诸位放心,我将仅仅介绍这一巨大变革运动的初期,决不介入英美历史学家挑起的争端(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也参与了这一争端)。何况,我的问题范围有限:我想指出英国的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同我描绘的格式和模式相符合,在多大程度上同突变丛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相融合。

必须说明,工业革命本身就是用词不当。从词源上讲,“革

命”是说一个轮子或星球的转动,是一种快速运动,刚开始转动,就知道它很快要结束。可是,工业革命是典型的慢速运动,初期几乎不被人注意。亚当·斯密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却没有察觉它的迹象。

当前的情形难道不正好说明,工业革命是个缓慢、困难和复杂的过程?我们亲眼看到,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历闻所未闻的困难,遇到无数挫折,速度之慢似乎出人意料之外。有时,农业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熟练劳动力的数量或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有时,本国资本家不愿在当地投资,宁肯向国外输出资本,因后者更加可靠和更加有利可图;官员贪污浪费,进口技术不能适应,价格过高,影响成本,或者必要的进口不能由出口作补偿: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国际市场不欢迎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它们因而束手无策。在工业革命已有模式可循,不必自己创新的条件下,尚且产生这种种失利。可见,事情说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所有这些困难情形其实也反映了英国以前的工业化经历,就是说,早在英国前,许多在技术上显然已经可能的革命遭到了失败。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已认识到蒸汽的力量,但仅仅以此为玩乐。古罗马掌握的工艺技术在上中世纪被埋没了几百年,到12和13世纪才复活。就在这个复兴时代,欧洲推广了风磨和古罗马已有的水磨,神奇地增加了能源,这已经是一次工业革命。中国大约在14世纪发现了焦炭炼铁,但这场潜在的革命却没有下文。16世纪,矿井深处开始安装一系列起重和抽水工具,这些作为现代工厂前身的设施一度对资本有诱惑力,但终因工效不高而很快被放弃。17世纪,煤炭的使用在英格兰日益扩大,约翰·内夫正确地指出这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这场革

命不能扩大范围和带来广泛的变革。至于法国,工业进步在18世纪表现明显,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基础科学与海峡对岸的英国相比也毫不逊色。总的说来,英国在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后,一切似乎就水到渠成,这正是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提出的引人入胜的问题,是世界历史的最大裂缝。但是,为什么这一切在英国发生呢?

英国历史学家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各执一词,使外国历史学家无所适从,但调和这些见解也并不容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传统的、简单化的解答都已被排除。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工业革命看作一个整体现象,一个起源深远和发展缓慢的现象。

我刚才谈到当前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混乱,相比之下,以使用机器和大生产为特征的英国工业革命却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使国民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没有发生任何卡壳和阻塞现象,这难道不是最令人奇怪的事吗?英国农民被迫离开了家乡,而乡村的生产力仍得以保持;工业家获得了他们需要的熟练或不熟练的劳动力;尽管物价上涨,国内市场继续在发展;技术也跟着发展,不断提供需要的服务;国外市场一个接一个地对它开放。甚至利润降低——例如棉纺工业的利润在第一次高涨后的急剧下跌——也没有引起危机:已积累的庞大资本转向别的部门,铁路代替了棉纺织业的地位。

总之,英国经济各部门满足了生产突然膨胀的要求,没有出现任何故障和停顿。这难道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致行动吗?况且,英国的棉纺织业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数发明由工匠作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较小,

也容易借到。发动这场惊人变革的不是伦敦的商贾巨富和金融资本。伦敦只是在1830年后才着手控制工业。这个例子足以使我们看到,正是市场经济、基础经济和小工业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全部活动才为未来的所谓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工业资本主义的成长壮大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

然而,没有使英国当时能横行世界的外在环境,英国革命的进行肯定不能如此顺利。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促进作用。棉纺业的繁荣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新市场的开辟不断在注入后劲:葡属美洲、西属美洲、土耳其帝国、印度等等。整个世界无意中为英国革命充当了有效的帮手。

因此,在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起源问题上,内因论者(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作解释)和外因论者(用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剥削作解释)之间的争吵在我看来是无的放矢。剥削世界不是单凭自己的意愿就能做到的。必须事先慢慢积聚,但可以肯定,力量的加强也必须以剥削他人为条件。正是在这双重过程中,自己与他人的距离便逐渐拉大。两种解释(内因论和外因论)错综复杂地胶合在一起。

到了这里,是我作结论的时候了。以上论述是否能使诸位信服,我没有把握。在结束我的演讲前,根据自己对以往世界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和解释,我现在还想告诉诸位我对当前世界和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否能使诸位信服,我更没有把握。但是,解释历史必须联系今天,必须通过联系今天来证实对历史的解释。难道不是如此吗?资本主义的规模当然今非昔比,作为基础的交换和生产手段也相应大大改观。但从大处着眼,我觉得资本

主义的本质没有彻底的改变。

我可用以下三个理由作为证据：

——资本主义始终建立在开发国际资源和潜力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它的存在具有世界规模，至少它的势力向全世界伸展。它当前的大事就是重建这种一统天下的局面。

——资本主义始终拚命依赖法律的或事实的垄断，尽管它在垄断问题上受到狂暴的攻击。用今天的话说，垄断性组织继续绕开市场。如果认为这是新事，那就错了。

——此外，资本主义并不如人们通常所说统辖整个经济或全部社会劳动，它从未完整地把前者或后者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我对诸位谈到的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三个层次，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分类性和解释性价值。为了明白这个道理，只要从内部去认识位于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某些特殊活动就够了。在底层，即使欧洲至今还有许多自给自足性质的和不列入国家统计范围的生产和服务项目，还有许多手工业作坊。在中层，以成衣工为例，他在生产和销售方面服从于严酷无情的竞争规律，稍有疏忽或努力不够，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在最高一层，我可向诸位举我所了解的两家大公司为例，一家法国公司和一家德国公司。它们名义上在欧洲市场互相竞争，但它们对定货送到这家或那家公司竟毫不动情，因为不论通过什么途径，只要取得利益，它们就能共享。

通过以上的事实，我证实了自己的观点（我个人也是慢慢才赞同这个观点的），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是最高层的经济活动或向最高层上升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这种手段高强的资本主义凌驾在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层之上，并体现着高利润区域。我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制高点。诸位可以因此

责备我,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就我一个。列宁在1917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曾两次断言:“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几万家大企业掌握一切,千百万小企业无足轻重。这在1917年显然是真理,但在很早以前也是真理。

报刊作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过分重视历史规模和历史前景,这是个缺点。许多历史学家把他们研究的时期当作既有开端又有结束的独立存在,这难道不是犯同样的错误吗?目光敏锐的列宁在同一本小册子中写道:“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这一断言很值得商榷:资本主义始终具有垄断性,商品和资本不断在同时流通,资本和信贷历来是取得和征服国外市场的可靠手段。早在20世纪前,资本输出曾是佛罗伦萨(13世纪)以及奥格斯堡、安特卫普和热那亚(16世纪)的日常现实。到了18世纪,资本在欧洲和世界的流通已很迅速。金钱的各种狡诈手段并非于1900或1914年间世,这难道还用我来说吗?无论过去和现在,资本主义都玩弄这些手段,它的本领和力量正是能够从一种狡诈手段和活动方式转到另一种,能够根据环境的需要多次改变策略,同时并保持或基本保持自己的本质。

今天,无论在资本主义世界或在社会主义世界,人们不愿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区分开来;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并非作为历史学家),我对此感到遗憾。在西方,每当有人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便回答说,这是自由兴业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在相对意义上是最小的弊端。在我看来,事情完全不是如此。根据目前的动向,即使在苏联,也有人觉得社会主义

经济过分刻板,主张给它较多的“机动”(用我的话说,更多的“自由”);对于这种担心,人们回答说,这是破除资本主义祸害的必然伴侣,在相对意义上是最小的弊端。我认为事情也完全不是如此。但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又是否行得通呢?我想它在世界上绝对不会有那么多的拥护者!

我的演讲本想到此结束,但作为历史学家,我还有一句心里话要讲。

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重头开始的科学。它的命运就是所有人文科学的命运。我认为,我们撰写的历史著作在过了几十年后就不再有价值。我们知道,任何一本书写成后都不是一锤定音的。

我对资本主义和经济的见解建立在大量查阅档案和图书的基础之上,但我引用的数字毕竟还不够多,相互的联系也不够紧,重质量甚于重数量。表现生产曲线、利润率、储蓄率的图表,企业的资产借贷表或固定资产损耗概算表都极其少见。我曾向我的同事和朋友打听这方面的情况,但收效甚微。

依我之见,朝这个方向努力可能是条出路,从而超脱我因没有其他选择而作出的解释。把极其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分成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固然便于人们理解,这种划分势必会牵强附会或削足适履。随着机器的出现,经济增长率发生了变化;为了懂得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应该抓住经济事实的整体。从整体上、总体上去研究历史应该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宏观经济计量和宏观经济这类现代方法纳入到以往的经济领域中去。研究国民收入(虽然很小)的运动,重新认识史学先驱勒内·巴雷尔关于17和18世纪的普罗旺斯的著作,确定“国家预算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联,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的建议,衡量毛收入

和纯收入之间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差距(我以为,库兹涅茨的假设对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上是我希望年轻的历史学家去做的事。在我的著作里,我已间或打开一二扇窗,人们从窗口仅仅可以看见这些问题的远景,这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群策群力地从事广泛的调查。

当然,这不等于说明天的历史将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史。经济计量至多能帮助研究国民收入的起伏波动,却不能衡量已有的国民财富总额,而这一总额是可以和应该加以研究的。对历史学家说来,对其他人文科学和所有客观科学说来,始终有一个新大陆有待发现。

注 释

1. 在古代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由此引伸的转义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

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

本文讨论的问题很不寻常：18 世纪以来的文明史研究（伏尔泰于 1756 年发表《风俗论》）对我们认识现时和未来能否有所启示？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因为人们若不联系过去，就几乎不能懂得现时。在本文作者看来，历史同时是对过去和对现时的认识，是对“已经发生”的和“正在进行”的演变的认识，因而在每段历史“时间”内——无论是昨天或是今天——，都要区别持续存在的因素和转瞬即逝的因素。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本文作者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是：为了认识现时，必须研究迄今以来的全部历史。但在我们史学界关注的这个整体中，文明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独特的领域

吗？拉斐尔·阿尔塔米拉毫不犹豫地断言：“说到文明就等于说到历史”。基佐于 1828 年写道：“这种历史〔指文明史〕是……包括所有其他历史门类在内的、最伟大的历史。”

文明史无疑是一个广阔无垠、难以划界的历史领域；根据不同的时代和国家，根据不同的史学家和评论家，它的内容曾不断有所变更，并且继续在演变中。可见很难为文明史下个定义，即使下了定义也不免牵强。

首先，文明一词有单数和复数之分，前者关系到整个人类，后者则分散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此外，文明一词从不单独使用，它必定有文化一词作伴侣。文化同样也有单数和复数之分。充当修饰词的“文化”历来模棱两可，既可作文化讲（由其词源所规定），又有文明的含义（因“文明”没有单独的修饰词）。我们或许可以说，文明是文化特征和文化现象的总和。

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词义的差异和可能的混淆。但是，无论关系到单数或复数，所谓文明史或文化史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统括着一系列独特的历史门类，这个和谐的乐队包括语言史、文学史、科学史、艺术史、法律史、政治制度史、技术史、迷信和宗教信仰史、日常生活史、以及难得有人研究的烹饪史……以上各个次等领域（恕不一一列举）的发展程度有高有低，它们的规律、对象以及内在的语言和运动均各不相同，它们的发展也不一定符合一般的历史趋势；把它们协调起来是很难办到的。我在法兰西公学曾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试图说明 16 世纪欧洲的科技史与其他历史门类之间的联系，结果几乎白费唇舌。不管这些历史门类是否同步发展，我们毕竟不能说它们之间毫无关系。针对莱昂·布兰斯维克和艾蒂安·吉尔松关于思想史自成体系的说法，吕西安·费弗尔曾合理地要求恢复通史的权利；在他看来，

通史有权关心整个生活，任何割裂生活的企图都只能是武断的。然而，要恢复通史的整体性，却又像化圆为方一样，是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

虽然如此，人们在文明史的问题上并不会产生犹豫，因为文明史不仅参与历史的某个门类，而且置身于整个历史之中。人们很难设想文明史竟与通史（或者说，总体的历史）能够分开。文明史通常表现为一种简单化的观点，但它始终试图解释历史和支配历史；它把某些真理和某些实在推向前台，而这些真理和实在都力图成为总体的解释。每种解释都在不同的层次上囊括整个历史；不论解释何等匆忙，它势必要抓住历史的全部内在和外表现；传统史是如此，社会史或经济史也是如此。进一步说，文明史之所以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今天遇到了挑战），这是因为唯独它才有超出历史界限的可能。昂利·贝尔主张“扩大”传统史的范围，使之不再陷于政治大事记的贫乏状态，“接触政治事件以外的事件和官方人物以外的人物”。换句话说，是要通过更加可靠的新途径，扩大历史的视野和作出全面的解释。根据这个主张，卡尔·兰普雷茨为推广文化史而进行的激烈论战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近年来，由于历史已扩展到社会和经济的领域，文明史研究不再四面出击，虽然它仍然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思考场所。

让复杂的、不确定的历史反过来解释现实，把历史放在一个很不习惯的位置——用今天的话说，“展望”的位置——上，这无论如何会引起一场艰难、持久的论战。本文并不以为能结束这场论战，也并不打算为论战作个小结，至多只想把有关的基本素材铺陈清楚。

即使如此，我们仍必须谨慎小心。至少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要根据昂利·贝尔的综合中心的传统,注意研究术语:对于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可能使我们产生误解的那些词,必须抓住它们的词源,并把它们放回原来的位置,以便知道它们究竟是真朋友或是假朋友。第二要真心诚意地假定,文明或文化一词与哪些力量群、价值群和要素群相联系,以便得出几个明确而毫不含糊的定义……如果我们在讨论中没有一定的整体连贯性,如果被大家认可的观察前提在科学上不能成立,如果不坚决挣脱历史形而上学的控制,我们的尝试显然事先就注定要失败。

一. 文明和文化

词的起源和风行

首先,我们惊奇地注意到,仅仅两个词,含糊多变和相与为伴的两个词,竟能囊括和涵盖如此广阔的领域。文明和文化(civilisation et culture 单数)在向复数过渡时,并不意味着数量的增加,而是意义的扩展。至于“文化的”(culturel)修饰词,它于1900年左右从德语进入到我国和其他各国的语言,无非给语言和文学带来方便而已。这么两个词,说来真是不多,尤其在使用时往往只用一个。

文化一词在1800年以前还很少见到。后来,两词之间展开了竞争,但有时混用,有时偏向其中的一个。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就等于说,文明和文化在观念上趋向统一。但这种趋向并不

构成规律。两词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并经常导致割据局面。辽阔王国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许多范围宽广的大问题被分成七零八碎的小问题：于是便产生了不同观念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众多的谬误。乍眼看来，这些词义之争似乎有点无聊，但它们却不止一次把我们引向辩论的焦点，虽然还不能完全说明争论的实质。

文化和文明在法国几乎同时问世。文化一词由来已久（西塞罗已经谈到“精神文化”），只是到了18世纪中叶才真正具有知识的特殊含义。据我们所知，文明于1766年首次在印刷物中作为名词出现，它的使用显然更要早些。但与动词形式和分词形式相比，名词的诞生肯定要晚得多，前面两种形式在16和17世纪已不难见到。必须发明和制造出文明的名词形式。该词最初确指对知识进步、技术进步、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朦胧向往，也就是所谓“启蒙思想”。孔多塞于1787年预言：“人们将看到，随着文明在地球上的传播和推广，战争、征服、奴役和贫困将逐渐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和“秩序井然”的社会作基础，文明是不可想象的。与文明相对立的是野蛮：文明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战胜野蛮，方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从野蛮到文明归根到底是一次伟大的过渡。马布里于1776年给他的朋友、一位波兰伯爵写道：“在上个世纪里，由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苦心经营，瑞典走出了野蛮时代，这对您曾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还写道：“彼得一世把他的国家（俄罗斯）从极端野蛮的深渊里拯救了出来。”不过请注意，在马布里神父的笔下，文明没有作为野蛮的反义词立即出现。该词的通用才刚开始。

文明接着引人注目地流行了起来，虽然流行而并无实际用

处,这至少是约瑟夫·夏佩在经过详尽考证后得出的见解。在半个世纪内,“文明”一词虽然在语言文字中取得了广泛的成功,但还不完全是科学意义上的成功。约瑟夫·夏佩说:“人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该词的重要。”按照这位评论家的意见,正在诞生中的各门人文科学本该为新词及其宽广的领域共同出力效劳,而事情却完全不是如此。人文科学本身还处在牙牙学语的孩提时代。在另一方面,那个“秩序井然”、充满乐观的社会却在给文明奠定了初步基础以后,就随着变革和革命很快消失了;大家知道,这些戏剧般的变革和革命发生在18和19世纪之间的交替阶段。一个很好的机会因此被错过了。

总之,在经过了种种曲折后,“文明”(同时还有“文化”)终于在1850年前后从单数过渡到了复数。特殊战胜一般的这一过程其实一直延续到整个19世纪。它本身就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它也是其他事件和其他变革的反映。文化或文明一旦以复数出现,便意味着人们不再把文明当作一种理想,不再要求文明恪守词源所包含的在社会、道德、知识等方面的普遍品格,而是逐渐趋向对各种人类经验——欧洲的经验和其他各洲的经验——一视同仁。

早在1850年前,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民族学家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推动“文明帝国分割成独立的州郡”(吕西安·费弗尔语)。欧洲正一次又一次发现外部世界,不能不勉强承认:无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人终究是人,文明终究是文明。于是,许多“地方”文明便应运而生;由于历史时间被专家们近乎荒唐地分段,“时代”文明也跟着成倍增多。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被越划越小。在伏尔泰和孔多塞的时代,难道有人曾说过爱斯基摩人的文化吗?或者,如阿尔弗雷德·梅特劳的出色论文所

说，巴西的印第安人是图皮瓜拉尼部族的文明吗？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1752年）中确实首先谈到了“时代”文明，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个词。复数的文明在19世纪开始盛行，无疑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新思想和新精神状态的出现。

复数的胜利于1850年间已经相当明显，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我们确实不能忘记，如同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基本语汇不断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语言传到另一种语言，又从一位作家传给另一位作家。人们把词汇像球那样传来传去，但传回时的球与传出时从不完全相同。当文化一词从德国——19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是个令人赞颂的国家——传到法国时，它的含义和威望已今非昔比。它在整个西方思想中正从次等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从赫尔德开始，文化在德语中被用于泛指知识和科学的进步，但与社会背景无关。至于文明，德语宁肯赋予它有关人的物质生活方面的含义。德语对以上的两词褒贬不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说：“社会上文明过度，〔就是说〕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

文明和文化的这种地位差异在德意志思想中将顽强地保持下去。正如有人所说，它符合德意志思想所惯有的那种精神和本原的二分法。沿着同一个方向，费迪南·滕尼斯（1922年）和阿尔弗雷德·韦伯（1935年）仍然认为，文明是实用知识或精神认识的总和，总之，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时使用的所有非个人的手段；相反，他们只承认文化是价值、理想和原则的规范。托马斯·曼指出：“文化意味着真正的心灵感应，而文明则是机械的传动。”一位名叫威廉·蒙森的德国历史学家于1951年画龙点睛地写道：“今天，人们有义务保证文明不至破坏文化，使技术不至消

灭人类存在。”话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但即使在德国,这种说法也并不是唯一通行的。奥斯瓦德·施本格勒于 1918 至 1922 年间略为修正了相沿成习的关系。他认为文化是一切文明的初级阶段和生机勃勃的春天;文明则相反是机械、僵硬和徒劳的重复,是虚假的荣华和落日的余光。在施本格勒看来,西方的“衰落”并非因为它遇到特殊的困难或严重的威胁(他不否认威胁和困难的存在),而只是由于它到达了半死不活的文明阶段。一位名叫 G. 库恩的德国历史学家在谈到蛮族入侵末期日耳曼农民对古罗马的胜利时指出,这是“农民对武士的胜利,乡村对城市的胜利,文化对文明的胜利”,这句信手拈来的话本身无足轻重,却正好说明了施本格勒以上看法的意义所在。

但是,德国从 1848 年和浪漫主义时代起对文化一词的长期偏爱,并未使文明和文化的词义之争告一段落。文明一词在英国和法国进行了相当有力的自卫,始终占据首要地位。在 1900 到 1911 年间的西班牙,拉斐尔·阿尔塔米拉撰写的划时代的通史著作就以《西班牙和西班牙文明的历史》为标题。在意大利,文明一词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扮演杰出的角色。在我国,不久前出版的《法国文明史》(1958 年版,若尔日·杜比和罗伯尔·芒德罗合著)成功地取代了原来阿尔弗雷德·朗博的那本旧教程,我相信该书的作者决不会认为,法兰西已陷入与精神相对立的物质生活之中,脱离开青春的源泉,陷入陈腐守旧、无所作为的境地。昂利·马罗在 20 年前曾建议,在法语中用文化一词专指“个人的精神生活”,而让文明确指社会学的实在。按照这种区分,文明仍旧保留很大一部分含义……我觉得约翰·赫伊津哈的看法很有道理,他从施本格勒的失败(我等会儿再谈)中找到一条补充的理由:这位德国评论家之所以猛烈攻击文明,是因为他低

估了文明的重要地位,我想说的是,他低估了该词在德国以外的“国际”威力。

我既不为文明一词辩护,也决不与它为敌;如果认为该词蒙受危险的威胁,这个危险与其说来自德国思想家并非毫无道理的固执,不如说因为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从中插了一手。爱德华·伯纳特·泰罗的巨著发表后(1871年),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从此不再使用“原始文明”的说法,而习惯于“原始文化”的说法;假如今天几乎只有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才科学地、“客观地”谈论文明问题,这对我们历史学家并不产生太多的妨碍。可是,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们对他们的说法将慢慢熟悉起来,这种说法也就迟早会强迫大家都接受。

由此只能得出以下的结论:文化和文明在漫游世界的过程中,在与各种互相矛盾的思想和爱好接触的过程中,经历了成千上万次曲折,在面对这些曲折时,我们至少应该持谨慎的态度。所有的词在使用中都有变化,而且必定会发生变化。这既由于科学术语的需要,也由于文化(作为修饰词)的潜在进步,还因为所有人文科学都面临思想的和方法的危机。美国两位最著名的人类学家阿·路·克罗伯和克里特·克拉克洪不久前进行的调查毋庸置疑地证明了以上的事实。他们列举了文化一词的161种定义,随后出现的定义还不算在内!阿尔芒·居维叶在其《社会学教程》中指出,文明至少有20来种不同的含义。含义很多,简直太多了。解决这些词义争执近乎痴心妄想……综合中心曾想编一部历史语汇,昂利·皮朗为此特地指出(1931年),历史学家最好不用别的术语,只用日常语言中的活词汇,也就是说,要绝对避免使用那种僵死的、枯燥的哲学用语(尽管哲学用语也不断更新)。我完全赞同皮朗的主张,即我们在写作时应采用语汇现

时的含义,暂时还在使用的含义。但我们应同时意识到,语汇还有和曾经有别的含义,甚至可能为我们准备新的不同含义。

原因是活词汇不受任何框框的约束,每个人几乎都能随意去使用它。有一位年轻的美国人类学家名叫菲利浦·巴格比,他在一本颇有见地的书中主张,在谈到城市的情形时使用“文明”一词,而在涉及尚未城市化的乡村时使用“文化”;如果这样,文明将始终是一种高级的文化,或者说是文化的高级阶段。这可能是个好办法,虽然办法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巴格比;但我认为,即使他提出的定义确有价值,并且变为一种约定俗成,这也很难一劳永逸地让以上二词从此循规蹈矩。就是眼下,这两个词还在演变,原因十分简单:我们往往在模棱两可的名词后面加上含义比较明确的修饰词,例如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科学文明、技术文明(文化亦然),甚至说经济文明(勒内·库尔德丹的一本书就以《巴西的经济文明》作标题)。

可见,在词义问题上的争执至今尚未结束。处在动荡中的人文科学也许特别需要有一些可以改变形态的、含义众多的、能够适应观察(而不是妨碍观察)的语汇。我要承认,在使用这些关键的语汇时,我更愿意根据上下文的含义随意使用“文化”或“文明”;如果交替使用将出现危险,我就降格以求,改用“文化的”修饰词。在我看来,这个修饰词既合规范,又很实用。更何况,如果要开列各种先例的单子,仅仅从黑格尔以来,不顾原有定义、随意混用文化和文明二词的大小作家,我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写满整整一页。我以为有意无意的混淆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定义的尝试

文明和文化的情形总的说来就是如此，我们不妨保留各自的判断自由和行动自由：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但在词义问题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如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历来的文明史学家对文明的理解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疑惑。他们把“文明”当作一种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手段，一种把历史分解为几大观察范围——历史学家的观察范围——的手段。由此产生的选择虽然本身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难免把文明的范围武断地分割成几个小领域，并且每次都把整体当作某个局部。根据不同的作家以及他们的选择或意图，涉及的具体领域便有所变化；于是，人们就很难确定文明史对理解现今的世界究竟有什么用处。任何一名作家——即使是阿尔诺·汤因比——似乎都觉得没有必要为文明下个定义，或向我们提供有关文明的整体观念。文明一词的含义不是十分清楚了吗？说来似乎清楚，但我们却必须分别查阅有关著作，并根据它们的内容，去发现历史学家们如何理解他们的任务，然后再规定我们自己的任务。

在基佐那里。阅读弗朗斯瓦·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1829—1832年)始终令人心情振奋，这两部美妙的著作——也许还应加上他于1855年为《欧洲文明史》再版所写的序言——可以充当我们的出发点。十分遗憾的是，它们显然没有明确划定研究的对象。基佐认为，文明在18世纪的含义首先是进步，具体地说，是社会进步和精神进步。文明的理想将是两

种进步的和谐,即天平两端的托盘取得平衡。英国主要实现了社会进步,德国则取得了精神进步,至于法国,它要在两条道路上同时并进。这些对我们说来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是,在基佐看来,文明的这种双重运动怎样由一个特殊的躯体(法国人或欧洲人)所体现。可惜,基佐仅在政治史的范围内抓住了这一双重运动,他的视野因而特别狭窄。尤其他还认为,政治归根到底是权威和自由两大原则之间对立和斗争的反映,而斗争又全靠必要的和明智的妥协——如七月王朝——才得以缓和。人们或许会说这是小题大作;但从历史的高度去观察现时,这对当时的人说来——无论是历史学家或实干家——确实还是罕见的事。

基佐在 1855 年的序言中写道:“作为两股巨大的力量和两种对立的权利,权威和自由在人类社会中共处着和斗争着……当我由闭门研究转而投入动荡的政治生活时,我曾在政治秩序中寻求权威和自由的积极和谐,这是一种有斗争的和谐,而且这种斗争是正大光明的、公开的和通过合法渠道加以调节和控制的。这难道仅仅是一种梦幻吗?”

在布尔克哈特那里。约翰·赫伊津哈说得对,雅各布·布尔克哈特是“19 世纪最明智的学者”,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一书于 1860 年出版,印数十分有限。我们且翻开这部书:它向我们展示的世界与基佐的世界完全不同。西方文明在这部巨著中被一笔带过,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没有作足够的阐述。布尔克哈特继米希勒(1855 年)之后使用了文艺复兴的名称,他对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的兴起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这些考证今天虽然已经过时,但作者的高屋建瓴和才智横溢却令人难以忘怀。壮年时代的雅各布·布尔克哈特是否已经完全

掌握了历史的视野？他把历史归纳成国家、宗教和文化的三位一体，并说人类的全部过去都与此相关。他用神妙的笔触长篇大论地讲述了国家：15至16世纪的意大利各国；他对文化的艺术价值（在他看来，艺术价值高于一切）也作了很有见地的研究；但有关宗教问题的议论显得相当单薄。更糟糕的是，除了三位一体以外，他对圣罗朗时代的物质机体和社会机体几乎只字不提。这部光彩夺目的著作在谈到“上层建筑”时仍然悬在空中，尽管它对具体事物有很高的鉴赏力……这难道是合乎情理的吗？我想说的是，对我们历史学家说来，在过了一个世纪以后，如果仍然停留于布尔克哈特的整体形象，不用别的形象去替代它，这是合乎情理的吗？

这里有必要看看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在德意志文化史运动中所占的地位。这个运动最早由赫尔德（1784—1791年）发起，后随古斯塔夫·克列姆著作的出版（1843—1852年）而普及。19世纪中叶的德意志历史编纂学往往有二分法的缺点，格奥尔格·维贝的《世界史教程》（1853年）就是一个例子：尽管这部巨著经翻译后将在西班牙产生重大影响，它把历史却分成外在（政治）和内在（文化、文学、宗教）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可是，“内在的”历史能否构成一个独立的实在呢？

在施本格勒那里。奥斯瓦德·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1922年）是部言词激烈、引起众多争议的著作，我们这里必须多说几句，因为该书从头到尾都谈到有关文明的问题。在落笔撰写本文前，我特地仔细重读了这本书。我以为今天可能采用不同于吕西安·费弗尔的方法，离开该书出版时的环境，单独判断它本身的价值。不能否认，这是一部气势澎湃、视野宽

广、高瞻远瞩和追根究源的伟大著作。

施本格勒认为,每种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经验。即使派生的文化也迟早——虽然有时很晚——会充分显示自己的特性。就西方文明而言,“只是在经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才终于找到思考自己的思想的勇气”,也就是说,摆脱古代的种种先入之见。但我们终究已经摆脱了它们的束缚。任何文化都可以被超越,而一旦被超越后,文化也就不成其为文化了。

文化究竟是什么?它既是艺术、哲学和数学,又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在脱离精神时便变得一钱不值和不可理解的一种实在。施本格勒认为,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道德;尼采也有类似的认识;或许可以说,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哲学(甚至不无夸张地说,还有多少种历史和历史编纂学),多少种艺术,多少种数学。西方的一个文化特征表现在数学方面,因为它发现了函数。翻开施本格勒的著作,最前而几页恰恰就介绍微分学的形成,这几页的文笔之美也是无与伦比的。

一种文化既然由其几个特征或由这些特征的几个特殊方面所规定,文明史学家的方法似乎将变得十分简单:他只要发现这些特征,然后再进行研究对照,就能比较文明之间的异同。但如果遵循这个方法,我们势必要在几百年和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上从事奇特的旅行。关于这些旅行,人们会联想到今天的星际旅行:当所有的行李物件猛然超脱重力法则后,它们便离开原来的位置,在空中自由飘荡。对位音乐、路易十四王朝、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油画和占卜术、陶立克石柱和希腊城邦在施本格勒那里往往互相冲撞或并行移动。所有这些行李都丧失了它们的历史重量。

我们不会因此产生错觉,作为历史思想,施本格勒的这个想

法是十分普通的和完全通情达理的，但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它始终解决不了文化要素之间如何保持联系这个恼人的问题，更加恼人的还有文化要素和非文化要素之间如何联系的问题（但在这里，施本格勒几乎守口如瓶）。他把后一种联系故意撇开，正如他把妨碍他推理的一切全都置若罔闻一样。因此，对整个经济史说来，金钱似乎仅仅是个“无结构的量值”。至于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施本格勒更轻松地一笔勾销，他说：“阿尔及尔的台伊手摇扇子，以及诸如此类的扭捏作态，历史舞台完全被这些滑稽人物的可笑表演所占领。”抛开这些滑稽人物，政治立即就无影无踪。施本格勒对社会问题同样不屑一顾，各种文化及其相互间的联系是那么显而易见，似乎不必再去进行分析；它们都是存在，仅此而已，还有什么可说？音乐曾是18世纪西方的变革中心，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施本格勒毫不犹豫地写道：“德意志产生了伟大的音乐家，因而也产生该世纪伟大的建筑师：柏培尔曼、斯吕特尔、巴尔、纽曼、菲舍尔·冯·埃尔拉赫、丁岑霍费。”

总之，“每种特殊的文化都是一个高级个体”：历史舞台上的头牌主角。这里用主角一词也许不尽妥当，但用机体一词也不合适。奥托·布龙内尔最近指出，施本格勒把文化当作单个的人，他想到的不是生物学上的人，而是中世纪思想中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灵魂（文化灵魂）作主宰，人便将成为僵死的躯壳。他在那本引人入胜的书中所追求的西方文化无非是一个精灵或一个灵魂。他因此反复声称：“灵魂觉醒之时，便是文化诞生之日”，或用另一个说法：“当灵魂穷竭其可能时，文化也就行将入木”。

我们这里终于抓住了施本格勒的思想要害，这也是他呕心沥血想说明的东西。历史——或不如说文化的“命运”——像是

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能动的长时段结构。文化的缓慢发展使它有充分时间逐渐形成,确立自己的地位,最后走向死亡。文化并不是永存的。但是,每一种文化在死亡前必定要把它童年时代的理想纲领展现无遗:古代文明的阿波罗精神,西方文明的浮士德精神,如此等等。在过了某个期限后——期限通常到达很晚——,当文化的创造力已经消耗殆尽时,它终将因不再有纲领而灭亡;“文化突然僵化了:血液还在流动,但已经精疲力竭,气息奄奄;文化正向文明转化。”可见,文明虽是文化的必然归宿,但其色彩显得十分阴暗。文明不再演变,它是演变的结果。文明没有命运,因为“命运是常青的”,而文明则意味着冬季、衰老和桑科·判扎!至于唐·吉诃德,他当然充当文化的象征。

这个黯淡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它迟早会作为生命的周期强加于各种文化,而在每个周期内,各个阶段又以相似的形式多次反复。它们是如此相象,因而施本格勒毫不犹豫地超越时空界限,硬把它们拉到一起;为了能够看到和展示它们的真相,必须假设它们能打破相互之间的时空界限。施本格勒断言,“同时代的”各种文化其实是孪生姐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在一百多年中塑造着欧洲的面貌,宣告了西方文明的到来。这一伟大事件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伐和古希腊的兴盛属于相同的类型:古希腊的一种“文化”;取而代之的古罗马则是一种“文明”。因此应该承认,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是“同时代的”,他们都是“站在文明门口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帕加马和拜罗伊特旗鼓相当,难分高低”,而瓦格纳则无非是西方文明时代的音乐家,尼采对他发怒,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许多人曾责备施本格勒,说他把事情想得过分简单和过分

天真。这种责备其实徒劳无益。拿《西方的衰落》去同阿尔贝·德芒仲的《欧洲的衰落》相比，只能说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散文。与其人云亦云地卖弄聪明，我们不如在这里作个小结：奥斯瓦德·施本格勒的尝试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他力图在纷杂的历史要素及其虚假的相互联系中揭示出精神价值的命运；在他看来，这种命运归根到底就是文化和文明。其次，他认为这些形成十分缓慢、但比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更坚强的精神价值，总有一天只能依靠原有的冲劲维持自己的生命，他把精神价值的成长过程说成是一系列互相连贯的阶段，或者说是一种命运和一种历史；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困难和争议。在历史学家看来，施本格勒的两个部分从一开始就是不合逻辑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后面再谈。幸而总有一些历史学家并不那么重视理智。我想阿尔诺·汤因比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不像奥斯瓦德·施本格勒那样轻易就下定论。他对以上两个部分所持的立场与施本格勒没有什么区别。

在汤因比那里。我承认曾反复读过阿尔诺·汤因比的著作，他那明快的文笔、巧妙的辩才和聪明的引证有时使我兴趣倍增。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独出心裁的体系，他特地慢条斯理但又坚持不懈地进行论证，这种艺术实在让我钦佩。我尤其喜欢他举的例子（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从例子出发进行推理）和他作的归纳，在这些归纳里，人们往往要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能发现其中的薄弱环节。就以1500年间的地理大发现为例，这场革命果真意味着欧洲船只对旧大陆驮帮的胜利吗？驮帮是在“无水大海”上的陆上旅行，但阿拉伯的航海业也很强大，何况中国也有航海业……汤因比写道：“阿尔比教派遭到了镇压，但它将以胡

格诺派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说法无论出自无心或是有意,难道能够说得过去吗?这且不去管它!对一本书说来,重要的是它的成果,而汤因比的这部著作确实有多方面的成果。如果有人给予恰当的指导,读者可以利用其中极其丰富的资料和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展望广阔的历史地平线不但是有益的,甚至是饶有兴味的。

但我们应该承认,阿尔诺·汤因比不肯浪费他的天才,为自己或为我们充当向导。他往往用文明一词,而很少用文化(人类学家责备汤因比,说在他那里,文化一词从不以人类学的含义出现)。那么,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究竟指什么?20年前,吕西安·费弗尔在一篇文章里曾不客气地对汤因比提出过这个问题。汤因比在事后曾写过不少文章,但他的答复总是有点拐弯抹角。他写道:“根据我们的认识,文明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项条件,是一次旅行,而不是一个港口”;“人们不能谈论文明的目的,因为它从未被达到”。他又说:“每种文化都是由许多互相依赖的成分组成的整体”,是既有核心又有外围的原子……以上算是相当认真的回答了!他还讲到,我们可以通过文明的行为和运动去领会它的含义,首先要看到“文明的诞生、成长、瓦解、衰落和垮台”。文明存在着,因为它们在运动。事情当然只能是这样。如果文明事先并不存在,它们又怎么会死亡?

至少有一次,他似乎怀着诚意来回答问题了。他写道:“在告一段落以前,我想就一个我至今认为业已解决了的问题说几句话,这个问题是:所谓文明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且莫高兴太早,他那姗姗来迟的诚意仍然停留于重复他在《历史研究》(1934年)这部巨著中作出的轻描淡写的解释。阿尔诺·汤因比说:“我们所说的文明意思十分清楚,在试图确立定义以前,我首先想

说,人类被分成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远东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这本身就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这些不同的文明使我们联想起在宗教、建筑、绘画、习俗等方面各不相同的表象。”他承认:“我所说的文明是指人们在试图认识本国历史时使用的最小的研究单位。”他接着只花几页篇幅匆忙地分析了英国和美国的历史。既然他在文明问题上不愿谈及人类的全部历史,既然人类的全部历史是个模糊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整体,我们又拿什么为文明划界呢?汤因比进行了一系列推理,每步推理都闭口不谈时间界线。他最后把决定性的时间界线确定在8世纪,即公元770年前后,也就是西方文明从古罗马中脱胎而出的时候。这种划界方法(相对而言)有个好处,它能超脱民族历史的束缚(很久以来,真正的历史学家不再相信民族历史),而提供一个时间框架,一个活动场所,一种解释手段和分类手段,但仅此而已。在我看来,把英格兰文明上溯到西方文明,这无论如何回答不了提出的问题。汤因比还是没有确定文明的定义和内容。不得已求其次,我们且跟着汤因比走,看他如何一步一步地进行分析的吧。

汤因比的思想包含着一系列互为联系的解释,但我这里先放过不谈,因为他拒不接受的道路与他遵循的道路同等重要。我愿首先指出,汤因比故意不说的话比他明白的表态更能显现他的真实思想运动。他往往只用一句俏皮话就避开各种矛盾或危险的念头。

历史事件有什么用处!汤因比只着眼突出的事件。这是把几乎所有事件埋没掉的一个办法,我们不会因此感到不快。可是,到底有哪些突出事件能够被保留呢?

汤因比虽然提到了地理,但只是把它当作二等或三等事件

看待。难道真要通过环境来解释文明吗？从物质的角度看，再没有比地理更能左右文明的了。可是，正是在自然环境十分优越、便于文明诞生的地方，文明却偏偏不肯露面（关于这个问题，我等一会儿再谈）。而在自然条件恶劣的不毛之地，文明却全靠恶劣环境激起的逆反心理，登上了历史舞台。

由于种种不无道理的原因，他把文化的转让和传播撇开不谈；他写道：“全靠这些办法，许多技术、技能、制度和观念——从拼音字母到辛格牌缝纫机——在文明之间互相传播”。拼音字母和缝纫机居然那么重要吗？这个问题不值得予以考虑！真正有价值的只是几次宗教大浪潮。相比之下，文明之间的其他交换、冲突和对话都居次等地位。我们先别注意这些细节，还是顺着一条连贯的纬线去研究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这又是什么意思？带着这样一个明显的偏见，我们将怎样看待那些间断、割裂和突变，或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爱用的说法，那些丑闻以及对预见、打算和规范挑战？既然汤因比硬说是连贯的，我们就只好承认它是连贯的吧。

就在这番长篇大论里，他对原始文明（或文化）和广阔的史前期仍然只字不提。他说，文化向文明的过渡是一种转变。他不肯向我们解释文明概念的内涵，于是就让我们自己去弄明白。

国家、社会、社会结构等问题也没有认真研究（他对创造文明的少数活动家以及对文明内部或外部的无产者所持的某些武断见解属于例外），技术或经济问题就更加谈不上了。这一切统统都是昙花一现的实在。例如，同寿命很长的文明相比，国家存在的时间简直微不足道。汤因比于1947年写道：“西方文明历时已达1300年左右，而英格兰王国仅有1000年历史，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王国还不到250年，美国不过150年。”何况，国家可

能“突然夭折”。因此不必为这些地位低微、体格孱弱的国家去浪费时间，经济或技术自然更不在话下。“人不仅仅靠面包活着”，“人不能仅仅靠技术活着”，他就这样三言两语，把困难躲了过去。

通过他要的这个花招，整个社会经济基础被一笔勾销，听凭命运的安排。每当两种文明发生冲撞时，“重要的不是冲撞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产生的直接后果，而是在宗教方面造成的长期后果”。我在“直接”和“长期”的下面加了着重号，这两个用得恰到好处的词在很大程度上使汤因比的思想变得容易被接受。实际上，冲撞也会产生短促的宗教后果和长期的经济或政治后果。但如果接受这个事实，就很可能打乱已经一劳永逸地确立的秩序。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既然是个整体，经济史和政治史就势必屈居次等地位，而让宗教史占头等地位。无论如何，宗教毕竟是人类的大事”。汤因比还说：“关键的关键在于宗教。”我们因此还必须弄明白，这里的宗教究竟指的是什么。

综上所述，汤因比从一开始就故意用一系列躲闪、排斥和沉默来掩盖其明确的立场。我隐约感到，阿尔诺·汤因比在那几页含糊不清的文章里想告诉我们，他认为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文明，文明的进步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文明只能以多种形式而存在，虽然每个文明的命运大体相同，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先已确定的。因此，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文明就有多种，但“人的精神本质”只有一种，统括所有文明——无论是死的或是活的——命运不言自明地也同样只有一种。这个看法不但否定马赛尔·莫斯关于“文明是人类的全部既得成果”的见解，而且排斥阿尔弗雷德·韦伯关于各种文明全都参与“普遍的、单一的渐进运动”的断言，甚至拒绝昂利·贝尔以下的至理名言：“每个国家的人民都

有自己的文明,因而始终存在许多不同的文明。”

阿尔诺·汤因比心目中的文明数量有限。只有二十来种文明配得上这个称号,它们存在的时间很长,而且涉及相当广阔的领域。其中有五种文明至今还活着:远东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为了限制在这样少的数目里,他不得不把一些可能的侯补者抛弃:有的存在时间不够长,有的缺乏特色,还有的遇到了明显的挫折。

我们且接受这个有限的数目。如果它是确实的,其意义就非同寻常。人类的复杂历史只用二十来种主要经验作概括:这种概括若是合理的话,将是何等可喜的事!总之,一接触到阿尔诺·汤因比的思想主流,一涉及到数目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出,他的思考方式同所有寻找世界体系的科学家十分接近:所谓世界体系必定有其明确的指令和专一的联系,必定要不顾一切去取代丰富多彩的现实。汤因比所关心的首先是要简化人类历史,其次是要找出规律、法则和同一性,制造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说的一系列互有联系的“模式”。如同人一样,文明只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诞生、成长和死亡,每个阶段幸而都拖得十分长久:诞生、成长和灭亡的进程似乎都漫无止境。

汤因比因此顺理成章地制造了三组模式:诞生、成长、衰落和死亡。他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惜耍了许多花招。可是他所制造的体系却像架发动机那样随时在出现故障。规律和法则随时遇到例外的威胁:例外又偏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和惹人讨厌。亚里士多德在他复制的宇宙里无法控制外面扔进的一块石子的反常运动,因为他的体系没有预见会发生这样的事。而在阿尔诺·汤因比的花园里,这类石子简直多不胜数。

在诞生、成长和死亡这三组模式中,前两组并不十分新奇,

最后一组最富特色，虽然它最终不能让我们信服，甚至它也是最经不起推敲的一组。

汤因比认为，文明只有面对有待克服的阻力（自然的阻力或历史的阻力）时才得以生存。历史的阻力是短暂的，但有时极其猛烈。在地理方面，环境的限制长期存在，要求人们作出长期的努力。如果接受挑战，并坚持不懈地克服困难，人们就能赋予胜利的文明新的活力，使它沿着轨道继续前进。阿提卡地处穷乡僻壤，当地人注定要加倍努力，以求改善自己的处境。勃兰登堡人的勇武剽悍同样也因为他们生活在沙丘和沼泽地带。安第斯山区的自然条件十分严酷，但对人却有好处：战胜了恶劣的环境，印加文明便得以产生。

这就是所谓“挑战和应战”的模式。它把环境的作用贬低到英格兰某些私立中学里使用的戒尺：一种严厉、有效的教育手段。但是，皮埃尔·古鲁等地理学家回答说，人错过了许多大好机会，没有接受挑战。钱拉德·马苏尔不久前指出，同亚马逊地区的原始森林相比，安第斯山区的环境不算十分严酷，而是相当舒适。否则，印加国王就不会选中这块地方……我甚至认为，海恩·吉尔台恩的看法也许不无道理，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出现首先应归功于亚洲和美洲晚期的频繁接触。皮埃尔·古鲁曾说中国的北方是一个典型的交叉路口，这种说法与以上的解释基本一致；阿尔诺·汤因比只字不提文明的传播，这里将受到一次公正的和无害的报复。我确实觉得，文明的火种不单是代代相传的，例如西方文明或穆斯林文明接受了古代文明的遗产。不同的文明火星之间的会合也能燃起熊熊烈火。阿尔诺·汤因比对他自己的“挑战和应战”模式也密切注视，因而知道在使用模式时必须作出许多修改和调整。他特地声明，挑战必须不超过人力许

可的限度方才有效。可见并非所有的挑战都能适用；打了这个折扣以后，模式似乎可能得救了。但模式所表现的却从此只剩下民族精神。

其次，文明的成长全靠少数富有创造精神的活动家去推动。这个说法与尼采和帕累托的思想相当接近……但一旦群众不再受少数活动家的控制，或者少数活动家丧失了他们的创造力、“生命冲动”或施本格勒所说的“文化灵魂”，各种堕落现象也就纷纷出笼。文明便从内部自动崩溃。

我们这里触及到的不仅是第三组模式（崩溃），而且是体系的核心；皮·索罗金的一句玩笑话说得好，阿尔诺·汤因比是文明的刽子手。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的死亡是关键的时刻，也是发人深省的时刻。

阿尔诺·汤因比认为，一种文明只是在历时几百年后方才死亡，但在死亡以前，种种内乱和外乱早已连续不断地暴露出来，我们几乎可以说，这些动乱是一种连锁反应。它们总有一天将被宪兵行动——即建立辽阔的统一帝国——镇压下去。但这也只是暂时现象，帝国的三、四百年寿命，同文明的历史相比，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刻。统一帝国因内部的种种灾难和外来的蛮族（用作者的原话，“外来的无产者”）入侵而迅速垮台。与此同时，一个包罗万象的教会将建立起来，拯救一切可被拯救的文明成果。希腊式的拉丁文明（即汤因比所说的古希腊文明）大致就是这样灭亡的。以古罗马为例，我们从文明的死亡可以得出一个典型的四阶段模式：动乱，建立帝国或统一国家，出现统一的教会，蛮族入侵。据说，本世纪初德国的战略家主张一切都按曼纳会战的“模式”进行，阿尔诺·汤因比却似乎要让一切都走向灭亡，难怪安德烈·皮加尼奥尔说这是对罗马帝国的“谋杀”。

阿尔诺·汤因比为以往的每个文明都寻找了和确认了模式的各个阶段(例如：阿开民王朝，印加王朝，阿拔斯王朝，笈多王朝，蒙古王朝，总共 21 个帝国)，间或也作了一些大胆的修整。历史学家从来习惯于同短促、确切的时间打交道，他们怎能相信，在阿开民王朝和巴格达的哈里发之间相隔的一千多年时间竟能被压缩成一天，而实际的联系却并不因此被切断？他们怎能接受，加洛林王朝、查理五世帝国、路易十四时代和拿破仑帝国竟因为存在时间较短，而从“统一帝国”的名单上被删去？何况，在汤因比开列的单子上，共有 21 个王朝被确认为文明生活的基本成分，它们没有任何理由取得宽大的待遇。作者的偏见对它们没有好处，相反离给它们脸上抹黑仅一步之差，罗马帝国的命运就是一个佐证。他写道：“罗马的和平是衰竭的和平。”这样的叙述至少从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糊涂了。

以上概括介绍了汤因比巨著的主要论点，根据作者事后赋予的价值，它们可产生许多不同的解释。他的模式对过去有效，对现时也同样有效。西方文明依旧活着，但一百多年以来，因接连出现动乱而疲于奔命和立足不稳。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能否延缓它的灭亡？这当然是可能的，不论这一帝国是俄国或美国，也不论帝国的建立依靠和平手段或用暴力。一位名叫菲利浦·巴格比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沿着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这条思路，立即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前的形势是否处在美国即将主宰世界和建立新的罗马帝国的前夕？

我们先不回答以上的问题，而要提出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假定在 1519 至 1555 年间，有个聪明人怀有阿尔诺·汤因比相同的信念，假定他用这些信念来思考当时的时代和查理五世皇帝的业绩，他肯定会在周围的欧洲国家中一再注意到罗马帝国的

秩序正在复辟,一个包罗万象的教会正在建立,因为最终在特伦托进行的宗教改革显然是一次彻底的革新。如果巴格比的预言比这个聪明人更加明智,美国主宰世界的希望是否会比查理五世皇帝更大呢?

但我们对汤因比的见解不能一笑了之。历史学家对他不太欢迎,这有一定的道理,这是由他们的职业所决定的,但这有时也欠公正。我本人也并不例外,但至少觉得,恩斯特·库尔提乌斯对汤因比著作的热情欢迎是可以理解的。汤因比确实给我们上了几堂宝贵的课:即使反对他的人也认为他的某些解释值得人们敬仰。

如同任何体系建造者一样,阿尔诺·汤因比把历史过分地简单化,甚至简化到了荒谬的程度;他本能地抓住了长时段这条根本性的但又充满危险的道路;他注重研究“社会”、社会实在或某些始终具有生命力的社会实在;他也注意研究历史事件,但这些事件却要等几百年后才突然激起反响,他所研究的人物是些高踞芸芸众生之上和具有长期影响的超人,如耶稣、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关于横在阿开民王朝和巴格达的哈里发之间的上千年历史,我认为不必像吕西安·费弗尔或钱拉德·马苏尔那样揪住不放。艾米尔-费里克斯·戈蒂埃坚持认为,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和西班牙(7世纪中叶至711年)在相隔一千年左右的距离上恢复了迦太基统治的原有地域……阿尔诺·汤因比的功绩在于他调动长段的时间,敢于把相隔几百年的经验进行比较,并寻找不很可靠但很重要的康庄大道,虽然他不免有迷失方向的时候。我难以或甚至不能接受的是,这些比较只是专门说明文明的相似性,并用单一的模式去硬套文明的相异性;总之,在汤因比看来,凡在任何一种文明里得以完成的人的努力,至少在观念

上必定具有文明的结构。这无非是把文明的单复数调和起来的一个花招，我对此真是不敢恭维，因为文明一词的单数和复数在含义上有多么巨大的差异。汤因比写道：“人的精神本质的同一性凌驾在各种类型的文化之上。”

在阿尔弗雷德·韦伯那里。阿尔弗雷德·韦伯的《作为文化社会学的文化史》是部结构严密、思考深刻的著作，但在我国并不享有盛名。该书于1935年在莱顿出版后，即被译成西班牙语，改称《文化的历史》，于1941至1948年间出过四个版本。该书材料扎实，论证有力。阿尔弗雷德·韦伯(1868—1958)是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弟弟，原系社会学家，这次临时客串撰写历史著作，尽管写得十分认真。因此，同施本格勒或汤因比相比，他在历史学界引起的反应就小得多。他没有前两人那么高的名望，因而也不像他们那样轻率下结论。然而，他同样解决不了两人曾遇到过的困难，尤其他不肯使用粗暴的方法。他广泛地从史前史、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马克思思想等方面充实他的解释。这样做有一定好处：他的著作拥有别的著作所缺少的扎实证据。在他解释的开头，有关第一批文明——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如何建立的论证令人钦佩，但在谈到第二代或第三代文明在西方(西方指的是欧亚大陆中位于兴都库什山脉以西的部分)的发展时，他的论证开始缺乏说服力，似乎他的综合解释对古老遥远的文明很有价值，而在接近现时和我们自己的文明时就逐渐失效。

我尤其怀疑阿尔弗雷德·韦伯是否为文明(或用他的话来说，高级的文化)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他认为文明是个“历史实体”，仅此而已，因而文明的含义将在历史进程中得到规

定。这个同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历史进程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多少种文明就会有多少个“实体”？虽然他不愿承认先验精神的“客观”存在，（威纳尔·桑巴特设想的精神既然单独能说明资本主义，当然也能解释抽象的或具体的文明），但他在阐述自己的想法和说明的同时，仍接受了一种“时代精神”或人的精神（即人的意识、自由感、思考自己的能力、发明创造的能力）。难道这种时代精神竟能把生命赋予文明的历史实体吗？

在菲利浦·巴格比那里。我们已作了过长的罗列，虽然仍很不完整，下面的叙述尽量简短些。不久前刚出版了一部新著，《文化与历史》，1958年版）作者名叫菲利浦·巴格比，是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兼人类学家，是克罗伯的学生。该书的一大好处是能使我们了解人类学家的最新见解，而我们早已说过，人类学家的见解对我们具有决定性意义。菲利浦·巴格比力图把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在一起，这使他的立场同我们年鉴派相当接近，虽然仍有不少差异。遵循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的路线，年鉴派所要建立的历史科学力图依靠整个人文科学，而不单依靠其中的任何一门，即便是人类学也不例外。菲利浦·巴格比则不同，他仅仅考虑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

根据他的意见，如果历史科学的过于庞杂的领域不被简化，如果不把这个科学领域人为地和断然地加以分割（分割便于控制），历史科学也就不能存在。物理学家对他们的“客观”世界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利用质量原理、瞬时原理和惯性原理去揭示和探索变化了的实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历史学家应该回到文明史这个得天独厚的研究领域去！所谓得天独厚，是说历史学家在这个研究领域可以进行比较。由于在人类生存的世

界里只有一种历史，即人的历史，我们必须把人和人进行比较，逐个地研究人类的经验和文明。当然还有一个条件，即文明一词仅确指一系列可以相互比较的命运。

于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必定要在文明之间进行一次分类；高居榜首的是庞大的“头等文明”；其次是较小的“二等文明”；然后只配称作文化的最小的文明。在每一类文明中，还应该分别掂一掂每个文明的分量，看它们是否具有共同的命运、类似的倾向和正常的结构，足以进行有益的比较。但在真正进行这些关系重大的比较前，必须事先驱逐种种荒唐的看法和形而上学的解释；例如对阿尔诺·汤因比提出的几个毫无恶意但又相当尖锐的批评，指责他是一名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说他没有人类学方面的知识。这类指责未免言过其实！

再说所谓“头等文明”，我们又该作何解释呢？菲利浦·巴格比没有真正试图给它们下个定义。在“头等文明”一类里，他只列入9个大文明，而不是阿尔诺·汤因比选中的21个或22个。我不知道这能否算是个进步。我担心这只是老调新唱，同样是用唯心主义去观察人类的命运。菲利浦·巴格比在他的书末勉强作了一点比较研究，但结果又如何呢？他认为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常从一个宗教时代向另一个宗教时代过渡，并逐渐服从理性。马克斯·韦伯已经就欧洲的情形说过类似的话，而在他之前，至少还有奥古斯特·孔德。恩里克·弗雷耶曾断言：“理性是西方思想的趋向”；那么，理性是不是世界思想的趋向？我很愿意说是，不过作为历史学家，对于这种比基佐更严格的二元论（宗教和理性），我不免感到担忧。难道理性和宗教始终如同白天和黑夜那样势不两立吗？为更加公正起见，让我们想一想恩里克·弗雷耶的见解：“理性王国始于上帝天国”，后者在不断的

世俗化过程中为前者提供养料。

读者这里可再次看到,这位年轻、聪明的人类学家将把我们引导到哪里去。他要我们不断登高,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敦促,结果反而使我们喜爱低海拔。人不仅靠祷告和思想而生活,他毕竟还要吃东西,“什么人吃什么东西”。夏尔·瑟涅博斯说过类似的俏皮话:“文明是道路、港口、码头……”我们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但这句话是要我们从天上下来,仔细观察地而的东西,看到事物的区别和特点,而不再满足于模糊的远景。

二.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历史

读者想必已经洞察我的意图。我确实认为,如同人类史一样,文明史正徘徊在十字路口。不论它愿意与否,它必须吸收新旧各门社会科学在无穷无尽的人生中实现的所有新发现。这是一项困难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因为只有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历史才能站在各门社会科学的前列,推动对当今世界的认识。

假如我碰巧也要写一部《历史研究》这样的著作,或者写有关文明(抽象的和具体的)的长篇论著,我能否根据以上的路线,列出必须遵循的写作提纲?

在我看来,第一项任务是进行必要的否定:对于从一开始就必须抛弃的某些习惯,不论是好习惯或坏习惯,都立即一刀两断,即便以后再回去也不要紧;第二项任务是设法为文明下个定义,下个毛病最小、最便于使用的定义,争取比较顺利地把研究

工作继续进行下去；第三项任务是邀请其他各门人文科学的所有专家，一起来检验文明的范围；最后提出确切的任务和作出必要的结论。

必要的牺牲

从一开始就放弃某些术语，例如不再说文明是存在、机体、人物或实体，即便是历史实体。也不再说文明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因为这些说法等于假定文明的命运就是简单的、按线形发展的人的命运。我宁愿采用乔治·古尔维奇关于西方中世纪时代的整体社会或关于当今社会的思考，尽管用历史学家眼光来看，我明知古尔维奇的思考有其不足之处。在他看来，无论什么社会，它的未来总是在几个可能的、各不相同的命运之间彷徨；我以为这正是符合生活多样性的合理见解：未来从不沿着一条路走。线形发展的说法应予放弃。同样还不能认为，每个文明因为各具特色就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世界，如同大海中的一个孤岛；文明之间的会面和对话毕竟是基本现象，它们正逐渐汇集成人类的共同财富。马格莱特·米德心目中关于文明一词的含义与我前面谈到的马赛尔·莫斯相同，他说：“文明就是人从此再也不能忘记的东西”，即语言、拼音字母、计数、三率法、火乃至函数、蒸汽等等，总之，是在达到一定水平的任何文化中为任何人不得私有的共同财富。

我将部分地放弃使用任何对文明（或文化）命运的循环解释，即关于文明由诞生到成长、再到死亡的固定说法及其各种翻版。因此要抛弃的不仅有维科的三时代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奥古斯特·孔德的三时代论（神学时代、形而上学

时代、实证主义时代),斯宾塞的二阶段论(从强制到自由),杜尔克姆的二连环论(内在联系和外在线索相交替),而且还有麦克斯威耶的渐进协调的阶段论,希尔德布兰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或布赫尔的经济阶段论,勒瓦瑟尔和拉采尔的密度增长论,以及卡尔·马克思关于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论。我抛弃这一切,有时不免感到遗憾,甚至恋恋不舍,因为我并不全盘否定所有这些解释;在我看来,它们提出的模式或周期有时反而是十分有用的,但我宁肯事先把它们一概排斥,这是出于必要的谨慎。

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模式当然也在被排斥之列;此外,我还不接受他们开列的文明单子。我确实相信,从最起码的文化到头等文明,我们统统都要抓住,特别这些头等文明还应分成次等文明,次等文明再分成更小的成分;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会取得成果。我们暂且假定可能出现微型的历史和具有开放传统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最小的成分究竟能小到什么程度。在中间的梯级上,我以为,尤其就今天的情形看,国家、人民和民族都趋向于构成独立的文明,尽管每个文明的技术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和英格兰(无论作为国家、人民或民族)都是各具特色和内在矛盾的文明。用西方文明这个统称去研究它们,我以为未免太简单了。尼采硬说,继希腊文明之后,除法兰西文明外显然不再存在别的文明,“这是毋庸置疑的事”。这种断言恐怕值得商榷,不过有趣的是,法兰西文明在汤因比的分类中竟然并不存在。

依我之见——我想这个观点并不背离马克·布洛赫的见解——,一方面应把法兰西文明置于欧洲文明之内,另一方面又把法兰西分成几个独特的次等文明。如同别的国家一样,我国是

一个活跃的文明星座，尽管它的规模不大。归根到底，重要的是应看到这些大小不等的成分之间的联系，懂得它们怎样互相渗透、互相制约，共同经历苦难或繁荣（这里有个条件，繁荣应符合确切的标准）。

必要的标准

在场地清理完毕后，我们将提出问题：文明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文明只有一个合适的定义，所谓合适，是说它便于用来观察，并且与任何价值判断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定义在某些人类学家的讲课中可以被找到，而我却是从马赛尔·莫斯的一份报告里借用的，对此我始终坚持不渝。

文化场。文明首先是个场地，按人类学家的说法，“文化场”是一所房屋。在这所相当宽敞（从不过分狭窄）的房屋内，摆着各种各样的“财产”，具有形形色色的文化特征：从房屋的材料和形状到屋面上的尖顶，从当地的方言、烹饪口味到特殊的技术，从信仰或情爱形式到指南针、纸张、印刷术，如此等等。某些文化特征在特定场所的存在、集合和汇聚是构成某种文化的最起码的表现。如果在地域的同一性之上再增加时间的稳定性，我就能把整个库存称作文明或文化。所谓“整个库存”也就是已被确认的文明的形式。

当然，文化场首先属于地理学的范畴，而不是人类学的范畴。一个文化场还有中心、核心、边界和边缘。人们往往在边缘最能认清文明的特征、现象或趋向。这些边界及其包围的场所有时规模很大。马赛尔·莫斯写道：“至于我们，我们很早已经讲

过,太平洋的整个沿岸和所有岛屿可能属于一种极其古老的文明……在这方面,确实存在许多巧合……”但也具有许多差异,因此必须把这个大区域分小,分析它们的不同和差异,画出轴线和“分水岭”……但太平洋规模太大,不便于我们去分析,即使比它小一点的例子也不容易着手。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文化场始终包括几个社会或社会集团。因此,我再说一遍,必须尽可能地注意最小的文化单位。一个文化场究竟占多大的地域,有多少人口,有几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它已经达到的最低生命水平?

借鉴。所有这些文化财富或文明的微型成分都不断在旅行(这是它们与普通社会现象的不同之处):文明之间既有输出,又有借鉴。一些文明善于吸收,而且胃口很大;另一些文明愿意输出,毫不吝啬。这种大规模的交流从未停止。某些文化成分,如现代科学和技术,甚至具有传染性,尽管所有的文明对这类交流的开放程度并不相同。索罗金认为,精神财富的借鉴比技术借鉴更加迅速,对于这个问题,我持怀疑的态度。

拒绝。并非所有的交流都十分顺利:某种思想方式、信仰方式或生活方式,或者某件简单的劳动工具,可能被别的文明拒绝接受。这种拒绝有时是盲目的,但有时却伴随着明确的想法,似乎故意关门插门,不准通行。每次拒绝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如果它是清醒的、反复的和明确的,则更是如此。在这个场合,文明作出一个决定性的选择;它通过这个选择表现自己。被汤因比认为无足轻重的“传播现象”,在我看来,却是判断文明的特点和活力的最好的试金石。

总之,我们从借用的文明定义中可看到三个步骤:文化场及

其边界；借鉴；拒绝。每个步骤又开创新的可能前景。

三步骤为文明史研究开创的新可能。举一个具体例子——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来研究，文化场及其边界的问题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古罗马的远征到达河界后立即停止。过了一千年以后，教会也几乎沿着这条老界线分成两个部分：界线的一边是改革派，另一边仍忠于罗马，强烈反对改革。两条河流标志着一条精神边界，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歌德在前往意大利时，曾在雷根斯堡渡过多瑙河，斯塔尔夫夫人曾渡过了莱茵河，他们都完全懂得这条界线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步骤是借鉴。有关的鸿篇巨著虽然已经写了很多，而这个大题目却仍然没有完全说透。西方文明已达到别的星球，变成了“无边界的文明”；它赠送的礼物有好有坏，给人类带来了束缚和冲突。但在过去，它曾向伊斯兰、中国、印度等远近文明有无数的借鉴。在查理六世的疯狂时代，法兰西曾从遥远的中国学到了唐代的“角状”服饰、女式高帽和敞胸内衣；这种装饰当时在中国早已失传，它从旧大陆向西流传，经过五百多年时间，于14世纪到达塞浦路斯岛和吕西尼昂王宫。地中海的活跃贸易几乎随即把这些奇怪的旅行者从塞浦路斯带到法国。

我们还可以举一些较近的例子。巴西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吉尔倍托·弗雷尔喜欢列举18和19世纪期间向欧洲的各种借鉴。他开了一个繁杂的单子，其中包括英国或汉堡的啤酒、白布衣服、假牙、煤气灯、英格兰木房、蒸汽（蒸汽船于1819年在圣萨尔瓦多的海湾游弋），后来还有实证主义，或较早的秘密社团（秘密社团源自法国，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媒介，取道大西洋岛屿，迁往巴西）。这部历史当然还没有结束。从1945年起，萨特

或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又从法国来到巴西,席卷了整个美洲大陆。存在主义其实原是德国的思想,后由我国加以发扬和传播。法国有很大的优越性,因为它处在世界文化交流的交叉路口。这个地理位置(地理学家称之为“咽喉要地”)显然是法兰西文明的主要特征,也是法兰西文明光荣伟大的原因之一。玛丽·居里诞生在华沙旧城的一所小屋;莫迪格里亚尼生在里窝那;梵·高生在荷兰;毕加索来自西班牙;保尔·瓦勒里的祖先是热那亚人。

第三个步骤是拒绝,它能最突出地显示我国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例如曾在欧洲造成严重的、深刻分裂的宗教改革。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法国曾十分动摇)反对宗教改革。这场意义深远、规模巨大的运动触及到欧洲各国文化的灵魂深处。另一个例子: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拒绝了拉丁民族的救援,这座城市宁愿接受土耳其人,而推开自己的异母兄弟。这个戏剧般的事件值得我们反思,土耳其历史学家列奇特·沙菲·阿塔比南对这个事件的直观记述虽然“离经叛道”,大可商榷,但也确实发人深省。为了对文明作出新的解释,如果让我找一个体现精神冲突的重大事件作为例子,我选的将不是罗马的灭亡,而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我们不想把一切都归结为文明的拒绝,但就当前马克思主义的情形来看,谁能认为不存在拒绝的问题呢?英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表示不愿接受。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敌意,但一半以上的人并不赞成。这不仅与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和近代的历史变迁有关,文化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读者可以看到我对“文化传播”的信任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我又一次站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一边。他在一次论

战时曾顺便谈到，文明像是围着一张桌子聚赌的赌友，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要服从赌博的普遍规则。假如他们串通起来交换纸牌和意图，他们中间必有一人将轻易取胜。在各种文明中，西方恰好利用了它汇集着无数文化潮流的优越地位。千百年来，它从各个方向吸取营养，甚至向已死的文明借鉴，这才使它后来光芒普照，风行全球。

为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对话而努力

确认文化的全部价值，这是我们的第三项任务。历史学家单独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必须集合所有的人文科学，从传统科学到新兴科学，从哲学到人口学和统计学，共同进行“会商”。如果按照德国的方式，硬要文化脱离其文明基础，那将是一种幻想。忽视下层基础和忽视上层建筑将同样是荒唐的。文明毕竟建立在土地上。用一个简单化的说法，就是我们必须强迫汤因比或吕西安·费弗尔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同步前进。有关文明的研究几乎总是导致唯心主义的猖獗，这种对卡尔·马克思的轻蔑是何等的幼稚！我们历史学家其实应该与人文科学的每个部门进行一系列对话。

首先与地理学对话。文明的大厦决不是偶然的产物；它虽然包含一种挑战，但这是一种反复的、长时段的挑战。1950年的一个晚上，费特里哥·沙博、比埃尔·勒诺万、约翰·内夫和吕西安·费弗尔在《年鉴》杂志就文明这个大题目进行了友好的讨论，当时曾谈到地理学。吕西安·费弗尔认为必须在每个文明的背景上画出文明和环境的反复无穷的联系（文明在其生命历程中不断创造和再创造环境），画出文明和土地、植物、动物、地方病

之间的起码联系。

历史学还必须与人口学进行对话。文明是数字的女儿。汤因比很少研究人口,他怎么可能研究好历史?一次人口的膨胀可能甚至必定带来断裂和变迁。人口负担不是过重就是过轻。每次超过正常的标准都会产生人口迁移;正如库里谢兄弟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的表皮下,世界的人口不停地和顽强地流动着。

还需要与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进行对话。在这里,首先请吕西安·费弗尔原谅,我不同意他的意见,而赞成阿尔弗雷杜·尼赛伏洛的见解,尽管尼赛伏洛提供的关于衡量文明的标准并不恰当,更谈不上完美无缺。我还赞同乔治·古尔维奇对“整体社会”(即所谓文明实体,但我在这里无权使用这个词)的探讨,虽然我认为这些探讨还不够大胆;如果同索罗金直截了当的唯心主义相比,这些探索似乎是围着实在兜圈子!此外,为了确定文明和社会结构或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恐怕还少不了要辩论一场。我最后坚信,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结构左右着道德生活、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的方向(不论是好的方向或坏的方向),缺少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结构,文明也就不能存在。1945年战后,有些法国人一再强调,战争虽然使我国元气大伤,但我们在世界的精神影响仍然存在。持相反意见的人并非仅我一人。单靠国力强盛并不能保证在世界的影响。文明的力量、强大和健康与以上一切都有关系。所以,我以为布尔克哈特的书应该重写(尽管我对该书十分钦佩),至少有一条重要的理由:必须让意大利文艺复兴找回其物质躯壳。任何文化都不依赖纯观念为生。谢泼德·班克罗夫特·克拉夫说得对:任何文化都以经济过剩为前提。文化是一种消费,甚至是浪费。

打破专业隔阂

我们以上对一系列观点谨慎地予以排斥或接受，但争议仍然存在。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具体纲领，对我们的论证进行检验，加以扩大和巩固呢？

应该说，我首先将考虑一个稳健的纲领，它将仅仅涉及文化生活的短阶段以及文化“环境”；“环境”一词至今仅适用于经济生活，而我则把它扩大应用于文化生活。为了促进经济和文化的这些接触，我觉得以选择一些时间界线比较明确、认识比较细致的阶段更为有利。我们千万不能立即把时间跨度拉长到几百年或几千年，虽然这样做也有其好处！在选定了时间的范围以后，我们再不抱成见地进行观察，看狭义的文化领域（艺术、文学、科学和宗教感情等等）同广义的其他文化领域（承认或不承认它们是文化领域，这并不重要，我这里指的是经济、地理、劳动的历史、技术和习俗等）如何互相发生关系。人类生活的所有这些领域分别由专家们进行研究，这当然是合理的；但如果这些领域被不可逾越的界限分成特殊的部分，那又变或很不合理。打破这些界限，说来确实容易，但做起来就难了。

昂利·布兰斯维克在他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社会根源的论文里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指出德意志文明在18和19世纪期间如何像沙漏般地倒转了过来。德意志文明最初以“理性”为准则，其特点表现为“扬弃”的法国式思维；它接着一反常态，变为推崇本能和想象；浪漫主义便由此产生。重要的是应该看到，人的行为、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始终伴随着精神价值的演变，并且是这一演变的根据。赫伊津哈则不然，他在一部文笔酣畅的名

著中研究了中世纪西方的“秋季”，说这是文明的“垂危”和末日。如果说“垂危”，垂危的病人其实并非已经无可救药；我个人认为这种“垂危”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阶段。赫伊津哈尤其不该盯住这个最后阶段不放，只看到文明即将死亡。他没有掌握 15 世纪西方人口和经济急剧衰退的有关资料，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归根到底，人的感情，最高尚和最低级的感情，从来都不能完全独立存在。

吕西安在其最后一部巨著——《拉伯雷的宗教》——的第三部分中力图展示拉伯雷时代的“精神工具”，即拉伯雷当时可能接触到的词汇、概念、推理和感觉。我对这部著作所以如此钦佩，因为它展示的正是时代的横断面。吕西安只是时近晚年（1942 年）才向我们说出如此富有教益的见解，而他还想不断加以补充，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结论。他的确还要让时代的横断面脱离开拉伯雷这个典型的、但又有相当局限性的具体事例，以便观察结论在什么场合和在多大程度上会出现变化，并进一步追究变化的原因。我们可以说，知识水平的提高似乎在 16 世纪上半叶遇到了阻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我们显然应该看到知识的内在联系，并且用内在原因去作出解释；对此我十分同意，但是也许还应该像吕西安·费弗尔在其整部著作中所主张的那样，用社会经济生活的情性来加以说明：这些长期存在的情性在文明中表现得极其突出，许多陈旧的因素如同一个沉重的包袱莫明其妙地压在文明的身上。

寻找文明的结构

我在从事以上的探索时十分谨慎小心，但为有步骤地寻找

文明的结构,下面就必须去冒点风险。所谓结构,实际上就是那些不受急风暴雨(或用汤因比的话说,“急进和猛退”)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既然要寻找结构,按理说,我应该想到建造几个模式,即几个互有联系的解释体系。先说明一种文明,然后再说明另一种。我们事先不能保证所有的文明都接受类似的结构或在历史长河中保持相同的联系。相反的情形或许更合逻辑。乔治·古尔维奇说过,“整体结构(文明)始终是不可通约的,不同类型的整体结构之间的连贯性和可比性其实纯属幻觉”。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完全合理或基本合理,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乐于承认这一点。

三. 面对现时的历史

经过以上必要而谨慎的分析以后,甚至可以说,经过种种的犹豫以后,我觉得还无权劲头十足地来下结论。尤其不能够把刚说过的话(是对是错姑且不谈)重复一遍。在这最后的几页里,我们无论如何总该回答那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即便与本文艰苦的论证相冲突也在所不惜。必须让历史说明它对解释现时具有什么功能,也就是让它稍为离开一点自身的领域。我这里说的是人类历史,而文明史几乎等于是人类历史,也几乎就是乔治·古尔维奇所说的“整体社会”。

正因为如此,我没有想方设法把一个困难的解答加以简单化。历史学家观察现时确实有其独特的方式。一般说来,他们关心现时是为了摆脱现时。但我们不能否认,改变立场和走回

头路有时是十分必要的。总而言之,人们值得去做一番尝试。下面就转过身来观察现时。

文明的长寿

我们对文明的认识也许比任何社会观察家更加高明,因为我们看到世界的根本相异性。我们全都知道,任何社会或社会集团必定对一种文明,甚至对互不相同、互有联系和同时并存的一系列文明施加强烈的近期影响或远期影响。每种文明和所有文明都把我们纳入到广阔无垠和长时段的历史运动中去;对每个社会说来,这一运动是产生该社会的独特内在逻辑和无数矛盾的根源。以语言为例,为了用法语作工具,我们就要从几百年、几千年前的词根、词源出发,去试图掌握法语词汇,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成百个。所以,文明史学家能比任何人更有理由断言,文明是长寿命的实在,尤其不能用单个人的寿命去衡量。保尔·瓦勒里有一句名言,暗示文明会出现死亡事故。这类事故当然是存在的,但出现的机会却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在许多情况下,与其说是死亡,不如说是休眠。文明最美妙的精华和最罕见的成果容易消失,但文明的老根却不顾寒冬和断裂依然存在。

作为长时段的实在,文明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它不断适应自己的命运,它的寿命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的集体实在。文明在地域上不受社会疆界的约束(特定的社会像在一个比它广阔得多的世界里漂浮,并不知不觉地受到几种特殊力量的推动),同时并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超越自己,汤因比正确地指出,时间留给文明一笔奇怪的遗产,谁若是满足于观察和认识最狭义的“现

时”，就无法理解这笔遗产。换句话说，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意识形态的变革并不决定文明的生死，文明却暗中对这些变革施加有力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在法兰西文明的命运中，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罗斯文明（有人加以扩大，称之为东正教文明）的命运中，都不构成全面的断裂。

我以为，对所有的文明说来，都谈不上发生过不可弥补的断裂或社会灾难。夏尔·瑟涅博斯有一天（1938年）曾与本文作者进行友好交谈，他强调说，没有资产阶级，也就没有法兰西文明。我们且别像他那样急于下这个定论；根据让·科克托的解释，“资产阶级是法国最根深蒂固的阶级……在我国一切重大成就的背后，都有资产阶级的作用，包括一所房屋、一盏灯、一盘汤、取暖的火、葡萄酒和烟斗”。然而，严格地讲，法兰西文明可以如同其他文明一样改变原有的社会基础，或者制造一个新的社会基础。一个资产阶级垮台了，还会长出另一个资产阶级来。在这场考验中，法兰西文明只会改变本身的色彩，但仍保留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征；总之，它固守自己的大部分优缺点。这至少是我的想法。

因此，谁想认识和影响当今的世界，他就必须“花点力气”在世界地图上辨明现有的各种文明，确定它们的界限、中心和边缘，弄清每个文明中各地区的区划和气氛，以及那里的一般生活方式和特殊生活方式。否则那将会出现多少差错和灾难！过50年或100年以后，甚至过二、三个世纪以后，这些文明很可能在地图上大致保持原状，不论历史的偶然性对它们有所促进或促退（经济学家说得好，促进或促退机会均等）；除非人类在此期间不幸自杀，人类今天已经拥有了自杀的手段。

我们至此可以相信，世界的各个文明具有不同的本质和特

点,它们长期保持各自的个性;这也就是说,当务之急是要研究每个文明固有的爱好、习惯、气质和本能反应,而这一切唯有历史——一种由来已久、发展缓慢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无意识的历史(心理学把无意识当作人的行为基础)——方能作出解释。我们必须让儿童从上学起就注意这个问题,但每个国家的人民却往往喜欢在镜子里只看自己,不看别人。这个宝贵的认识事实上至今很少成为共同的认识。它要求我们全面考察有关文化的所有重大问题,但宣传除外,因为宣传只是短期有效;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必须找到能为所有文明所接受并能尊重各自不可调和的立场的共同语言。

法国的地位:法国过去曾提供了可被接受的共同语言,今天也仍然如此。在穆斯林世界看来,法兰西文明堪称“近代的希腊文化”(雅克·贝尔克语)。法兰西的光明普照整个拉丁美洲,后者对前者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不论怎么说,法兰西的光明曾经和始终照亮着非洲。欧洲公认法国是唯一的明灯;若在波兰或罗马尼亚作次旅行,你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即使前往列宁格勒或莫斯科,这类证据也多不胜数。如果世界想求得生存和理解,而不互相侵犯和破坏,法国的存在对世界将仍然是个需要。在历史的长时段,这一前景依旧是我们的机会,几乎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尽管一些鼠目寸光的政治家坚持相反的意见。

同一性和多样性在世界永远存在

然而,兴奋也罢,伤心也罢,观察家和旅行家们众口一词地说,世界正日益变得千篇一律。在地球上到处都以相同的形象

出现前，让我们赶紧从事环球旅行！对于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无可反驳。过去的世界曾充满着丰富的地方色彩；今天，所有的城市，各地的人民都有某种相似之处：里约热内卢近二十年来开始兴建摩天大楼；莫斯科令人想到芝加哥；到处都是飞机、卡车、汽车、铁道和工厂；地方服饰陆续在失传……但除开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外，以上说法是否还包含着一系列相当严重的谬误？过去的世界也曾经有其千篇一律之处。技术的烙印到处可见，但技术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更何况，这种说法还有又一次混淆抽象文明和具体文明的危险。

地球不断在变小，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共同生活，互相依靠，“同舟共济”（汤因比语）。由于日益靠拢，人们势必要共享财产和工具，甚至产生某些相同的偏见。技术进步使人类拥有更多的手段。文明为人们提供各种商品、资源和服务，但这些并不都是赐予。如果我们面对一张有关大工厂、高炉、发电站和原子工厂的分布图，或一张现代主要产品的消费分布图，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财富和工具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布很不均衡。这里是工业化国家，那里是不发达国家；后者正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成效有好有差。各地的文明程度也不均衡。文明既提供了许诺和可能，又刺激着贪欲和野心。一场竞争从此展开了，有的胜利，有的失败，还有的处在中间状态。进步在展示人类广阔前景的同时，扩大了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如果进步停止，所有的参赛者就会重新集合，虽然情况看来并不果然如此。其实，只是有竞争力的文明和经济才真正参加竞赛。

总之，在抽象的意义上，文明程度确实普遍在提高；但如果只看到这一种进步，面对各个文明地区（始终存在的、长寿的文明）的具体情形不闻不问，那将是一种浅薄之见。正是这些具体

文明在进行竞赛,它们肩负着进步的重任,决定着进步的方向。所有的文明地区都愿接受这些崭新的财富,但各自赋予它们特殊的意义,莫斯科的高层建筑不同于芝加哥的大厦。人民中国的高炉和土炉尽管外形与我国洛林地区或巴西米纳斯吉拉斯或沃尔塔雷东达地区的高炉相象,但并不完全相同。这里还有人、社会、政治的因素,甚至包括神秘的因素。工具固然重要,但工人也起重要作用,还要看他是否用心出力。除非瞎子才会看不见世界巨大变革的影响,但这种变革又并非无所不在,即使在完成变革的地方,变革的形式、规模和谐振效应也很少相似。这也等于说,技术并不决定一切,对法兰西这样的文明古国说来,这个道理实在太明显了。抽象文明的胜利决不意味着具体文明的失败。抽象文明和具体文明互相对话,互为补充,但它们并不相同,有时不用费劲和单凭肉眼就能看到二者的区别。我至今记得,在阿尔及利亚南部艾格瓦特和盖尔达耶之间的漫长而空旷的大道上,阿拉伯司机在规定的时刻把汽车停住,去几米远的地方跪下祷告,不管旅客们对此作何感想……

这些形象以及其他形象并不完全说明问题,但生活本身充满着矛盾:世界一方面猛烈地趋向统一,另一方面又始终保持分裂。同一性和相异性毕竟共存着,过去的情况是如此。我们注意到,许多观察家对肯定今天的同一性和否定昨天的同一性竟然同样起劲。他们不惜自相矛盾,坚持认为过去的世界因路途的遥远和艰难而四分五裂:高山、沙漠、大海、森林都构成天然障碍。在这天各一方的世界里,文明势必具有多样性。这无疑是个事实。但历史学家在观察这些以往的时代时,如果把眼界扩大到整个世界,仍会看到相距千里之遥的不同地区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发展速度也很相近。备受亚洲战争灾难的明代

中国与瓦洛瓦王朝的法国的距离肯定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第五共和国的距离要近得多。我们还不能忘记,即使在过去的时代,技术也始终在流通着。有关的例子不胜枚举。但造成同一性的重要原因还不在这里。人总是困守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这条界线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有所变迁,但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这条界线却大致不变,不论在哪个时代,它给所有的人类经验打上相同的烙印。在中世纪,甚至在16世纪,由于工具、机器和技术的简陋,由于牲畜数量稀少,一切活动全靠人、人力和人的劳动;那时候,人口普遍稀少,人们体弱多病,寿命很短。所有的人类活动,所有的文明,都被局限在狭小的可能性范围内。这些束缚事先包围和限制着任何冒险精神,使它们长期停留于碌碌无为的状态,因而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移动这些界石。

现时的革命恰恰冲破了这些古老的束缚和众多的限制。一切都逃不过这场根本的动乱。所有的文明地区都在经受新文明的考验。

革命是当今时代的特征

对于“现时”一词,我们必须作出解释。我们不能用个人生命作尺度去衡量现时,不能把文明像我们的庸碌、短促、若明若暗和平淡无奇的生命那样分成几个阶段。为了认识和理解文明,必须使用别的尺度去衡量。“现时”的文明是个长时段,它的黎明时分远在18世纪,目前尚未接近黄昏。世界上众多的文明地区在1750年左右开始置身于一系列动乱和灾难之中(动乱和灾难不是西方文明的专有物)。我们至今也还停留在这个状态。

这场革命,这些反复的动乱,不仅意味着工业革命,而且是

一场科学革命(但这只涉及客观科学,如果人文科学找不到真正的捷径,世界将始终不能平衡),一场生物学革命(其原因众多,但结果显然只有一个:人口的空前膨胀)。世界人口很快将达到30亿,而1400年却仅有3亿。

如果有人敢于谈论历史运动,除了这些共时的、全面的人口增长以外,就别无其他可说。人的物质力量把世界和人托在空中,使人脱离自身,投入一种崭新的生活。已对邻近的时代——例如16世纪——习惯了的历史学家,当他接触18世纪时,就有登上另一个星球的感觉。这正像目前的航空业使我们习惯于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音速和距地球八千公里的地磁场都是不可逾越的界线,而人们总有一天会超越这些界线。在15世纪末,所谓不可逾越的界线正是妨碍人们征服大西洋的地域阻隔。可是,从18世纪到今天,人类似乎不知不觉地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虽然在世界的某些地区,这类障碍还依然存在。由于医学的奇迹,锡兰不久前出现了震撼世界的生物学革命,促使人的生命大大延长,但通常伴随着这场革命的出生率下降却尚未来到这个岛国(那里自然增长率仍然很高)。这种现象在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国家都还存在。中国今天才真正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至于法国,我们早已全而进入到工业化时代。

这个新时代势必打破旧的发展周期和人的传统习惯。我所以强烈反对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观点,因为他们顽固地坚持把人类拉回到业已过去的旧时代去。若要同意今天的文明是印加文明或其他文明的周期反复,那就必须首先承认,技术、经济和人口同文明没有多少关系。

人的处事方式确实不断在变化。文明(具体的和抽象的)和人的活动(物质的、精神的和知识的)也随之变化。谁能预见未

来的劳动和休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介于传统、意识形态和理性之间的宗教又将怎样？谁能预见未来的客观科学在现有公式之外还会作出什么解释？目前处于孩提时代的人文科学又将以什么面目而出现？

文明的彼岸

随着现时的不断演变，文明正不断广泛传播。这不仅打乱各文明地区之间原有的相互关系，而且还打乱每个文明地区的内在关系。所谓文明的传播，用傲慢的西方人的话说，也就是我们西方文明在世界的扩散。据专家们认为，只有新几内亚中部或喜马拉雅东部的土著勉强可算作例外。但是，虽然西方曾是这种连锁传播的推动者，这种传播如今却显然已脱离西方的控制。革命如今在西方之外进行。它们正以极大规模扩展世界的文明基础。现时首先意味着文明的膨胀，简直可以说，是抽象文明对具体文明的报复，而报复的结果目前尚无法预见。

我已经说过，这种新的束缚或新的解放，在整个世界构成冲突的新源泉，并强迫世界去适应它们，从而触发五花八门的运动。人们不难想象，当技术猛然闯进一个文明地区并导致该文明地区的加速发展时，这在文明的内部关系中和在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范围内将会产生怎样的动乱。尤其，这种内部关系因地而异，使人不能一目了然；由其古老的、很难改变的结构所决定，每种文明各自处在特殊的地位上。正是根据旧立场和新需要之间的冲突或和谐，各国人民每日每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现实”。

又有哪个文明真能做到把机器完全驯服？卡尔·曼海姆于

1943年提出了一个明智而悲观的见解,他预言人民群众的自治势必导致“社会技术”的出现,而社会技术又有扩大人主宰人的危险。机器和技术将为少数技术专家服务,或者将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在文明(抽象的)和文明(具体的)之间,正以不同的名义,在不同的战线上,展开一场盲目的、残酷的斗争。问题是如何去驯化抽象的文明,把它纳入正确的轨道,使它接受一种崭新的人道主义。在这场具有空前规模的斗争中,问题不再是推倒贵族和扶持资产阶级,不再是用新资产阶级代替旧资产阶级,用刻板的统一帝国代替各民族的分裂割据,或用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代替坚守阵地的宗教;在这场具有空前规模的斗争中,许多文化结构可能同归于尽。所有的文明,包括历史上十分显赫的古老文明和最不起眼的文明,都经历着这种深刻的动乱。

从这个观点看,最令人振奋的景象显然表现于北至撒哈拉、南达赤道森林的广大黑非洲地区从印度洋的旧文明向大西洋的新文明的过渡。这些文明在巴格比看来只能算是“文化”,施本格勒、汤因比、阿尔弗雷德·韦伯、费利克斯·萨尔西奥和菲利浦·巴格比因而根本没有谈到它们。文明世界竟把这些“真正的”文明排斥在外。如果把一切归结为文明的传播,黑非洲显然未能利用它与埃及和地中海的古老联系。在印度洋方面,因有高山阻隔;至于在大西洋方面,则长期处于真空状态;直到15世纪,广大非洲地区才能向海岸沿线,接受大洋的赐予和危害。但在今天,黑非洲的情形有了变化:推广机器、普及教育、兴建城市等努力已打开局面,取得成果,虽然尚未完全达到西方的程度。马赛尔·格里乌尔等人种学家对此十分清楚。黑非洲已经觉醒,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and 可能性。这一过渡在什么条件下实行?其中有什么欢乐和痛苦?有关这些问题,你只有到了当地才会明白。

其实，假如我要更好地了解这些困难的文化演变，我就不必把拜占廷的末日当作战场，而是兴致勃勃地前往黑非洲去寻找。

朝着现代人道主义前进。今天，我们不再把文化和文明充当我们的价值尺度，但除了这两个词以外，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口号呢？如同在18世纪中叶一样，我们在20世纪中叶确实也需要提出一个新的口号，以便避免可能的灾祸和危险，说出我们深切的希望。乔治·弗里德曼等人建议采用现代人道主义的口号。人类和文明必须克服机器的压迫，避免因自动化的发展而被迫无所事事。这里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人类渴求兄弟相处的一种希望，是让文明拯救人类和永不灭亡的一种方式。人道主义，那就是要现时而对未来，摆脱预言家（悲观的预言家）所说的崩溃、破产和灾难。未来决不是跑道的终点，也不是摆脱千百年来经历的种种悲剧的障碍，而是人类从诞生以来不断更新的希望。

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正经历着全面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人文科学自身进步的结果：随着新认识的积累，科学研究已必须是一项集体工作，而明智的组织形式却尚待建立。某些科学进步尤其迅速，它们有意无意地、直接间接地影响其他各门科学；然而，所有的科学都与落后的、乏味的、不能再为它们充当框架的人文主义相冲突。由于古今以来的研究势必将汇合成为一个庞大的整体，各门科学无不关心自己在这一整体中的地位。

再在定义方面作一番努力，或者再发一通牢骚，人文科学是否就能摆脱这些困难？有人或许对此抱有幻想，因而他们现在比过去更加

喋喋不休和无中生有地去规定人文科学的目标、方法和优点。他们纷纷在相邻学科的界线问题上找岔。其实,每一门学科都想留在或回到自己的领域之内。个别学者正努力牵线撮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要“结构”人类学朝语言学程式、“无意识”历史和定性数学的方向靠拢。他主张在所谓“传播学”的名义下,把人类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等等组合成一门科学。但是,谁能同意打破学科界限和接受这项改组?答复的是与否将关系到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分家!

但平心而论,这些争执和拒绝并非没有意义。一门科学要肯定自己和否定其他,势必会产生新的好奇,因为否定其他已意味着认识其他。尤其,各门社会科学都不知不觉地互相制约,它们都力图抓住社会整体,都想侵犯邻近学科领域,而自认为仍留在自身的领域之内。经济学发现了在它四周的社会学,历史学接受了邻近学科的种种忠告,并力图作出反应。由此可见,尽管遇到了沉默、蔑视之类的消极对抗,一个“共同市场”正在形成中;在今后几年内,朝这个方向作些尝试也许是值得的,虽然各门学科最终还是走自己的道路为好。

但首先是要互相靠拢,这已成为当务之急。美国对当今世界各文化场已采用了多学科集体研究的形式;所谓“文化场”是由“社会科学工作者”组成的一个班子,主要研究现代的政治巨人:中国、印度、俄国、拉美、美国。为了认识这些政治巨人,每个参加者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在把有关的技术和知识实行汇总的时候,他们还必须不停留在自己独特的领域,不能像以往那样,对别人的言论、著述和思索不闻不问!必须使这一汇总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而不重今轻古。可是,在美国从事的这些尝试中,地理学几乎不占任何地位,历史学的比重也极其微薄。

更何况，他们搞的历史又是什么历史？

其他社会科学对历史学二、三十年来经历的危机很少了解；它们忽视历史学家的工作，而且还看不到，历史在为现实服务的同时，也是现实的一个表现方面：作为社会的时限，历史是人类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和矛盾的时间体现，它不仅是过去的实在，而且是当今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在人文科学之间出现大辩论的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强调历史的功能和重要。经过反复的历史观察，历史学家发现了关于时限的辩证法，即瞬时与缓慢流逝的时间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深刻的和反复无穷的对立；我们认为，在社会现实中，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比这一对立更加重要。无论研究过去或研究现在，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时间的这种多元性，这是人文科学共同的方法论。

我这里长篇大论地谈论历史以及历史的时间，主要不是为了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本刊读者，而是为了人文科学的其他专家：经济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甚至社会数学家或统计学家。很久以来，我们注视着这些相邻学科的经验与研究，因为我们认识到，与它们取得联系或走它们的道路能使历史学家耳目一新。在我们这方面，也可能给他们提供一点新东西。通过近年来的摸索，历史学得出了一个越来越明确的概念：时间的多种形态和长时段的特殊价值。历史的长时段概念恐怕会比历史本身——五花八门的历史——使邻近的社会科学更感兴趣。

一. 历史与时段

任何历史都把过去的时间分解成不同的时段,并根据各自的偏爱选择其中的一个时段进行研究。注重短时间、个人和事件的传统史学已使我们习惯了它那匆促、紧张的情节叙述。

新史学把经济和社会的周期性波动放在研究的首位,着重研究波动的时段,从而同时看到物价周期性升降的假象和真象。今天,除了叙述传统的历史事实,还要叙述涉及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历史态势。

在这第二部分的叙述之外,更有规模以百年计算的长时段和超长时段的历史。这与所谓“事件史”恰恰相反(事件史的名称是保尔·拉孔布最早使用的,弗朗索瓦·西米昂用得更多)。这些术语是好是坏并不重要,我们已经用习惯了;它们反映了本文所要讨论的时间的两极:瞬时性和长时段。

使用这两个词并非绝对可靠。就我来说,我愿意把“事件”一词列入短时段的范围:事件是爆炸,或如16世纪的说法,是“惊人的新闻”。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

哲学家们无疑会对我们说,这是把词的一大部分含义取消了。严格地讲,一个事件可能具有许多连带意义。它有时为一些深刻的运动充当见证,并且通过种种牵强附会的因果推理——以往的历史学家乐此不疲——吞并自身以外的长段时间。它可以被无限延长,自由地或勉强地与一系列其他事件或隐蔽现实相联系,从此再也不可分开。贝内迪多·柯罗齐据此声称,

由于这种添加手段，历史和人统统被置于任何事件之中，随后又重新从中分离出来。这里无疑有个前提条件，需要在历史事件中添加它最初没有的内容，并要知道作此添加是否恰当。让·保尔·萨特最近在《方法问题》一文中的思考正是在玩这种聪明而又危险的游戏。

说得更清楚一些，事件是短促的时间，是个人接触的日常生活和经历的迷惘和醒悟，是报刊记者报导的新闻。但请注意，报刊不但登载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披露普通的生活小事：一场火灾、一次铁路事故、小麦价格、一起罪案、一次戏剧演出或一场水灾。由此可见，生活的各种形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机构、宗教乃至地理（一阵风或一场风暴）都有一种短时间。

乍眼看来，历史似乎是这类反复无穷的小事（有的引人注目，有的默默无闻）的集合，微型社会学和社会计量学（还有微型历史学）目前正搜集这些琐碎的材料。但这众多的琐碎素材并不构成科学思考所能加工的全部历史实在。社会科学对事件几乎深恶痛绝，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短时间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

一些历史学家因此对传统的事件史持强烈的不信任态度；事件史和政治史的名称被混用并不十分恰当，因为政治史并不注定就是事件史。事实上，近百年来的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间。这也许是近百年来科学家们为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严格的研究方法付出的代价。自从大批文献资料被发现后，历史学家以为，全部真理就寓于真实的文献之中。路易·哈尔芬说过：“只要把文献资料按顺序编排起来，历史事实也就几乎自动对号入座。”这个理想在 19

世纪末曾导致一种新体裁的纪年史,为了力求精确,它以大使通信或议会辩论为依据,亦步亦趋地记述各重大事件。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特别重视长时段观察,而在后来,只有米希莱、兰克、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和甫斯特尔等少数大思想家才重新发现了长时段。超越短时段,这是近百年来史学研究的最珍贵的财富:如果同意这一点,人们也就容易懂得政治制度史、宗教史和文明史的重要作用,懂得建立在考古成果基础上的古代史研究的先锋作用。正是它们才挽救了我们的史学研究。

与19世纪传统史学形态的决裂还不是完全与短时间相决裂。大家知道,这一决裂有利于经济史和社会史,而有损于政治史。由此产生的一场大变革无疑也是历史学的一次振兴,它势必要改变研究方法,转移研究重心,计量史开始登上舞台,它的精彩表演还在后面。

尤其,传统史学的时间含义有了变化。在以往的政治史学家看来,一天、一年都是时间的计量单位。时间是许多天的总和。但价格曲线、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生产预测、流通分析都要求更加宽广的尺度。

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即所谓“态势”、“周期”和“间周期”的叙述方式,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可以是十多年,二十五年,甚至是康德拉捷夫的五十年周期。例如,不考虑短暂的和浮而的偶然事故,1791至1817年间欧洲物价趋向上升;1817至1852年间逐渐下跌:这一缓慢的升降运动在欧洲的时钟上表现为一个完整的循环周期,在世界范围内,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些时段显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是其他的晴雨表,弗朗索瓦·佩鲁曾根据它们的数值提出了

另外的界石,也许更有价值。但这些正在进行中的争论并不重要。历史学家肯定拥有一种关于时间的新尺度,按照崭新的方位标及其曲线和节奏定位,使对时间的解释能适应历史的需要。

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及其门生于1955年罗马历史学年会后,广泛地展开了以计量为特征的社会史调查。这项调查的最后结果是确定社会的态势(甚至社会的结构)——我想,我这样说并不违背他们的本意——;至于这类态势的变化是否与经济同步,我们事先是没有任何把握的。何况我们不应该只注意经济和社会这两大态势而无视其他因素;由于缺少精确的尺度,其他因素的进展很难衡量,甚至不可能被衡量。科学、技术、政治体制、精神工具、文明也有其生活和成长的节奏,新史学只是在其乐队补充完毕后才能开始合奏。

按照逻辑,这种合奏本该通过扬弃而导致长时段。但由于种种原因,扬弃并不形成惯例,我们今天又看到短时段的复归。与其朝未知的方向前进,或许还是把“周期性”历史和短时间的传统历史焊接在一起更加恰当(或更加紧迫)。用军事术语说,这叫巩固既得的阵地。厄内斯特·拉布鲁斯于1933年出版的第一部巨著研究18世纪法国的价格运动。1943年,拉布鲁斯又出版了近二十五年来法国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他在该书中因叙述的需要又回到了较短的时间去,并指出1774至1791年间的经济衰退是法国大革命的有力动因或发射架之一。他这里也还涉及到长时段,但只是半个周期而已。历史学国际代表大会于1948年在巴黎举行,拉布鲁斯作了《革命如何诞生》的报告;他这次却力图把短时段的经济事态与政治事态——革命行动——结合在一起。这就重新陷进短时段的泥坑,而且一直埋到了脖颈。当然,拉布鲁斯的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和无可非议的,但它又

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征兆！历史学家十分喜欢充当导演。他们惯于在幕后牵线，演出时间短促的戏剧，如今怎能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一老本行呢？

除了周期和间周期外，还有经济学家所说的“百年趋势”。经济学家并不全都研究百年趋势，对此感兴趣的至今还只是少数；他们对结构危机的认识尚未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只是以粗浅的假设而出现，而且只涉及 1929 年后的近代，最早也不过到 1870 年为止。但这些认识为长时段历史指引了方向和提供了第一把钥匙。

第二把钥匙更加有用，这就是“结构”一词。该词在长时段问题中居首位。在考察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对我们历史学家说来，结构无疑是建筑和构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另有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些阻力表现为人及其经验几乎不可超越的限制（数学术语中的极限），可以设想，要打破某些地理格局、生物现实、生产率限度和思想局限（精神框架也受长时段限制），这是何等困难的事。

最易接受的例子似乎是地理限制。在几百年内，人们困守一定的气候、植物、动物和文化，以及某种缓慢形成的平衡，脱离开这种平衡，一切都会成为问题。例如在山区，山民有按季节易地放牧的习惯；在沿海地带，海上活动总是集中在某些条件比较优越的地点。城市的建立，道路和贸易的通畅，文明地域的范围，都是惊人地持久和固定。

广阔无垠的文化领域也具有相同的稳定性或残存性。恩斯特·罗伯尔·库尔提乌斯的杰出著作《欧洲文学和拉丁族的中世纪》终于出版了法译本，它研究的那种文化体系同时是下罗马帝国的拉丁文明的变态和延续，而拉丁文明本身也背着遗产的沉重包袱：在13至14世纪民族文学诞生前，杰出知识分子的文明曾经有过相同的题材和比较，相同的陈词滥调。沿着一条类似的思路，吕西安·费弗尔的《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力图说明拉伯雷时代法国人的思维工具，即在拉伯雷以前和以后的长时期内曾左右着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事先严格地限制了自由思想家的思想探险。阿尔丰斯·杜普隆的论文《十字军的神话》是法国历史学派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他认为早在14世纪前，即在真正的十字军东征开始前，西方已有过这样的打算，这种长时段的打算在不同的社会、世界和心理状态中反复出现和不断延续，甚至在19世纪的人们身上还有最后的反映。皮埃尔·弗朗卡斯台尔在《绘画和社会》中指出，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开始，始终存在一种“几何形”的绘画空间，这种艺术完好无损地发展为本世纪的立体派油画。科学史也曾造就过几个体系，这些体系对世界的说明都有缺陷，但都维持了几个世纪之久。在伽利略、笛卡儿和牛顿出现前，亚里士多德体系保持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人曾经提出过异议。它的地位被一个具有几何结构的体系所取代；这后一体系面对爱因斯坦的革命，也终于垮台，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史学研究刚从经济学领域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但偏偏在这个领域却很难显示出长时段；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点奇怪。在这里，周期、间周期和结构危机掩盖了体系（有人用文明一词，

指旧的思维习惯和行动习惯,以及不易被打破和消亡的格局)。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欧洲范围内,经济体系遵守几条相当明确的普遍规律:这一体系大致在14至18世纪期间建立,更确切地说,在1750年以前。在那数百年中,经济活动取决于人口的增减,1350至1450年间以及1630至1730年间的大退潮都说明了这一点。在那数百年中,流通领域以水路和船只为主,陆路运输障碍重重,居次等地位。经济高涨集中在沿海地带,个别的例外只是证实了规律(香巴尼交易会在这个阶段初期已日趋衰落,莱比锡交易会于18世纪没落)。另外的特点是:商人占首要地位;金、银、铜等贵金属起重要作用,贵金属之间的冲突只是在16世纪末随着信贷的发展而减弱;季节性农业危机的反复袭击;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和朝不保夕;对外贸易的重大作用(乍眼看来,与当时的经济水平很不相称);12至16世纪期间与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18世纪的殖民地贸易。

以上列举了西欧商业资本主义的几个主要特点。在这个长达四、五个世纪的长时段中,尽管发生了种种显而易见的变化,经济生活却保持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这四、五个世纪具有共同的和不变的特点;围绕这些特点,在其他连续性中间,又有成千上万次断裂和动乱刷新了世界的面目。

在历史时间的种种不同形式中,长时段是一个棘手、复杂和陌生的人物。把长时段接纳到史学研究中来不是件好玩的事。这不是简单地扩大研究和兴趣的范围,也不是仅仅对史学研究有利的一种选择。对历史学家说来,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他们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在这个层次上

——不是别的层次——，脱离严格的历史时间，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从历史时间的大门出入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总之，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从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出发，由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为转移。

综上所述，我并不认为已为历史学家的职业下了定义，我只是谈了我的认识。在经历了近年来的风暴以后，如果谁以为我们已找到了真正的原则，划定了鲜明的界限或建立了好的学派，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其实，各门社会科学都由于自身或整体的运动而不断在变革，历史学并不例外。现在还望不到任何平静，门生的时代尚未到来。从夏尔·维克多·朗格鲁瓦和夏尔·瑟涅博斯到马克·布洛赫，中间有着很长的距离。在布洛赫之后，车轮还不停在转动。在我看来，历史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各行各业和各种观点的集合，是各种可能的历史的总和。

我认为，历史学能犯的唯一错误是独尊一家，排斥百家，过去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大家知道，要使所有历史学家明白这个道理很不容易，要说服其他社会科学就更不容易，它们竭力把历史拉回到以往的状态去。我们必须花许多力气和时间，才能在“历史”的旧名称下接纳所有这些变化和新事物。一种崭新的历史“科学”已经诞生，它继续在探索和变革。在我国，《历史综合杂志》（创办于1900年）和《年鉴》（自1929年开始）宣布了新史学的诞生。历史学家从此下决心重视有关人的所有科学。我们的职业无论在界限方面或兴趣方面也从此与以往大有改观。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不再像以往那样有明显的

分界和区别。包括历史在内的种种有关人的科学互有联系和影响。它们有或可能有共同的语言。

如果有人想了解 1558 年或 1958 年的世界,他就要先确定力量、潮流和特殊运动的一系列自下而上的层次,然后再取得整体的全貌。在这一研究的每个环节上,必须区分从遥远的过去已经开始的漫长运动和起源于眼下的短促推动。1558 年在法兰西时钟上是个毫不起眼的时刻,当时的世界不是从毫无魅力的这一年年初诞生的。1958 年对法国是个困难的年头,当时的世界也同样不是在那一年诞生的。每一件“时事”包含着不同的原始运动和不同的节奏:今天的时间既始于昨天和前天,又始于遥远的过去。

二. 短时间的争论

以上这些道理虽然平淡无奇,但社会科学对研究已失去的时间却不感兴趣。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向社会科学兴师问罪,指责它们不肯把历史或时段充当它们的必要尺度。社会科学表面似乎欢迎我们;它们在理论上从来都关心历史的贯时性研究。

除此以外,还必须承认,社会科学家的爱好和本能,也许还有素养,决定着他们总是忽视历史的解释;原因要从几乎对立的两方面去寻找。一方面是所谓“事件主义”,或者说,依靠经验社会学的帮助,过分注重“时事”,蔑视历史,使社会科学限于研究短时间的素材和调查现实的状况。另一方面是干脆超越时间范畴,也就是根据所谓“传播学”的要求,用数学公式去表现几乎永

恒的结构。我们的兴趣显然在后一方面，因为它最新鲜。但“事件主义”的拥护者今天还大有人在，因而两方面问题值得分别谈到。

我们已说过，我们对纯事件的历史怀有戒心。公正地讲，并非唯独历史犯有“事件主义”的错误，所有社会科学全都有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地理学家都把自己的科学分成过去和今天两部分（但分界不很严格）。为求得稳妥，他们本应该使二者保持平衡：这对人口学家是容易做到和必须做到的；这对地理学家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尤其我国的地理学具有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传统）；但经济学家则很少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困守最近的现实，往后追溯不超过1945年，往前的计划和预计一般距今几个月，至多几年。我以为整个经济思想就被这种时间限制卡死了。经济学家们说，研究1945年以前的经济状况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他们因此放弃了一个很好的观测场所。经济学家习惯为现时服务，为政府服务。

民族学家的立场不是那么鲜明和令人担心。在个别情况下，有人曾强调历史学既不可能又无必要进人民族学的领域。把历史学拒之门外的立场并未给马林诺夫斯基及其门生带来任何帮助。事实上，人类学怎么能对历史学不闻不问？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说得好，人类学与历史学都是精神的冒险历程。人们通过观察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社会，即使是低级社会，都带有“事件留下的痕迹”，没有一个社会的历史能完全被埋没。在这方面，任何抱怨和坚持都无济于事。

相反，在短时间的边沿地带，新史学与社会学的争夺十分激烈；以调查成千上万种社会现实、心理现实和经济现实为内容的社会学根深叶茂地在我国和在外国发展了起来。这些调查反复

断言,现时具有“火山般”的热力,丰足的财富和不可取代的价值。而历史时间在沉默的掠夺下已变得十室九空,回过头来重建历史时间究竟有什么用处?但是,历史时间是否真的已遭破坏而需要重建呢?从过去的时代中抽出本质,这对历史学家无疑是太容易的事了,用昂利·皮朗的说法,历史学家不费力气就能抓住“重大事件”,他想说的是“具有一定后果的重大事件”。现实生活因夹杂着种种小事而显得模糊不清,历史的眼光却能简化现实生活而揭露其真象,这正是在现实中生活的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声称,如果能与柏拉图时代的人谈上一个小时,他对古希腊文明的了解将比所有经典论述要多得多。我十分同意他的说法。不过,历史学家已为他的旅行作好了准备,他多少年来已听到了从沉默中发掘出来的上百个希腊人的声音。如果在今天的希腊停留一小时,他对现实状况仍将几乎一无所知。

进一步说,调查现时并不能剖析结构的细微末节,除非人们先用假设和说明去重建现时,也就是说,不能单凭感觉去认识实在,而要经过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先要离开已知的现实,以便更好地掌握现实。我怀疑社会学对现时的摄影能比历史对过去的描绘更加“真实”,这种摄影离“重建”现实的距离越远就越不真实。

菲力浦·阿里埃斯强调改变环境在历史解释中的重要作用:你对16世纪的一件事感到奇怪,原因就在于你是20世纪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远离故土产生的新奇感是认识的重要手段,它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周围的事物(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即使你在伦敦住上一年,你对英国的事仍是一知半解。但在新奇感的启示下,通过比较,你会对

法国的某些根本特点豁然开朗,这正是你拚命认识所认识不到的特点。与现时相对而言,过去也是改变环境的一条途径。

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很可能在死材料和活见证、遥远的过去和切近的现时等问题上永远互相踢皮球。我以为这不是主要问题。现时和过去应该互为说明。如果单一地观察狭隘的现时,人们的注意力将转向虚无缥缈的、喧赫一时的和转瞬即逝的事件。而要观察社会,就必须注意全部事件,不论这是多么枯燥乏味。人种学家调查波利尼西亚人,只在当地停留三个月时间;工业社会学家交出最后一次调查的结果就算了事,或者用几个巧妙的问题拼凑出打洞的卡片,就以为完全摸清某个社会的结构。社会是个特别狡猾的猎物,这样急于求成是不能把它捕获的。

有人就巴黎地区的人口流动作了一次广泛的调查,我们的人文科学对此能感兴趣吗?家住十六区的一个女孩每天去她的音乐教师家里和政治学院,由此可画出一张漂亮的地图;但假如她学农艺学或玩滑浪板,她那三角形的行程就会全部改变。我高兴地看到某个大企业职工居住地的分布图,但如果我没有以往的分布图,如果分布图之间的时间距离不能够汇总成一项真正的运动,调查仍是无的放矢和白费力气。为调查而调查至多能积累资料,而这些资料对未来的研究却未必都有价值。我们对为艺术而艺术应有所警惕。

我还怀疑一般的地方志,无论是欧赛尔、维埃纳或多菲内等地的地方志,如果不涉及历史,能否算是社会调查的对象。任何城市都是社会的延伸(包括其必然的危机、割裂、故障和打算),必须在附近城乡的复杂体中,以及在这个复杂体的历史运动中,才能认识该城市的地位。在记录城乡交流、工商竞争这类现象

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知道:这种运动是离弦之箭或者是强弩之末,是历史的再现或是简单的反复?我们不能对此无动于衷,而相反应看到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吕西安·费弗尔在其生活的最后十年中反复说过:“历史既是过去的科学,又是现时的科学。”这也是我的结论。作为时段的辩证法,历史不正是对整个社会现实的解释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教训提醒我们要防止单纯重视事件的偏向。我们不能只思考短时间,不能以为会吵会嚷的演员才是真正的演员,除他们以外,还有其他的演员,只是保持沉默而已。难道有谁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三、信息传递和社会数学

我们也许不必在短时间的动荡边界上停留太久。有关这方面的争论意义不大,至少不会得出惊人的结果。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与历史学相邻的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经验,即所谓信息传递和社会数学。

这场笔墨官司确实比较难打,我想说的是,社会科学的某些课题——至少在表面上——绝对地处在历史时间之外,我们很难证明这类研究不能脱离历史时间。

读者如果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场讨论(不论赞成或不赞成我们的观点),最好对每个术语自己先掂一下分量,这些术语并非全都是新词,但在新的讨论中被沿用时有新的含义。

关于事件或长时段，显然没有新的含义可说，结构一词及其含义虽然还有争论，不能完全确定，但分歧并不太大。贯时性和共时性二词也不必多说：它们的定义已不问自明，尽管在研究社会现象的具体课题中，弄清它们的作用并不那么容易。在历史学的语言里，确实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共时性：要让所有的时段在某个时刻一律停止，这本身几乎是荒谬的或十分勉强的事；同样，我们只能设想，时间的长河多不胜数，每次顺水航行仅是无数次航行中的一次而已。

以上简短的提醒和警告暂时已足够了。但对“无意识历史”、“模式”、“社会数学”这类术语，还有进一步加以说明的必要。这些必要的说明在探讨社会科学共同问题中是迟早会遇到的。

所谓“无意识历史”当然是指无意识的社会形态的历史。“人创造着历史，却不知道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的这句话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但还不能说明问题。实际上，这是用一个新词重新提出有关短时间、“微型时间”和“事件历史”的全部问题。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始终觉得自己能捉摸到时间的流逝。但这种清醒的、有意识的历史是否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想的那样，竟是欺人之谈？语言学过去以为一切都由词所派生。历史学曾以为一切都由事件所派生。在当代，许多人以为一切来自雅尔塔协定或波茨坦协定，来自莫边府事件或沙基埃-西迪-优素夫事件，或来自另一件更重要的事件——人造卫星的发射。无意识的历史正是在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之外展示的。就算在事件的一定距离之外有一种社会的无意识，就算这种无意识可被认为比闪闪发光的表面事件有更丰富的科学内容，但要区分光亮表层和黑暗的深层十分困难，人们没有成功的把握。更何况，无

意识的历史一半属于态势的时间,一半又属于结构的时间,它往往比人们所承认的更容易被感知。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之外还有群众的历史,并且容易承认群众对历史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但不容易看到这股力量的方向和规律。这种意识今天正变得日益强烈,虽然它的存在历时已久(例如在经济史方面)。这是思想中的一场革命,人们开始正视事件的模糊部分,赋予它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损害其他部分也在所不惜。

在对无意识的这场考察中,历史并非单枪匹马,它追随着某些新兴社会科学,并采用了它们的新观点。新的认识工具和考察工具业已形成,例如“模式”,虽然有的模式比较完善,有的还很粗糙。模式只是以方程和函数形式出现的、互有紧密联系的假设和解释体系:这个决定那个,或者这个等于那个;此实在如无彼实在相伴即不能成立,互相间显然保持紧密的和经常的关系。模式如果定得好,就能在人们所观察的社会环境之外,透过时间和空间,接触到其他的社会环境。这就是模式的循环价值。

根据使用者的打算、目的或心血来潮,这些解释体系可变化无穷:简单的或复杂的,定量的或定性的,静止的或流动的,机械的或统计的。我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接受了这最后一种区分。机械模式的范围较小,只涉及直接被观察的一小群人的实在(例如民族学家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在考察范围广阔、人口众多的社会时,就必须计算平均数,从而得出统计模式。但这些定义并不重要,有时还存在争议。

我认为,在制订社会科学的共同纲领前,必须先确定模式的作用和界限,以免它们被某些人肆意扩大。为此,我们应该把模式和时段进行对照,因为在我看来,模式的意义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有效时段。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举历史模式为例，我想说的是某些历史学家制造的、相当粗糙和简陋的模式，它们虽然也是模式，但很少做到如真正的科学法则那样一丝不苟；历史模式从来不想用数学语言作出表述。

我们在前面曾谈到 14 至 18 世纪期间的商业资本主义：这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许多模式之一。这个模式虽然对各种推理敞开大门，但只对一定时间内的某一类社会才完全适用。

我在《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制定的模式就不同，它涉及 16 至 18 世纪期间意大利城邦的经济发展周期，即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再到银行资本的转化；银行的繁荣最慢，消失也最慢。银行的结构比商业资本主义的结构规模要小，但在时间和空间中却更易延伸。它记录的现象能够在不难找到的许多场合反复出现。弗朗克·斯普纳和我在《16 世纪的货币金属和经济》一文中提供的模式也许属于同样情形：关于 16 世纪及其前后时期的贵金属的历史，无论是金、银、铜或其替身（信贷），全都“想方设法”要压倒对方。为便于观察起见，我们选择了 16 世纪这个特别动荡的时代，如果把这个模式搬到别的时代去，也毫无困难。一些经济学家不是曾试图用今天不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来验证货币数量理论吗？

这些模式如果与一位名叫希格孟·迪亚蒙的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模式相比，其存在的有效时限也还是短促的。迪亚蒙设想的模式带有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双重烙印：内部语言是指美国当时统治阶级（大金融家）内部使用的语言；外部语言是指面对公众进行辩护（为了使人相信金融家的成功是民族

致富的条件)时使用的语言。迪亚蒙认为,这是统治阶级感到自己的威信和特权蒙受威胁时表现的习惯反应:为了掩盖自己,统治阶级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把自己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等同起来。如果需要的话,迪亚蒙将会用同样的模式来解释王朝观念(英格兰王朝)或帝国观念(罗马帝国)的演变。这类模式显然能延续几个世纪。他所设想的某些具体的社会条件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因而模式的有效时限也比前面谈到的模式长得多,但它涉及的现实同时却更加具体,更加狭窄。

极而言之,这类模式可与社会数学家偏爱的、几乎永恒的模式殊途同归。所谓“几乎永恒”实际上也就等于说在超长时段的道路上行进。

前面的解释只能勉强算是模式科学和模式理论的先导。历史学家在这方而并不遥居领先地位。他们的模式不过是些解释性的光束。其他社会科学家比我们更有雄心壮志,在研究方而也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试图与信息、传递或定性数学的语言和理论相会合,把数字语言引进他们的领域。这个功劳诚然很大,但一不小心,数学语言有摆脱我们的控制和溜跑的危险;至于溜到什么地方,那简直是天知道了!信息、传递和定性数学都能集合在社会数学这个含义极广的术语之下。在使用这个术语前,还必须先作一点说明。

社会数学至少包含三种语言,它们可能互相混合,并随之产生新的语言。数学家的想象力至今尚未穷竭。这三种语言是:必然现象的语言,属传统数学的领域;随机现象的语言,属帕斯卡尔以来的概率论领域;既非必然又非随机,但受一定规律支配的条件状语言。由于使用了集合、组合和概率运算的方法,这些

规律后来为定量数学开辟了道路。从此,由观察向数学表述的过渡就不再必须走大量和冗长的统计计算这条艰难的途径。人们可以从分析社会现象直接得出一个数学公式,也就是说,利用计算机进行计算。

当然,计算机并不能把所有的材料全都吞下和消化,还必须事先作好必要的准备。信息科学正是为了传播的需要和根据计算机的运行规则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作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远远地注意着有关翻译机器的研究,并因此而沉浸在遐想之中。他注意到以下两个事实:1. 必要的机器和数学可能性已经存在;2. 必须为社会数学准备好社会数据,因为社会数学已不再是我们熟知的价格曲线、工资曲线、人口出生率这类老一套的数学。

虽然我们往往不掌握新数学的演算程序,但我们不能不注意为使用新数学而准备好社会实在。我们至今几乎总是要完成相同的准备工作:选择一个范围有限的考察单位(如一个原始部落,一个对外隔绝的人口群落),那里的一切几乎都能够被我们直接用手指摸到;随后,在各种不同的要素之间建立一切可能的有机关系。根据这些业已严格确定的关系,人们将列出数学方程,得出各种可能的结论和引伸,最后得出能概括(或不如说考虑到)一切结论的模式。

在这些方面,能够研究的课题多不胜数。举一个例子也许比发一通长篇议论更加好些。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自告奋勇为我们引路,我们就跟他走罢。他向我们介绍了其中的一个研究领域,即所谓“传播学”的领域。

列维-斯特劳斯写道:“在任何社会里,传播至少在三个水平

上进行：妇女；财产和劳务；信件。”我们姑且承认，在三个不同的水平上有着不同的语言。因此，我们是否有权把每个水平上使用的语言当作具体的、甚至特定的语言？是否有权把它们直接地或间接地同语言学或音位学的惊人进步联系起来？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音位学“必将革新整个社会科学，正如核物理学革新了整个精确科学一样”。这样说未免言过其实，但有时言过其实却是必要的。历史学落入了事件史的陷阱，语言学同样掉在词的陷阱之中（词与客体的关系，词的历史演变），音位学的革命终于使语言学摆脱了困境。语言学从此在词的此岸依附音位，不再注意词的含义，而重视词的位置，重视伴随着词的音符以及音符组合、亚音位结构和整个隐蔽的、无意识的语言实在。在世界各国语言中都能找到的几十个音位的基础上，奠定了崭新的数学工作；于是，至少一部分语言学在最近二十年来开始脱离社会科学的领域，并越过“精确科学的隘口”。

把语言的意义推广到亲缘的基本结构，推广到神话、仪式和经济交换，这正是寻找通往“隘口”的道路，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在夫妻交往——人际交往中最基本的语言——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在任何社会中，即使是原始社会，乱伦——在狭小的家庭细胞内通婚——无不遭到禁止。这是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下，他寻找一种与音位相应的基本要素，即亲缘的“原子”。列维-斯特劳斯在1949年的论文（《亲缘的基本结构》）中指出，用最简单的表述，“原子”指的是：男人、妻子、孩子再加上孩子的舅舅。从这个基本要素以及从原始社会大量已知的婚姻系统出发，数学家将寻找各种可能的组合和方案。在数学家安德烈·韦依的帮助下，列维-斯特劳斯成功地把人类学的观察翻译成数学语言。由此得出的模式应该证实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并显

示该体系包含的具体方案。

人们可以看到这种研究意味着什么：突破观察的表层，进入无意识（或少意识）要素的领域，再把这种实在分割成等量的、敏感的和细微的要素，以便精确地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正是在“微型社会学”的这一梯级上，人们可望看到最一般的结构法则，正如语言学家在亚音位梯级上，物理学家在次分子（即原子）梯级上，发现了自己最一般的结构法则。这类研究显然可以朝许多其他方向继续进行。于是，列维-斯特劳斯顺理成章地又开始研究神话，且别发笑，还研究烹饪（这是另一种语言）：他把神话分解成一系列基本题材，把各种烹调法分解成味的基本要素（他对此并不十分深信）。他的研究每次都立足在深层的、下意识的水平上：我在讲话时，我不关心我的话语中的音位；在餐桌上，除个别例外，我也并不注意烹饪是否包含味的要素。然而，在每种情况下，内层各要素之间都保持确切而细微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难道是要以语言的形式表达这些简单而神秘的关系，从而把这些关系翻译成莫尔斯电码和通用的数学语言吗？这恰恰是社会数学的雄心壮志。我敢认真地说，这种研究决不是历史研究。

我们这里必须考虑时限。我曾说过，模式的时限有长有短：模式的有效时间是它记录的实在的有效时间。在观察社会时，这一时间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同生活的内在结构相比，这些结构在各种矛盾压力下出现的断裂（突然的或缓慢的）意义更加重要。

我有时把模式比作船只。一旦船只已经建成，我就要让船只下水，看它是否漂浮，然后沿着时间的长河顺流而下或逆流而

上。船只失事始终是最意味深长的时刻。可见,弗朗克·斯普纳和我本人为说明贵金属之间的争夺而提出的假设对15世纪以前的世界并不适用。在15世纪后,贵金属间的冲突表现十分激烈,这种激烈冲突随后又见不到了。我们需要寻找其中的原因。由于这里必须向下游航行,而到了18世纪,随着信贷的急剧膨胀,我们的船只便遇到了困难,过于简单的模式已不能成立。照我的主张,研究应该不断从社会实在得出模式,再从模式回到社会实在,多次往返,耐心地进行修补。因此,模式就由说明结构的尝试、检验和比较的工具变成对某个特定结构的生命力和可靠性的验证。如果我从现实出发制造一个模式,我就会立即把它放回到实在中去,然后在时间中向上追溯,尽可能追溯到它的诞生为止。接着,我将根据其他社会实在的共时运动,估量这个模式可能的有效时限(即到该模式与实在脱节为止)。这并不排除另一个可能:我将把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中与其他实在进行比较,以便能够用模式对其他实在作出新的解释。

我认为定性数学的现有模式不适于从事这类往返运动:时间的河道多不胜数,而这些模式却只在一条河道中航行(长时段和超长时段的河道),避开了航行事故、外在机遇、与实在脱节等偶然因素。我想再一次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例,因为在我看来,他在这些领域的尝试是最聪明的和最清晰的,而且也最能扎根在社会经验中。我们必须看到,列维-斯特劳斯每次所研究的都是一种演变极其缓慢、甚至近乎永恒的现象。所有的亲缘系统都世代相传,因为如果血缘亲属的比例超过一定限度,人类就不能生存,而为了生存,必须有一部分人对外部世界开放:禁止乱伦是长时段的实在。发展十分缓慢的神话也与超长时段的结构相适应。且不谈最古老的神话,我们可把有关俄狄浦斯的各种

神话收集起来，整理出其中的各种差异，从而在差异之下揭示出一个贯彻始终的骨架。但是，列维-斯特劳斯不研究神话，而去研究“马基雅弗里主义”及其各种形象和表现。假如他从16世纪中叶该学说被真正提出的时候出发去分析该学说的基本要素，我们在马基雅弗里主义的结构中就随时可以看到许多断裂和颠倒，因为这一学说体系不具有神话那样的、几乎永恒的稳固性，而要受历史上众多的变迁、起伏和波折的影响。用一句话说，它不能仅仅沿着长时段的平坦大道前进……由此可见，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结构中所推崇的方法不仅处在微型社会学的梯级上，而且处在无限小和超长时段的交叉路口。

说到底，定性数学是否注定要走超长时段这条唯一道路呢？假如是的，我们所能找到的真理将仅仅是些过分偏向永恒的人的真理。有人或许会对此感到失望，会说这些原始真理不过是聪明人的陈词滥调。我们则认为，这些基本真理能够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作出新的说明。但整个争论并没有到此为止。

我实际上并不以为这些尝试（或类似的尝试）不能在超长时段之外进行。人们向定性数学提供的素材不是数字，而是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都有严格的定义，因而不能用一个数学符号来概括；从这些数学符号出发，有关的数学可能性将得到研究，而不必考虑这些符号代表什么社会实在。结论的全部价值将取决于原始的观察，取决于在所观察的实在中选择哪些基本要素和如何规定要素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社会数学何以对模式有所偏爱，列维-斯特劳斯称之为机械模式，也就是说，建立模式的出发点是些狭隘的集团，在这些集团里，每个个人都可直接被观察，社会生活十分单纯，人际关系简单、具体和很少变化，因而肯定能够就它们的性质作出规定。

相反,所谓统计模式则以广阔和复杂的社会为对象,观察这些社会的现象只能依靠平均数和传统数学。但在平均数确定后,如果我们能够在集团之间——不再在个体之间——建立为定性数学所必需的基本关系,当然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们这样去做。据我所知,这类尝试至今还没有。我们还处在试验的初期。暂且,无论是心理学、经济学或人类学,所有的试验都朝着我前面谈到的列维-斯特劳斯所遵循的方向进行。定性的社会数学只有在向现代社会发起冲击,研究其纷杂的问题和不同的生活节奏后,才算经受得起考验。相信会有某个数理社会学家将从事这项冒险。我们也还相信,这项冒险必将促使人们修改至今遵守的方法,因为社会数学不能局促在超长时段的一隅之地:它理应找回包括各种运动、各种时限、各种断裂和各种变异在内的多样的生命活动。

四. 历史学家的时间和社会学家的时间

在结束了在社会数学中的漫游以后,我回过头来再谈时间和时限。作为历史学家,我对社会学家居然能超脱时间一事深感惊讶。问题在于,他们的时间不等于我们的时间:社会学家的时间远不是那么专横,那么具体,几乎从未成为他们的问题和思考的中心。

历史学家实际上从不走出历史时间的范围:时间紧贴在他们的思想上,犹如园丁的小锄总是沾土一样。历史学家当然也梦想超脱时间。在沉闷的1940年,加斯东·罗普内尔的《历史和

命运》一书对时间问题发表的见解使一切真诚的历史学家感到伤心。保尔·拉孔布也曾有过同样的想法，这位大历史学家在《历史综合评论》撰文写道：“时间本身毫无意义，客观地讲，它仅是我们的一个观念而已”……但是否真能避开时间呢？就我个人而言，在那百无聊赖的被困期间（1940至1945年），我曾拚命去摆脱这些困难年月的漫长时间。拒绝接受当时的事件和时间，就是明哲保身地站在一边，以便能高瞻远瞩和不过分着眼现实。从短时间过渡到较长的时间和很长的时间，接着便暂时停下，重新考察一切和重新建设一切，看到一切都在自己周围转动：这种处世之道确实值得历史学家一试。

这一连串的超脱最后并不会把历史学家抛出世界的时间和历史的时间之外，时间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随地球公转的节奏向前奔跑。我们区分的各种时限其实在相互间有着休戚与共的联系：精神的创造主要并不归功于时限，而应归功于时限的片断。这些片断在我们工作的终点殊途同归。长时段、态势、事件也毫无困难地随之而来，因为所有这些时间都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思考其中的一种时间，也就是思考所有这些时间。重视主观方面并深入时间范畴内部的哲学家从不意识到历史时间的分量，而历史时间却是具体的、普遍存在的时间（如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经济危机》一书篇首描绘的态势），是以同等身份周游列国和把相同桎梏强加各国的时间。

对历史学家说来，一切以时间为开始，一切以时间为结束，这是一种数学的和造物主的时间，是推动人、强迫人和外在于人的时间，或用经济学家的说法，是“外原的”时间，它把各人特有的、色彩不同的时间夺走：一句话，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时间。

社会学家当然不接受这种过分简单的范畴。他们更接近加

斯东·巴歇拉尔在《时限的辩证法》中所介绍的时间。社会时间只是我观察的某个社会实在的特殊量度。它处在该实在的内部,又是该实在带有的许多记号之一和特性之一。这种宽容的时间不给社会学家带来困难,社会学家可以随意拦截它、放过它或促使它运动。历史的时间不易接受贯时性和共时性的这种灵活的双重活动:它不能把生活设想成一种可以停止其运动和展示其静态的进程。

这个分歧其实更要深刻得多:社会学家的时间不能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职业决定了我们从内心就厌恶这种时间。我们的时间,如同经济学家的时间一样,是一种尺度。当一位社会学家说,结构的不断破坏只是为了重建,我们完全愿意接受这种解释,历史观察何况也证实这种解释。但根据我们习惯的要求,我们还想知道这两种相反运动的确切时限。各种经济周期,物质生活的涨潮和退潮,都是可以衡量的。社会的结构危机也应该在时间中并通过时间被测出其自身的确切地位,或与共生结构的运动相对的确切地位。历史学家所强烈关心的,正是这些运动的交叉、相互作用和断裂点;而要记录这一切,又只能使用历史学家的时间,即记录所有这些现象的、划一不二的通用尺度,而不是充当各现象特殊尺度的形式多样的社会时间。

历史学家在进入社会学——即使是乔治·古尔维奇的亲如手足的社会学——的领域时,不论有理无理,总要提出这些相反的意见。而在自己的领域内,历史学家却不承认时限,又不承认时态。乔治·古尔维奇的社会大厦由五种基本建筑所构成:上下楼层、社交、社会集团、总体社会和时间,时间是最后、最新的脚手架,因为它也是在整个大厦之外添加的、最后的建筑。

乔治·古尔维奇所说的时间以众多的状态而存在,算来竟有

整整一串：迟缓的长时段时间，转瞬即逝的时间，节奏不规则的时间，周期的时间，落后于自身的时间，超前和落后交换的时间，走在自身前面的时间，爆炸的时间……历史学家怎能相信这些？如果时间有这么多的色彩，历史学家就不能重组他所不可缺少的单色白光。他很快看到，这种变色的时间不过用一种新的色彩来标出早已区分清楚的不同范畴。在古尔维奇的大厦中，姗姗来迟的时间自然处于寄人篱下的地位；为了适应房屋的要求，时间要听从上下楼层、社交、集团、社会的约束。这是不加改变地以另一种方式重写相同的方程式。每个社会实在都分泌自己的时间或时间标尺。这对我们历史学家能有什么好处？这座理想大厦的庞大建筑仍然是静止的。历史在其中没有立足之地。世界的时间和历史的时间留在那里，但像埃奥勒的风一样，被禁闭在羊皮口袋里¹。社会学家所反对的最后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时间；即使人们力图以多种形式去改造历史时间，这个实在仍然是专横的。历史学永远摆脱不了历史时间的束缚，而社会学家却几乎总是脱离时间的约束：在他们眼里，始终现实的瞬时现象似乎高悬在时间之上，而多次反复的现象则没有任何时间标志；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在思想上趋向极端，或者局限于严格的瞬时，或者满足于最长的时限。这种认识难道是合理的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以及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之间争论的真正焦点就在这里。

按照历史学家的习惯，我在本文列举了大量例子进行论证，我的论点想必是够清楚的了。但社会学家和其他邻近科学的专家是否能同意我的论点，我却感到怀疑。作为结论，这里不必再反复重申业已叙述和强调过的论点。历史学的本质要求它给予

时限及其赖以分解的各项运动特殊的关注；在我们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但愿我们的邻居们在思考社会现象时能把他们的观察和研究纳入这条轨道：这对他们难道是一项过分的要求吗？

所有的历史学家并不全都赞成我的主张，潮流还会出现逆转：历史学家从本能上偏向短时段。大学里神圣的教学大纲也助了一臂之力。让-保尔·萨特最近发表了《〈评丁托列托〉一书（即将出版）的片断》，支持短时段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或者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冗琐，为了同时反对这两种倾向，他提倡注重人物传记和丰富多采的实际事件。“确定”福楼拜资产者的地位或丁托列托小资产者的地位，这说明不了所有的问题。我对此完全同意。但是，让-保尔·萨特每次研究具体情形——无论是福楼拜、瓦勒里或吉伦特派的对外政策——终究要回到时代背景那儿去。这种研究从历史的表层转向历史的深层，因而与我的想法殊途同归。如果沙漏计时器能朝两个方向倒转——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就更加符合我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有众多的模式。萨特强调特殊和个体，指出模式的不足，反对生硬的公式化倾向。除少数细微差别外，我赞成他的意见，但我不反对模式，而是反对滥用模式。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人们简单地把这些模式固定下来，赋予法则的价值，似乎它们能自动说明一切和预示一切，似乎它们能适用于所有的场所和所有的社会。其实，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模式拉回到时间的可变长河中进行观察，它们的网络将显得一清二楚，因为这是编织得十分精细、十分牢固的一张网络，

它不断重新出现,但每次都在其他结构的作用下,发生细微的增删变化,而其他结构本身也可能受其他的规律、其他的模式所规定。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强有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活力和焕发青春……但必须补充,在我看来,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却喜欢停留于既有的公式,为公式而公式;这难道不正好典型地反映着整个社会科学而临的危险吗?

我在结论里还想强调指出,长时段仅是社会科学会商时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之一,应该看到还有其他的共同语言。我曾介绍了社会数学的崭新尝试。新尝试诚然对我有很大吸引力,但我们对旧尝试不应感到失望;它们在经济学中取得了切实的成果,这也许是人文科学中最先进的成果。在这个传统领域中,还有大量的计算等待我们去做,尽管目前已有了大批日益完善中的计算机和计算器。我相信今后还必须扩大统计的范围,把计算运用于对过去时代的研究。18世纪的欧洲总的说来还有许多领域需要发掘,但对17和16世纪的研究也应提上议事日程。奥托·伯凯尔巴赫的《中国明代的人口统计》和马里安纳·里格尔《明朝的金融和农业经营》以其空前详尽的统计为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深层打开了大门。数字的简单明了显然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任何科学都是从复杂向简单发展的。

我们这里不应该忘记最后一种语言,最后一组模式,即必须把任何社会实在归结为它所占领的空间。遗憾的是,在人们的思想中,地理往往被当作一个自在的世界。地理学需要再出现一位如维达尔·德·拉布拉什那样的学者,不但思考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而且思考地域和社会实在的关系。今后,地理学将优先研究有关人文科学整体的问题。社会学家或明或暗地把生态学当作地理学的同义词,借以避开由地域提出的种种问题。空间

的模式是至少能部分地解释社会实在的地图,它们对各种社会现象和各种时间运动都有真正的规范价值。令人奇怪的是,社会科学竟对此视而不见。我经常想到,法国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个优点正是我们有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地理学派,但这一学派的精神实质却往往被背离,我们不能不对此深感惋惜。对社会科学来说,它们也应该如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主张的那样,在认识人类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地理的因素。

我在写本文时怀有一个实际的目的,即希望社会科学在相互的界线、社会科学的定义和结构的定义等问题上暂停争论,而通过共同努力,为今后从事的集体研究划定几条指导性路线。依我之见,这些路线可称作数学化、地域论和长时段……但我十分希望能知道其他专家将提出什么建议。本文被列入《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的“论战”栏目中,这当然决非偶然。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不涉及自身专业的条件下,我们每个人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显然要冒点风险。因此可以说,写以上的文字,目的在于挑起争论。

注 释

1. 埃奥勒系希腊神话中的风神。他赠给乌利斯一只羊皮口袋,后被乌利斯的同伴打开,从而使他们在航海旅途中经常遇到风暴袭击。

1450 至 1750 年欧洲的价格

在通史中单辟一章¹,专门阐述 15 至 18 世纪中叶——大致相当于所谓前工业时期——欧洲价格史的庞大问题,从一开始就可能让人发慌,我们也曾为此感到有点担心。事情是否真能做好?既能又不能:展现欧洲价格史的基本格局和轮廓显然比较容易,但根据我们今天的知识状况,要为欧洲价格史奠定可靠的基础和作出确有把握的解释,却又几乎不可能。这样做的唯一好处将是用崭新的术语,从整体上重新提出价值的问题,或者说价格史的性质问题。这个好处不可小视,人们所遇到的困难本是显而易见的,但这里也还必须一一加以说明。

非常实际的第一个困难：这里涉及的经济是一种业已成为过去的旧经济，其结构和节奏都与19世纪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经济大相径庭，更不用说20世纪的经济了。读者和经济史学家由此势必会因陌生而感到不自在；经济史学家自然会记着不断向经济学家讨教，而后者其实却只是关注现时。由此可见，经济史学家必须脱离一眼就能看到的活生生的现实，抛开业已得到公众承认的解释，脱离为现时制定的简便实用的方法，更确切地说，脱离为当今西方世界制定的、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方法。然而，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经济学却又承认，为西方经济现实制定的、至今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规则，一旦被应用于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如现时的印度等年轻的“不发达”国家，就不再有什么价值。那么，它们怎么会轻易适用于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呢？

在现时和过去之间进行比较确实吸引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我们不要轻易声称自己的论证对时间的两个坡度全都适用！比较旧制度下的欧洲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如亚历山大·沙佩尔所做的那样²，进而认为通过这种比较，可以证实货币数量理论的后溯价值（和现时价值），这可能让人怦然心动，但不能令人信服。这个方法有助于在比较的两项经验中提出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同样，伊尔·汉密尔顿关于在通货膨胀期间——即在16世纪或18世纪——工资和物价增长速度的不相称，从而促使企业大幅度增加利润，成为推动资本主义时期发展因素之一的假设，的确也让人为之动心，但这个假设是否完全合理，我们却并没有把握。凯恩斯爵士曾相信这个见解，波兰历史学家斯塔尼斯拉夫·哈斯佐夫斯基³的近著也持同样的主张。但我们对汉密尔顿的以上假设未敢苟同。我们认为，有关工资的统计

数据委实少得可怜,因而不能提供可靠的讨论基础,无论如何,单凭现时的论据,例如 1939 至 1952 年间北美的现实(R. A. 凯塞尔和 A. A. 阿尔羌据此推断,伊尔·汉密尔顿的理论不能成立),证明不了这个假设的合理或不合理。这种比较方法,以及大卫·费利克斯⁴在这场辩论中发表的言论,都使我们疑虑丛生。

为了肯定起见,让我们再说一遍:用今天的理论来解释,1750 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都是不恰当的,这里所说的今天,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如波浪一般不断向我们涌来和把我们席卷而走的新岁月。

然而,价格史至今仍未能制造出自己的工具。它尽量使自己去适应从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借来的工具。由此势必就大费周折,接二连三地有所调整和反悔,就方法论问题反复推敲,精益求精,似乎每一位学者都相信只有一种方法——自己的方法——才是有效的方法,并且以自己的名义和“以科学的名义”,把前人和对立面的研究成果一概忘却或摒弃。这就是所谓价格史的困难,即人为制造的、非现实的困难。对价格史的先驱者,如格奥尔格·维贝、弗朗索瓦·西米昂、弗朗西斯克·布亚克、贝弗里奇爵士、威廉·阿贝尔、伊尔·汉密尔顿、厄内斯特·拉布鲁斯等人的大名,人们或者故意不提,或者肆意批评,总之,很少予以重视。人们不记得,没有这些先驱,物价史就无从谈起;更何况,尽管他们的研究及破旧立新的解释尚存争议,但在他们之后,价格史却基本上再也没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进步。价格史满足于在某些细节问题上验证已知的或事先可以预见的真理,在推理的无底洞里越陷越深,最终顺从极其荒唐的思辨马尔萨斯主义。昨天,我们曾见到,有人竟为农业年度和纪年年度争得不可开交,朱泽培·帕朗蒂通过两根曲线解除了疑难,使争论

终告结束⁵。我们还注意到巴雷尔和默弗雷之间的纠纷,两人的争论随后平静了下来,但每个第三者都自以为有义务站出来评三道四,重开争端,以至直到现在,还没有达成合理的一致意见。在最近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历史科学国际代表大会上(1960年8月),继伊尔·汉密尔顿的报告之后,会场气氛竟像死一般沉闷。不久前,我们饶有兴味地读到了一位法国青年历史学家的文章⁶,文章的论证充实有力,但一看脚注,我们不禁大吃一惊。据他认为,前人的研究成果几乎不值一提。其中的一位前辈只是绘制了名义价格的几根曲线:说得多么轻松!其他前辈把名义价格折算成白银,但白银的官价竟是错误百出!纳塔利·德威伊⁷的比价表应予废止!取5年的平均数吗?这些平均数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百年周期。至于“间周期”,这又怎么能让人相信?采用年度平均数,即取当年某一个月的数字,这难道是个好办法?归根到底一句话,唯独作者使用的方法才是好方法:季度平均数和活动中位数,由此得出的全部数据照例根据纳塔利·德威伊的比价表折合成白银,尽管作者不顾其他作者的普遍采用,对比价表再三提出批评。平心而论,一位经济史学家说得对,取5年平均数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它最少节外生枝,便于观察百年趋势的运动。

至于我们,我们以为这些争论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和最初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唯一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准确地在往日物质生活复杂现实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而这个轮廓又通过众多的客观数字,以见证的身份,衡量选定的某个局部现实。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的也正是第一个困难。对历史学家来讲,要学会使用不常用的经济学语汇,借以充当简便易用的工具,委实很不容易。如果真有分歧,自然应该小心求证和以

理服人,但还必须进一步跨过这条界线,争论才有意义,价格史本身也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必须重新抓住历史整体,而作为出发点的局部历史现实,原则上都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历史整体和重新回到历史整体。

这正是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得出的研究结论:重新回到历史整体。一条价格曲线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我们却不是为它而勾勒的:它只是作为认识的工具,作为重新回到具体的工具,才有其价值。价格史势必要归附通史,它归根到底只是通史的附庸,否则,它就不再存在。有谁会否认这一点呢?研究任何特殊问题都应向中心问题汇总。出于对科学的好奇心,我们历史学家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但我们必定要远离现时,借用社会学或经济学的问题和概念,考察和再现生活的人文景观。我们必须重起炉灶,不论冒什么风险,一切后果都由我们承担。

为了从事这项工作,为了重返现实,是否有一条好曲线或一种好方法可供我们使用呢?如果有的话,岂不妙极了。本文的两位作者分别向两位对经济学颇感兴趣的数学家求教,一位在英国⁸,另一位在法国⁹,希望他们对有关“好”方法的争论作出裁决。他们用几乎相同的话,立即回答说,没有任何好方法。任何曲线都是好的,都能提供一个好的或比较好的答案。你们不妨都拿来试一试,再自己作出判断!在他们的这番鼓励下,我们就一个特定事例进行了试验(承蒙他们的指点)。本文作者之一与吕杰罗·罗马诺和乌戈·图奇一起对乌迪内价格的长系列作了考察¹⁰,这一长系列适宜作各种计算,因为它提供连续 212 年间同一市场上多种粮食的每周价格。通过用不同方法进行的各种试验,看来每次试验都突出地展示出现实的一个不同方面。

因此,既不要排斥,又不要偏爱,我们决定选择最能使我们

得以从已知的长系列出发,开展这项特殊工作的方法,我们的工作之所以特殊,因为从格奥尔格·维贝以来,任何一位价格史学家都没有(也许主要是怕受批判)试图比较各种不同的曲线,以便抓住欧洲价格实在的整体。由于接受了一个如此广阔的活动天地,我们要做的事变得相当复杂。特别是不仅有单数的欧洲,而且有复数的欧洲。把欧洲看作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个整体,这就停留于一个壮观的、往往是最宏伟的场景,但同时却忽略了其他的场景。然而,历史学家却想包罗万象,想把一切都汇集起来,然后再分门别类,进行重新构架,不断在分析和综合之间反复周旋。这两种运动既互相补充,互相排斥,又互相更替。

显然,很早以前,经济史学家已在所谓分工的名义下指出了欧洲地域的经济布局,这种分工也就是对众多事物带有强制性的共同生活。在1400年的欧洲,地区分布肯定不完全遵循冯·屠能的模式。然而,在11、12、13和14世纪那时,尽管“工业”一词尚未问世,但巨大的“工业”区以及市场的某种一般布局,却在欧洲依稀可见。一种秩序正在孕育之中。

威尼斯商业联系网的扩展(见图示3,商船的航运),意大利工商业城市居高临下的地位,最后还有西北欧呢绒区(尼德兰、法国北部和英格兰)的兴旺、位移和短暂滑坡,都能为我们提供见证。根据埃克托尔·埃曼的地图,这些集中,这些长时段的特权,肯定都意味着存在一个欧洲整体以及促使整体形成的力量。确实,这正是J. A. 旺胡特提出的大问题¹¹;他当时问道:在15世纪,布鲁日究竟是不是一个国际商埠?安特卫普到16世纪则肯定是国际商埠了。换句话说,在过了一个世纪以后,欧洲的整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巩固,随后将不断加强,以至在18世纪变得更加茁壮坚实。

因此,人们首先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从伦敦到伊斯坦布尔,从莫斯科到里斯本,欧洲的价格似乎听从一根指挥棒的指挥。但我们接着将看到,乐队指挥并不始终遵循既定的乐谱,往往心血来潮地随意发挥,他所指挥的音乐家们也同样不守纪律。总之,如果说是音乐,这里的音乐处处充满了别出心裁。用经济学家极而言之的话来说,在 1450 至 1750 年期间,欧洲简直是个很不和谐的乐队。经济协奏中总是夹着杂音。威尼斯于 15 世纪推行的秩序,除阿尔卑斯的陆路大宗运输外,还有灵活多样、往返繁忙的海运经济,而 15 世纪的布鲁日则可算是海运业的另一集散中心。这种光彩夺目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对而言已具现代的特征,但规模毕竟有限(它在各海洋和各大陆的影响并不完全均衡)。

为此,我们不宜仅仅搜罗有关大宗贸易和奢侈品贸易的数据:在 12 世纪中叶远属东西地中海地区的北方呢绒;由威尼斯商船外运艾格莫特、英格兰或布鲁日等地的香料;小麦的国际大宗贸易。因为还有另一个不甚明朗但仍然活跃的现实:即一些地区处于停滞、落后和拖后腿的状态,货币经济尚未深入其中;货币经济一有机会闯了进去,就把这些地区的旧秩序打得落花流水(我们这里想到波兰,大批小麦出口使当地物价飞涨,导致货币急剧贬值)。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巴黎附近的博韦地区,物物交换在 17 世纪仍十分活跃,金币和银币被视为富人之禁脔,穷人拥有的“黑币”也为数不多。这是小城镇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那里几乎见不到金属货币,也听不到它们丁丁当当的响声。欧洲的许多地区都属于这种情形。

正因为如此(还由于其他几个原因),我们特意绘制了几张图表加以说明,这些图表展示的地区价格差别,为我们认识欧洲

经济的整体性指引了方向,但在这里,障碍和便利却同时并存。具体地说,所谓整体性难道不正是依靠劳动力价格的地区级差所培育的吗?归根到底,但泽或巴尔干半岛出口的小麦,中欧或新大陆生产的白银,巴西冲积层的黄金(1630年后),实际上都是投入到国际市场上去的人力劳动,最穷最苦的一批人的劳动。

可以肯定,我们面对的这些困难、矛盾和问题不可能全都得到解决。借用恩斯特·瓦杰曼的一个比喻¹²,价格(许多数字中的一个数字)像是一名私家侦探。我们往往把所要知道的事情托他出门打探。但只是在侦探小说里,打探的曲折经过才能最后说清。实际生活从来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因而至少将反复四次,试图弄清扑朔迷离的事实真相,而我们对其中争执不休的疑点,则几乎永远不能澄清。

迈出的第一步就要小心:必须先对货币——货币以及货币金属——进行一番调查。可充货币的金属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或者如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快言快语所说的,是无足轻重的“表面现象”?

第二步是要勘测百年周期运动,接受它们的现实,尽管经济学家对此尚存争议和保留,至少也要承认这是简便易行的解释框架。百年趋势的时间怎样流逝?它们怎样影响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又怎样随不同的地区经济而有所变异?这就立即涉及到一种“长时段”¹³的历史,即一种注重规律和结构超过关心偶然和态势(不论长期或短期)的历史。

第三项任务是要调查趋势的短暂变异以及这些变异持续的时间,五花八门的名称和显而易见的经历。这里使用的语言往往使人误以为与传统的历史十分接近。

在作了尽可能深入的抽样调查以后,我们就具备了足以计

算数据和分析事实的素材(图示 35)。走到这一步,我们总得作一个结论。也就是说,重新考察原来的依据、问题、假设、曲线和计算,但终究因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深感遗憾。

一、货币、货币金属及汇兑

货币系统为价格充当框架和表现形式,脱离开货币系统,人们自然无从理解价格。没有货币,也就没有价格。马莱斯特罗瓦先生于 1567 年曾经写道,货币是“由少数内行人操纵的勾当”¹⁴。直到今天,对于货币在价格形成和经济演变中所占的地位,人们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昨天,还有大量的经济生活往往脱离货币的控制。关于这些重大题材,考虑到历史资料之丰富和议论范围之宽广,似乎很有必要长篇大论地作一番介绍。下面只是勉强提供一个梗概。

我们首先要回到业已被讨论过千百遍的计算货币问题上来。内行的读者很可能会觉得我们的介绍过于简单,那也只能如此。这并非因为问题本身实在复杂,而是因为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发挥想象力。计算货币今天在经济和会计事务中存在,涉及的技术复杂而又含蓄,不是专家休想弄懂。而在我们所要考察的那个时代,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假想的”货币相反却是欧洲各地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种普遍性和必然性势必让局外人不能立即明白其中的奥妙。

普遍性:只用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所有的价格,所有的帐册,即使是最简略的帐目,所有的契约,都采用一种并不由

金属货币体现的,但在流通中充当价值尺度的货币,充当计算单位。每个国家各有自己的货币及其辅币:在法国,图尔里佛价值20苏,一苏等于12德尼埃;在英国,一英镑等于20先令,一先令等于12便士;在德国,一马克或一芬特等于20先令,一先令等于12芬尼……任何帐目当时均根据计算货币登录,再折合成实际货币付款。举例说,我欠下65图尔里佛的债。如果我用退斯通银币还债,而退斯通在1574年的某一天价值13苏,我就得支付100退斯通。

为什么要用这个在我们看来十分复杂的中间媒介呢?无非因为这个中间媒介显然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弥补货币体系的不足,使它成为结构严紧的一个整体。一块丁当作响的金属货币代表若干克金或银,它是价格可变的一种商品,正如所有的商品一样。各国政府从来都想拥有一种与计算货币等价的实在货币(计算货币原本就是一种实在货币)。但是,由于贵金属价格的波动,必须不断调整这些货币的重量,使它们能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事实上,辅币的调整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主币的调整也屡见不鲜,新铸造的货币往往比原先的货币分量更轻,如此等等。结果是很早就出现了重量、成色、铸像各不相同的多种货币同时流通的现象,再加上使用磨损,偷工减料(这就往往要求重称),以及五花八门的外国劣币大量流入本国,使得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经过从“假想”到“实在”的过渡,怎么可能用实在的货币算帐?

下面就举威尼斯共和国1551年9月24日的一份公告为例:公告列举了可在威尼斯流通的外国金币的名单,展示了21种金币的复制样品,供公众认证,又规定这些金币折合成计算货

币威尼斯里拉的市价。每当必要时,由威尼斯造币厂铸造的“实在”货币的市价也一并确定。因此,一切都井然有序;一名威尼斯人如要清偿 1 万里拉的债务,他可参照最后一份比价表,使用表上列举的威尼斯或外国货币中的任何一种。简单地说,就像我们今天突然要用金币偿付 10 万新法郎一样,我们必须要把总数除以交易所发布的“拿破仑金币”的最新市价,以便确定所要支付的金币数目。在这个场合,我们的钞票或许也悄悄地起着计算货币的昨天的作用;钞票是由国家银行担保的、可供交换和积蓄的一张纸(实行强制流通),这个事实又赋予它真实的、完整的乃至带有欺骗性的货币特征。

价值尺度也罢,价格标准也罢,计算货币均可用于确定物价水平,便于连续记帐:它必定使国与国的汇兑交易结成一环扣一环的连环套,结果连自己也被套了进去。作为金币、银币、含银铜币或普通铜币的计量单位,它不断追随这些铸币的实际价值,参与它们的价格运动。在日常生活的低级水平上,我们已经说过,小额钱币(即“黑币”)不断与计算货币(及其多种辅币)进行对话。例如在米兰¹⁵,不但“泰令”和“塞西尼”(面值极低,含银量极少)的发行数量毫无节制,而且其成色和重量也每况愈下,但无论如何,前者的价值却始终等于作为米兰计算货币的“帝国里拉”的 $1/80$,后者等于帝国里拉的 $1/40$ 。

计算货币其实不断由这些小额钱币所体现,小额钱币潜在的和反复的贬值因而把计算货币拖进了一场算术游戏中去。帝国里拉的贬值势必形成对高值金银铸币的冲击,正是由于这些“内部汇兑”,金银铸币不断在升值……通过这个例子,读者可以联想到,在德意志,面额为一芬尼的铜币始终等于计算货币马克的 $1/240$ 。

类似的情形也在土耳其帝国发生。阿斯普尔是一种含银量甚少的小铜币,它在土耳其充当计算货币。从1584—1586年起,阿斯普尔经常贬值,这不但危及所有货币的流通和价值,而且还有损奥斯曼大公的盛名,威胁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各地的社会安定;这些地区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社会动乱纷起,奥梅尔·吕特菲·巴尔康对这段历史作了详尽的记述。

同样的情形在莫斯科公国也可见到。我们且简单谈一谈卢布的历史。卢布原是一种实在货币。在15世纪,随着银质辅币戈比和半戈比的出现,卢布便沦落为价值100戈比或200半戈比的计算货币。1656至1663年间,莫斯科公国铜币充斥,铜质戈比取代了银质戈比,卢布随之迅速贬值。彼得大帝于1701年和1704年先后下令开铸银质半卢布和银质卢布。计算货币由此又重新变成实在货币,但币值并不固定,因为新货币的币值直到1762年才稳定了下来¹⁶。

货币的这些计算方法并不纯属算术问题,因为它们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究竟想得到什么?它们其实希望确定所有货币的价值,无论是实在货币或者计算货币,是主币或者辅币,但采用的每种衡量尺度都对整体产生影响……通过这些换算,政府往往自欺欺人地以为占了便宜。在结束以上的简短叙述前,我们且举一个典型的例子:1577年,法国正值“古典主义”时期,国王诏令全体臣民,不再用图尔里佛,而改用“金埃居”充当计算货币,这些又称“足赤金埃居”的实在货币价值3图尔里佛或60苏。这项把计算货币与埃居(也与黄金)挂钩的措施原则上将延续到1602年。但是,宗教战争一爆发,平衡立即被打破。埃居的“非官价”猛烈上升,超过了60苏,与此同时,物价也跟着飞涨。在局势平稳后,国王颁发了1602年的

新敕令,恢复图尔里佛作为计算货币的地位,同时又接受每金埃居 65 苏的市价换算,这一兑换牌价后来自然再次被突破……风波虽已过去,但惯例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在钱币兑换所,人们根据老习惯,照例按 3 里佛(即 60 苏)为一埃居的比价把埃居当作兑换法国货币的计算单位。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实在货币(继续通用)向计算货币转化的过程(让我们再说一遍,所有的计算货币最初都要经历这一过程)。还是在 15 世纪,威尼斯“杜加”自从其币值于 1472 年 3 月确定为 6 里拉 4 苏迪以后,就成了威尼斯的主要计算货币,而与其同名的实在货币色庚则继续通用;此外,在 16 世纪,西班牙“杜加”的币值确定为 375 马拉维迪,同样也就成为一种计算货币。

通过以上的简要说明,读者如果没有乱了思路,想必早已猜到,计算货币的贬值,或者说实在货币的升值,是本文所要考察的几世纪中有关货币和价格的所有问题的核心。物价动荡几乎始终伴随着计算货币的币值升降,后者究竟是前者的原因,成者是后果?

图示 4 恰好展示出 1440 至 1760 年间各大计算货币逐年贬值的曲线,我们由此一眼就能注意到白银数量(计算货币的金属等价物)的逐年减少。我们也完全可以用金或用铜充当这种具有“物质价值”的等价物。我们之所以从一开始就选中白银,这一方面因为有关白银的基础数据比较完整;另一方面还因为,在我们看来,白银在经济生活中比黄金流通更广和更活跃。在这几百年期间,银是相当公正的法官。这话才刚说完,我们立即又感到后悔:无论让·巴蒂斯特·萨伊(1818 年)所说的小麦,约翰奈斯·法尔克(1869 年)的黑麦,埃尔曼·格罗特(1864 年)的最低工资,或者是金银,老实说都算不上是不偏不倚的法官。必须增

加更多的法官,例如价格曲线,同时又不偏信任何一方……

这张草图向我们提供内容十分丰富的信息,如果想要通过这些信息进一步弄清每一种计算货币的身世和经历,我们就得在图表面前停留很长时间。当然,我们只是要了解一个概况。总的特点是,贬值早在1440年以前已经开始,持续不断地延伸到1750年以后,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又在新的名义下延续至今。不论愿意与否,每一种货币势必经历这一多样的、反复的运动,而且迟早都要寿终正寝。如果把1642年前的马拉维迪、1601年后的英镑(虽然几经波折,英镑在这些货币中仍是含银量最高和最坚挺的货币)和那不勒斯的卡利诺(如果有关资料是正确的,但我们对此并无把握¹⁷)撇开不算,计算货币的币值不断在下跌,有时跌势猛烈,有时缓缓下降,就像一条江河的水流一样。任何货币终究都逃脱不了币值下降的命运。在本文考察的300年期间,英镑对白银的比价仅损失43.42%(成绩优异);图尔里佛损失82.68%;热那亚里佛72.96%;波兰格罗兹90.1%,荷兰古尔登68.74%。到了1750年,从欧洲地图上看,历年积累的货币贬值在波兰、土耳其和法国这三大政治实体中显得特别严重。就法国而言,经过1726年的整顿,图尔里佛的币值勉强得以稳定,但价位定得很低,这是约翰·劳币制改革失败后不久的事。

从这些曲线出发对有关的货币进行分类无疑是可能的,甚至是有益的。在前面提到的图表(图示4)上,大家一定已经注意到,每种货币都附有实际含银量,而且这些含银量多种多样,各不相同。如果按含银量进行分类,这些货币可分为“重币”(实际上,只有英镑一例)、“中币”和“轻币”三类。同类货币是否具有共同的命运¹⁸?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必须提出:这些阶梯状的、或急或缓的币值下跌是必然的还是人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再说,在经济生活中,特别在我们研究的价格运动中,货币贬值究竟意味着什么?

“货币增值”当然是指实在的货币;这意味着随着图尔里佛、马克或其他计算货币贬值而从四面八方吸引来的各种外国铸币相应增值。长期以来,相当多的货币作为贮藏手段被留置不用,这个障碍一旦被破除,货币流通顿时变得活跃起来。我们知道,早在 16 世纪欧洲经济起飞和货币泛滥以前,“外来”货币的入侵(通常是劣币)已经屡见不鲜;远在托马斯·格雷欣爵士(1519—1579)发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以前,劣币已在计算货币反复贬值的召唤或指引下,横行全欧各地。

事实上,无论从短期看或从长期看,随着计算货币的变轻,价格水平必定作出反应。在这些传输过程中,人们无疑经常能观察到某些显而易见的惰性或重大的迟缓。我们不妨可以说,虽然任何一次贬值必定由汇兑牌价立即作出准确的记录,但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却并不明显。F. J. 费舍的一篇重要文章告诉我们,1522—1526 年至 1555 年期间英国接连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¹⁹。英镑的急剧贬值,立即在安特卫普的汇兑市场激起反响。英国呢绒在这个主要集散地因此降价(1553 年的最高交易额达 13.3 万匹)。英国国内的物价却在上涨,但速度不快;相对而言,国内落在国外的后面……百姓对物价上涨纷纷抗议,亨利八世政府眼看王国的外债迅速膨胀,终于被迫采取了坚定的补救措施。

由此可见,计算货币的比价调整(下调)要通过价格予以确认,但在短期内,这种确认往往并不全面。更何况,确认的方式

又随有关货币的金属而各不相同。确实,涨价有时涉及金币,有时涉及银币,有时二者的币值同时上涨。我们在观察乌迪内长曲线时所见到的情形,难道是错的吗?在唯独金币坚挺的情况下,物价轮番上涨的趋势在短期内似乎反而受到了扼制。威尼斯(乌迪内系威尼斯的属地)之所以提高黄金价格,这是因为当局希望吸引黄金和金币流入国内。相反,它必定将出让部分银币:一手取金,一手交银。脱手的这部分白银在短期内似乎正好扼制名义价格的上升,这就再次表明白银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白银充斥,物价就上升;白银紧缺,物价也就下降。让我们再说一遍,这是在短期内出现的实际情形。但从长期看,计算货币价格的任何扭曲都与价格运动融合为一体,并被价格运动所淹没。

进一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物价对币值上升的反作用变得更加明显。毫无疑问,为使价格和货币之间建立这种作用和反作用关系,必须具备足够数量的通货和达到相当的流通水平²⁰;如果没有蓄水,开闸放水纯属徒劳。总之,币值上升始终意味着对黄金或白银有新的需求。大家知道,没有供给,需求也就无所作为。必须使供给能适应和迎合需求,而供给却姗姗来迟:直到16世纪初,西方似乎仍处于货币供不应求的状态。

价格史因而是十分复杂的历史,很难弄清价格的实际状况以及价格运动的来龙去脉。为简便起见,我们想采用图解方法,对当时价格水平作初步的定位。这个想法是否可行,确实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图解本身并非无可争议。就以1450—1474年为基数(100),再加上不同的曲线指数,我们就能画出欧洲各种货币平均值(折合成贵金属)的下降曲线。当然,为使这条曲线准确无误,我们本应参照有关各国经济的规模,作出必要的调整。但

限于我们现有的认识程度,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所画的曲线因而仅具参考价值,但它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重视。我们同时计算了货币的含银量和含金量(以克为计算单位),因而把两条曲线颠倒过来,我们就能得出欧洲银币和金币对计算货币比价的平均涨幅。黄金和白银的重要地位从此就确定了下来。我们千万不要继他人之后,蒙受黄金和白银的迷惑,但也不应低估它们的作用。

由此画出的这两条曲线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们体现了长期趋势的体现。我们没有以年度为单位,而以 10 年的平均数为单位,绘制了曲线图表,这就可以把金银的价格曲线与其他的价格曲线重迭起来,特别是与小麦的价格曲线重迭起来,后者也以 10 年的平均数作计算单位。

金银的价格曲线相当奇特,并非因为我们的计算不尽完善(远不是最好的),而是因为两种贵金属的价格似乎对曲线的走向显得无足轻重。确切地说,从长期看,它们沿着一个几乎固定的坡度向上攀升,有时出现减速的阶梯,但除开两次细小的例外,从没有出现过倒退。总之,它们绝不下降。在整个历史时期中,金银价格不断在攀升,这一现象恐怕与货币体系本身是分不开的。卡塞尔、沃依廷斯基、基钦、瓦伦、皮尔逊、韦尔科兴、里斯特、马若林等经济学家都费尽心计,想方设法要解决这个无从解决的难题。金银的需求从不停顿。根据对 19 世纪中叶所作的一项计算,仅仅为使物价保持同等水平,贵金属存量至少要以每年 3% 的速度持续增长(这里指的是 19 世纪下半叶)。否则,物价势必下跌。换句话说,即使在滞胀时期,始终存在着对贵金属的正常需求和消费,而通货膨胀只能极大地增加这种需求。

我们可以认为,铸币的这些价格仿佛沿着一系列直线逐级

上升,它们究竟领先于还是落后于其他价格反复无常的运动?直到本文结束,关于铸币价格上升平缓,而一般商品的价格上下起伏的幅度很大的问题,仍将得不到解决。除非对贵金属和铸币在当时经济中的具体作用有了确切的认识,人们是不可能和不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自称有这样的把握,我们却不敢有任何奢望。

众所周知,我们考察的两种贵金属并不在同一条跑道上前进,互相竞争的程度也超过人们的一般想象²¹。无论在实际生活中或在人们的思想里,始终都要把两大类作出区分。总的说来,在1550年前后,黄金总量比较充裕;到16世纪中叶后,白银数量成倍增加,黄金的相对数量就显得少了一些。这种差距后来越拉越大,银对金的比价逐渐下降,直到17世纪中叶为止。在这以后,两种金属差不多并驾齐驱。

人们不难想到,金银比价的消长,加上铸币和一般商品的比价消长,又使整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6世纪那时的“经济学家”一口咬定说,为了保持正常的经济秩序,必须遵守金银之间1:12的“天然”比价(1克纯金等于12克纯银)。直到17世纪,人们终于恍然大悟,所谓“天然”比价其实也不可靠。

我们以上介绍了金银平均价格的两条曲线,从这两条曲线出发,我们进一步绘制了金银比价演变的曲线(见图示5)。1610—1620年间(即所谓“黄金转折”的时期),黄金升值趋势明显加快,金银比价终于超过1:12的大关。乍眼看来,金价上涨的原因是美洲白银的大规模生产(“现代化”开采,或不如说,“工业化开采”),而黄金生产当时仍停留于小手工业生产的阶段。这个常被引用的理由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两种金属的流通速度

在这里也应起一定的作用。金币的流通速度是否比银币多少快一点？考虑到储藏的因素，人们宁愿回答说，黄金的流通反而慢。随着铸币流通的加速，金银流通速度的这种差异在 16 世纪变得更加突出，由此产生的影响也日益增大²²。到了 16 世纪中叶，正如弗朗克·斯普纳所指出的，欧洲货币无疑开始向金本位制过渡，黄金的供应量不如白银充裕，这一趋势随后将继续保持下去。

如果以上的一般性论述具有一定的价值，尽管不能充当最后的结论，我们绘制的曲线（虽然有待完善）就可能为我们提供某些信息。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顺便能够发现，金银比价的行市变动很小，但总在不断变动。如果把这些零星的数字收集起来，并把它们同平均数曲线进行比较，人们就能根据这些数字与控制线相对的高低位置，赋予它们一定的含义。人们立刻懂得，这些价格波动不断在打乱欧洲的货币格局。例如，1555 年，接受查理五世政府咨询的西班牙“货币专家”指出了黄金和白银的双向运动：白银不断从西班牙向法国外流，黄金则反其道而行之。或者，正如菲力浦·吕兹向我们揭示的，西班牙通过宽阔的汇兑网，定期向尼德兰寄送汇票，以便在当地用黄金发放部队的军饷。仅仅这项需要——当然还有别的需要——就能说明西班牙白银外流的原因。人们还注意到，让·德吕莫收集到的有关 16 世纪罗马的数字²³表明，当时的罗马在币值方面并不完全与西方同步；而安德森为拉古萨提供的数字²⁴则表明，16 世纪那时的拉古萨不断在西方（白银在西方日益充裕）和东方（通过埃及的中间媒介，土耳其受非洲黄金的控制，开罗造币所负责把非洲黄金铸成名为“苏塔南”的金币）之间左右摇摆。

三言两语谈汇兑

我们至此故意把信用货币和签字票据等纸币搁置一边。这种虚假的、但又以成千上万种形式流通着的货币逐渐侵入欧洲和经济生活,15世纪时只是偷偷摸摸,16世纪时还小心翼翼,到17世纪就已经咄咄逼人,而在18世纪则摇身一变,公然成为黄金和白银的必备替身,扮演大人物的角色。

纸币的数量不断在增多,而金属货币却因贵金属产量相对低下而受到限制,人们不可能再把纸币视为金属货币的必要助手。

任何性质的纸币都是计算货币的翻版。最早出现的银行券无非是计算货币的物质体现,设置银行券准备金只是控制通货总量与价格相对稳定的金属不相脱钩的预防措施。其他各种票证,如西班牙的“公债券”(juros)、意大利城邦的“公债券”(giuri和 monti)、法国巴黎市政厅年金、安特卫普城市年金、英国的国库券等国家有息证券,且不说以“借据”²⁵形式投入流通的契约或最普通意义上的私人年金,都是部分地独立于货币总量的交换手段,但它们仍不免受到币值动荡的冲击,特别是计算货币。请看有产者在借贷契约中竟是何等的小心谨慎²⁶:他们在银行存款,即便是在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²⁷,都备有两份存折,一份按金币记帐,一份按银币记帐,从1625年起,甚至还有按西班牙“本洋”(币值8里亚尔)记帐的第三份存折,西班牙“本洋”在16—18世纪曾是欧洲乃至世界(从美洲到中国)的标准货币。难道所有这些票证都是货币吗?当然是的。透过热那亚银行家向西班牙皇室贷款的契约(这是极其珍贵的资料)²⁸,人们可以

看到,热那亚银行家在一手买进一手卖出的过程中,做成了一笔收益颇丰的交易,国王把这些契约交给热那亚银行家,充当借款的“担保”凭证,“契约债券”便由此得名。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问题。更何况,葡萄牙人伊萨克·德·品托后来又为我们提供了见证²⁹。1764年,当时欧洲正值战争,各国纷纷举债,品托写道:“列强的借据竟是凭信用额外增加的一笔通货,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笔额外增加的信用货币同时具有真实的和人为的价值,只要信用得以保持,它们就能继续流通,并且部分地履行实在货币的职能,尽管这是虚妄的和不可能符合现实的。”

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些既重要又复杂的流通过程,票证的流通牵动着物价、息率、财富以及经济的各个方面。但我们可以举汇票为例,这是我们在这部欧洲历史中必须弄清了几项重大关系的首要问题。

然而,应该说明,这里并不是要再次展示汇兑的复杂运作,也不是要道出它的奥秘:汇票集普通借贷和高利贷于一身。使用汇票只是利用货币之间的差价谋取合法利润(当然是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的一种手段,但通过一种巧妙的手段,它又掩盖着不合法的有息借贷。利用机遇不等于人为地制造机遇。汇兑活动的实质恰恰在于几种计算货币之间的比价差异,无论在昨天或在今天,这种差异又通过汇兑进一步分出几种不同货币和几种不同经济的优劣。汇兑的实质在于汇率本身,而人们偏偏对汇率研究得最少;罗列以下的这些数字,或许能有助于我们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汇兑问题分析清楚。

为简略起见,且举一个众所周知的实例:1609至1750年间的阿姆斯特丹汇兑市场。我们的分析将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绘制一系列地图(图示7),展现几大商埠在阿姆

斯特丹的汇兑行市。第一张地图把 1609 年弗罗林(荷兰的计算货币)的基本指数确定为 100。其他三张地图分别显示 1640—1649、1700—1709 和 1740—1749 这三个 10 年期的平均数;依靠这三根标尺,人们可以发现,外国货币对弗罗林的比价随时间而变³⁰。外国货币在阿姆斯特丹的比价当然取决于这种货币的固有价值。否则岂不使人觉得奇怪。确实,每当固有价值一减少,汇兑行市立即就记录在案:例如巴黎或里斯本的情形就很明显。人们因此可以认为,在原则上,货币的汇率曲线与它的固有价值曲线相近似。甚至可以预见,当两条曲线碰巧不相重合时,应该是汇率曲线更加可靠,因为汇率曲线随市场实际行市而转移,而不取决于政府确定的官价。在多数情况下,汇率曲线可根据需要,验证和修正币值下跌的曲线。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隔一会在分析一个实例时还会谈到。

这里,我们先就两条曲线的重合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且看第二张曲线图(图示 8)。该图仅涉及但泽对阿姆斯特丹的汇兑,即由但泽的格罗兹(当地的计算货币,1663 年前也是波兰的计算货币)转换为弗罗林及其角币。在这张曲线图上,弗罗林以三种形式充当比较单位,因而直线 100 实际上代表着三条线:以计算货币出现的弗罗林;折合成白银的弗罗林;折合成黄金的弗罗林。格罗兹由三条曲线作代表,每条曲线分别记录格罗兹与弗罗林的相对价值:1)以计算货币计算;2)折合成黄金;3)折合成白银。比较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1620 年的猛烈贬值牵动格罗兹在阿姆斯特丹市场的兑换值,连同格罗兹在但泽折合成黄金和白银计算的价值一起猛跌,在这以后,局势恢复正常,曲线缓慢地呈小坡度下降。可见,汇兑曲线与金银价值曲线有着密切的联系(用经济学家的说法,汇率水平位于黄金价值和白银

价值之间),但明显地偏向于随白银曲线而波动起伏。

我们还可以就另一种货币和另一个汇兑市场再次进行验证。我们不妨留在阿姆斯特丹的汇兑市场,巴黎或伦敦的曲线(后者偏向于随黄金曲线运动)提供的答案也同样简单。威尼斯的曲线值得我们注意:城市的全部汇兑活动必须通过银行进行,并收取高额的手续费(20%),威尼斯借此人为地把当地货币(里拉)的国际汇率水平保持在其实际价值(折合成金银计算)之上³¹。

现在,我们就可以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经过以上的解释,尽管十分仓促,我们想事情将会变得十分清楚的了。这个例子关系到 16 世纪的最后 10 年,当时法国正值危机深重的非常时期,危机同时影响到物价和货币。关于价格,我们掌握的几条曲线表明,当时物价飞涨。铸币又如何呢?我们已经说过,国王先后于 1577 年和 1602 年颁发了两份诏书,在此期间,埃居(埃居当时已取代图尔里佛,充当了计算货币)始终停留在 60 苏的价位不变,换句话说,计算货币——埃居也罢,图尔里佛也罢——保住了自己的固有价值。然而,只要看一看 1587 年后价格飞涨时的名义价格曲线,就可以相信,事情完全不是如此。物价的猛烈上涨不可能与银价和金价的涨幅相脱节,金和银毕竟也是商品。实际上,从 1587 年起,在自由市场上,铸币金埃居便与作为计算货币的埃居相脱钩;一块金埃居在围城时期的巴黎可换 65 苏乃至 70 苏和 80 苏,在胡格诺战争期间的艾克斯昂普罗旺斯,最高可换 100 苏。这种不正常的混乱状况很快平息了下来。埃居又回落到 65 苏乃至 63 苏和 64 苏,1602 年诏书在确定贬值率前所作的调查可充见证。以上是法国本土不同地点随动乱程度而产生的市场变动,但在实际上,整个国家都

受到了影响。

那么,在此期间,汇兑曲线又变得怎样了呢?这条曲线理所当然地记录了这一贬值趋势:商人在里昂接受一张可在法国兑付的汇票时,完全明白按计算货币在票面开列的埃居,将根据市价(不是官价)折算成真实的埃居付款。因此,他所接受的汇率必须与市场汇率相符合;埃居兑换价的下跌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意外。但下跌的幅度究竟有多大?且看弗朗克·斯普纳根据里昂交易会上对威尼斯、热那亚、塞维利亚和安特卫普的汇兑所绘制的曲线图³²。曲线表明埃居的价值约降低14%,这个数字比巴黎围城期间记录的30%和40%肯定要小。汇兑记录的数字反映全国的经济状况,而全国的情形显然不同于一个被围困的城市。但是,银价的上涨指数(14%或50%)是在食品的名义价格涨幅高达500%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为确切起见,如果根据汇兑指数去修正银价的涨幅,银价的上涨指数必定会减少,但减幅应在40%以下。银的最高价位仍原封不动,与许多其他国家同期的最高价位基本相同,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出现了像法国那样的政治动乱。

为以上的论证作个小结,我们再次要称赞计算货币。我们已经说过,计算货币既是不真实的,又是真实的,之所以真实,因为它以实在的金币和银币为后盾,正如金币和银币以各类物品为后盾一样。计算货币既不是简单的“障眼物”³³,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³⁴。它的存在不仅关系到价格或贵金属,而且也关系到欧洲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至于其中的因果关系,这并不重要。无论如何,计算货币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见证。

贬值与短期经济形势

称赞也罢,辩护也罢,我们都必须把理由讲清楚。然而,这里先要肯定,我们的说明具有局限性。

在本章的导论里,我们已叙述了货币系统以及计算货币。与某些历史学家相反,我们坚信这些系统和货币都曾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作出这些论断前,我们还必须推敲所使用的术语,尽量进行一切必要的验证和计算。货币究竟是不是决定性因素?对于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就必须作出几个在许多方面互为矛盾的回答。切莫忘记,计算货币、实在的铸币、价格、经济、社会结构、历史时代……这一切都是客观存在。因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把研究、探索和计算一气呵成,而是从事上百次的衡量和推测。

仅举一例,计算货币的贬值从不像我们最初所说的那么简单。伴随着计算货币的贬值,或者是金币升值,或者是银币升值,或者是两种铸币同时升值。由此产生的影响似乎各不相同。

每一国的经济,甚至每一种政治制度或货币系统,无疑都各有其独特的贬值方式,各有自己的习惯、薄弱环节或迫不得已的难处。我们在威尼斯遇到什么?当地的金币不断在小幅度涨价,这是为了吸引黄金:威尼斯堪称是铸造金币的一台机器,不断铸造新的色庚(zecchini)金币,改铸尚属完好的金币,并随即投入流通。如果大家对黄金反复升值的后果感兴趣,那就必须从长期经济形势或从短期形势的角度加以考察(关于长期经济形势的问题,我们已经谈到过,后面还会再谈)。

关于短期经济形势,我们不妨研究基奥贾或乌迪内的月度

价格曲线。假定这些曲线对黄金的小幅攀升相当敏感(不是极其敏感)。我们再次可以相信,提高金币价格,那就是吸引外国的金币,同时则驱逐和出让银币。正如我们今天所说,那也是让计算货币对黄金的比价下降。以上表过不谈,这里绘制的价格曲线表明,随着黄金的上百次小幅攀升,整个价格水平大体上取相同的走向:金币的每一次升值缓和物价的涨势,有时甚至戏剧般地制止物价轮番上涨。相反,金币币值下跌,银币价格的相对或绝对上升,则会加快物价的涨速。这已成为一条普遍的规律,根据观察,这条规律在其他地方比在威尼斯可得到更好的验证;相对而言,威尼斯很少从事白银交易。如果有人就此问题作一番考证,肯定会受到欢迎。与其论证货币贬值在长期经济形势下对价格运动的影响,人们将着重考证,根据贬值主要涉及金币或银币的不同情形,整个物价在短期经济形势下所作出的反应有什么不同。

二、百年趋势

我们现在该是研究价格本身的时候了。我们立即可以承认,形形色色的价格运动全都像汹涌澎湃的激流那样推波助澜;借弗朗索瓦·西米昂多次被人引用的形象说法,价格运动犹如海上的潮汐,激起和带动整个海浪运动。正如潮汐有涨潮、退潮、息潮一样,人们同样可以说,百年趋势有上升、下降和停顿三个阶段。为了观察这些价格运动,必须用较长的时间尺度去取代较短的尺度;这是观察长时段现实提出的要求;尺度问题在这里

必定起作用,而且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例如,位于亚德里亚海和威尼斯礁滩接壤处的小城市基奥贾,在 1500 至 1797 年期间,每天的帐目除登记向货栈出售的货物数量外,还记录十来种货物的售价。我们每天仅取一个平均价(或中间价),当天的价格波动暂且略去;我们再以周六的价格或以 6 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为准,一星期内的价格差异全都抹去;依此类推,我们获取 1 月、1 年、5 年、10 年、20 年乃至 50 年的平均价格。这里有 10 至 20 种不同的、但又类似的方法可供我们任选一种,以便抹去短暂的、较短的、较长的和很长的价格运动,只留下漫长的百年趋势。这正是 5 年平均法或 10 年平均法、不定期平均法、最小平方法、中间变数法……企图达到而始终不能达到的目标。除此以外,人们只能满足于在由众多虚点构成的曲线上放置一条用肉眼即可定位的棉纱线,从而辨认出价格运动的一般坡度。一位著名数学家而露微笑对我们说,无论如何,结果还是与最小平方法得出的平均数没有多大的差别,就数学而言,最小平方法是排除短运动的最复杂的计算方法……实际上,所有的方法都各有其优点,而各人又各有自己的主张,最简单的方法不一定是最不确切的方法。

方法问题就说到这里。但计算素材又是什么呢?或者同时采用所有的价格,算出总指数,在某些情况下,总指数的价值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么糟糕(伊尔·汉密尔顿曾就西班牙价格、N. W. 波斯图穆斯就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的价格,计算了总指数)。或者是先就几种主要价格单独进行仔细研究,然后再对次要价格进行分类研究。我们选择的是后一种,先让小麦作出最坚实的答复。我们的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趋势主要是小麦的价格趋势。随后列举的其他价格将与这位基本见证作比较,因为它最

可靠(有关小麦的数据也比任何其他产品多得多),此外还因为小麦是欧洲平民的主要支出。如果我们考察日本和中国,我们就会请稻米作主要见证。

读者将看到,我们在图表中大多使用按白银折算的10年平均数,即经过了修改的价格。这里有很多理由,正确的理由也罢,不太正确的理由也罢,但根本的原因是,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必定要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折算单位。一方面,我们要把价格折合成白银,以便从事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另一方面,我们要排斥那些与几乎所有长系列显示的价格断层相悖逆的中间变数或平均变数。与此同时,我们指出了这些方法和其他方法可能得出的结果,尽管我们认为这些方法有助于问题的说明。最后,我们始终援用原始的价格曲线,与其他数据相比,我们对原始数据情有独钟。不论面对什么困难,我们宁可想方设法去找出原始的数据,因为它们的误差最小。

只要人们记得这第一项运算的目的,我们的审慎和选择便不言自明:比较精确地确定价格百年运动在空间中的不同时间顺序。虽然百年运动业已在一系列具体实例中被认证,因而不能不认为它们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这些真理性是否适用于整个欧洲,却有待人们进行系统和认真的比较和研究。价格运动掀起了历史的波涛,导致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兴衰,保持了或打破了古老而强大的平衡。在整体演变过程中,这里或那里出现的畸变(落后或超前)始终具有发人深省的特殊价值:即使人们对产生这些畸变的原因不能完全解释清楚,指出这些畸变的存在仍然是重要的。透过百年趋势,人们能够对欧洲经济作出诊断。每一种价格就是一位证人,不同价格各有自己的证词。

麦

第一位应召出场作证的是麦。我们且听他的长篇证词,就像自古以来所有价格史学家一样。麦是 1750 年前欧洲经济的重要晴雨表和标准衡器:即使 18 世纪中叶的英国也还是以乡村为主。无处不在的麦提供的长串价格系列可充当我们衡量的依据,虽然在衡量时不免要冒很大的风险。这里所说的“麦”,无疑不单指“小麦”,大麦、燕麦等可制面包的其他谷物也都包括在内。在法国、西班牙等国,“麦”甚至通常以复数名词的形式出现(les bledz, los panes)。实际上,小麦往往与其他的“麦”相混杂,这些杂麦便以众多的名称在各地市场出售。根据不同的地区,欧洲人食用的面包有黑白之不同,食用面包的品质足以说明当地的许多问题。食用黑面包的地方几乎肯定是穷地方。1579 年,一位爱挑剔的威尼斯人在加利西亚的一家小旅店里好不容易找到了黑麦面包,这难道算是面包吗?波兰经由维斯图拉河在但泽和埃尔宾出口小麦,但农民却吃黑麦面和喝麦芽酒。甚至贵族在餐桌上也不总有白面包。据 18 世纪的一项统计,在得天独厚的但泽城,黑麦消费量等于小麦的四倍多。同期在马赛,为满足城市消费,面包商采购普罗旺斯平原和丘陵区生产的上等小麦,而农民却在出售当地小麦的同时,食用品质低下的“海运麦”,后者是由马赛大帆船从东地中海地区或柏柏尔地区运来的,粮价之外又加上往返的运输费用。最后,黑麦本身也在地区之间调剂余缺,北方地区除出口小麦外,还大量出口黑麦。

应该看到,在谷物价格的合奏中,小麦的价格毕竟以主旋律出现,尽管在百物昂贵的时期,谷物价格的上涨幅度比小麦价格

更大。让·默弗雷不久前说得对：“谷物的行情得视小麦的行情为准”，他的判断得到了巴黎食品市场价格曲线(1520—1698)的证实；我们且把这条曲线复制附后。皮埃尔·古贝尔在关于18世纪博韦地区的近著中说得更加肯定：“作为17世纪平民的主食，‘面粉’的价格在物价统计中足以充当经济大趋势最可靠的指标。”布阿吉尔贝尔于1695年已经指出：“麦价涨，百物昂”。直到18世纪，对法国平民来说，面包还是吃得很多，买面包的开支约占穷人(即绝大多数人)家庭开支的一半(厄内斯特·拉布鲁斯)。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麦价不仅主宰着市场行情，它还是经济形势和经济结构的体现，是让人每天感到“提心吊胆”的威胁。因此，人们就不会觉得奇怪，笨重而不便运输的小麦，居然应西方人口众多的富裕地区的要求，或根据军队后勤部门给予优先供应的命令，周游欧洲各地。为使笨重而宝贵的小麦起运，城市当局往往早已等得迫不及待，有时甚至向商人大声呼救(例如，在1591年意大利食品危机期间，向里斯本从事国际贸易的巨商希门尼斯求救)，而且货款都用金银支付。早在13世纪，威尼斯就用金条在法国的普利亚地区收购小麦。在16和17世纪，布列塔尼的破旧小木船曾把北方小麦运抵里斯本或塞维利亚，并经地方当局同意，带走白银或米纳金砂。

人们由此可以猜测到，麦价曲线该是多么的敏感和富有戏剧性，汉密尔顿就西班牙麦价记录的长曲线简直称得上是地震曲线。小麦贸易的特点无疑正是价格波动的极其猛烈，但要抓住深埋在欧洲物质生活底层的百年趋势，真正看清长时段运动的主流，我们却只能无视这个特点，缓和价格波动的猛烈程度。

步格奥尔格·维贝和威廉·阿贝尔之后尘，我们记下了若干

十年平均数,它们往往能使我们沿用已经作出的计算。经过试验,我们发现它们勉强能使我们摆脱 10 年内周期所记录的最大价格动荡。至于系列的选择,我们显然不得不选择很长的系列,这些系列为数不多。但它们足以为整个欧洲空间树立路标。小麦价格一律以百公升为单位,折算成若干克银。

这些线条汇集到图示 18,构成一束乍眼看来并不十分清晰的线网。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简化的制图法。我们先划一条线,把线束的高点连接起来,接着再把低点连接起来:两条线(顶线和底线)又围成一个“信封状口袋”或一条宽阔的河流(在上游处,两岸相距甚远,但到 18 世纪,两岸迅速靠近)。实际上,任何一条具体的曲线,在与这条宽阔的河流对照时,便显示出意义。人们甚至可以在图中调整一段曲线的位置,曲线的价值立即就清晰地显示出来。例如,由费尔南·布罗代尔好不容易绘制的威尼斯 1575—1602 年间的食品价格曲线,其位置正处在我们的图示的上限。这在危机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但事情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同样,菲·芒特利埃早先根据收集到的有关奥尔良的零星资料所绘制的曲线,安·曼科夫编制的有关莫斯科的系列数据,都可在我们的图象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项验证首先适用于我们第一张曲线图所记录的数据相对可靠的长系列。无论与上限线或下限线相对照,每一条曲线都以各自的方式曲折伸展;如同对待金银的价格曲线一样,我们只是把麦价曲线当作便于用肉眼定位的标识而已。面对图示,我们立即就能确有把握地指出,利沃夫的曲线始终与下限线相重合,至少直到 17 世纪中叶为止,其位置在很长期间低于波兰其他城市的曲线。我们还可以说,埃克塞特的曲线在沿着中线延伸了很长一段距离以后,突然于 1690 年与上限线会合:这是一

个重要的信号,熟知 1688 年“光荣的革命”后英国现实的历史学家对此不会感到惊奇。至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曲线,直到 17 世纪中叶为止,始终处于高于其他曲线的危险地位。所有这一切,我们随后将通过地图作进一步的说明。

当然,我们从此有了一个探测和监控工具,这个工具还可以通过耐心的计算加以完善,但就其现状而言,已能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初步的答复。其中的某些答复还是出人意料的。我们现在就把“美洲”麦的价格放置在我们的简图上。大家惊奇地看到,这些价格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具有竞争力,至少直到 1764 年大饥荒过后不久为止。难道要对美洲小麦运抵欧洲的条件再次进行分析,或要对价格系列进行重新审查?

我们的图表提出另一个问题:在 18 世纪初以后,两条线的明显靠拢表明,欧洲各地的价格开始趋向一致。如果小麦的见证具有普遍价值,——这是十分可能的——,那么,随着价格的拉平,商业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是否因此遇到阻碍?大家知道,只是由于价格水平的差异,商业资本主义才能生存和发展,而价格水平的差异又产生于经济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差异。能否认为,商业资本主义在利用这些水平差异的同时,又促使差异的填平补齐,并且随着一系列流通渠道的建立,损害自身的交易买卖,从而被迫另谋生财之道,甚至彻底改头换面?这样说也许有点过分,但在 1440—1449 年间,价格的差距竟是从 6 克(利沃夫)到 43 克(巴伦西亚),而在 1750 年,同一差距则分别是 38 克和 75 克。演变的一般趋势在这里无疑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最后一个意见。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价格的这一趋同意味着商品流通以及铸币流通的改善。且不说 18 世纪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也应归因于流通的改善,难道我们不能认为,至少在得

天独厚的某些欧洲地区，流通的改善促使了饥荒惨剧的结束，并在 1750 年（大致日期）以后，只剩下几乎尚可忍受的“隐性食品不足”？

可是，价格靠拢的现象仅涉及本文研究的历史时期的末尾。在 15 至 18 世纪期间，欧洲的价格正好相反，那是五花八门，千差万别³⁵，各行其是，互不相干。当时的欧洲远不像我们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所见到的那样，拥挤，躁动，人流往来频繁。我们这里考察的欧洲仍处于地区隔绝的状态，下面绘制的麦价地图正好也指出这个事实。

绘制价格地图的尝试

我们只得有选择地在这里展示七张地图，后一张图与前一张图相距半个世纪（图示 19）。如果让时间距离更加靠近，地图可能占太多的篇幅，而且会使我们脱离我们的主题（百年趋势）过久。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被注意到。百年趋势决不是千篇一律的，它势必要考虑到欧洲各地经济水平的差异。

正如报纸每天刊登的普通气象图一样，我们的地图将区分高压区和低压区，或者说高物价地区和低物价地区，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气旋和反气旋是根据短期分析（当天的气象资料）作出区分的，两个气压区分别位于一条界线的两侧，界线的位置则固定在大气压强 1000 毫巴处；而在高物价地区和低物价地区之间，界线却是活动的（平均线随价格的一般趋势而移动），更何况，我们的地图所追逐的目标是十年乃至几十年的长期趋势。为便于进行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比较，这些十年平均数均以白银为计算单位。

第一张地图——1440—1449 年期间——,有关的数据略嫌单薄,但可以看出水平差异很大。在利沃夫和巴伦西亚之间,麦价竟达 1 与 7 之比。巴伦西亚的价格最高;北欧和大西洋欧洲是中等价格地区;东欧(波兰及其邻国奥地利,以维也纳及诺伊堡教区的曲线为证)是低价格地区。顺便指出,布鲁日和乌得勒支的价格可能估计过高;施特拉斯堡的价格则显然估计过高;从前后的价格曲线看,价格水平理应低 $1/3$ 或一半。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还缺少必要的考证。

第二张地图:1490—1499 年间。作证的数据较多,表明价格普遍下降,但原来的水平差异不受影响。地中海地区价格水平最高,居首位(巴伦西亚、巴塞罗那、乌迪内、那不勒斯),该地区往北可延伸到格勒诺布尔。大西洋欧洲位居第二(乌得勒支和布鲁日除外),与地中海地区相比,价格约低 35%,英格兰的埃克塞特价格明显偏低,施特拉斯堡和诺伊堡教区的情形更加突出,是大西洋欧洲价格最低的地点。至于欧洲的第三号地区(东欧),当地的价格始终处于低点(克拉科夫为 5.47 克,利沃夫为 4.77 克,比巴塞罗那低 7.5 倍,从图上可以看到,巴塞罗那的价格最高,达 35.26 克)。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我们把欧洲第一号地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价格指数定为 100,大西洋沿岸和北欧地区(第二号地区)则为 77,在代表欧洲第三号地区(东欧)的波兰,价格指数只剩 16。以上当然仅是粗线条的估测而已。

第三张地图——1540—1549 年间——正值美洲白银大批涌来的前夕。在地中海及其邻近地区,价格依旧居高不下,老卡斯蒂利亚除外(当地盛产小麦,因而不在于真正的地中海地区范围之内;与前一张图相比,地中海沿岸各地的价格涨幅很大)。涨

价的浪潮席卷意大利(那不勒斯、锡耶纳、佛罗伦萨、罗马、乌迪内)及法国南方,深入内陆,直到格勒诺布尔和瓦朗斯。这股“反气旋”的顶点仍然位于巴塞罗那,这在当时只能归因于典型的城市特征。实际上,高物价对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是个沉重的负担,使它被排斥在地中海地区活跃的经济活动之外。

中等价格地区也颇有特色,从维也纳和奥地利起,经由德意志和法兰西,最后抵达英格兰(乌得勒支、布鲁日和巴黎例外),就像一平如镜的水面;从我们的图上可以看到,除维也纳的行市几乎下降了 23%(13.98 克)以外,英国的价格水平最低(18.17 克)。

第三块大陆又怎样? 根据我们计算得出的数字(计算的原始数据并不十分清楚),价格确实有所提高。诚如斯塔尼斯拉夫·哈斯佐夫斯基³⁶所指出的,其原因大概是西方增加了对谷物的需求(维斯图拉河的谷物运输更加繁忙)。这个说法看来有一定的道理。华沙粮价甚低(10.67 克),但克拉科夫却高得出奇(18.12 克)。小波兰地区(Maloposka)人口相对稠密,地方条件在这里或许也起一定的作用。

50 年过后,16 世纪最后 10 年的地图表明,当时银价经历了最大的混乱,但在 1600 年(根据伊尔·汉密尔顿的计算)或 1610 年(根据于盖特和皮埃尔·谢努的计算)以后,银价很快又回落到塞维利亚的水平。顺便指出,我们正处于“黄金转折”的前夕,在过了这一转折以后,整个欧洲的货币系统将经受严重的考验,战争、饥荒、社会动荡、经济混乱在各地将连绵不绝。

高物价的反气旋继续赖在地中海不走,地中海是欧洲最富庶和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价格最高的顶点转移到了安达罗西亚,原因不言自明:塞维利亚正成为小麦和面包价格最昂贵的中

心。与此同时,意大利、法国南方和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价格也在持续上涨,物价上涨对新卡斯蒂利亚的冲击略为晚些,而老卡斯蒂利亚则明显落后。百物昂贵的浪潮在整个法国泛滥成灾,利摩日、普瓦蒂埃、比莱巴罗尼等少数地区价格相对低下,可视为例外。巴黎周围受高物价所控制,巴黎的麦价一度甚至高达149.76克(1590—1591年的围城期间),这并不真实反映当地生活水平的居高不下,我们已经指出,其中还有别的原因在起作用。

在欧洲的上述地区,面包供应紧张,价格显得高昂;而在幅员辽阔的另一个地区,从克拉科夫(27克)和维也纳(40克)直到英格兰的埃克塞特(67克),物价则相对低下。在这个区域中,唯独乌得勒支和阿纳姆两地价格偏高,那也是战争破坏造成的结果。如果我们再次进行整体的计算,假定南部的价格指数为100,北部就仅为76,波兰则是25。

在16世纪末,最重要的事实显然莫过于波兰小麦³⁷与欧洲价格一般水平的依附关系。人们一眼就能看到,这应归因于维斯图拉河和波罗的海的贸易。无论如何,在16世纪期间(以及在17世纪初),但泽港的小麦出口不断在增长,北方地区越来越多地从波兰调运剩余小麦,同时又使当地的物价逐渐向西欧的价格水平靠拢。部分地由于这项出口,北欧小麦和谷物的价格仍比较便宜。然而,从1591年起,波罗的海的小麦开始也运往地中海,而且延续了很长时间。

第五张地图(1650—1659年)显示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不久的情形。一眼看去,情形似乎相当混乱:一方面是价格在总体上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是出现了重大的地理变更。

由于缺少某些重要数据(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全都

有),南方地区的最高点就暂定在那不勒斯。法国南方和意大利其他城市的小麦价格都降低了。乌迪内的麦价最低,与意大利其他城市呈鲜明对照,这个数字可能还有点问题。

但从欧洲规模来看,决定性的变化并不发生在价格居高不下的地中海地区,而是发生在原来价格偏低的北方地区,北方如今被分割成两个不同的价格区。首先是从维也纳到法国布列塔尼之间有一系列低物价地带(当然,只是相对而言),往南限制地中海沿岸地区的高物价向北扩展,往北则顶住从乌得勒支到英格兰的高物价往南蔓延。因此,如果见诸地图,低物价的中间地带把欧洲拦腰切成两个价格水平几乎同样高的海洋地区。谷物价格在欧洲南部——原来的富有地区——明显下降,而在欧洲北部——新近变富的地区——则相对上涨。究其原因,难道是由于后一些地区的经济地位突然变得优越了吗?或者是因为波罗的海贸易这台机器出了什么毛病,不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的小麦?

德意志的畸变就这样铺陈在我们的眼前。如果说有一条低物价地带从东到西横贯欧洲,我们会注意到,德国的物价比邻近的法国更要低得多。低物价地区确实有两个:法国物价偏低,德国更低。如果我们没有搞错,这正是我们隔一会用来说明德意志畸变的一项论据: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德国的物价极其低下,这个事实难道不正好能够说明,当欧洲价格后来下降或停滞时,德国的价格为什么却偏偏上升?

第六张地图涉及 1690—1699 年期间。如果我们并不把热那亚的特例看得过分认真,西地中海地区那时已丧失了麦价最高的首要地位。法国以巴黎为首,粮食价格节节上升。尼德兰的情形也是如此。至于英格兰,在 1688 年革命后,当地麦价日

趋昂贵。在中欧和东欧(利沃夫为 44.31 克,卢布林为 40.13 克),小麦价格仍然便宜,尽管自 1675 年后上涨势头不减。华沙小麦售价为百升 25.24 克(数字尚存争议)。

北、中、南三个地区始终可被辨认。南部地区的价格从高位跌落,随后即保持平稳(锡耶纳、新卡斯蒂利亚、乌迪内)。在从利沃夫到布列塔尼的欧洲大陆,麦价保持平稳,德国略为落后,巴黎则始终一路领先。在北部地区,17 世纪的新富人全都食用高价面包。

最后一张地图(1740—1749 年)显示出新的平衡,确认前一张地图的价格走势:一条大陆轴线,从维也纳到波罗的海和布列塔尼,代表低物价地区;北部地区的价格有所提高,而在地中海地区,物价停留在中等水平。可是,到了 18 世纪中叶,所有这些地区之间的差价进一步缩小,平衡似乎已是大势所趋。总的情况就是如此。南、中、东、西各地区的价格几乎不相上下,略低于平均数;相对而言,北部地区的价格略高一筹。

百年趋势的涨潮、退潮和息潮

前面的解释显得有点冗长,其实还是过分简短和不够充分;尽管如此,我们毕竟已对小麦的价格以及产生各种差价的理由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现在就开始提出我们的问题:百年趋势怎样在欧洲得到表现?我们又怎样对它作出具体的测定?

问题关系重大,但并不简单。实际上,它始终包含着我们业已指出的和认识的欧洲经济空间的异质性问题。可是,由于忽略了这种异质性,伊尔·汉密尔顿和 M.J. 埃尔沙竟把西班牙和德意志的特例(两个特例不容混淆)说成是欧洲的普遍现象。关

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其实,价格史专家全都各自研究一个特例,而且往往作出一个过分具体的解释。当汇集这些见证时,人们很快发现,每项解释都不可能推广应用于欧洲整体,必须作出因时因地的区分。

对于为历史学家所公认的价格运动,人们只能粗线条地划分时段。大体上说,这时有四个长时段:15 世纪时价格稳中有降;16 世纪至 17 世纪初节节攀升;随后又逐渐回落,直到 1720—1750 年间为止;最后是 18 世纪的价格猛涨。这一切无疑都是事实,但如果想要把日期说得更加确切一些,人们马上又开始犹豫起来。首先因为这些不同升降运动的日期,在许多情况下,根据人们观察的是名义价格曲线或实在价格曲线(折合白银计价),而互不相同。我们在两条曲线中究竟该相信那一条呢?为什么两条曲线显示的日期竟各不相同?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只能得出一些没有把握的或不尽可靠的假设,特别是我们所能依据的曲线往往本身还存争议。看来,我们似乎有必要多提出几个问题,轮流使用以下两种数据:名义价格和折合成白银的价格。这是对棘手的问题进行多次验证的一种方法,通过对每个实例的验证,就能确定一般性假设的依据是否可靠。

16 世纪,或者说 16 世纪的所谓“价格革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16 世纪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灾难深重、动荡不定的 15 世纪告一段落,但可以肯定,1500 年决不是转折的年代,虽然人们往往把涨价同 16 世纪相提并论,但价格革命诞生的日期却因地而异。

在名义价格的时钟上,16 世纪的价格革命显然有一个革命的准备阶段,正如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发生前,都曾有过一个

准备阶段一样。在这准备阶段,价格缓慢上涨(1450—1500年间,增长率为50%,平均每年1%),中间夹杂着活跃的周期运动,价格走向并不始终如一,但从长期看,价格无疑显示出平稳上升的趋势。根据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经济,这个准备阶段到来的时间也略有差别,我们在名义价格的时钟(尽管不甚完备)上可以看到:巴黎,1460年(?);埃克塞特,1462年;慕尼黑和奥格斯堡,1463—1464年;乌得勒支,1464年;施特拉斯堡,1464年;根特和布鲁日,1464年;法兰西(根据乔治·达韦内尔的曲线),1465年;法兰克福,1470年;利摩日,1468年;拉古萨,1482年;罗马,1485年;利沃夫(硬燕麦),1485年;西班牙(巴伦西亚),1500年左右。我们在日期存有争议的地点下方划了黑线,以便区别于日期比较可靠的地点,因为就15世纪而言,我们掌握的一系列数据很不完善。然而,我们毕竟可以肯定,在日常生活实际中,革命的准备阶段几乎同时开始覆盖整个欧洲,唯一的例外是西班牙(我们对此确有把握),也许还可加上葡萄牙,可惜我们不掌握任何可靠的数据。

无论在西班牙的纳瓦拉或巴伦西亚,名义价格虽然存在周期的波动,但总的趋势相当平稳。只是从1500年开始,我们已经说过,巴伦西亚的物价才逐渐上涨,这个日期对塞维利亚可能同样有效;根据安德列·赛游的考证,塞维利亚的涨风起于1506—1510年左右,可惜赛游没有提供数字依据。伊比利亚半岛可见像是与欧洲经济格格不入的一块飞地;然而,由于汉密尔顿撰写的论著无可挑剔,我们大家都倾向于按照西班牙的形象来绘制欧洲的经济概貌。

这里引证的数据如果折合成白银,以便替代名义价格,革命准备阶段的范围便立即缩小。折合白银计算的价格实际上并不

伴随着名义价格的上涨而上涨,这在利摩日、格勒诺布尔、施特拉斯堡、法兰克福、维尔茨堡、慕尼黑都莫不如此。以利沃夫为例,前后相差 10 年时间,埃克塞特相差 28 年,乌迪内相差 30 年;布鲁日和根特相差约 36 年。在西班牙(巴伦西亚),折合白银计算的价格和名义价格却并驾齐驱,于 1500 年前后同时上涨。

具体事实已如上述。至于对这些事实应作什么解释,那就不是轻而易举和确有把握的事了。我们要闯的第一道难关无疑是要把名义价格的运动与潜在的货币贬值作一比较。

就以西班牙为例,据我们所知,西班牙是唯一的例外,价格革命没有准备阶段。但我们注意到,计算货币对白银的比价在西班牙并未贬值。我们还发现,西班牙乃至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当时正是非洲黄金的集散中心,黄金从西班牙外流,借助有利的汇率,吸引白银。在前一张图表上,我们已提请读者注意两种金属的比价相差甚大,维多利诺·马加拉埃斯·戈蒂诺的宏篇巨著³⁸已分别就西班牙和德意志的情形作了介绍。在这孕育“地理大发现”的 15 世纪,伊比利亚半岛难道就不再继续注视伊斯兰和非洲,以及非洲的金币、奴隶和贸易(撒哈拉地中海的贸易包括在内)? 非洲的影响当时难道就不再抵达比利牛斯山脉? 难道不正是黄金再次对价格运动起着减速的作用,伊比利亚半岛的经济节奏才比欧洲其他各地慢了一拍? 所有这些问题都得不到切实可靠的回答,但无论人们作何解释,西班牙的畸变——名义价格和铸币价格迟至 1500 年才逐渐上涨——势必与所有这些理由都有关系。

此外,每当物价上涨率高于计算货币贬值率时,名义价格和铸币价格照例总是齐头并进。例如在施特拉斯堡,物价上涨率

为 28%，而贬值率仅为 9%，又如在乌迪内，两种比率分别为 40% 和 18%。

鉴于以上的事实，这里又提出一个新问题：计算货币的贬值率高低为何因地而异？根据德意志的实例，人们或许会说，计算货币的贬值率与白银的余缺成反比。阿尔卑斯山区和中欧的银矿早已掌握在奥格斯堡资本家的手中，银矿的兴旺或许恰好能同时说明德意志的计算货币贬值幅度较小以及两种价格系列的齐头并进。每年 10 吨的产银量显然少了一点，不足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德意志因此又展示出另一个畸变：物价上涨在德国比在其他各地更加突出，几乎与随后的 16 世纪的物价飞涨不相上下。就德国而言，价格革命似乎谈不上有什么准备阶段。但在这里，我们是否也应考虑到，1350 至 1450 年间，德意志陷于何等深重的危机之中？乡村人烟稀少成了德意志的致命伤。在经历了长期的兵荒马乱（即我们所说的百年战争）以后，当时德国经受的苦难远比法国和英国更加深重（加斯通·安贝尔说，战争是一种奢侈，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德国这一跤摔得比别国更重，重新再爬起来自然也更加费劲，这很可能就加速了物价上涨的势头。不用说，我们谨慎地提供的以上解释只能是有待详加考证的假设，这样的假设必要时甚至可予抛弃。

剩下有待说明是最主要的畸变：尼德兰（以及隔海相望的英格兰）的价格曲线，可能还有意大利的价格曲线（至少是威尼斯地区乌迪内的价格曲线），在白银的天平上静止不动。总的来说，欧洲经济的两台发动机（佛兰德和意大利）都处于白银供不应求的状态，计算货币的贬值即足以为证（威尼斯的货币贬值，以及佛兰德的货币反复贬值）。换句话说，白银在当地需求甚旺，居高不下，但又继续外流（一名威尼斯商人 1467 年在信中谈

到,白银流往西班牙;晚些时候,其他的文书更加明确地谈到威尼斯有大笔白银于 1505 年分别汇到西班牙和伯伯尔地区兑换黄金,获利颇丰)。总之,佛兰德和乌迪内计算货币的贬值,如果折合白银计算,或许足以抵销物价的上涨。以上三言两语的论证,更多地是对问题作出有益的概括,而并没有为问题提供不容置辩的答复;真要回答问题,还需要更加确切可靠的文献资料。

然而,通过这些论证,人们无疑可以发现,五花八门的、但又显而易见的价格运动(由名义价格曲线所记录)标志着,早在美洲的第一批宝物运到以前,欧洲已开始了全面的觉醒(这恰好证明皮埃尔·维拉尔的推断是正确的)。英格里·哈马斯特隆曾指出了瑞典的觉醒,这一见解为人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广开了大门……

我们掌握的历史资料显然还不允许我们去研究这些问题。有关意大利的文献(乌迪内和基奥贾除外)竟是一片空白。伊尔·汉密尔顿正确地指出,我们在佛罗伦萨有一大批文献资料放着未用。传统史学家们集中全力去研究美男子罗朗治下的佛罗伦萨,这固然并没有什么过错,但他们对这个城市举世无双的命运却显得无动于衷。经济史学家只熟悉 15 世纪的佛罗伦萨,即托斯卡纳大公的佛罗伦萨,这委实可惜。无知使我们对欧洲命运至关重要的见证置诸脑后。

“漫长的 16 世纪”什么时候结束?如果我们现在要为漫长的 16 世纪画一个句号,我们同样会感到举棋不定。价格的退潮虽然有预兆可见,却是姗姗来迟,而且到来的日期也因地而异。

从贵金属的价格曲线来看,漫长的 16 世纪令人惊奇地变得短了起来(图示 18)。退潮的先兆在西班牙的出现,以 80 年代

的政治转折为标志。首先要为征服葡萄牙付出代价(1580年),随后又为无敌舰队付出代价(1588年)。到1588—1592年期间,形成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财政危机,其原因很难作出解释³⁹。再过一些时候,整个法国似乎也跟着垮了下来(巴黎、格勒诺布尔、利摩日、瓦朗斯、罗芒等)。在某种程度上,法国也要为胡格诺战争付出代价。这场战争导致了国内急剧的通货膨胀和银价猛涨。意大利也同样如此,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里,锡耶纳、佛罗伦萨、乌迪内等地的经济形势阴云密布。

总之,折合白银计算,价格曲线的最高点分别位于1580—1589年(安达卢西亚),1590—1599年(乌迪内、锡耶纳、艾克斯、巴黎、格勒诺布尔),1600—1609年(那不勒斯和新卡斯蒂利亚),1620—1629年(热那亚)。

由此可见,一场规模宏大、配合默契的价格退潮终于形成,西班牙和意大利首当其冲,唯独位居最后的热那亚可视为例外,其真实性尚属可疑。意大利长期是欧洲得天独厚的地区,美洲白银输入欧洲的任何迟缓,对意大利都是难以忍受的打击。当地富人的生活排场如此之大,势必要求从新大陆源源不断地取得大批白银。法国至少有部分地区参与了贵金属价格运动的退潮。当然,就个别地区而言,继16世纪末的价格猛烈波动和急剧下跌之后,贵金属价格于17世纪初略有回升,并在短期内保持上升势头,从而推迟了真正的退潮的到来。尽管如此,16世纪末看来仍是重大转折的标志。

欧洲南部的情形就如上述,欧洲北部的情形,包括德意志、尼德兰、英格兰在内,与此恰成鲜明对照。在欧洲北部,价格转折的出现(仍折合白银计算)竟落后几十年时间。在德意志,关键的时期似乎是1630—1639年间,在维也纳以及英格兰和尼德

兰,似乎是 1640—1649 年间。在波兰,甚至在但泽(直至 1663 年,但泽仍与波兰王国的货币交易相联系),我们不能作出任何明确的判断,因为当地所有价格全都趋向上升。

总的来看,南北两侧恰成鲜明对照:根据我们对价格折合白银的初步测算,百年趋势的回落在欧洲南部位位于 1590—1600 年间,在北部位于 1630—1650 年间。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指出,根据白银的余缺,百年趋势这一鲜明对照可在白银计量历史的范围内得到解释,我们将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有据可依地作进一步的说明。

暂且,我们先满足于确认这个事实,并且把它同名义价格的走向作一比较,这项考察将再次让我们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表面上看,百年趋势的转折通过三次连续的运动而完成。第一次运动发生在 17 世纪的 20 年代,德国的价格开始下滑(莱比锡、维尔茨堡、慕尼黑、奥格斯堡为 1621 年;维也纳为 1622 年;法兰克福和施特拉斯堡为 1636—1637 年)。

第二次运动约在 17 世纪中叶,大体日期分别是:锡耶纳在 1649 年;埃克塞特在 1647—1648 年;拉古萨在 1648 年;那不勒斯和乌迪内在 1649 年;艾克斯在 1649 年;阿姆斯特丹、阿纳姆、乌得勒支在 1651—1652 年;但泽(黑麦)在 1660—1664 年(?);博韦在 1661—1662 年;巴黎在 1662 年。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运动,1678 年在卡斯蒂利亚出现;卡斯蒂利亚的情况十分特殊,我们隔一会再谈。

仅仅在英国和荷兰,名义价格紧随着折合白银计算的价格之后运动。这是偶然的巧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巧合恰好说明一个简单的算术真理,因为英镑的固有价值基本保持不变。在

德意志,两种价格运动一前一后,相距的时间很长,约在10—20年上下。意大利的差距更长(约50年);法国比意大利更长(但我们的计算方法不尽可靠);卡斯蒂利亚的差距最长,达3/4个世纪……在这些不同的地区,接二连三的通货膨胀促使名义价格持续上涨。在西班牙,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照例是铜币的流通量急剧增多。整个大陆欧洲差不多都曾发生过这类事故,各大商埠(特别在地中海沿岸地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力图摆脱通货膨胀。在卡斯蒂利亚,只是查理二世政府采取了清理货币措施以后,铜币泛滥成灾的状况才终于停止。名义价格立即一泻千里。在这次货币整顿以前,西班牙由于铜币作祟,白银向欧洲其他各国外流自然十分容易,白银的集散中心首先在塞维利亚,1685年后又转到加的斯。西班牙由此成了欧洲经济的玩物: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而雅各布·旺·克拉夫伦⁴⁰还没有完全看到这一点。

关于铜币充斥产生的有趣后果,历代的人都以亲身经历作了见证,所有的史书也都有所记载,我们这里不必再多噜苏。我们关心的只是百年趋势什么时候出现转折。在欧洲的经济空间,这一转折再次不是一气呵成的。17世纪经济不景气的困难局而很晚才正式形成,混杂纷陈的欧洲各国经济只是在经过一系列的折腾和变迁以后才勉强适应。鲁吉罗·罗曼诺声称,一切都取决于1619年的尖锐危机,这个说法使我们在惊奇之余颇感兴趣,但毕竟不能令我们信服。难道可以认为,一场如此深刻的演变会在阵阵排枪声中就此完成?

17世纪的革新在什么时候产生?在17世纪的停滞不前和18世纪的节节攀升之间,还有最后一个转折的位置尚待确定。

在这里,与我们预期相反,充满活力的 18 世纪也并不是一鼓作气完成其飞跃的,它像 16 世纪那样,最初也往往举棋不定和慢慢吞吞。

根据折合白银计算的价格曲线,欧洲各国大体上分两批起飞。

第一批是德意志地区,起飞的顺序如下:维尔茨堡在 1650—1659 年;维也纳在 1650—1659 年(当时至少跨出了第一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莱比锡和柏林在 1680—1689 年。简单地说,17 世纪的低谷在这里仅持续几十年,其局部原因是三十年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灾难(1618—1648 年)。

第二批在 1720—1750 年左右起飞,涉及程度不同地置身于百年战争之外的许多欧洲国家。在这一大批国家里,我们注意到意大利(锡耶纳、那不勒斯和乌迪内在 1720—1729 年)、卡斯蒂利亚(1720—1729 年)和法国(艾克斯、格勒诺布尔、施特拉斯堡、巴黎、博韦在 1720—1729 年)起步较早。但泽、阿纳姆、阿姆斯特丹和布鲁日在随后的 10 年间(1730—1739 年)跟着起动。1740—1749 年间终于轮到了英国(埃克塞特、威斯敏斯特和伦敦)。英国排在这一批的末尾,不禁使我们想起,1500 年的西班牙也是继欧洲其他各国之后方才起动。

同名义价格相比较,这里可区分三种不同的运动。德意志地区的价格居欧洲队列之首:法兰克福、施派尔、莱比锡(1657 年);维也纳(1659 年);慕尼黑、奥格斯堡、维尔茨堡(1671 年);韦尔斯(1673 年);魏尔(1674 年);施特拉斯堡(1655 年)。排在队列中间的有法兰西(至少部分是如此):艾克斯(1673 年),格勒诺布尔(1689 年),比莱巴罗尼(1690 年);米兰(1684—1688 年);阿姆斯特丹(1688 年);莱顿(1690 年);乌迪内(1689 年);

热那亚(1690年)。末尾的一组有:锡耶纳(1721—1727年);卡斯蒂利亚(1721年);但泽(1735—1739年);英格兰(埃克塞特为1731年;伦敦为1734年)。

总之,这次仅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畸变:德意志的畸变。威廉·阿贝尔曾提到过这个畸变,但没有作详细的解释。确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至今还缺少深入的考证。人们把原因立即归诸三十年战争,但这场战争能否说明德国的迅速复兴?究竟是德意志经济直线下降,一直降到物质生活的最低点以后,再次上升?或者,根据同一个思路,由于经济凋敝、价格低下和人口减少,德意志比欧洲其他地区容易恢复?从种种迹象看来,在1680—1690年间,美洲殖民地开始觉醒,巴西的金以及随后墨西哥的银产量日增,这个因素或许也起了作用。

拿德意志经济与美洲经济作比较,至少可以提供一种解释。18世纪的经济兴旺最初在周边地区发生,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整个欧洲。至于在16世纪,百年趋势的转折却首先出现在德意志和法兰西,然后再带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地区意大利和尼德兰。

初步结论。经过以上粗浅的考察,现在应该是明确地进行小结的时候了。我们罗列的种种事实只涉及问题的现象或展示问题的框架,却不能真正说明问题的难点。

幸而,感谢上帝,所有历史学家对百年趋势的主流没有分歧意见。但在关系到百年趋势转折的具体日期问题上,却往往还是举棋不定。每当转折牵动整个欧洲时,总是涉及相当长的时段,这些时段的大致位置就在:1460年和1510年之间,1590年和1650年之间,1650年和1750年之间。如果不用10年平均

数,而采用别的办法划定界线,得出的结果或许会好一些,总之,会与现在的结果不同;朝着这个方向,大家还可以进行有益的探讨和研究。

尽管如此,我们以上揭示的问题要害仍然有效:欧洲从不在一年内就来个大转弯,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不但五花八门,而且在本质上缺乏有机的联系。尤其,尽管反复确定了这些界线,在名义价格和折合白银计算的价格之间,却依旧存在着衡量标准的矛盾。这些矛盾单靠比较两种衡量标准的优劣无疑是不能解决的。换句话说,价格并不顺从地停留在货币的数量理论或质量理论所划定的界限之内,这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已知道的事。还有其他因素也在这里起作用。我们已经猜到其中的某些因素。关于这个重要问题,我们隔一会再谈⁴¹。

麦价以外的其他价格

麦价已经指明了百年趋势的重大问题。现在就要弄清楚,其他价格在什么地方证实或否定这第一份见证。新的见证人在被召来以后,将接受详细的询问,而且每次都尽可能拿他们的证词同麦价作比较。

因此,从一致和不一致出发,我们将首先说明程度不同的价格差异,但这里有一个条件,即这种差异必须长期保持不变,具有欧洲经济的主要结构性特征,进而成为说明欧洲经济的重大根据之一。为了懂得价格,最好的办法往往就是对价格进行比较,让数字自己说话。

两种重要的食品价格：葡萄酒和肉

葡萄酒如同麦一样扮演重要的角色。在 15 至 18 世纪期间，种种迹象表明，葡萄酒和烧酒的消费均有很大增长⁴²。葡萄酒的第一次消费浪潮出现在 11 世纪，仅涉及城市（西班牙和意大利在 11 世纪初，法兰西在 11 世纪末），城里人开怀畅饮，不大顾及酒的质量。第二次浪潮发生在 18 世纪，开始影响乡村。在法国，农民长期节衣缩食，满足于饮用“压榨葡萄后剩下的渣汁”；在约翰·劳币制改革（关于这场革命，堪称众说纷纭）过后不久，农民便越来越多地饮用葡萄酒了。

随着 16 世纪和 18 世纪两次经济大潮的到来，酒精饮料的消费，从葡萄酒、苹果酒、啤酒到烧酒（葡萄烧酒、粮食烧酒），都明显增加。结果是，酒铺和其他饮料店成倍增多（因醉酒而引起的种种趣闻轶事已为众所周知），葡萄酒的价格如箭在弦上，随时紧随物价的波动（有时甚至走在整个物价波动的前面）。

虽说葡萄酒消费在欧洲十分普遍，但葡萄种植却有地区之分。从后一角度看，这里至少可以划分三个地区（图示 2）。

位于欧洲南部的地中海地区是葡萄的主要产地，种植历史达千年之久。当罗马帝国建立时，葡萄种植向地中海气候区（大致位于橄榄树生长的北方界线南侧）之外发展。随后，陆续向大陆纵深推进，适应较差的气候条件，但对种植地块十分挑剔，终于在波尔多、勃艮第、香巴尼、皮埃蒙特以及莱茵河流域等地开创了欧洲品质上佳的葡萄酒产区。其间经历的困难可以想见，而且越是接近葡萄种植的北方界线，困难也就越大。在拉昂山区或兰斯山区的坡地上，葡萄种植可谓久经磨难……1579 年，

就在兰斯地区,葡萄又一次因成熟过晚而遭灾,收获期间,“赶上一场严重的霜冻,挂在葡萄架上的果实被冻得如此厉害,以至许多人用口袋装载摘下的葡萄”⁴³。这些冻得像石子一般硬的葡萄怎么能用传统的筐来装呢?

葡萄种植的这条北方界线,从法国卢瓦尔河的人海口为起点,走向大致如下:它穿越大陆,在美因茨附近与莱茵河会合,接着沿多瑙河北岸,相隔一定距离,与该河平行延伸,往东直到克里米亚。俄罗斯人于18世纪就在克里米亚地区开辟了他们的葡萄园,早在上古时代,尽管寒冷的北风刮得很凶,当地葡萄树的生长却十分旺盛。

第三个地区是位于这条界线以北的广大欧洲地区,那里不生产葡萄,但人们对葡萄酒的嗜好并不稍减,在尼德兰、英格兰和德意志地区,有时因长年饮酒,人们对上等佳酿情有独钟。越往东去,对口味的要求也就越来越低。波兰的情形还算不错,法国葡萄酒在当地市场始终按质论价,至少在1700年后是如此。但在18世纪的圣彼得堡,外国酒刚刚运达港口,尚未上市,假冒伪劣产品便已到处泛滥。

总之,葡萄种植在欧洲可分三个地区。葡萄遍布地中海沿岸各地,甚至侵占农田。1540年8月,直布罗陀正值采摘季节,居民倾城下乡,晚间在葡萄架下草草过夜,就在这时,深知当地习俗的阿尔及尔海盗试图对城市进行偷袭……此事本身固然是件小事,但它却能说明葡萄种植的地位;人们因此也可以猜想到,这种状况往往强制当地农民作出不能两全的选择,或者种小麦而没有酒喝,或者种葡萄而缺少面包。我们可以看到,在威尼斯的科孚岛,自从15世纪选择了种植葡萄和生产摩奈姆瓦西亚葡萄酒以后,该岛经常处于饥饿的边缘,忧心忡忡地等待着运

粮船的到来。皮埃尔·维拉尔正确分析了加泰罗尼亚地区麦价和酒价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农业耕作自然大有影响……普罗旺斯的情形基本上也是如此。

在欧洲的第二个地区,同样也遇到作何选择的问题:或者是种葡萄,或者是种小麦和搞工业。柯尔贝尔叮嘱手下的人在发展工业时注意:“若有两个城市,其地点均适于发展工业,但一个城市靠近葡萄产区,而另一个城市则不然,在选点时就必须选择后者,因为葡萄酒对发展工业有很大妨碍。”⁴⁴

北部欧洲不生长葡萄,但在这里,也还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些地区是南方葡萄酒的老主顾;在另一些地区,葡萄酒相对来说是一种时鲜货,是摆阔气的奢侈品。我们不禁想起一位波兰贵族,他执意要喝葡萄酒,以示与喝啤酒的农民身价不同……用威纳尔·桑巴特的话来说,奢侈是资本主义兴旺发达的酵母。满载波尔多或拉罗歇尔地区桶装葡萄酒的船队很早就浩浩荡荡地开往北方;这些船队后来南下伊比利亚各海港以及马德拉斯群岛、亚速尔群岛和意大利,从事葡萄酒运输。波尔图、赫雷斯、马德拉、马拉加和马撒拉等著名葡萄酒的历史无不与英国人对葡萄酒的喜好相联系。早在15世纪,摩奈姆瓦西亚的红白葡萄酒已由塞浦路斯向英国出口。

这些船队穿越辽阔的大西洋,在南欧和北欧之间航行,也在欧洲和美洲之间往返,桶装葡萄酒在远洋运输中扮演什么角色?人们几乎可以说,全靠桶装葡萄酒,贸易往来居然得以平衡……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深有感触地说:“相比之下,葡萄酒在16世纪交换中的作用竟与煤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海洋运输中的作用差相仿佛,堪称调节运量余缺的机动货载。”葡萄酒运输并不满足于海路。载运勃艮第酒的内河船队活跃在莱纳河和塞

纳河上；巴黎地区生产的葡萄酒也经河流运往鲁昂及更远的地点。陆路运输必要时也派上了用场。每当收获季节结束，就有被意大利人叫做“桶车”的德国大车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南方，装运维罗纳、布雷西亚、伊斯特里亚等地依然“浑浊”的新酒……威尼斯听任本地产品外销北方，而对罗马尼阿和普利亚地区生产的口感醇厚的葡萄酒情有独钟。

在不生长葡萄的北方地区，每年新酒上市（不论新酒来自何地），人们在欢庆之余，总要猛喝滥饮；说到喝酒，南方也许是细水长流，北方则是一醉方休。请看，蒙田曾嘲笑这些德国人，说他们把满杯的酒一口喝干。在克拉科夫，摩拉维亚或匈牙利的新酒每年于9月运达当地。不标明产地的新酒照例不准出售，因此，根据商务官员的命令，凡供应摩拉维亚酒的铺子一概以嫩树枝为市招，凡出售匈牙利酒的铺子则以草制瓶塞作装饰。我们前面说过，麦的种类很多，葡萄酒的情形又怎样呢？说来也是品种繁多，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酒的品质好坏一般是不会让人忘记的。早在15世纪，温切斯特教堂里做弥撒用的葡萄酒也有一级和二级之分。从16世纪末开始，红白葡萄酒在伊顿已分开饮用。长期曾是上等葡萄酒产地的奥尔良（18世纪后，酒的品质将一落千丈）于16世纪就对葡萄酒实行按质论价，两种不同酒的价格可以相差1至2倍，甚至达到3倍。作为商业重镇的亚眠，1567至1667年间公布的价目表上分别标出5至8种葡萄酒的价格。我们还知道1669年阿姆斯特丹公布的法国和西班牙葡萄酒价格竟有11种之多。

从我们掌握的有关阿尔萨斯地区的价格系列来看，顾客一般都根据产地对葡萄酒分门别类。历史学家单凭各种价目表就想弄清楚不同品质的葡萄酒，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请看，在乌

迪内的价目表上,并非写着上等葡萄酒和次等葡萄酒的名称。可以肯定,它们分属不同的产地,前者的售价总比后者贵些。尽管如此,在18世纪,一位名叫斯坦内罗的学者却告诉我们,乌迪内还有第三种酒,品质高于前两种……

然而,由于历时已久的偏见,那不勒斯对“希腊酒”和“拉丁酒”在价格上分得一清二楚,尽管这两种酒都向罗马大量出口。在克拉科夫,我们再次被一系列葡萄酒品种搞得晕头转向。分不清匈牙利酒和摩拉维亚酒,但在价格曲线上,我们却可以认出摩奈姆瓦西亚的葡萄酒,粮食烧酒,还有醋(醋是酒的穷亲戚,每次总是与酒一起标价)和啤酒(因为还有麦芽醋)。谈到门类繁多的葡萄酒,有关实例极其明显,我们可以通过价格曲线加以表现(图示22和23)。从利沃夫的情形看,在摩奈姆瓦西亚葡萄酒、普通葡萄酒和粮食烧酒之间的竞争似乎相当激烈,尽管竞争的结果不甚明朗。最后,华沙市场上酒的品种更多,那里同时可以遇到匈牙利酒、摩奈姆瓦西亚酒、法兰西酒(1700年后正式标价)、粮食烧酒以及桂皮烧酒。

总之,对葡萄酒品质的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只属于第三类的欧洲北方地区的特点。在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在新老卡斯蒂利亚或巴伦西亚,葡萄酒往往就是当地生产的酒,仅此而已。一条价格曲线足以记录葡萄酒的价格运动。

此外,北方地区的特点是主要饮用烧酒,尤其是粮食烧酒。欧洲于16世纪重新采用了或不如说推广了蒸馏技术,饮用烧酒在17世纪变得十分普遍。到了18世纪,烧酒生产和烧酒消费的规模更趋庞大。在当时,没有烧酒,士兵的生活和作战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烧酒消费以北方为主,阿姆斯特丹曾是烧酒的首都,粮食烧酒和葡萄烧酒都极其畅销,正是荷兰人在西方各地让

葡萄农学会使用酒的蒸馏技术……

北方地区另一更具个性的特点是饮用啤酒。随着广泛采用啤酒花为原料,啤酒这一古老饮料的制作方式在各地先后发生了改变。如果硬说葡萄的北方极限同时是啤酒的南方极限,这未免言过其实。啤酒销售点实际上深入到遥远的南方地区。巴黎很早开设了啤酒铺,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

啤酒自然并非只有一种。奥格斯堡就有“浅色”和“深色”啤酒之分;维也纳虽具白葡萄酒之都的美名,却有 6 种不同品质的啤酒,而且价格几乎不相上下;华沙的啤酒有 5 种;利沃夫 2 种;克拉科夫 6 种。慕尼黑把啤酒区分为三月啤和冬季啤,据说前者质量上佳,售价较高(也有个别例外,但例外恰好证实规律)。

※※※

在葡萄酒和啤酒两种价格数据中,我们能得到什么教益?首先,它们全都证实我们前面提供的有关小麦的价格运动。特别是在 16 世纪,所有的葡萄酒,不论产地远近和品质高低,全都价格上扬。继 16 世纪价格革命的节节攀升之后,葡萄酒价在 17 世纪有所回落。啤酒对这些价格波动也同样敏感。阿尔萨斯、加泰罗尼亚和但泽的价格曲线(图示 22)证明了这个事实;除这些曲线外,这里还补充有关温切斯特、利沃夫和阿姆斯特丹的几项数据(图示 23)。

我们首先要问:葡萄酒的价格运动与小麦相比孰快孰慢?回答至少有三个,分别涉及欧洲三个不同的地区。为便于绘制曲线起见,我们且假定,在被选作抽样调查的城市里,100 公升

小麦和 100 公升葡萄酒的价格(分别折合白银计值)从同一个起点开始运动。

第一个回答:西班牙有两条曲线,一条代表巴伦西亚,另一条代表新卡斯蒂利亚,两地都位于地中海气候区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欧洲第一个地区之内。在巴伦西亚,葡萄酒价格最初约等于小麦价格的 66%。两条曲线一前一后,酒价几乎以同等速度跟着麦价上涨,但酒价始终不缩短其落后的距离。在新卡斯蒂利亚,麦价从一开始就高于酒价,而且前者在 16 世纪的上涨速度比后者更快。差距由此越拉越大。可惜的是,到 17 世纪初,我们暂时还分不清两种价格运动,因为葡萄酒的一个计量单位让我们不能作出正确的计算。两条价格曲线提供的见证显然单独形成不了规律。然而,作为实例,它们却能使我们对盛产葡萄地区的价格变化有一个基本概念⁴⁵。

再拿格勒诺布尔的价格作同样的试验,但这次所得的教益相对要小一些。从我们掌握的价目表来看,格勒诺布尔消费的葡萄酒产自附近的乡村。小麦价格比酒价贵些,但相差不大。到了 16 世纪的最后 10 年,酒价上涨比麦价更快,一度超过麦价,但很快又被麦价赶上。我们不妨说,两种价格几乎并驾齐驱,麦价略为占先。

如果我们来到北方地区,情况正好就颠倒了过来。在温切斯特公学,100 公升“弥撒用酒”的价格最初相当于 100 公升麦的 6 倍。在 1542—1551 年货币贬值以前,酒价比麦价涨得更快。在这以后,麦价上涨的速度似乎赶上了酒价。到 1655—1659 年期间,所谓“弥撒用酒”(能否说就是前一种酒,还是个疑问)的价格竟超过 100 公升小麦的 10 倍,酒价上涨如此迅速,因而于 1710 年达到麦价的 12 倍,1750 年更是麦价的 20 倍。在

阿姆斯特丹,葡萄酒供应相当充足,但酒价上涨趋势几乎与前者相同。1630 年左右,波尔多葡萄酒,作为一种高级葡萄酒,在阿姆斯特丹的售价比小麦贵 6 倍;在 17 世纪下半叶,酒价和麦价的差距由 1 倍增至 10 倍,差距在漫长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还将进一步拉大。

以上数字无需多作解释。我们不如说,数字只能表明,在这些北方地区,葡萄酒消费量明显低下。葡萄酒在北方是一种奢侈消费品,而在南方就完全不同,每个农民都能提着酒壶上家里的酒桶边灌满,城里人也能去附近的酒铺沽酒。为用数字说明这个差别,我们在同一张曲线图上画出了利沃夫城啤酒(北方的日常饮料)的价格曲线。100 公升啤酒与 100 公升小麦的价格最初几乎相等;这一平衡随后被打破,酒价低于麦价,而且差距不断拉大。自 1620 年后,啤酒的绝对价格保持不变,到了 18 世纪中叶,100 公升啤酒的售价仅为 100 公升麦价的 $1/4$ 。这也就等于说,无论在南方或北方,普通饮料(葡萄酒或啤酒)的地位毕竟不如主食那么重要。下而所举的一个小例子可以证实以上推断:在 17 世纪,博韦城四周都种葡萄,人们从记录的价格曲线看到,葡萄酒的价格波动与麦价的走向大体相同。

从价格的长趋势看,这无疑是事实。但就短期波动而言,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价格有时表现任性,甚至偏离常规。恰好就在博韦,我们可以观察到,葡萄酒和小麦两种产品往往出现矛盾;根据两种作物当年的收成好坏,有时酒价上涨而麦价下跌,有时则酒价下跌而麦价上涨,因为小麦丰收往往赶上葡萄歉收或者相反。这些复杂情形只能展示价格的短期波动,我们这里且表过不谈。勒内·巴雷尔声称,在普罗旺斯地区,葡萄酒和小麦两种价格的矛盾是长期经济运行的规律。可是,在巴雷尔的

特殊用语中，“长期”又指的是什么？他其实说的是 30 年周期运动（相当于半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而不是百年趋势。

肉价。公元 1400—1750 年间，欧洲当时以素食为主，面包吃得很多。这种“中国式”的节俭使欧洲在逐渐推广科学种田的 19 世纪以前得以支撑人口增长的压力；在此期间，欧洲人口大约增加了两倍（少说也翻了一番，1650—1750 年间人口增长陷于停顿），绝对数字从 1400 年的 5000—6000 万上升到 1750 年的 14000—15000 万。

直到 19 世纪中叶为止，面包消费量逐渐把肉食消费量远远地甩在后面。但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对两种食品的需求又颠倒了过来，肉价上涨的压力增大，“牛排”终于成为餐桌上的主食。欧洲早在 1750 年前已趋向于吃白面包；到了 19 世纪中期，肉又逐渐取代面包。面包消费在食品中从此不再占首要地位，特别是土豆和各种干鲜蔬菜（蔬菜除引进新品种外，还在原有基础上改进种植方法）于 19 世纪已成为日常的普通食品。

可是，人们通常却不了解，所谓 1750 年那时餐桌上面包多而肉食少的说法其实并不恰当；如果向中世纪时代追溯，应该说反倒是餐桌上——不仅是王公们的餐桌——堆满着肉食，而在 1750 年以后，肉食少的状况还延续了一个世纪，直到 1850 年为止。

古斯塔夫·施穆勒 1871 年发表的论文⁴⁶首先介绍了 15 至 18 世纪的漫长演变过程，威廉·阿贝尔（1937 年）就此问题所作的详尽考证进一步证实了施穆勒的论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无可争辩的，虽然对历史学家来说还相当陌生。威廉·阿贝尔指出，德意志城市年人均肉食消费量由 15 世纪的 100 多公斤下降

到 19 世纪的 14 公斤以下。这在德意志是事实,在欧洲其他各地大体上也是事实,只是在时间上略有不同而已。由此可见,为了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原来耕地不多、以畜牧为主的欧洲逐渐向农业经济过渡,而农业的发展则不断蚕食草场的空间。在西方,依靠畜牧业勉强维持生存的地区变得越来越少。17 世纪有一位名叫鲁瓦泽尔的法学家,他在谈到布赖地区的经济时写道:“好吃懒做的村民依傍附近的草场食肉为生,如今已寥寥无几。”按照固定的程式,欧洲各地陆续在扩大价格剪刀差,粮价居高不下,肉价相形见绌……

众多见证足以表明,畜牧业的比重正逐渐变小,肉和畜产品的需求也逐渐下降。有关的细节不难提供,我们确实注意到,西欧需要的皮革当时就得从埃及、巴尔干地区或从新大陆运来。我们还注意到,欧洲自 15 世纪开始,已从匈牙利、巴尔干半岛和波兰等地进口畜群;欧洲的这些边缘地区由此得以发展了名副其实的平民牧场或领主牧场。

但是,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是具体的价格和数字(牛肉、小牛肉、猪肉、羊肉、猪油、火腿、牛奶、黄油、鸡蛋、禽类、野味),然后再进一步考察这些数字(例外恰好证实规律)与古斯塔夫·施穆勒提出的问题有什么联系。

下面就用几种主要价格的数字对施穆勒的问题作出快捷的表述。从安达卢西亚、维尔茨堡、桑威奇的几条牛肉价格曲线(图示 24)看,或根据巴黎贫民收容所档案记载的羊肉价格曲线(图示 26)看,肉价总的来说始终落在麦价和其他谷物价格的后面。肉的需求低于小麦,肉价或早或晚跟着麦价运动,但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例如,在 15 世纪巴黎的价格系列中,羊肉价格的上涨率始终处于中间地位,既不是最快,又不是最慢。同样,

从维尔茨堡和英格兰的价格曲线也可看到,麦价领先于肉价。我们先把肉价和麦价折合白银计算,再对二者作一比较,结果就十分明显:天平总是朝着农业和谷物的一边倾斜……

有关的证据数以千计。假设施特拉斯堡 15 世纪的平均数为 100,黑麦的平均价格至 17 世纪上涨到 350,肉价则仅增加到 250。在 1485—1520 年到 1590—1628 年,杜伊斯堡黑麦的价格,如折合白银计算,竟增长了 200%,而牛肉的价格则增长 112—142%。在 15 世纪至 16 世纪下半叶,萨克森地区黑麦和牛肉的价格分别上涨了 250% 和 150%。

毫无疑问,整个演变过程并不是没有曲折和沿直线发展的。在 17 世纪的博韦,肉价在头 30 年间一路领先,小步上涨,直到 1630 年为止,随后改变为与麦价波动的平均数相当……德意志在经历了严酷的三十年战争以后,由于人口下降,一度曾出现了逆转的局面,麦价一反常态地落在畜产品价格的后面。试以维尔茨堡、奥格斯堡和慕尼黑三地 1619—1624 年(1622 年的状况特殊,不计在内)和 1669—1673 年两个五年期作一比较,暂定前一个 5 年期的基数为 100,黑麦的价格下跌至 25,肉价则停留在 85(慕尼黑和奥格斯堡)和 60(维尔茨堡)。这种情形当然纯属例外,但延续的时间却相当长:它使屠宰场和牲畜交易会变得十分兴旺。据法兰克福 1658 年的一份文书记载,“目前市场供应极其充足,购买食品的顾客完全可以挑挑拣拣……”

欧洲的状况虽说千变万化,但其价格演变与德意志竟是大同小异,真要介绍肉价和畜产品价格的历史,确实还大有文章可做。食品的历史说来话长,人们至此只是罗列某些有趣的细节,而没有进行分类、统计和比较。食品史才刚走出“小故事”的圈子。一日三餐的食品构成是什么?它们的卡路里含量究竟有多

少？食品的销售价又怎样？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被涉及到。维托德·库拉正在撰写一篇论文，他得出的结论是：对 18 世纪波兰农民来说，获取热量最昂贵的食物仍然是粮食烧酒，库拉面露微笑讲述这个小故事，并不仅仅是为了寻开心。这是朝“真诚的”食品史迈出的第一步，价格史无疑只能从侧面展现食品史的风采，但它也确实触及到问题的要害，或更确切地说，价格史为撰写食品史提供必要的参考素材，必须把这些素材与涉及社会学或生物学的其他素材进行比较。食品的价格高低以及人们选择什么食品，这是人们每天都不能不面对的困难。

非食品价格

关于非食品价格，我们再也别想继续从事系统的调查，原因自然很多。首先，除个别例外，我们收集到的数据都不太精确。生石灰论“车”出售。但一车的数量究竟是多少？至于木柴，从名称看，人们会联想到不同的体积和重量。纺织品更是五花八门，谁也别想解释清楚。纺织品的花色品种多不胜数，其价格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染料的影响（我们在威尼斯的帐本中可以见到）；面料的宽幅和长度又各不相同，即便是众所周知的固定品种也并非千篇一律（例如，在波兰出售的斜纹布，每疋的长度为 32 至 37 法尺不等）。甚至由商标确指的某些呢料和丝绸（如“单狮牌”、“双狮牌”等），在全欧各地，也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面料的质地更大有差异，因为在时尚和顾客心理的影响下，纺织技术的演变十分迅速。

再说钢、生铁、熟铁、铜和其他金属，我们且莫忘记，重工业当时尚未诞生，所能收集到的价格系列极其有限。

总之,我们在涉及这些产业部门时,面对通史的严格要求,只能审慎从事。我们将对有关资料作概括的介绍,着重分析价格的长系列,如某些产品的数据比较可靠,则尽可能追溯它们的价格变迁。

居住

居住牵涉到一系列价格。建造和装修房屋,购置家具,还有取暖和照明,分别需要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关于这一大批产品,已公布的价格系列数量很多,但缺乏连续性,很少能覆盖本文考察的漫长时期。无论涉及的是粗细檩条、石灰、厚薄木板,我们对它们的重量、尺度、原料乃至产地都充满疑虑。究竟是当地的产品还是加上昂贵运费的外来产品?由此出现了很难解释清楚的价格不协调。以 1550 至 1750 年间的波兰为例,椽子的价格在华沙从 1 增加到 10,在克拉科夫也不过增加到 15;但檩条的表现有点反常,其价格在华沙从 1 增加到 20,在克拉科夫则增加到 30。我们由此得不出任何结论,不能肯定两条曲线中哪一条曲线的数据有误,或许不如说,“椽子”和“檩条”二词的含义尚待确定。

砖

砖的曲线仅是一例,其他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在复制这些曲线时,不但不希望说服别人,而且自己也并不完全信服。砖是一种价格可比的产品,在欧洲各地,通常论百块或论千块出售。欧洲以石砌建筑居多,但砖的使用也相当普遍,无论在锡耶纳、

威尼斯、伦敦、阿姆斯特丹、但泽或巴黎，到处都有砖房；巴黎的孚日广场以及更普遍的路易十三风格（还有亨利四世风格）属于尼德兰式的砖石混合型建筑。然而，砖的分量太重，运输因素对价格的影响不容忽视。就是在今天，住在砖窑附近的人买砖也总是比较便宜。这个因素也许足以解释我们考察的最可靠的曲线数据，在折合白银计算后，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图示 27）。

这里共有 5 条曲线：利沃夫、克拉科夫、维尔茨堡、英格兰和巴伦西亚。我们还附上了折合白银计算的小麦价格曲线。前面已经说过，小麦价格曲线作为一个平均数，只具有方位标的意义，读者不可完全信以为真。

大家一定注意到，除个别例外，100 公升小麦的价格大致等于 1000 块砖，我们本可以开列有关的参考数据，但这里就不必多此一举了。大家还会看到，砖价基本上跟随物价的普遍上涨而上涨，但上涨速度不如小麦快。关于砖价的又涨又停，我们本可以提供更多的数据，尽量把砖价曲线与当时的麦价曲线或一般价格指数曲线作比较。这些也都不去细细地介绍了。我们只想指出，在 1450—1750 年间，英格兰的一般价格指数从 100 上升到 600，而砖价却只增长到 350。在波兰的价格曲线上，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趋向，曲线的两次脱钩与 1663 年的货币贬值不期而遇。也许只有通过对比利沃夫和克拉科夫的比较研究，才能说明两地价格水平的差异。这难道不是一个大问题吗？

此外，我们随即还发现，总的说来，砖的价格在波兰最初处于较低的水平：1440—1444 年间，每千块砖在利沃夫值 25.7 克白银，而在英格兰和巴伦西亚却分别值 77.8 克和 87.81 克。西方的三条曲线显然位于高得多的水平上。只是到了 18 世纪，几条曲线才互相靠拢；至于克拉科夫的价格猛跌，这里且不作详细

解释。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对曲线图提出过多的要求。砖的价格涉及到一种普通的天然原料,也关系到劳动力和燃料的价格,通常是木柴,但有时是煤(在尼德兰和英格兰)。这最后一项细节或许是说明英格兰和荷兰砖价下降的原因。在荷兰,城市还用砖来铺设街道。

木料

有关木料的数字也同样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尽管木料对室内取暖及房屋和船舶建造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此外,它还以木炭形式促进冶金业的发展,由此可见,木料远远超出了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范围。

人们几乎可以断言,历史上曾有过一个木柴时代;到18世纪,甚至直到19世纪为止,木柴曾是供人支配的主要能源。也许正是由于木柴资源日趋匮乏,从16世纪开始,英格兰才逐渐提倡使用煤炭。约翰·内夫的论断⁴⁷就是根据以上信念而得出的。

树木对耕地也是一道樊篱:树木退一寸,耕地进一分。“面包与木料”之争历时几百年之久。这场斗争至今还在进行。这里牵涉到很多重大问题,但我们却只能提供十分差劲的答案。

利沃夫、新卡斯蒂利亚、维尔茨堡、伊顿等地的木柴价格曲线(图示28)均根据各自的实在价格(折合白银计算)分别绘制,这里所说的价格,对我们来说,并不仅仅指售价,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涉及到计量单位。木柴在各地一律论“车”出售,而车与车之间的数量自然就很难进行比较了。我们只能孤立地就每条曲线的运动进行比较,但这种比较必定会激起我们的好奇心。

维尔茨堡和利沃夫的曲线在某些方面可作比较,尽管前者记录了涉及 17 世纪前期,即大降价时期的数据(曲线从 1620—1624 年开始),而后者(利沃夫)的起点则是 1650—1654 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从 1660 年开始,波兰像德国一样出现了价格的回升。我们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价格从低谷回升的趋势究竟是不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现象?新卡斯蒂利亚的价格曲线支离破碎,但它展示的价格下跌却反映着西方经济正在走下坡路。最后,自 1600 年后,伊顿的木柴价格渐趋上升,1650 年更登上了一个新台阶。直到 17 世纪中叶为止,英格兰的价格曲线表明,木炭价格显然比木柴价格上涨更快(大家知道,这个大趋势很晚才出现逆转)。博韦的价格曲线让我们看到,在 17 世纪初,当地的木柴价格接连 30 年急剧上升(涨速比小麦更快),此后又随欧洲经济的普遍萧条而回落。但在 17 世纪的博韦,人们注意到,某些高原地带重新又种上树木。夏尔·德凡兹⁴⁸在巴黎盆地开展的大规模绿化工程同样表明,16 世纪的大片森林仍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与现有的界限大致相同)。在东普鲁士,汉斯·赫尔穆特·韦希特尔⁴⁹指出了 1620—1625 年间的转折(图示 16):谷物种植侵占树林的趋势当时发生了改变,远离村庄的地块从此被撂荒,作物在优良的土地上继续种植。单位面积产量将不断提高,而森林则再次不受蚕食。但是,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无论是价格或价格曲线都不能帮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穿

纺织品涉及的而很广,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进行深入的考

察。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纺织业是当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工业。它必定将促成一场工业革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

早在15世纪以前,欧洲每一个地区都各有自己的纺织业。根据不同情况,有的仅能满足当地的需要,有的则除供应本地外,还实行外销,有时甚至运到离产地很远的地方。从15世纪到18世纪,纺织业逐渐出现大规模的集中,这在欧洲地图上一眼就可以看到,集中化趋势并且不断变得更加明显,其中确实还夹杂着某些难以说明的调整和变动。再没有别的产业能比纺织业更富流动性了,因为在当时,纺织业通常既要与城乡的工人相联系,而且更要受厂房和原料的制约。设厂的地点和原料产地的大小在当时是个大问题,可惜它不是我们考察的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假如价格史真能为它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我们也不妨对它作一番考察,但情况并非如此,至少暂时不是如此。我们的任务是要试图解开这一团乱麻,把断了的几根线头重新接上。我们通过以下三条渠道,或许能部分地达到上述目的:先弄清有哪些原料;然后注意有哪几种比较著名的成品;最后再开展广泛的调查,尽可能绘制一系列详尽的图表。

原料共有羊毛、棉花、亚麻和苧麻。在我们的曲线图(图示30)上,原料重量以公斤为单位,名义价格则折合白银计算,这样便于根据不同材料分别排列价格;在图的上方,展示羊毛和呢绒的价格;接着是棉花的价格;然后才是17世纪亚麻的价格;最后,在最下方,是苧麻以及在阿姆斯特丹被称作“鱼绳麻”的优质亚麻。当然,图表的涉及面过分狭窄,虽然展示出国际贸易中供应的除蚕丝以外的各种商品,但并不反映农民生产的日用消费品和地方产品;后者多半处在货币经济之外,因而不为我们的资

料所记载。

我们记下的数据系列与百年趋势大体相符。就以里加苧麻的价格运动为例,这种苧麻在阿姆斯特丹市场出售,人们通过曲线不难可以看到,苧麻价格的走向相当忠实地反映着欧洲大陆的经济形势,也许有一次例外,即苧麻价格自 1682 年起提前回升。关于法兰克福的亚麻和奥格斯堡的苧麻,前者的曲线恰好体现 16 世纪的价格上扬,后者的价格比前者要贵得多,反映着 16—17 世纪的百年趋势,但从 1750 年开始,其价格曲线显得有点反常,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随着 18 世纪的价格普遍上扬,里加的苧麻、阿姆斯特丹的“鱼绳麻”,士麦那的棉花、塞哥维亚的羊毛(羊毛之王)都纷纷跟着涨价,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特别是里加的苧麻,涨势一路领先。

这些原料的价格高低不等。我们这里顺便指出,西班牙羊毛的价格无疑居各种纺织纤维之首,但泽的细羊毛其次,而但泽普通羊毛的价格则要低得多……据约翰·霍顿的考证,英国羊毛的价格更低,但人们注意到,这些羊毛基本上都是当地产品,不承担巨额运输费用。由于同样的原因,亚眠的羊毛价格如用曲线表示,也显得很不起眼。

至于纺织制成品(图示 31),图上总共有 5 条价格曲线,粗看似乎只有 2 条,因为这些曲线像接力一样,相互在更替。我们对它们不宜过分相信!如以织物的长度为 1 米计算,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呢绒等优质产品的价格与棉麻(棉纱作纬线,麻纱作经线)织成的绒布(价格均折合白银计算)有着很大的差距,因为绒布的成本要低得多。英格兰的红呢织品在法兰克福的市价,于 15 世纪曾有所下跌,到 16 世纪又趋上涨(涨幅不大,1515—1604 年仅涨了 55%),可惜有关 18 世纪初的数字不为我

们所掌握。在利沃夫上市的“伦敦呢”是否属于同样的情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无论如何，两条曲线的走向显然是相同的。人们可以认为，在17世纪，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总是尾随着伦敦的价格运动，从我们掌握的有关英格兰粗呢的曲线可以看到，它的价格从1605—1609年的顶点快速下跌，到1719年才开始转为平稳。

在法兰克福，绒布价格从1519年起逐渐上升。图示的虚线表明，直到16世纪中叶为止，价格上涨幅度甚大，我们对此难道能完全相信吗？即使价格继续上涨，上涨率恐怕也会比较低。至于英格兰粗呢，其价格曲线在18世纪呈平台状。应该承认，这里收集到的有关见证可惜都不可靠。我们能否由此推断，纺织品价格比麦价上涨较慢和下跌较快？如果能够得出这个结论，这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每个人想必都能猜到，我们的图表有什么不足之处。图表对主要纺织品的价格运动没有作出一目了然的展示，我们期待着这类研究成果的问世，但恐怕还得等待很长时间。

相反，我们都知道，食品和纺织品的价格运动往往此长彼消（在短期内），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和混乱的发生，而两种价格运动的矛盾又是危机和混乱的结果。这些事实来自我们对短期经济形势的观测。至于长期经济形势，我们却往往把握不住。

面对其他物品的价格波动，纺织品是否作出同样的反应呢？我们拥有的信息又一次不允许我们提供肯定的结论，至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反应是相同的。古纳尔·米克维奇早已指出，在16世纪的里加，上市的纺织品有两种价格：外国货售价高昂，当地货价格低廉。腓力普·吕兹·马丁在其未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正确地把塞哥维亚经由塞维利亚向新大陆出口的高级呢绒与位

于拉曼查平原的昆卡在当地出售的产品作出了区分。这当然不等于说,中低档产品,绝对不远销外地,阿拉贡地区农民生产的条纹呢未尝不是遐迩闻名。但据我们所知,它们的流通渠道与上等和特等纺织品不同。其实,正是最普通的大路货,我们最难弄清楚,例如阿勒颇及其邻近村庄生产的粗蓝布,据 1687 年的一份文件说⁵⁰,这些粗布通过马赛港进入法国后,供南方穷人制作衣服。我们由此或许会联想起童年时曾经见过的家庭妇女穿戴的蓝围裙,或者今天工人的蓝工装。与廉价布料相比,羊毛织物依旧是一种奢侈品。英国的莎士比亚不是借法尔斯塔夫之口,表现对身穿粗棉布或硬麻布的人的鄙视吗?在 18 世纪,莫渥指出,以往很少使用的粗呢料开始在法国乡村普及,他为此深感高兴。纺织业在 18 世纪、特别在 19 世纪取得了迅猛的发展,这一革命性转折实际上首先是大众消费增长的产物。

人们几乎能够确有把握地想到,平民使用的这些廉价织物,并不像其他物品那样,对价格波动迅速作出反应。我们不妨在巴雷尔和默弗累两人的论战中借用有关 1625—1660 年间米兰高级和低级衣料的两条价格曲线,种种情况表明:在此期间,低级衣料的价格相当稳定,而高级衣料相反则明显下降。在生活艰难的岁月,特别在危机期间,顾客们购物时总是更多考虑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宁可选择低级产品。就拿米兰来说,次等呢料的价格保持不变,而优质毛料则有所降价。不过,这里所说的事还是没有脱离短期经济形势的范围。

然而,从长期经济形势考察,这条规律也很有希望在长时段中得到确认和证实。尽管在这期间,价格演变将十分复杂。维托德·库拉对此深信不疑,并在他撰写的一篇杰出论文中⁵¹,借鉴厄内斯特·拉布鲁斯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以上的论断。确实,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波兰以及别的国家,奢侈品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价格变得相对便宜,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日渐昂贵,或至少绝不降价。我们可以认为,到了18世纪,奢侈品在欧洲广为流通,并且被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所接受。

大家可以看到,在现有的纺织品价格曲线中,数字可靠、足以说明百年趋势的曲线寥寥无几。但在各地,有关的文献资料却如汗牛充栋,至今未经整理和利用。也许我们的数据还有待补充,使之更加精确?除开价格问题以外,我们还应考察产量,有关的数字目前还是一片空白,人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最后,对于已知的少数几种货物,恐怕还应穷追不舍,查找欧洲各地的有关价格,人们将再次遇到路程和运费的问题。关于在波兰和巴尔干各国出售的英国粗呢,似乎完全有可能找到众多必要的原始数据。这个方法虽然不能保证一定有效,但应该认为,朝这个方向去认真考证,恐怕值得一试。考证的内容包括:查明交易路线,确定纺织物的品质,从而为最终解决1750年前欧洲主要工业品价格这个大问题的作出贡献。

重工业崛起前的欧洲

在1750年前,纺织业无疑已是重要的产业,因为纺织品的销路很广。在衣食住三项必需中,衣和食几乎同等重要,衣的地位更不在住的之下。但在15—18世纪期间,欧洲仅赋予重工业次等的位置。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煤、焦炭炼铁的崛起和钢铁的大量使用,发展重工业才有了可能;而在蒸气机、铁轨、汽船铁壳及众多工作母机问世前,大量使用钢铁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事。

在 1750 年,我们还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切莫因采矿、金属冶炼和铸造的存在而产生太多的错觉。早在格奥尔格·阿格里哥拉时代以前,这些产业已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技术成就(矿山坑道中的抽水泵,升降设备,粉碎矿石的杵锤,水轮带动的铁锤),但木材仍是制造这些机器和传动设备的主要材料,例如在克拉科夫附近的维利奇卡盐矿,铁链和绳子(由椴木纤维编成的绳子能耐盐的腐蚀作用)同时使用。

然而,采矿、冶炼或铸造不断在推动资金和劳动力的集中,依靠有利的经济形势或国家的恩赐,这些企业当时取得的成就委实令人惊叹。大家知道雅各布·富格尔在蒂罗尔和匈牙利建设铜矿的辉煌业绩。我们同样还知道 1563 年由伊丽莎白女王下诏在英国创办的铜业公司。曼斯菲尔德生产的铜行销各国的历史以及 17 世纪瑞典铜矿主的冒险经历在这里或许可不必再旧事重提。约翰·内夫在其经典名著中已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荷兰和瑞典等得天独厚的国家首先兴起的经过作了详细的叙述。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成就仅限于欧洲范围之内,中欧某些采矿业的繁荣且历时甚短⁵²。总之,除个别例外,采矿、金属冶炼和铸造的成功往往还停留于小企业。有人曾试图对 16 世纪法国的金属冶炼企业进行全面调查,可惜没有完全考证清楚。16 世纪那时,在火炮飞速发展的刺激下,冶金工业致力于铜或锡的生产。但炮筒的铸造仍以手工方式进行,正如教堂的钟一样,直到 18 世纪为止;从那时起,才在一次铸就的实心铜管中用镗具加工炮筒。

我们提供的数字多少能反映上述介绍的概况。通过数字,

我们将得知欧洲各地的价格差异以及这些重工业产品的价格运动,经济形势无疑对工业品的价格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相比之下,却又远不如对食品价格的影响那么直接。

铁

为了考察铁的价格运动(图示6),我们只有三条曲线,第四条曲线涉及亚眠的情形,这一极好的价格系列可惜历时过短⁵³。总的来说,所有这些系列(利沃夫的除外)都随百年趋势的大起大落而运动:在维尔茨堡,铁价于1613—1619年间达到顶点,1680年再次上扬(从长期经济形势看,铁价在价格运动中居领先地位);在亚眠,铁价似乎与西方的百年趋势恰相吻合;阿姆斯特丹的价格曲线(瑞典生产的铁)从1609年开始,呈平台状伸展,晚至1750年才出现明显的涨势。利沃夫的铁价从1666年起缓慢上升,随后呈略有起伏的平面,最后于1718年开始急剧上涨,接近国际市场的价格,甚至有超过的趋势。总之,如同麦价一样,随着18世纪的到来,欧洲各地的铁价明显地日渐靠拢。

锡

锡价(图示6)为我们提供一个不错的实例,尽管我们的数据并非无懈可击,这个实例已被大家所公认。直到17世纪末,英国的锡单枪匹马地横行全欧及整个地中海地区,并经由东地中海贸易,转销欧洲之外。从1695年起,荷兰人以条约形式确定了对暹罗国锡的垄断。东方生产的锡质量优于英国产品,随

后将充斥欧洲市场。阿姆斯特丹自 1722 年起定期公布锡的牌价。每百公斤锡的价格均折合白银计算,由此得出的曲线使我们能对不同锡的价格进行排队:但泽的锡居价格表之首,其次为东方的锡,然后是英国的锡,价格比前者低 50%。大家会注意到,由于相互竞争和销路不广(直到 17 世纪末,销路才有所扩展),所有这些价格涨幅都不大,从 1480 年到 1740 年,英国产的锡价仅翻了一番。

锡价或许还有别的见证价值。确实,锡价代表着工业品的价格。就英国而言,我们掌握着有关锡的产量和成本的数据。锡价在欧洲市场上上涨不快,但其生产成本,包括铁、绳索、劳动力的生计(特别是食品)在内,却对物价上涨反应灵敏,这对锡的生产量造成很大的牵制。英国锡产量自 1450 年起开始上升,于 1520 年左右有所回落,1667 年后再次迅速增加,直到 1690 年为止,以后增速放慢。从 1480 年到 1750 年,锡价虽说只翻了一番,但同期锡产量却增加了两倍。

铜

铜在日常生活中是铁的竞争对手,又在货币金属中位居第三,我们对铜的价格自然更感兴趣。我们在绘制曲线时对它将作特殊处理(图示 6)。银再次充当基本计算单位,用来与其等价物作比较:1)与金比较:采用传统的金银本位比价;2)与铜比较:在这第一张曲线图中,我们插入了呈虚点状的第二张曲线图,提供 1500—1750 年间几大商埠的铜价(折合白银计算)。根据我们的计算体系,铜银比价曲线上升意味着铜的贬值;读者如果注意到这一点,他就能明白,维尔茨堡的曲线记录了铜自

1460年起的急剧贬值。这种通货膨胀难道是德意志所特有的吗？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正是早期的通货膨胀导致了15世纪中期的物价上涨？以上的问题还有待讨论。此外，维尔茨堡的曲线还表明，铜价于16世纪初涨势猛烈；如果英国或阿姆斯特丹的曲线没有画错的话，我们会发现，铜价趋向平稳，呈直线朝横向延伸。铜以货币金属的姿态在运动。

价格、价格指数和工资：与费尔普斯·布朗商榷

关于这最后一个问题，历史资料虽然比前面几个问题更加丰富，但真要看得一清二楚，却反而更加困难。工资作为支付劳动力的价格，确实有自己的特殊性，工资一般总是定得偏低。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1450—1750），工资的表现相当迟钝，也就是说，演变比较缓慢，无论是上升或者下降。我们可采用许多方法来考察这种升降趋势：比较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把名义工资折合成所谓“实际”工资；把工资折合成一定数量单位的谷物（威廉·阿贝尔偏爱这种方法，但使用这种方法的并非仅他一人）；或者采用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创导的生活指数计算法。

任何一种方法都并非无懈可击，即便把所有这些方法加在一起，也同样不能排除各自的缺陷，原有的缺陷仍顽固地表现自己。巴黎近郊有一位葡萄农，种植一弓丈土地的葡萄园，1510年获利10图尔里佛；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笔钱又值多少？他能用来购买什么物品？夏尔·维尔兰登⁵⁴随口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这笔钱够他苟且偷生，当物价上涨时，就买点便宜货，可见工资总是落在生活消费的后面。维尔兰登接着说，事情恐怕

只能是如此,否则雇工将会在世界上消失。更何况,这是人们不能视而不见的一条规律:经济危机和人口危机从来都分不开,“死亡才把总帐结清”。如果雇工活着,他怎么过日子呢?鉴于工资有时与生活消费持平,有时又低于生活程度,雇工怎样节制自己的欲望,省吃俭用,把挣得的工资真正派上用场?

甚至在今天,生活开支也是难以确定和衡量的概念,拥有各种统计数字的当代人对此尚且弄不明白,两眼漆黑的历史学家怎能有所作为?

在历史文献中,有关工资的素材不像价格那样容易收集。工资的数据往往让人难以深信。特别是在多半实行以物易物的社会里,工资更难折合银两计算。这是当时经济水平和物质条件的需要。工资很少百分之百用货币支付。在这方面,我们恐怕至多能抓住少数几个实例,一般是在建筑业。营造商、泥瓦匠及帮工如果天天都有活干,他们的日子算得上得天独厚,但每年都有冬季,如果再遇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建筑业更是在劫难逃。总而言之,很多情况还是让人疑窦丛生。

有人对基奥贾作了广泛的调查,他们根据市政机构的记载,查找小麦磨而和运输(从基奥贾运往货栈)的价格,有关劳动价格的这些间接指数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不过,具体是些什么机构,除个别例外,都还弄不清楚,它们的见证依旧让人怀疑。根据不同的地区和时代,还根据档案保存的偶然性,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有多有少……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甚至连劳动的天数也不知道。费尔普斯·布朗和歌拉·霍普金斯却偏偏把劳动日当作他们计算的基本单位。这个办法对当今的工业化社会或许完全适用。但也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工业化社会并非就是铁板一块,经济危机减少着每周的工作小时数,往往在削减工资的同时

又增加失业。此外,大家还知道,在从旧时代向机器时代的过渡中,人们对生活节奏感到很难适应,这恰恰因为人们以往对正规劳动的概念并不明白,或者几乎一无所知……除开歇工和节日之外,还有因经济萧条引起的失业以及工人的随意旷工等问题。假设工人在工资低的时期比高的时期干得更多,这在当时是有此可能的,因而采用简单的计算方法无论如何行不通。实际上,在试过几种计算方法以后,我们还是茫无头绪。奥梅尔·卢夫蒂·巴卡及其学生不久前仔细研究了伊斯坦布尔苏莱曼清真寺的建筑帐目。建筑工地上工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流动量极大……只有不断进行招工,才能填补缺额,并在工程最繁忙的时候能使人手有所增加。星期五休息日过后,星期六是发工资的日子,工人在那天到的最多,但周末过后,人员就立即减少,需要重新招工。谁能想到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曲线图是根据当时的支付帐目绘制而成的,但这些数字,鉴于工人出工的时断时续,却又不能使我们确有把握地估算出工人的收入。这种状况究竟是偶然的或是经常的?这是否构成某种规律?关于这些问题,必须查阅其他历史资料,方能作出判断。

以上细节表过不谈,可是另有别的细节(说来话长)表明,人们在计算时无从估测基层存在的大量参差不齐的现象。我们不妨看看问题究竟在哪里。

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不可能知道某个国家在某个特定时期衣食住三项的典型支出帐目。然而,对工资的研究显然不能离开它所要满足的需求。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断然解开了这个难题。他们编制了一份个人消费比例表,而且假定这个典型的比例在我们这里考察的整个时间和空间中固定不变(吃占 80%,取暖和照明占 7.5%,纺织品占 12.5%)。这

个简单化的计算方法显然是粗暴的和武断的,因为人的“需要”,即使按平均数计算,也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不这样武断,也就无从作出简单的计算。我们姑且相信他们对消费的估测是正确的,承认这些消费可分割成若干份等额的日常开支(同意后者比同意前者更加困难)。在作出这些让步以后,购物筐的形象便变得相当清晰,消费者每天提“筐”去集市,购买“淀粉类食物”(麦和豆全都包括在内)、肉、鱼、饮料、点灯的油、取暖的柴以及衣料等物品。我们在注文⁵⁵中对购物筐的确切构成作了介绍,这其实不过是计算一般生活指数和了解生活用品价格演变的一种方法而已。这种不免有点异想天开的方法,同其他的方法相比,并不见得更好,也不见得更差。

费尔普斯·布朗和歌拉·霍普金斯将开始作他们的一系列计算。首先,他们为购物筐中的不同物品分别绘制价格曲线,并根据不同物品的比率,求出购物筐本身的价格曲线。作为第二步,他们再衡量工资与代表生活水平的这条曲线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先确定 1521—1530 年间的购物筐的基数为 100,再看 1571 年的某一种工资究竟是多少:假如与购物筐相等,其数字则为 100;假如等于购物筐的一半,其数字则为 50……我们由此就能用消费单位来计算工资。第三步,根据计算单位是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或是工业品的价格,计算得出的数字恰好翻了一番。以上三言两语的说明很可能使人弄不清楚,幸好有曲线图在那里(图示 33),可以让读者心悦诚服地了解这一切。

有了费尔普斯·布朗及其合作者的以上计算,我们就能考察几份抽样调查:阿尔萨斯、维也纳、法国、巴伦西亚、明斯特、奥格斯堡、英格兰南部。按等距视角排列的一系列曲线无可争议地证实,按消费计算,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都有所下降。虽然名

义工资至少跟上工业品价格的步伐,但根据计算,实际工资却到处都降低 50% 以上,到了 17 世纪,情况慢慢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是否表面多于实在? 这又成了另一个问题。

实际工资的一落千丈恰好与 16 世纪的物价飞涨相对称。至于物价上涨的起因,有的说是美洲贵金属运抵欧洲,有的说是人口增长。究竟如何,至今没有定论,但结果却完全一样:活计更重,生活更苦,大多数人的普遍贫困化和受奴役。只要这些问题未被历史学家所解决,16 世纪的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将始终是个猜不透的谜。无论如何,当时的人往往都感觉到生活的今不如昔。古贝尔维尔先生 1560 年在日记中写道:“先父在世时,家里每天都有肉吃,菜肴十分丰盛,喝葡萄酒简直像喝水一样。到了今天,一切都变了样:百物昂贵呀! 即使生活最富裕的农民,他们的食品也还不如过去的仆人。”历史学家无视这类历史文件,真是大错特错。

我们且回过头来再看费尔普斯·布朗的曲线。在英国,生活程度的滑坡一直持续到 1610—1614 年,随后慢慢地、但不断地出现点滴改善,直到 1750 年为止。在 16 世纪的 70 年代,维也纳的生活程度急剧下降,但随后立即有所回升,下降趋势只是在 1600—1616 年以前与英格兰大体相同,在 1600—1616 年期间,情况第一次出现好转,生活逐渐有所改善,但好景并未超过 17 世纪 80 年代,后来又一次发生了相当大幅度的升降运动。

以上认识或许还有待进一步推敲、斟酌和补充。事情本身不难办到,但其效果如何,却很难说。与其如此,还不如立即指出,这些认识与威廉·阿贝尔绘制的有关哥丁根的曲线图恰相吻合。哥丁根因其大学闻名遐迩,其实不过是个小城镇,这条曲线显示出 4 个世纪期间小城镇上为殷实人家供应壁炉取暖用柴的

一名砍柴工的劳动收入,有关数据并不十分可靠。此外,砍柴的工资被折算成相应数量的黑麦,两条曲线又硬是按同样的比例尺排列,这一切都不免引起争议。然而,计算的结果却与最复杂的价格指数几乎相同:在衡量了哥丁根的砍柴工的劳动价格和黑麦的价格以后,人们看到,在 1475 年到 1580—1590 年间,工资迅速下降,随后有所回升,但回升节奏相当缓慢,而且在此期间又发生不少波折……

另一项验证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项验证,材料甚好,可惜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这项验证仅涉及 17 世纪的博韦以及博韦地区。皮埃尔·古贝尔的新著对历时百年的“下降期”(1630—1730)作了考证,所谓“下降期”是从弗朗索瓦·西米昂那里借用的一个专门术语,至少法国的历史学家对此已很熟悉。这里指的是长达百年之久的物价逐渐下降过程,也就是说,继 16 世纪的物价轮番上涨之后,在 1630 年、1637 年和 1650 年陆续出现几次刹车,只是到 1662 年以后才断然显示物价的全而下降。我们在撰写本文时,对这一缓慢和渐进的转折并不感到意外。在这 100 年期间,除开物价逐渐下降外,名义工资处于停滞状态,因而尽管购买力慢慢有所提高,长时段的严峻形势却丝毫也没有动摇。赶上好年景,雇佣劳动者大众的生活自然比较好过,随着物价下降,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毕竟还有灾年,百物腾贵,死亡率剧增。简单地说,结果是长运动带来的好处往往被短运动所夺走。皮埃尔·古贝尔在关于博韦地区的那部著作中就作出了以上的判断。勒内·巴雷尔在谈及普罗旺斯地区时,不像古贝尔那么悲观。关于这个问题,讨论并未就此结束,我们也不能抱太多的幻想。从 15 世纪到 18 世纪初期,欧洲的生活水平不断在恶化。如果有人愿意对 14 和 15 世纪的形势进行认真的

分析,这当然是件值得做的好事,这两个世纪在时间上离我们已很久远,而人的生活质量却高于后来的几个世纪。是否真如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当时正值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关于随后出现的持续动乱,我们仅着重介绍了历史经过,但没有进一步衡量其规模)?如果确实是这样的,随后出现的则必定是极度贫困化的几个世纪。

※※※

关于百年趋势,我们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作介绍,现在该是结束的时候了。我们没有全部考察完毕,只能就此打住。除开我们谈到的几个问题外,还有多少问题没有触及!例如,把百年趋势与短期价格运动区分开来是否恰当?照恩斯特·瓦杰曼的说法,这两种运动的区别“就像天花不同于肺鼠疫一样”。拉伯雷如若在世,或许会作更形象的表述……

有待讨论的问题多不胜数,这里暂且放过不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百年趋势的考证仍是蜻蜓点水和浮光掠影;真正请到现场作证的证人只有小麦以及可铸货币的金银。调查的范围既然受到限制,这就事先决定了我们的结论摆脱不开传统解释的束缚。勒内·巴雷尔认为,以各种形态出现的货币不过是披在经济实际身上的一件外衣,我们对这个说法不敢苟同,但赞成巴雷尔的另一见解,即认为金属货币并不决定一切,唯有名义价格才名副其实地称得上是价格,用金银折算价格是对名义价格的歪曲,至少也会引向片面的解释。金、银、小麦、工资等在长时段或短时段中提供见证的难度虽然各不相同,但归根到底,它们只

是在被列入物价清单的情况下才有其价值。对每种价格的衡量,就是把它同所有其他价格作对比,就是要对照经济实际,对照不断进出的货物库存,对照整个经济的结构和运动。巴雷尔关于 16 至 18 世纪下普罗旺斯地区的那篇振聋发聩的论文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项尝试。巴雷尔是否达到了目的,我们这里且不作判断,但他的意图无疑是合理的。无论是长时段、短时段或长短时段兼顾的价格史,都必须为经济整体充当见证,否则也就算不上是价格史了。

下面还要介绍有关短时段价格运动的研究概况。只是在这以后,我们才能重新回到正题上来,我们所要讨论的正题显然只可能是经济总体的问题。

三、短波:周期及周期运动

除开百年趋势以外,人们还注意到一系列短波。这些短波各有自己的名称、表象和内涵。最长的一种,持续时间约 50 年,称作康德拉捷夫周期:加斯东·安贝尔不久前就此问题撰写了一部好书⁵⁶。随后,根据持续时间的长短,逐次排列以下的顺序:“超周期”(约 20 年);厄内斯特·拉布鲁斯的“间周期”(约 15 年);所谓朱格拉周期(约 10 至 8 年,往往年限不足,很少超过);最后是基钦周期,历时最短(约 40 个月)。除基钦周期外,还有季节性运动,历时不到一年,人们只是一笔带过,几乎从不专门加以研究。

人们完全可以用“周期”一词来谈论季节运动,这不会使我

们误入歧途；该词无非确指又升又降的双重运动，而位于两种运动之间的制高点，用严格的术语来讲，又称“危机”。在各国语言中，“危机”一词尽管有超脱原始定义的趋向，但归根到底，它终究都回到本文中使用的含义。危机是割裂、间断和瞬间……

以上这些周期的分类排列显然是暂时的，今后将逐渐自动修改。确实，在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中，每一种周期都各有自己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但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学者之间互不服气，不如说是被观察到多种现实具有本质的差异，因而我们赋予它们各不相同的解释。从美国经济到欧洲经济，从现代经济到前工业化经济和古老的农业经济，周期的概念怎么可能以同样的面目出现呢？根据不同的时代，总有某一种周期脱颖而出，占据主导地位。随后，当出现重叠时，几种周期往往互相干扰，互为制约……由此便出现周期不完整的结果。根据百年趋势处于攀升阶段或滑坡阶段，周期的连贯性各不相同；此外，根据周期分别在百年趋势的顺向运动中或在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顺向运动中达到平衡，这种连贯性也各有差异。总之，每一种周期都根据不同的情形，或销声匿迹，或强化自己的功能。显而易见，时间并不顺理成章地孕育周期，在实际生活中，几个不同周期也从不是机械地相互衔接的：2—3个基钦周期等于一个朱格拉周期，2个朱格拉周期等于一个“超周期”，2个“超周期”等于一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周期与周期之间、周期与百年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又规定着一系列反作用，而作用和反作用则打乱每个周期的特殊运动，往往还影响到周期运动的方向和期限。就以法国的情形为例，1778—1791年间的拉布鲁斯“间周期”表明，两个长短不同的周期可能局部地互相汇合，以致前一个周期的后半部分实际上竟与后一个周期的全部运动合在一起。

但是,不论它们多么不规则和混乱,这些隐蔽的周期总是在制造某种阶段性和周而复始的节奏,就像物质生活中的呼吸一样;而令人十分奇怪的是,所有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却是全都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研究和经济调查中,特别是在经济预测中,数理会计学的地位正日益变得重要。

我们两人为此作过一次试验,把根据逐月记载的原始素材绘制的乌迪内城 1586—1797 年间的价格曲线送交贝尔机械计算中心,让机器去作成千上万次盲目的和诚实的运算,通过这些运算得出的价格“自相关系数”可以揭示曲线的周期性。有关的系数已在注释中一一列举⁵⁷,附加说明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因为只有专家才会对此感兴趣。但结果十分清楚:曲线承认,在相距 12 个月的时间内,价格具有一连串的亲缘关系,也就是说,在长达 200 年的历史长河中,贯穿着一连串的周期和反复……海尔费里希在一部颇具创见的著作(1843 年)中已有此预见,可惜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

这些节奏,这些相关性,这些短期的乃至长期的反复,很早已引起贝弗里奇爵士的注意。通过计算,他发现一些类似的现象每隔 15 年重新出现一次。他由此感觉到和触摸到周期性波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独一无二、从不重复发生的事实,多少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此深有感触,想到这里,我们不禁暗中发笑。皮埃尔·古贝尔面对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好年景和坏年景,以及在博韦每隔 30 年肆虐一次的食品危机(1597 年,1630 年,1691—1693 年,1725 年……),也大为惊讶,他写道:“我们难道应该归因于太阳的节奏吗?”他这里暗示的是杰冯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直到不久前才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太阳黑子周期论。有什么理由就不能相信气候节奏(或者说太阳的节奏)主宰着农业

活动(农业的波动更甚于工业)?至少,为什么不能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总之,如果我们首先根据某些实例来叙述各种周期的变迁,实例本身就足以使问题变得比较明朗。随后,我们再试图对周期进行分门别类。

季节运动

先从最小的谈起。统计学家、经济学家乃至历史学家习惯于把季节运动排斥在周期运动之外:难道季节运动是不能预见的吗?不论你在什么地方观察,你大致都能知道事情将如何展开。一位经济学家⁵⁸于1843年写道:“粮食价格(不论年景如何)总是在10月、11月和12月最低,开春后逐渐攀升,经4月、5月、6月和7月,达到顶点。”只是到了19世纪,才有来自阿根廷、智利和澳大利亚的第二次收成在欧洲上市,这是因为在南半球,季节与北半球恰好颠倒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又何必再对18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形作更进一步的调查?我们不必再为小麦和其他物品的价格差异有所担心,特别是因为季节性运动始终被历时更久的周期性运动所突破。

然而,价格运动毕竟依旧存在着。在乌迪内,小麦、黑麦、玉米以及小杂粮的每次收成都对物价造成突然的、猛烈的冲击,这种冲击对市场有时像是久旱逢甘雨,即使其影响迅速被抵消,它在短期内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终究带来好处。如果掌握每天、每周或每月的市场牌价,人们不难发现,季节运动这个“小角色”突然却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我们不妨以1673—1683年间的乌迪内为例,看季节运动在舞台上唱什么“独脚戏”。经过计

算(图示 13),曲线表明季节运动竟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它像是吹皱平静水面的狂风,这阵狂风与更大范围的台风周期相比虽然不值一提,但台风并不就此能把狂风的影响扫除干净。我们不妨设想,对每天只能量入为出的绝大多数穷人来说,物价的季节性运动,小麦价格几个月内由 14.30 里拉变为 32 里拉,整个冲击可能导致什么后果!

大家一定知道,为了弄清价格的季节性运动,还必须同时考察粮食的库存状况,以基奥贾为例,富人从冬季开始,已对下年的收成好坏有所预测,准备必要的粮食库存,政府也是如此,以免饥荒和投机猖獗。

有人会说,我们选择的例子是季节性运动特别严重的情况,这样说无疑是正确的,季节运动有时显得比较平稳。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价格周期。我们下面就来考察价格周期。

有没有基钦周期?

在考察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至少先要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基钦周期。据专家认为,基钦周期仅是现代经济的一个周期,而且主要具有美国的特色。他们说,基钦周期于 20 世纪才在美国出现,比马铃薯甲虫抵达新大陆更晚。事情是否果真如此呢?此外,我们可以相信,历时 40 个月的基钦周期相当于太阳周期(10 年)的 $1/3$,它主要反映粮食库存量的变动。但是,难道应该满足于这些听来相当顺耳的论断,而把惹人讨厌的观察结果置之不理吗?

根据我们掌握的月度价格曲线,我们决定别出心裁,力图查明是否存在某种类似基钦周期的短节奏;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受

到了皮埃尔·谢努的鼓励。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在16世纪塞维利亚的贸易曲线中，人们可以找到基钦周期的存在。由自相关系数计算得出的乌迪内曲线也显示出价格的阶段性反复，通过直接观察这些曲线，我们不难在某些阶段中区分出一系列历时3—4年的短周期⁵⁹。如果我们没有搞错，这种过渡性的偶然在其他经济中往往被埋没。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几乎要说，基钦短波主要是在价格运动比较平稳的时期显示出来的。每当10年内长波日趋活跃和经济形势变得恶化时（我们将看到，这些波动可能极其猛烈），价格的短暂摇摆便在更加有力的长时段运动的冲击下几乎完全消失。例如，在15世纪布鲁日或基奥贾平稳的价格曲线上，我们可以正确无误地发现一些短节奏的波动。乌迪内的曲线，从其开始直到17世纪中叶，同样也让人看到一系列的短波。

我们不得不透过以上混杂不清的随机运动，进而揭示肯定为经济学家感兴趣的短波的存在。在我们历史学家看来，基钦周期显然只是时隐时现，其影响也远不如所谓10年内周期（又称朱格拉周期）那么重要，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朱格拉周期几乎成为历史学家唯一关注的对象。

朱格拉周期，拉布鲁斯的“间周期”， 巴雷尔的“四倍周期”，康德拉捷夫周期

历史学家诚然都关注朱格拉周期，但他们的见解是否一致？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实际上，应该怎样去计算和衡量？特别是在人们掌握逐月价格变化原始数据（据我们的意见，这些数据并非必不可少，但

掌握它们,当然更好)的情况下,这对绘制价格曲线无疑便成为十分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因为朱格拉的 10 年内周期犹如波浪那样千篇一律地反复,每次起伏历时约 2—3 个基钦周期,但都不超过 10 年。

在考察 1500—1650 年间塞维利亚的“贸易周期”时,皮埃尔·谢努曾谈到长达 11 年的朱格拉周期,但必须指出,他说的是“贸易周期”,而并非价格周期⁶⁰。如果同时利用博韦、下普罗旺斯、巴黎、乌迪内、锡耶纳的曲线(参见下页图表),计算这些周期的平均期限,我们得出的平均数差不多是 7 年半。这并不是为了确定一个衡量尺度(衡量尺度是否存在,本身还是个问题),而是为了选择一个数量级,充当深入思考的基础。

我们要问:究竟应怎样计算和选择什么单位?历史学家对此往往举棋不定。比较明智的办法,如皮埃尔·古贝尔那样,就是暂定以朱格拉周期为计算单位,尽管古贝尔也曾不止一次建议,采用更长的计算单位,或者把几个周期合并计算,结果当然还是一样。另一些历史学家则不无道理地认为,周期既然像前后追逐的波浪一样,其影响势必是互相加强或互相抵消,周期的历史也是累积的历史。假定继一个起伏不甚明显的周期(上升趋势较长,随即略在下降)之后,接着又出现一个升势强劲的长周期,人们就完全可以据不对称法则,把前一个周期同第二个周期的上升趋势合并在一起,一直上升到最高点(即危机点)为止。

10年内周期的平均期限

		周期数量	平均年限
艾克斯(巴雷尔)	1588年至1733年	18	8.06
巴黎(默弗雷)	1588年至1728年	17	8.24
博韦(古贝尔)	1588—89年至 1727—28年	20	6.95
乌迪内(罗马诺、 斯普纳、图西)	1588年至1728年	19	7.36
锡耶纳(帕朗蒂)	1588年至1727年	19	7.31
平均年限:			7.58

举一个具体的实例总是比单凭想象更加让人明白易懂。下面就看巴黎小麦的价格曲线(图示12)。这是典型的拉布鲁斯“间周期”。从1590—1591年的周期最高点420(以1610—1616年为基数100),我们回到了1593—1594年的最低点173。我们把这几年与下一个周期合并,而下一个周期的相对高度较低,1596—1597年的最高点为201,1601—1602年更跌到最低点79。我们由此看到一个历时12年的“间周期”,下降趋势只是在1595—1597年前后曾一度出现间断。毫无疑问,从物质角度看,这12年正是一个现成的计量单位,值得我们把这个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的长时段尺度移植到历史领域中来,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正是这么做的,他以1778至1791年的间周期为依据,撰写了他的经典名著。应该承认,我们对这个计量单位,确实特

别喜欢。说到底,它的好处是通过积累,可以突出地显示多次反复的协调效应⁶¹;它把周期置于或者上升或者下降的交替活动之下,从而能扩大周期的活动范围。此外,在我们看来,这丝毫也不是统计学家玩弄的花招,而相反是观察在深层的长波作用下周期出现畸变的一个好办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另作解释。

再进一步把周期的期限延长,显然依旧是可能的。在上述的划界中,我们本可以把 1588—1593 年的周期上升部分与 1590—1602 年的拉布鲁斯“间周期”相合并,从而实现两个周期的组合,一个周期快速上升(1588—1593 年),另一个周期(1593—1602 年)因后劲不足而显得有气无力……不用说,这里的合并确实显得很不般配,历时 14 年的“超周期”(或双周期)几乎不成一个整体,因而不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与其说它是周期,不如简单地称它是“时期”。在我们看来,只是当前后两个周期形成接力,中间不存在太长的间断,并且汇成一股劲、合成一口气的情况下,“超周期”方才有用。更何况,勉强把前后两个周期结对成双,很少能有什么好处。若与皮埃尔·古贝尔就博韦地区绘制的曲线作比较,加斯东·安贝尔关于 17 世纪法国的曲线,虽然采用了“超周期”的分段方法,却不符合历史学家的设想和解释需要。

至于勒内·巴雷尔把“超周期”加倍得出的“四倍周期”,我们更不用再多噜苏了。

大家知道勒内·巴雷尔的简单方法,这是具有统计学坚实功底的一位历史学家经深思熟虑后采纳的方法:从名义价格曲线出发,通过记录各项数据,进而画出长趋势的右侧。这样去处理小麦的价格曲线并无任何不当之处。问题是这种方法每次都把

几个周期合并起来,其数量则随价格上升、停滞或下降而定。几个“30年阶段”因此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些阶段照例都汇集着4个普通的周期。请注意,周期的每一次汇集都合乎逻辑,因为它们的起伏波动重复着同一种运动,反映着同一种趋势。我们得到的是同一经济部门中物质生活的单位时间。例如,在下普罗旺斯的时钟上,1594—1625年的下降阶段集合着4个周期:1594—1602年;1602—1610年;1610—1617年;1617—1625年。随后出现的1625—1655年的上升阶段,1655—1689年的下降阶段和1689—1725年的上升阶段也是如此。

这种规律性也不是统计学家在玩什么小聪明,它是普通加法得出的结果。重要的是,周期总是遵循相同的方向编组排列。正因为如此,勒内·巴雷尔的解释与厄内斯特·拉布鲁斯的经典名著不谋而合。为着历史解释的需要,必须超越周期的局限;弗朗索瓦·西米昂采用的划分甲乙两阶段的方法,其目的正是如此。勒内·巴雷尔经过深思熟虑,不但接受了西米昂的方法,而且还接受了康德拉捷夫的分期方法。30年上升,30年下降,不折不扣是康德拉捷夫的节奏,无论周期的集合点位于30年的单斜坡或60年的双斜坡。康德拉捷夫在19世纪的价格演变中观察到了这种反复运动;勒内·巴雷尔则从直接观察事物出发,承认这个运动于16世纪初业已存在;当然,反复运动出现的时间其实更要早些。加斯东·安贝尔就1339—1389年或1420—1470年期间法国的情形绘制的曲线图难道不也显示着类似的运动吗?

周期的和非周期的解释

一系列周期组合由此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们不仅便于对历史实在分期断代，而且还能充当解释和说明历史实在的框架。然而，怎样解释百年趋势的问题，却在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引起了众多的争论。再加上长短不一的周期，争论简直就可以多得没完没了。更何况，究竟是小周期决定大周期或者大周期决定小周期，这个问题就像鸡蛋和鸡孰先孰后一样难以弄清。周期有长有短，但它们都能与“事件”相合拍，因而就极有可能被运用到政治史或短期的社会经济变迁中来（或者作为原因，或者作为结果）。

这样做不但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今天，不利用价格曲线及其长周期和短波动，从事政治、社会、人口（当然，还有经济）的任何研究，都将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把互为说明的两种运动重叠起来，不一定就能确定究竟用哪一种运动去说明另一种运动。无论如何，如果用局部的经济形势去解释周期性运动，那注定是十分危险的，只有在核实了局部的价格运动和全欧经济形势之间的明显差异以后，才能容许作这样的尝试。例如，就法国而言，谈论“胡格诺运动的周期”或“投石党运动的周期”，这就等于假定，在此期间的价格波动完全由法国的经济环境所决定。局部的小气候诚然在起作用，但作用毕竟有限。在投石党运动期间，我们将看到，物价在法国以外的欧洲各地同样在上涨，例如意大利和波兰的物价上涨甚至比法国更加猛烈。

难道战争竟如此听话，自动地作为“原因”在这里不断起作用吗？战争确实是天平上一个沉重的砝码。加斯东·安贝尔认

为,在阿赞库尔、罗克鲁瓦或丰特努瓦三次激战期间,战争每次都导致通货膨胀……但每次破坏严重的激战过后,必定都有经济重建的任务,并且出现某种“繁荣”。照这么说,战争岂不操纵一切,或如人们所说,“制造一切”(bellum omnium pater)。人们怎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假象的欺骗?人们满足于用已知去说明未知(周期波动),却不问战争是否可能兼有主动和被动的作用。战争有时甚至可能完全置身于周期运动之外。勒内·巴雷尔在对17和18世纪普罗旺斯的战争和物价作了严谨的考证后,倾向于赞同后一个论断。

如果说局部的经济环境终究不足以说明价格周期,那么孤立有限的时间之内,单凭一个周期本身就更不足以说明价格演变的来龙去脉,必须与前后的几个周期携手合作,才能达到以上的目的。

我们所需要的是双管齐下:既要价格周期在欧洲范围内作全面考察,又要进一步分析不同周期的类型,特别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周期组合类型。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为不负其使命,就更有必要沿着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或勒内·巴雷尔开辟的新路,继续从事弗朗索瓦·西米昂的创新尝试。这是以上讨论得出的基本教益。

投石党运动和克伦威尔统治期间的整个欧洲

从经济结构和长期演变看,欧洲具有极大的多样性,但就中期形势而言,欧洲的前进步伐却相当整齐一致。看来,必须承认,厄内斯特·拉布鲁斯、皮埃尔·谢努和勒内·巴雷尔的见解既是专断的,但又是正确的,应该说,欧洲单一的中期形势面对着

多种多样的经济结构。从欧洲一端到另一端,并不就像剧院中那样,一切都听舞台监督的藤鞭指挥,但经济形势的每个冲击——当时主要来自农业生产——都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即使在经济的深层,冲击与每个地区的独特历史和独特结构结合时不尽相同。因此,尽管百年趋势的轮廓可以大致被认出,但具体的经济形势却有待作切实的考察。继几位学者(特别是厄内斯特·拉布鲁斯)之后,我们说出了我们对月度价目表的偏爱。我们相信,今后进一步采用星期和天为计量单位,也是完全可能的。正如客观科学一样,在人文科学中,认识的进步往往取决于衡量精确度的改善。在欧洲的坐标上,周期波尚待作出精确的测量。我们下面就举例展示 17 世纪中叶(法国正值投石党作乱时期,英国正值克伦威尔统治期间)波及整个欧洲经济的几个周期。

我们没有任何先人为主的理由,一定要选用这个例子,还有别的例子同样可供利用。但用这个例子比较方便,因为它便于作出相当精确的计量。我们不妨把欧洲起伏不定的价格波动比作汹涌澎湃的海浪。在这 17 世纪中叶,我们有可能精确计算出几个浪花的时间,测量出它们的规模,进而再进行比较。我们在另页所附的周期运动日程表本身(图示 1)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此外,我们制作的图表(图示 17)也可充当有力的证据。据此,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断定,1640—1660 年间三次明显的价格波动席卷整个欧洲空间,其影响所及,打破了实际存在的各种地域差异。最后,在这些波动的局部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时间差距比较短。因此,确切地衡量这些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周期波的传导方向,如果真有方向的话,将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然后再逐渐弄清这些显然推动人类物质生活和非物质生活前进的节奏。图表提供的各项数据可以表明,价格的中长周期属于

覆盖范围极广的历史,可以肯定囊括整个欧洲,很可能具有世界的影响,堪称与费尔南·布罗代尔和皮埃尔·谢努先后作出的论断殊途同归。

周期相随而不相似

这里有必要就周期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表现进行比较。

勒内·巴雷尔规定的“右侧”已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比较方法:周期一律按相同的方向排列;对于朝同一方向发展的周期,我们可通过一条上升直线把它们加以组合;至于后退的另一些周期,它们也有权组合为下降趋势。我们已经指出,由此划分的“阶段”与康德拉捷夫的观察恰相吻合。康德拉捷夫周期完全不是一种计算方法,更不是想象的产物。它是介于中趋势和长趋势之间、经济形势和经济结构之间的桥梁和门户。勒内·巴雷尔一心希望牢牢把握住一个增长过程(其实也是一次结构运动),结果却不得不测定一个长时段的经济形势;想必大家对此不会感到惊奇……

难道这是在时间坐标轴线上观察周期回归函数的唯一手段吗?不。这里正好是个机会,我们想提请大家注意玛丽·克吕埃尔的颇具开拓精神的那本书(1935年),以及爱德华·杜威和艾德温·达肯的经济学论著⁶²,这些著作可惜至今不受历史学家的重视。根据以上几位作者的见解,周期组合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有的温和,有的猛烈,关键要看它位于百年趋势的上升阶段或下降阶段。例如在西班牙,贯穿整个16世纪的物价上涨趋势伴随着几个相对平静的周期,17世纪的下降趋势则相反,它带来了一系列升降幅度极大的周期。为了对这些“10年内周

期”的猛烈程度有一个概念,我们不妨回顾,在 17 世纪的乌迪内,某一周期内出现的涨幅高达 500%,堪与整个 16 世纪期间的物价上涨率相比。

皮埃尔·古贝尔也注意到温和阶段和猛烈阶段的这些周期反复。他对这一现象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我们也不能对此断然作出解释。必须多准备几份有关月度价格(或至少是季度价格)的长系列考证(例如有关乌迪内、博韦这类考证),然后分门别类作不同的比较。图示 17 展现的 1640—1659 年的周期曲线表明,周期的长短随时间和地点而各不相同。在不能完全肯定的情况下,我们暂且可以提供若干假设性说明。这些说明无论如何总是有用的。首先因为我们很难立即作出显而易见和不容置疑的解释。周期的狂风暴雨不是百年趋势持续发展的简单延伸。例如,在博韦,平稳阶段和猛烈阶段的分期完全不由趋势的运动所决定。与“30 年阶段”相联系看来也不尽可靠。玛丽·克吕埃尔认为,周期性动荡或许是百年趋势回落阶段——即所谓“接合阶段”——特有的产物;这个说法尽管往往与实际观察相吻合,但也还不能视为确定无疑的事实。考虑到已被认定的事实和可能发展前景,这里还能提出另一种假设,虽然我们 cannot 保证它完全符合实际,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投入到流通中去的货币数量有多有少。凡在金银铸币供应充足以及“黑币”并不极其缺少的地方,物价往往偏高,而与此同时,很少有引发周期风暴的可能。通货匮乏是价格恶性波动的罪魁祸首。这一论断的正确与否,还有待通过系统的和反复的考证,方能作出最后的解答。我们掌握的有限几份抽样调查,不允许我们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这场讨论因而并不到此可以结束。在科学辩论中,不存在

任何最后的结论。但是,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论证,有两点意见值得重视: 1. 为了抓住结构的本质,还应最大限度地扩展中期形势的价格门类; 2. 必须对有关数据作出更新、更多和更确切的计算。

例如,英国拥有最好的价格系列和有关专著,但这些素材和解释都偏于陈旧。如果真想抓住英国历史上的周期变迁,并拿它同英国过去发生的各种持久或半持久的价格运动作有益的比较,就应该至少以年度为单位,重新审查所有这些素材和解释。我们所能绘制的有关英国中期形势的草图确实还很不确切。正因为如此,对贝弗里奇爵士目前提出的改写其旧著的创议,我们表示欢迎。为了成为科学,人学不断要求我们调整自己的认识;每一代新人都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开发利用历史留下的遗产。

四、结论及一般性解释

现在该是对价格史的讨论作一小结的时候了;我们将试图分清每个人对价格史作出的贡献,但并不幻想单凭我们的意愿就作出定论。讨论的大门依旧敞开着。没有任何人能比本文作者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有关价格史的理论 and 解释多不胜数,人们为向困难靠拢,设法抓住始终捉摸不住的实在,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至于我们,我们并不打算提供一种崭新的理论,而想尽可能恰当地概括和比较以往的各种观点,进而指出今后还能做些什么。

货币数量理论

在作出一般性解释的时候,我们立即要与货币数量理论打交道,也就是说,一个“模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应该承认,伊尔·汉密尔顿在他撰写的关于安达卢西亚物价的最初几篇文章中并没有发明这个模式⁶³。他至多想要验证模式是否正确而已。

姑且就把这个模式当作是好的,我们也来试试,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掌握的基本事实如下: 1)价格的一般运动(为简化论证起见,我们仅采纳 16 世纪上升的长趋势,在西方的大致日期是 1510—1635 年间); 2)贵金属如潮水般涌来,其数量之大,可见诸伊尔·汉密尔顿的曲线或于盖特和皮埃尔·谢努夫妇的估测;波托西矿银产量直线上升(采用混汞法炼银)也部分地证明这个事实,这里已根据利马历史学家玛雷伊拉-帕斯·索尔旦的数据⁶⁴绘制了产量曲线。

通过比较(图示 32 和 34),1、2 两条曲线的运动前后相连接(座标使用了对数比例尺)。模式是否就此证实了呢?

埃诺迪⁶⁵和卡洛·齐波拉⁶⁶说,既是又不是。在他们以前,弗朗索瓦·西米昂作出了否定的回答⁶⁷。其他因素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例如,可以肯定,计算货币的贬值在整个这个时期始终都起作用;此外,投资和人口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当卡托-康布雷齐条约签订时(1559 年 4 月 1—3 日),历时多年的战争终告结束,意大利的重建工程需要巨额投资。

另外还要证明,货币贬值和人口增长既不是物价上涨的原因,又不是物体上涨的结果,而贵金属产量的增加则更不是早在

16 世纪初以前一直刺激和加速欧洲经济发展的动力。皮埃尔·维拉尔⁶⁸的一篇文章已就这个问题提供了必要的阐述。总之，在这结论部分，各种解释都能够，甚至都应该像沙漏一样颠倒过来，由原因转为结果，从结果变成原因。

我们已经提到了卡洛·齐波拉掷地有声的短文，以及鲁伊治·埃诺迪的见解，现在再把沙漏重新放正。换句话说，再次假定贵金属的增多是物价上涨的唯一原因，尽管我们对此并不相信。如果我们作两次连续的运算，我们在这场困难的辩论中能否把问题认识清楚呢？

1. 回过头来看小麦，我们把欧洲麦价的平均曲线先折算成黄金，再折算成白银，同时又暂且承认这些小心谨慎地得出的曲线和折算（图示 11）能切实有效地为一般价格运动充当见证。我们还要承认，在这“模式”的框架内，不仅黄金的数量在增长，白银的数量也有所增长。我们最后又注意到，从贵金属的曲线看，黄金的增长在 1600 年已经停止，白银则要等到 1660 年才停止增长。关于黄金和白银的这些“转折”，虽然众说不一，但它们所显示的不规则却不存在任何疑问。 2. 我们不打算把古斯塔夫·卡塞尔等人说过的大道理再重复一遍，而只想在 16 世纪范围内，重新考察主要来自美洲的新增贵金属数量以及欧洲 1500 年以前已有的贵金属存量。从理论上讲，货币存量只是在不断有所增加的情况下才能支撑和维持物价平衡，增加的数量自然随有关国家的经济水平而定（就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经济而言，增长率为 3%）。我们确实没有丝毫把握，可以认定这一理论完全适用于 16 世纪。就算它是适用的，那也还必须知道，当时足以稳定价格所需货币存量的增长率，特别是要知道原有的货币存量，以及促使货币实际总量增多的平均流通速度。如果一定

要得出确切数字方能满意,这个问题看来是不可能解决的,甚至是让人无从着手的。

不过,我们可以同意,数量级在历史研究中始终能提供某种有益的方位标;即使不能得出确切可靠的结果,数量级毕竟是进行论证的一个宝贵手段,只要大方向正确,使用这种手段远比审慎者的雄辩术高明得多。这里有两三种数量级可供我们计算货币总量时使用。

威廉·雅科布斯的《贵金属生产与消费的历史调查》(1830年)在统计学界早已声名狼藉,但该书建议的计算方法本身却无可厚非。据他估测,1809年的铸币总量(在欧洲流通),金银加在一起,约合47426吨白银。在这总数中扣除前些年的产量,我们就能陆续推算出以往几年的铸币存量。作者告诉我们,这里还有一项条件,即应考虑到欧洲贵金属的外流、工业消费和损耗……这一切都想得极其周到。但真要做到一连串的计算无懈可击,基数首先必须衡量准确。然而,我们不能证明雅科布斯做到了这一点。根据他的计算,雅科布斯得出的结果是,1500年前后的铸币存量(折合白银计算)约4230吨白银。尤其,用于历年扣除的产量数字大大低于泽特贝尔的估测(1895年),且不说后者又分别低于威廉·勒克西斯(1897年)、伊夫·居约(1928年)、克拉伦斯·哈林(1915年)以及伊尔·汉密尔顿(1928—1934年)的估测。如果我们认为1809年的数字是切实可信的,并且在此基础上,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历年贵金属产量,作出必要的扣除,我们就会看到,16世纪初的铸币存量水平竟低于零。

第二个计算方法:在威廉·勒克西斯计算18世纪俄罗斯货币存量之后,我们是否有权认为,某一日期的货币存量大致相当于前30年货币发行量的总和?在法国,1631—1660年间铸造

的金银币数量等于 267734871 图尔里佛,或折合白银计算,约 2259 吨。法国当时约有 1600 万居民,货币的人均拥有量为数甚微,仅 16.73 图尔里佛或 141.22 克白银。假定欧洲人口约为法国的 10 倍,且货币的人均拥有量与法国相等,欧洲 1660 年的货币存量则可达到 22590 吨白银。这个数字看来似乎不小。但是,如果在这总数中扣除已知的或估测的历年产量(1500 至 1660 年,抵达塞维利亚的黄金和白银至少分别为 181 吨和 16000 吨),1500 年的铸币存量又一次处于很低的水平,即使我们参照雅科布斯的合理意见,把货币的外流和损耗等因素全都考虑进去。这种计算方法可见仍然是失败的。

第三种计算方法,我们以为,即使不比前两种方法好,至少也不比它们差。我们拥有欧洲的黄金总量和白银总量,我们还知道两种货币金属的比价,两种金属总量似乎随着比价的浮动实现价值的平衡。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金银比价不断在变动:1500 年约为 1:10,1660 年则约为 1:14。仅仅考虑到美洲金银的大批运抵欧洲(根据伊尔·汉密尔顿的统计,1500 至 1660 年间,共有 181 吨黄金和 16000 吨白银),欧洲的金银总量理应有所增加(亚洲、非洲、波罗的海和东地中海地区的输出以及存储和损耗的数量姑且不计在内)。如果我们用 X 代表 1500 年的黄金存量(单位:吨),用 Y 代表同期的白银存量,我们就能写出以下两个方程式:在 1500 年, $10X = Y$;到 1660 年, $14(X + 181) = Y + 16000$ 。解这两个简单方程式得出的答案是: $X = 3366$ 吨, $Y = 33660$ 吨。

这项计算的前提显然还存争议。我们历来以为如潮水般涌来的美洲金银在欧洲泛滥成灾,因而一眼看到以上两个数字之大,不免感到惊讶。但如果考虑到 150 年以来的金银产量以及

自铸币诞生之日起历年的积累,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亨利希·奎林的《黄金史》一书(1948年)叙述多于计量,有关数据且并非尽善尽美。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作者统计,罗马帝国时期的黄金总产量为1700吨,中世纪为500吨。能不能把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根据我们现在的计算,1500年时的欧洲黄金存量为3000吨,这个数字与以上两个数字之和相当接近。这当然只是一种巧合,而不足以互相印证。不论我们的估测有多少缺陷,它同历史学家在以往基础上力求精益求精的努力方向却是相同的。我们不能确定这项努力什么时候能告结束,但我们认为,努力的方向毕竟是正确的。既然如此,货币计量理论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难道说,我们不仅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也在浪费读者的时间?也许是吧,但我们自有辩解的理由。直到1930年为止,甚至在这以后,我们的先辈过低估计了美洲贵金属大批抵达欧洲前贵金属的产量和存量。在他们看来,美洲的贵金属矿产在欧洲的泛滥,给原来贵金属奇缺的欧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旧大陆有史以来积聚的和投入流通的货币量为数本已十分可观,这个事实与美洲金银产量的剧增丝毫无妨,但能使人对新旧两种货币总量的比例关系得出一个全新的认识。

总之,我们认为,新大陆的贵金属流量,据最乐观的推测,也达不到欧洲原有货币存量的一半,欧文·费舍的货币数量理论及其公式因而丧失其惯有的价值,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方能对16世纪的价格上涨作出有效的解释,这个条件就是:铸币的流通速度在同期也大为增加。

这恰好正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大势所趋。在1660年前后的

法国,人均货币拥有量约 16 至 17 图尔里佛,而人均毛收入少说也有上百里佛。要使缺额得以补足,货币必须流通,如葡萄牙人品托所说,货币在完成众多使命的同时不断转手。种种迹象表明,在本文论述的这个时期内,无论在法国或别的国家,货币流通加快了速度,这一趋向早在 16 世纪肯定已经开始,而在 18 世纪则更加突出。

据此,如果打出货币平均流通速度系数的王牌,我们或许能使货币数量理论这条旧船免遭灭顶之灾。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因为除经济因素以外,这项系数势必还包含着和掩盖着众多的社会和人口因素。但问题并不完全在这里。根本的问题在于:流通速度的加快是否足以使欧文·费舍的方程式有效地充当 16 世纪价格革命的一般解释?我们以上强调了“足以”二字,因为没有人对当时流通速度的加快有所怀疑,但是加快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对此,谁也说不清楚。货币的快速流通带动了整个欧洲,并且涉及到所有的资金、财产和积蓄。用地理学家的话来说,沉睡中的大笔货币被派上了用场;经济学家则称这种现象是资本的集中。就以巴塞尔为例,在 15 世纪初,该城 7000 名居民的收入极其平均,因而那里虽然存在殷实富户,贫困却几乎绝迹,历史学家鲁道夫·苏姆对此曾赞赏不已,但这种景象在 100 年过后还能找得到吗?肯定不能。16 世纪时出现了一道鸿沟,且有日益扩大的势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依我们之见,这要归因于铸币流通的加速。显然,我们还应分析和解释流通加速的必然性和原因。此外还要知道,流通加速在造成居民不同阶层间贫富差异的同时,是否也促成欧洲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如果历史学家掌握必要的数字和数据系列,这可真是从事研究的一个好题目。

实际上,货币流通速度有快有慢,因地而异,数以十计、百计、乃至千计。塞维利亚是货币的重要集散中心,从美洲运到这里的黄金和白银属于从事国际贸易的大商人和“天主教国王”的财产。至于这些“财宝”的去向,它们或者被投入国际大宗贸易,而由于货币流通的加速,大宗贸易也加快步伐,并攫取更多的财源。或者是用于西班牙推行强国拓疆的政策:第一次是1552年,查理五世皇帝在令人惊心动魄的麦茨围城战期间(里查尔德·埃伦贝格早已指出)大开阀门;接着是1580—1590年期间,菲力浦二世皇帝又开闸放水,建立起大规模的白银流动网(菲力浦·吕兹对此作了叙述)。在这以前,西班牙尽可能阻止货币流通,以免白银流出境外,如今却让白银畅行无阻,这一大批白银的迅速流动足以带动欧洲各国的货币存量。

从此以后,新大陆每一批银条的运到都在整个欧洲的金融和贸易生活中激起巨大的反响。胡塞·让迪·达希尔瓦绘制的地图鲜明地展示了脉搏跳动的节奏。每当运送美洲白银的船队陆续抵达欧洲的各大商埠,当地立即银根松动,现金充裕,接着汇票也一一签发。由此,来自塞维利亚的白银从一地到另一地不停流动,而每到一地,用以清理欠帐的数额可达其自身数额的十倍乃至百倍。如果我们掌握有关交易会的清帐数字,大家就会发现交易数额的巨大增长。总之,铸币也罢,汇票也罢,钱就这样从一人转移到另一人的手里,从一个商埠流动到另一个商埠。举几个例子,就足以使大家想象这一切。在16世纪的罗马,每年的现金流通量竟与塞维利亚不相上下。从1575到1602年,威尼斯使用62吨黄金铸造色庚,比塞维利亚同期接受的52吨黄金数量更大⁶⁹。法国1493至1660年间的货币铸造额高达4133吨白银(金银铸币均包括在内),相当于同期抵达西班牙的

“美洲财宝”的 1/5 强和 1/4 弱。对于这些雄辩的庞大数字,我们不必感到莫名惊诧。在我们的欧洲,金币和银币就像由奥芬巴赫作曲的一个轻歌剧中的火枪兵:它们不停地转圈和又来又往,但转来转去,始终还是或差不多还是原班人马。

然而,在这些交换中,并非全部运动都是对称的和有规律的:圈子并不始终都能合拢。长期的货币外流也不难见到,历史学家早已发现,金银铸币经由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乃至好望角,流向近东地区或更遥远的地方。尤其,西班牙白银(因政治和商业需要)有自己的特定流通过程。我们的地图(图示 10)表明,它们优先流往意大利,因为白银要经由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中转,正是通过白银发汇和黄金支付的帐面往来,西班牙才把资金转到尼德兰。在安特卫普这个因战争而腐败滋生的金融中心(其腐败程度可与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的西贡相比),集中着大量的货币,后者陆续向北方各地区扩散,首先是向反叛的尼德兰地区扩散。

除了上述政治通道之外,还有大宗贸易的经济通道。而经济通道的目的地之一仍是北方地区:西班牙要靠北方供应小麦、铜、锡、木柴、厚薄木板、亚麻和苧麻织物以及高级衣料。每年都有价值一二百万埃居的货物几乎堂而皇之地从北方运往塞维利亚。对北方地区的贸易人超使西班牙和葡萄牙把剩下的一部分黄金和白银用得一千二净。意大利从对西贸易中也获利不少,但意大利对东地中海地区支付的款项为数巨大。在 1595 年(创记录的一年),威尼斯对叙利亚的贸易逆差就达 551677 杜加,折合白银 14700 公斤。这是意大利为其奢侈、虚荣和摆阔付出的代价。

百年趋势的不均衡性不可能仅用以上的解释加以说明。遵

循货币数量理论的思路,根据我们绘制的折合白银计算的麦价图表,我们或许能想到,由于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某些地区(例如地中海地区)的货币供应历来比其他地区更加充裕,货币经济也较为发达。在 17 世纪,如果把勒内·巴雷尔笔下的普罗旺斯与皮埃尔·古贝尔考察的博韦进行比较,前者的现金流通量比后者多。弗朗克·斯普纳就 16 世纪法国货币分布的不均衡描画了一张草图。人们大致可以认为(例外恰好证实规律),北方地区投入货币交换网的程度长期不如南方那样深。金银数量少意味着物物交换和自然经济的成分多。在垂直的纵坐标上,北方的城市经济依靠很不发达的乡村(一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所养活。因此,无论在纵向或横向,北方对铸币和贵金属的消费(广义上的消费)总是不如南方。北方的经济构造更简单,经济基础更坚实,因而不像南方那样对贵金属挥霍无度,这种状况至少维持到 17 世纪的第一次转折,甚至直到 18 世纪初;那时候,欧洲的经济高涨终于把局面完全颠倒了过来,使以往的穷人变成了新富人。

以上的辩护是我们从货币数量理论得到的启示。但这里必须重申,辩护就是辩护,我们进行辩护并不等于承认自己理亏。

我们本可以花更多的篇幅详细阐述。继威纳尔·桑巴特之后,巴西历史学家曾提到过 1680—1720(或 1730)年间米纳斯吉拉斯、马托格罗索、巴伊亚“荒漠”投向欧洲市场的价值 5—6 亿皮阿斯特的黄金,这些黄金就值得作进一步的考察。难道黄金将从此在欧洲市场或在国际市场走俏?或者,黄金数量的充裕将再次促使白银开采的发展,促使新西班牙的银矿经历了比第一次繁荣更加辉煌的第二次繁荣。关于这些数量问题,可惜至今没有人通过计算提供答案。我们暂且只能满足于假设……但

有两件事可以肯定：欧洲货币存量在 18 世纪大大增加，货币流通速度也有所加快。我们就 1660 年的法国计算得出的数字显得过低，货币存量仅 2.67 亿图尔里佛；据古典经济学家的估计，1789 年的流通总量高达 20 亿图尔里佛。即使把名义货币贬值因素考虑在内，即使有关总量的数字不甚准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期间取得的进步毕竟是巨大的，它对形式多样的价格运动具有一定的影响。

价格、工资与资本主义

我们不能躲开而必须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价格史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孕育有无帮助？我们不会忘记，伊尔·汉密尔顿在其富有开拓精神的鸿篇巨著中已经提出过这个至关重要的难题。

问题难以回答，这有成千上万条理由。我们已经说过，有关价格史的考证既不扎实，又很片面，这些缺点在涉及工资的特殊问题时显得尤其突出。此外，资本主义不是普通的人物或概念。甚至在 1750 年前，资本主义已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对资本主义所下的定义又因人而异，这使对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亨利希·贝希特尔和赫伯特·黑吞最近甚至主张禁止使用这个争论不休的词。但资本主义一词刚被从大门逐出，又从窗口钻了进来。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多种功能、历时十分长久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个定义的条件下，勉强用短时段的现象去说明长时段的结构，就决不有什么好结果。前者对后者的缓慢成长或逐渐衰退显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用这些转瞬即逝、自生自灭的因素解释资本主义的全部命运，似乎是不够的和并

不始终恰当的。伊尔·汉密尔顿在其青年时代曾发表过一篇文章⁷⁰，正确地强调了发现新大陆以及后来华斯哥·达·伽马(1497—1499年)的远航(开辟了欧洲、印度和远东之间的海上通道)对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性。他还正确地指出，在通货膨胀期间，工资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为企业及资本家创造了一份额外的利润。这条一般规律当然也有其例外，根据不同的场合，它具有不同的历史表现方式，它从属于一个范围更广的历史真理，用卡尔·马克思或用阿尔弗雷德·索维的话来说，就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是受社会要求和可能所支配的一个变量，因为有关社会的要求和可能本身就是可变的。

总之，人们要抛弃伊尔·汉密尔顿的理论，并不那么容易。但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没有搞错，如何使这些理论更加完善。任何经济形势，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仍然是一种偶然，资本主义既然是结构，而由其本质所决定，结构势必高于偶然⁷¹，无论是伊尔·汉密尔顿向我们指出的偶然，或者是我们在考察18世纪欧洲麦价趋向均衡时提到的偶然。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在短时段和长时段全都扮演几个角色，从事多项活动。

我们先看资本主义在短时段有何作为，以便把问题的整个轮廓勾画清楚。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16世纪末的威尼斯，面对海上航运的风险日益增大，资本家纷纷知难而退。虽说在15世纪，海上的私掠活动已十分猖獗，但从16世纪开始，私掠活动竟被宗教战争所取代(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战争，新教对旧教的战争)，而到了17世纪，则已转化为名副其实的海盗抢劫。在这种情况下，威尼斯资本家岂不就此断了财路？

一位在威尼斯定居的佛罗伦萨商人(据1606年商界五贤人的一份报告称，佛罗伦萨商人当时在威尼斯城堪称首富)，为了

保住自己的财富,就致力于收购房产和出租房屋;至于也在威尼斯定居的一位热那亚人,他所从事的活动是进口白银,开展汇兑投机;另有一位土生土长的威尼斯旧贵族(家产比较殷实,没有因境遇变迁而沦落为穷人,这些旧贵族因通常住在巴尔纳巴上等居民区而被称作“巴尔纳巴人”),他为保住自己的钱不受损失,正如我们从几份公证文书所见到的那样,往往从事对贝桑松的汇款业务(应该说明,这里的汇款实际上是一种有息贷款,但息率不高)。但对所有的资本家而言,他们的主要投资方向还是购买土地和改良耕作(威尼斯小麦产量的巨大增长应归功于他们,但从中获利的也正是他们,这里顺便提醒大家,归根到底,农业毕竟是欧洲最大的产业部门)。当然也有人把钱用来做呢绒生意,但这类投资越来越少。原因无疑是呢绒行业的工资较高,限制了企业主的利润,再加上北方呢绒的竞争,资本家纷纷放弃了这个行当。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的活动五花八门,多不胜数,怎么可能适用于一条简单的规律?

人们因此赞同皮埃尔·维拉尔在《过去和现时》一文中的表达的意见:不论人们下什么定义,资本主义始终是一种结构,或者说是一个缓慢萌发的现象,而在萌发的过程中,始终具有多种的价值。伊尔·汉密尔顿和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只抓住价格和工资之间的一个暂时的水平差异,这种短暂运动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但单凭这一项,他们的解释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皮埃尔·维拉尔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而我们则主张以结构为出发点,无论如何,资本的历史还有待大家认真地加以重新研究。我们至此只是抵达了重新考察的门口。价格史仅为我们推开一道门,但并不是主要的门。

价格史和系列史

价格史确实很不完备,只能成为系列史⁷²中的一章,虽然是最早构成的章节之一,因为系列史本身几乎也要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可是,只要系列史并不比自己的手段、目标和结果更加宽广和更加可靠,价格史在这部主要用数字构成的历史中将始终是范围极其狭窄、不能有效地覆盖广阔领域的一个章节。

一部真正的系列史应建立在有效地互为联系的若干组系列的基础之上,这些系列就像应召出庭作证的见证一样,而历史法庭则应习惯于接待这些奇特的来访者。可惜,根据历史研究的现状,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开展系列史和非系列史之间的对话。

在作了以上交待过后,我们再看有哪些系列——业已存在、即将出现或可能形成的系列——可作我们的依据?

恒等系列和趋近系列。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显然是补充和增多我们已有的价格系列;对那些资料尚未认真清查整理的广大地区(巴尔干半岛、莫斯科公国)加紧探测;在别处扩大抽样调查,甚至把欧洲赖以兴旺发达的非欧洲地区也包括在内;尽可能把不完整的系列补齐,例如纺织品价格系列(数据不全使我们对这个本该掌握的重要工业部门丧失了控制);然后再对房地产的售价进行调查。威廉·阿贝尔曾试图推断房地产售价的长期演变趋势⁷³;H. 哈巴古克⁷⁴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对价格的系统研究;阿尔杜·德·马达列纳⁷⁵则撰写了一篇颇具开拓性的论文。

关于趋近系列,我们这里主要是指有关借贷利率的系列。在这方面,伊尔·汉密尔顿计划开展的大规模调查能否覆盖 15

至 18 世纪的整个欧洲？我们所说的调查也将涉及到企业的利润率。直到目前，对企业的利润率，还从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调查。然而，假如对里斯本从亚洲的贸易活动中攫取的前所未闻的红利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此事本身岂不为认识 16 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进程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德国商人卢卡斯·雷姆的发财致富就是一个极好的事例。如果能对热那亚商人 16 世纪在各大商埠获得的利润作出特别富有成果的考证，我们据此也就可以推算出当时实行的汇率以及各种商品的价格。可是，我们究竟要等到哪一天，才能随意支配商人们的文书和帐册？

国家的财政预算和平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以及其他系列更加难以计算。H. 格罗特一度曾试图用“最低工资”充当衡量平民大众生活水平的基础。在皮埃尔·古贝尔考察的博韦地区，不论年成好坏，这一生活水平相当于 6 口之家约消费 500 公升小麦，这个数字具有方位标的价值。但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方位标。特别是要能够计算出每人每天消费的食品热量，尽管这些计算得出的临时的或永久的结果会像货币数量理论刚才向我们提供的认识那样纯属推测。无论如何，反复考察这些问题仍然是值得的，那怕遭人讥笑也在所不惜。既然无从得出确切的数字，在一般情况下，求得不完整的数据（数量级）也就有其重要性；数量级虽然名声不佳，但毕竟是个十分宝贵的助手。

独立系列或平行系列。在这个名目下，一组曲线——人口曲线——十分自然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据我们的了解，在使用人口曲线与经济形势相对照这方面，应该说是皮埃尔·古贝尔的常被人们引证的那部著作作用得最好：人口危机与食物危机恰相吻合，物价上涨与死亡率增长又不期而遇。在经过确切的验

证后,人们对已知的事情,如今知道得更清楚了。在计算死亡率和出生率的过程中,人们也注意到长周期运动乃至百年周期的存在,这项假设虽然尚未完全被验证,但如今将被人们所接受:皮埃尔·古贝尔的尝试为后人的研究和思考打开了合理的大门。

就以 16 世纪的人口增长为例,如果我们局限于计算人口数字,正如我们刚才在考察货币的数量理论时那样,我们很可能会把这些数据的变化仅仅归结为一场灾难的结果:欧洲的出生率在 15 世纪中叶开始缓慢而有力地增长,随后于 17 世纪急剧回落,跌入谷底(西班牙的人口下降出现最早,时间约在 16 世纪末,法国和欧洲的人口普遍下降,尚要等到 17 世纪中叶)。由此可见,与黄金或白银相比较,人口增长堪称是一股“原动力”。人口增长首先带动了 16 世纪的价格急剧上涨,接着又导致 17 世纪头 30 年的涨势趋缓。就在进入 17 世纪的前后,最佳人口指数终于被突破。总之,根据阿尔弗雷德·索维言简意赅的名言,人口增长最初是好事,后来是坏事……所有这一切说来十分动听,而且事情很可能就是如此,更何况又不难得到实例的检验。研究工作从此可以走上康庄大道。

此外,从社会角度看,情形又是如何呢?社会一词含义笼统,它囊括着历史研究的许多模糊的问题,很难或几乎不能用统计数字加以说明。厄内斯特·拉布鲁斯 1955 年在罗马代表大会上倡导开展的对社会结构的大调查,与贝弗里奇爵士于 1933 年主持的价格大调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调查的对象主要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调查究竟应参照什么社会数理模式?得出什么系数,从而为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提供一个合乎科学的正确形象?难道使用定性分析的模式(确定一个社会究竟是开放的,或者是封闭的:例如,从 16 世纪初到 16 世纪的最后十年,法国社

会是个开放的社会),就意味着把赌注押在社会变动的一边吗?这不过是从事社会分析的方法之一而已,根据这种方法,人们把迟钝笨重但并非一成不变的社会大厦同时放在短时段和长时段中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先后观察社会的中期演变和百年趋势。我们以为这样做是可能的和合理的。种种迹象表明,在百年趋势的回落期,社会停滞不前,等级森严,内部流动的渠道遭到堵塞。在整个17世纪,尽管也曾出现某些革新,但社会的目光却是转向过去……

但是,为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历史学家就必须借鉴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以必要的谨慎和胆识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来。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离这个要求已经不远。当这一障碍终于克服时,历史学的脱胎换骨也就势在必行了。

贸易和生产。价格系列势必要与贸易和生产的会计系列作比较。在这方面,一场大辩论才刚开始。大家注意到尼娜·班格和克努特·科斯特就1497至1783年间厄勒海峡关税征收问题撰写的著作。通过对这部巨著的广泛讨论,有关数据得到了核实,该书的创新意义也被大家所认同。从历史的角度看,于盖特和皮埃尔·谢努的著作意义更加重大。全靠他们的考证,我们今天终于得知塞维利亚在欧美之间的贸易数额(1502—1650年),他们还许诺把加的斯1784年前的贸易额计算出来,这两项计算使我们对近代初期世界主要流通渠道之一几乎完全衡量清楚。相比之下,任何其他贡献简直不值一提……

从此,我们就不难回答价格与贸易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从厄勒海峡的海上交易或从伊比利亚半岛的大西洋贸易来看,答案幸好是一致的。贸易和价格运动大体上协调一致,没有明

显的差距,价格运动伴随着日益增长的贸易,前者与后者明显地同步发展,甚至几乎是一气呵成。这一认识使人们终于把有关价格问题的讨论从所谓专家们限定的狭窄天地中解放了出来。

价格既然随流通而变化,那生产又起什么作用呢?皮埃尔·谢努指出,生产也是决定价格的一个因素,但是间接的因素,价格与生产看来互为函数关系,但变量的这种相互关系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实际上,我们对当时的生产知之甚少。以16世纪为例,这里仅有三条曲线,而且这些曲线在我们看来还不够长:1378—1676年间翁斯科特丝毛哔叽的产量;威尼斯高级呢绒的产量(历时两个世纪);莱顿丝毛哔叽的产量。严格地讲,波托西矿的产量曲线也可充当见证。我们不再停留在欧洲的地域范围内,欧洲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为行将问世的国际经济充当矩阵和框架。路德维希·伯丹在他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我们向他提供的波托西矿产曲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说过这些以后,我们再通过图表进行验证(图示32)。与价格运动(仍然是小麦的价格)相比,这三条抛物线先往上升,然后笔直下降。我们这里见到的是经济辩证法的传统实例:一边是不可逆转的价格运动,另一边是可以逆转的数量运动。如果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我们也就可以不费力气下个结论,算是大功告成了:既然数量运动落后于价格运动,前者必定是由后者所启动的。但是,如果反过来看,价格上涨的趋缓却使纺织品和矿产品的产量增长比价格上涨本身下降得更快。这后一种现象尚未得到证实。我们还需要有一条或两条新曲线,看百年趋势上升和下降期间的价格差距在欧洲各地区是否与产量的增减幅度完全相符。例如,莱顿的情形究竟又如何?关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回答。

我们还要知道,东普鲁士麦播地面积的增减(记录农产量的依据),尼德兰排水造地的加速进行(也是记录农产量的依据),是否随着价格百年趋势的升降而变化。我们的图示已十分清楚地展现了有关数据,不必我们再作解释,但数据本身解决不了它们提出的各个难题。

※※※

大家想必可以看到,以上的结论最终还是落空。在我们看来,价格史的缺陷并不仅仅在于资料不足或资料使用的不够充分。关键还在于如何把这些资料运用到有关经济增长(勒内·巴雷尔的贡献正是他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去考察普罗旺斯的价格问题)和社会演变的讨论中来。人们往往把两个问题混淆在一起,似乎经济增长始终意味着社会进步,或反之亦然。马若兰在谈到欧洲共同市场时写道:“从长期看,任何经济扩展总是对人有利的事,但这一结果要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示出来。在这以前,急剧的价格运动很可能会打破原来的旧结构,改变就业的地理分布和行业分布,转移经济活动的重心,从而使一些人受益和使另一些人受害。”他随后又指出,经济扩展可能意味着社会危机,甚至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

我们认为以上思考完全适用于中世纪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我们甚至想说,经济增长的问题要在长时段中加以考察,而百年趋势的价格曲线则合理地可被视为有关经济增长的几乎不可缺少的见证:物价上涨=扩展=经济增长。这些当然都可以肯定。但价格并不仅仅是经济的见证,它是影响工资(工资是劳

动力的价格)增减的一个因素。当价格被认为是生活水平的准绳,而不是经济扩展的准绳时,价格曲线又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价格运动的社会意义又究竟是什么?就我们这里考察的历史时期而言,即令有关价格曲线的数据整理得极其完备和极其可靠,我们也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找到一条新的思路,使周期运动以及因被视为纯属多余和只会扰乱经济正常运转的价格大起大落,重新取得头等重要的地位。为此,再没有别的方法能比进行周期比较更好的了;勒内·巴雷尔和皮埃尔·古贝尔对同期的(17世纪的长周期)普罗旺斯和博韦地区分别作了考察,他们把这个长周期的120年时间划分为4个时期,并且分期的具体日期几乎恰相吻合。当博韦地区处于繁荣的阶段时,普罗旺斯正值经济衰退。而当普罗旺斯蒸蒸日上时,博韦地区却是灾难深重。更具体地说,勒内·巴雷尔采用西米昂的术语,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把周期划分为甲乙两阶段。而皮埃尔·古贝尔则从社会危机的角度,根据周期增长的猛烈程度把周期划分为“丰年”阶段和“灾年”阶段。两条价格曲线的运行方式大体相同,只是两位作者注意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在这基础上,我们不妨补充说,在普罗旺斯,周期性危机的力度较弱,而增长阶段(即甲阶段)在博韦地区不甚明显。此外,对各自的曲线,两位作者提出的问题不同,因而得到的回答也就不同。

鉴于价格史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的既多,对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又提供不了任何切实的答复,我们这里当然也就无从作出结论。总之,作为剑桥史的一章,本文旨在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工业革命前欧洲的价格充当见证。价格史表明,欧洲既有众多实体各自为政、互不干扰的一面,又有互为联系、不可分割的一面,随着时间的流逝,统一的趋势将使欧洲经济汇合在一个共同的

命运之下。这个趋势促使我们在惊诧之余,提出成千上万个问题,从事成千上万次求证。开拓全新的视野,迎接崭新的任务,这难道不正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可靠的途径吗?历史学从没有一成不变的结论。

注 释

1. 本文系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弗朗克·斯普纳合作的成果。文章由布罗代尔执笔撰写,斯普纳负责各项数字的计算。1967年,当《剑桥欧洲经济史》出版第4卷时,本文以节录形式,被收入该书。

2. 亚·沙佩尔:“再论16世纪价格革命”,见《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7年。

3. 斯·哈斯佐夫斯基:“面对价格革命的中欧”,见《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1年。

4. 大·费利克斯:“利润膨胀与工业增长:历史记载及同期类比”,见《经济学家季刊》,1956年。

5. 朱·帕朗蒂:《佛罗伦萨价格革命初探》,1939年佛罗伦萨版。

6. 皮·古贝尔:《1600至1730年间的博韦及博韦地区:17世纪法国社会史引论》,1960年巴黎版。

7. 纳·德威伊:《论圣路易治下到货币十进制建立期间图尔里佛的演变》,1857年巴黎版。

8. 牛津大学的C.B.温斯顿。

9. 巴黎大学的G.吉尔博。

10. 吕·罗马诺、弗·斯普纳和乌·图奇的部分成果刊载在《威尼斯集市历史论文集》,1960—1961年。

11. J.旺胡特:“14至16世纪的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究竟是‘民族商埠’

或者‘国际商埠’？”，见《北方评论》，1952年。

12. 恩·瓦杰曼：《充当侦探的数字》，1952年慕尼黑版。

13. 费·布罗代尔：“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见《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8年。

14. 马莱斯特罗瓦先生：“马莱斯特罗瓦帐房师爷 1567 年 5 月 16 日的日记”，见鲁伊治·艾诺迪编辑出版的《奇闻轶事》，1937 年都灵版。

15. 卡洛·齐波拉：《米兰国 1580—1700 年间的货币运动》，1952 年版。

16. 威·勒克西斯：“贵金属统计论纲”，见《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79 年版。有关素材由列宁格勒隐士博物馆俄罗斯货币部主任 G. 斯帕斯基提供。

17. G. 科尼格利奥：“西班牙统治期间那不勒斯的食品与价格”，见《那不勒斯省历史档案》，1940 年版。

18. 顺便指出，主要计算货币往往有价值高低不等的辅币或其他计算货币相伴，如英国先令值英镑的 $1/20$ ，西班牙杜加值 375 个马拉维迪，威尼斯杜加等于里拉的几倍。

19. F. J. 费舍：“16 世纪的贸易趋势与政治”，见《经济史评论》，1940 年。

20. 吕·罗马诺：“殖民地经济：18 世纪的智利”，见《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0 年。

21. 弗·斯普纳：《世界经济与 1493—1680 年间法国的货币铸造》，1956 年版。

22. 费·布罗代尔和弗·斯普纳：“16 世纪的货币金属与世界经济”，见《罗马国际代表大会文件集》，第 4 卷，第 233 页。

23. 让·德吕莫：《16 世纪下半叶罗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1957—1959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667—668 页。

24. 沃尔特·安德森：“关于拉古萨货币总量和货币体系的材料”，见《社会经济史季刊》，1935 年。

25. 皮·古贝尔，见前引书，第 141 页。

26. 贝纳尔·施纳发:《16世纪的年金》,1957年巴黎版。
27. 费·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第一版,第407页。
28. 我已把这份资料交给一位年轻的西班牙历史学家,他已开始加工整理。
29. 伊·德·品托:《奢侈论》,1764年版。
30. 顺便指出,专家们想必知道,这里还要考虑到弗罗林与金银的比价。
31. 弗·斯普纳将单独撰文,详细阐述有关汇兑的各个问题。
32. 弗·斯普纳,见前引书,第308页。
33. 马克·布洛赫的用语。
34. 我们联想到詹姆斯·斯图亚特所下的定义:“就其本身的价值而言,计算货币的作用与测角的度分秒以及地图的比例尺相同。”见《詹·斯图亚特著作集》六卷集,1805年版,第2卷,第271页。
35. 甚至可以说,“互不相关”。参见瓦尔特·阿基里斯:“16至17世纪欧洲的谷物价格与谷物贸易”,见《农业历史学和农业社会学杂志》,1959年。
36. 斯·哈斯佐夫斯基,见前引文。
37. 或不如说波兰北方的小麦。瓦尔特·阿基里斯对此有保留,见前引文。
38. 维·马·戈蒂诺:《葡萄牙的价格与货币》,1955年版。
39. 皮·谢努:《塞维利亚与大西洋(1540—1650年)》,第8卷,第781页。
40. 雅·旺·克拉夫伦:《16至17世纪西班牙对欧经济关系史》,1960年。
41. 我们说过,在百年趋势问题上,历史学家没有任何重大分歧。但对使用“价格革命”一词形容16世纪长期的物价上涨,却有一场小小的争论。

“价格革命”并不是伊尔·汉密尔顿或费尔南·布罗代尔生造的用语，至少格奥尔格·维贝(1895年)早已用过。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比喻未免过火。一位历史学家(皮·古贝尔，见前引书，第499页，注17)称：“哪有‘持续百年之久’的革命”？专攻16世纪史的加斯通·泽勒于1948年大声疾呼：“对这种事，我们已经见多不怪”。我们是20世纪的人，我们当然已经见多不怪，但16世纪的人，如马丁·德·阿兹皮库塔(1556年)、马莱斯特鲁瓦(1566年)、让·博丹(1568年)等，他们没有经历20世纪的机遇，面对当时前所未见的物价飞涨，他们在错愕之余，怎不感到惊慌……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观感，推测前人的心情。卡洛·齐波拉也对革命一词提出异议(见“从意大利的经验看所谓价格革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5年)。他就物价上涨率所作的比较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辩中声称，意大利只是在16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物价上涨，而原因则要归诸卡托-康布雷齐和约(1559年4月1—3日)后国家重建工程的高涨。就算如此，那么，为什么其他各国也同样发生了物价上涨呢？

我们对皮埃尔·谢努的见解更加重视(格奥尔格·维贝也曾提出过类似的意见)。他认为，价格浪潮其实并不像人们一眼看到的那么大，而且也不如埃诺迪测量的那么大(见前引书，第23页：1471—1472年至1590—1598年期间，法国名义价格上涨率达627.5%)。皮·谢努接着又说，这部分因为要补偿1350—1450年间价格退潮时留下的空缺(格·维贝则以为，对退潮的补偿仅在1520年左右完成)。这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任何浪潮是否必定都是如此的呢？那么，为了衡量18世纪的物价上涨，是否也要事先扣除17世纪的价格下跌呢？

无论如何，如按习惯从零出发进行测量，16世纪的价格涨幅毕竟是巨大的。但在我们看来，单凭这条理由，仍不足以促使许多历史学家称它是一场革命。哪怕它半途中止，我们依旧认为这是革命(这里要摈弃该词的词原意义，并把它看作是词义业经习惯改变了的一个常用词)，意思是指情节曲折、影响甚广、历时持久的一次创造性的革新，新旧之间由此出现的新裂可充当历史断代的标识。且听博丹、马莱斯特鲁瓦、马丁·德·阿兹

皮库塔等人的证词,且听哈斯佐夫斯基讲述的价格不停上涨在波兰引起的困惑反应,我们一定会相信,生活在16世纪的人,尽管经历过以往的危机(有时十分猛烈),却猛然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新现象,这种新现象撇开一切常规,脱离各种已知的原因,带动物价和工资一往无前地上涨,达到空前的高水平。这种意识不折不扣正是16世纪的价格革命。

42. 大家记得,葡萄烧酒和粮食烧酒实际上只是从16世纪起,开始作为商品出现。

43. 让·普索:《零工》,1859年版,第12页。

44. 保·克莱芒:《柯尔贝尔书信文件集(1861—1882年)》,第2卷,第624—625页。

45. 安达卢西亚葡萄酒和食油价格上涨比小麦快,原因要从美洲市场方面去找。

46. 古·施穆勒:“肉食消费的历史演变”,见《一般政治杂志》,1871年。

47. 约·内夫:“1540—1640年英法工业增长之比较”,见《政治经济学学报》,1936年。

48. 夏·德凡兹:《16世纪法国森林概况》,1936年版。

49. 汉·赫·韦希特尔:《16和17世纪东普鲁士领地的外围经济活动》,1958年版。

50. 巴黎国家档案馆的《经济档案》(B),第3卷,第235页。

51. 维·库拉:“历史与经济:长时段”,见《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0年。

52. 中欧采矿业的繁荣抵抗不了效益递减的法则,以及16世纪中叶美洲银矿的冲击。到了17世纪,又因遥远的日本铜矿生产而衰落。

53. 皮·古贝尔,见前引书。顺便指出,从短期看,亚眠的麦价和铁价经常此长彼消。用铁铸造的犁铧,其主顾不正是农民吗?

54. 厦·韦尔兰登:“16世纪比利时的价格运动和工资”,见《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5年。

55. 家庭支出分列如下：

淀粉类食品	20%
肉和鱼	25%
黄油和奶酪	12.5%
饮料(啤酒、糖、茶)	22.5%
取暖、照明	7.5%
纺织品	12.5%

合计 100%

材料来自费·布朗和歇·霍普金斯：“700 年消费品价格与建筑工人工资的比较”，《经济学家杂志》，1956 年。

56. 加·安贝尔：《论康德拉捷夫的长时段运动》，1959 年版。

57. 乌迪内小麦和玉米月度价格的“自相关系数”(1586—1797 年)迅速下降，但后者的下降速度(每两年减少 0.5)不如前者(每年减少 0.5)快。然而，周期运动对小麦的影响更加明显。经过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约 21 年)后，两种价格系列的自相关系数再次下跌。不能完全排除此事与“超周期”几乎完全巧合。

月份	自相关系数		月份	自相关系数	
	小麦	玉米		小麦	玉米
1	0.96	0.97	316	0.12	0.20
13	0.53	0.70	373	0.13	0.20
25	0.33	0.48	385	0.11	0.14
37	0.32	0.38	397	0.17	0.10
49	0.33	0.35	409	0.13	0.11
61	0.32	0.36	421	0.08	0.11
73	0.33	0.39	433	0.06	0.07
85	0.36	0.40	445	0.05	0.07
97	0.39	0.32	457	0.04	0.03

月份	自相关系数		月份	自相关系数	
	小麦	玉米		小麦	玉米
109	0.29	0.19	469	-0.01	-0.03
121	0.30	0.18	481	-0.08	-0.06
133	0.30	0.21	493	0.05	-0.03
145	0.27	0.20	505	0.13	-0.01
157	0.24	0.21	517	0.10	-0.03
169	0.34	0.26	529	0.13	-0.03
181	0.33	0.29	541	0.12	-0.05
193	0.28	0.27	553	0.08	-0.04
205	0.25	0.24	565	0.04	-0.01
217	0.30	0.24	577	0.01	0.05
229	0.34	0.29	589	0.06	0.07
241	0.33	0.31	601	0.05	-0.01
253	0.34	0.33	613	-0.05	-0.06
265	0.29	0.31	625	-0.06	-0.06
277	0.26	0.27	637	-0.01	-0.04
289	0.26	0.20	649	0.02	-0.04
301	0.24	0.15	661	0.04	-0.04
313	0.20	0.13	673	0.03	0.03
325	0.18	0.16	685	-0.03	-0.03
337	0.12	0.17	697	-0.002	-0.06
349	0.13	0.18	709	-0.01	-0.09
			721	-0.06	-0.12

58. 威·罗雪尔:《论谷物贸易与物价上涨政策》,1852年版。值得指出的是,乌迪内的季节最低价位于7—8月。但罗雪尔这里以德意志为例,德国的收获季节来得较晚。

59. 在乌迪内的价格曲线上,尽管存在几个相当模糊的段落,人们通

过直观却能发现一种短节奏,节奏的平均期限略低于 39 个月。

60. 实际上,在价格周期和贸易周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

61. 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正确地指出:“如果孤立地考察 1789 年的危机,不把它同危机前的长期萧条联系起来,1789 年的崩溃是不可理解的”,见《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危机》,1944 年版,第 22—23 页。

62. 玛·克吕埃尔:《价格的长时段运动》,1935 年版;爱·杜威和文·达肯:《周期:预言的科学》,1950 年纽约版。

63. 伊·汉密尔顿:“美洲贵金属与安达卢西亚的价格(1503—1660 年)”,见《经济史和贸易史学报》,1928 年。

64. 玛雷伊拉-帕斯·索尔旦:《关于波托西矿两份有价值的文件》,1953 年利马版。

65. 鲁伊治·埃诺迪就马莱斯特罗瓦与博丹的论争事后作了裁决,并参照保尔·勒沃收集到的 1471—1472 年至 1590—1598 年间的数,得出了以下的判断。在这一百多年期间,物价水平由 100 上涨到 627.5(名义价格)。其中,35.47% 的原因属于图尔里佛的贬值(等于价格提高 226.4%);剩下 64.53% 的原因(等于价格提高 404.9%)属于其他原因,包括美洲金属抵达欧洲在内。最后一个因素在价格革命中承担的责任占价格上涨比率的 299.4%,也就是说,105.5% 的价格上涨比率要用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解释。毫无疑问,任何人(甚至包括作者在内)都不能认为这种计算是准确无误的。但作为论证的一种假设,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手段。

66. 卡洛·齐波拉:“从意大利的经验看所谓价格革命”,见《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5 年。

67. 弗·西米昂:《关于 15 至 16 世纪一般价格运动的新旧探索》,1932 年版。

68. 皮·维拉尔:“价格史评述”,见《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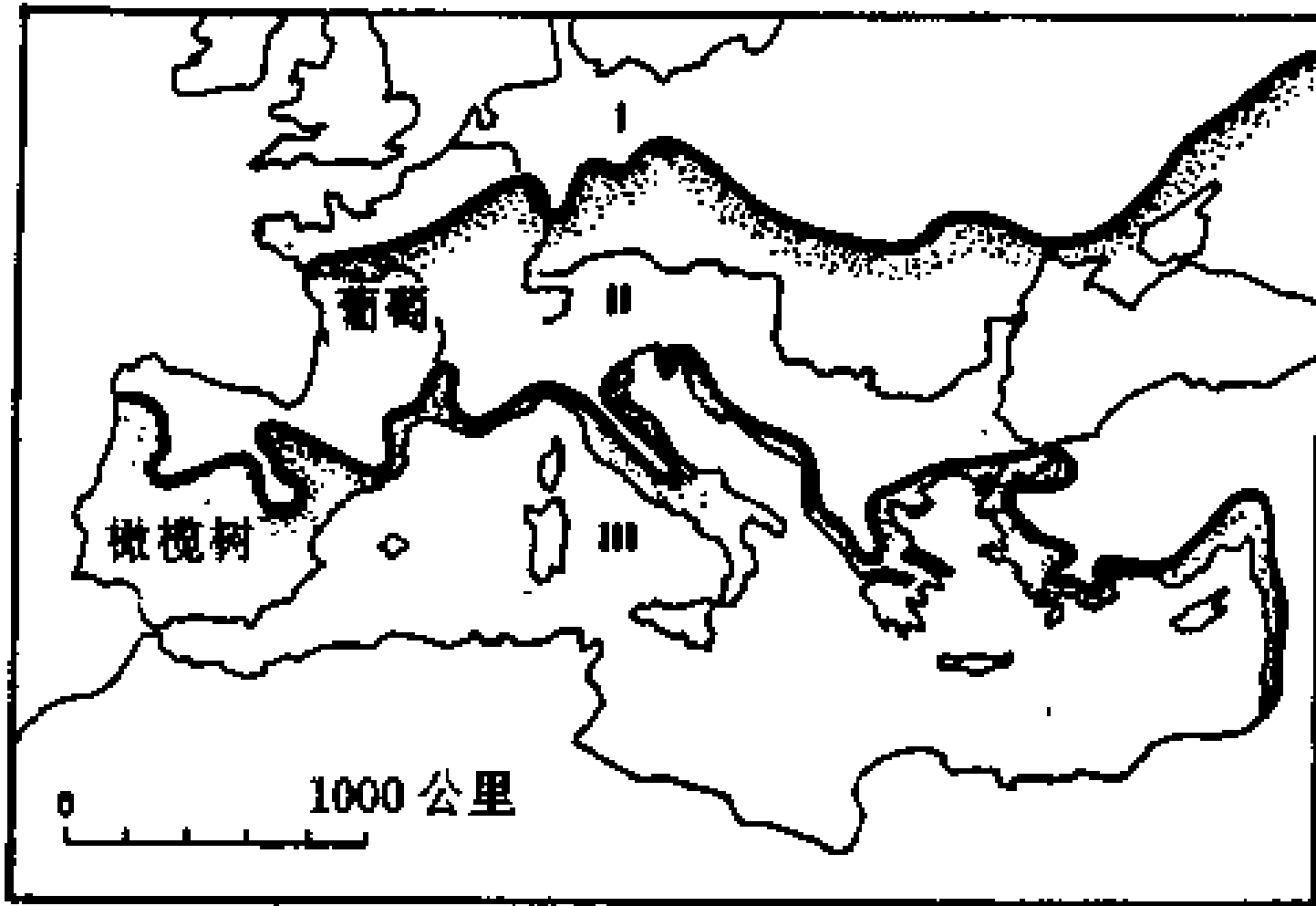
69. 威尼斯博物馆玫瑰厅赠品第 42 卷,第 23 页背面。仅 1593、1594、1595 和 1596 四年期间,铸币量合计为 1045447 杜加,年平均 261361 杜加(约等于 6950 公斤白银)。

图
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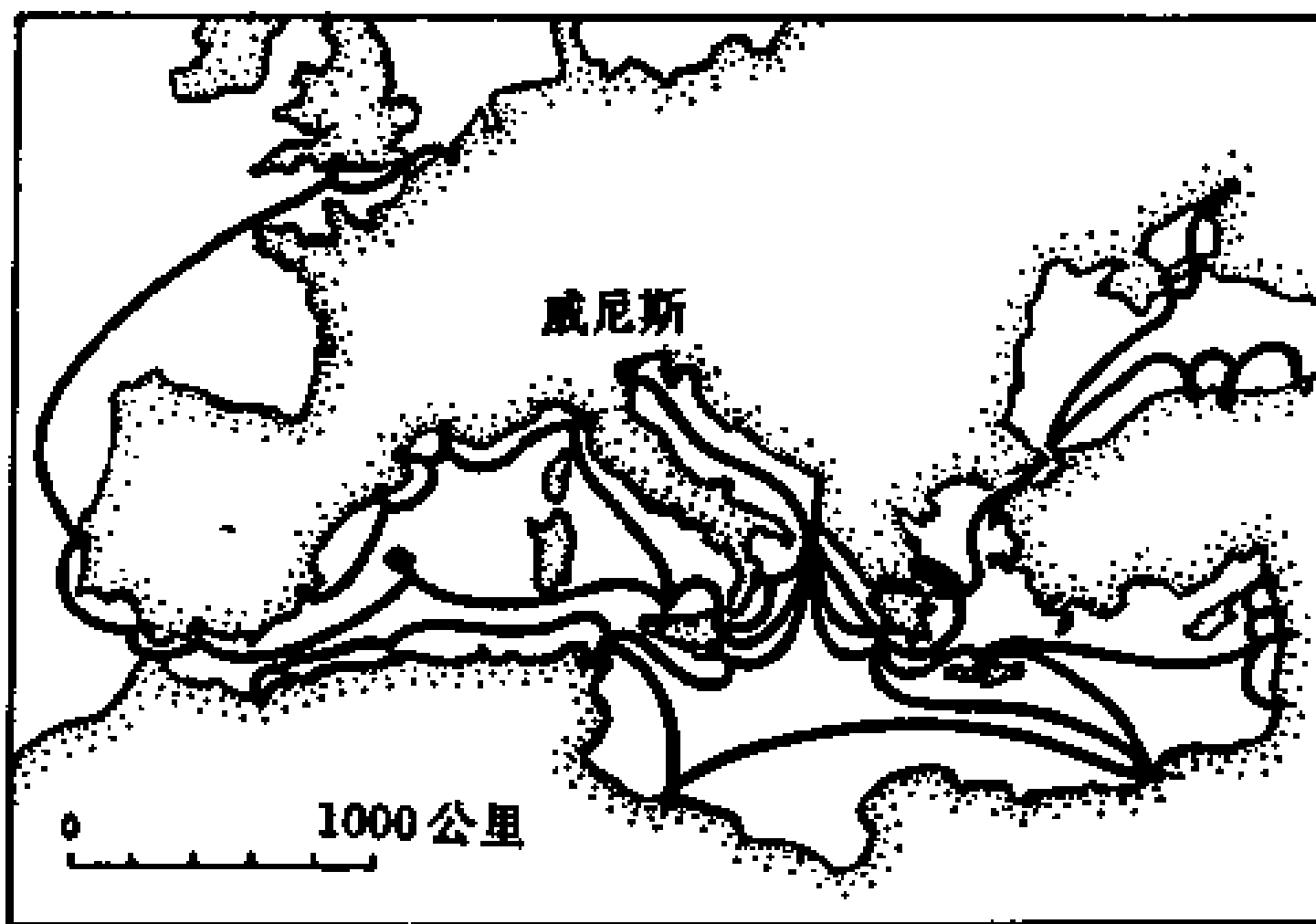
图 示 1 欧洲价格周期运动的日程表

周 期	1						2						3					
	一期低谷		一期高峰		二期低谷		二期高峰		三期低谷		三期高峰		四期低谷					
年度	百分比	年度	百分比	年度	百分比	年度	百分比	年度	百分比	年度	百分比	年度	百分比	年度	百分比			
博 希	1640 1	100	1643 2	190 - 13	1646 2	83 - 20	1650 1	296 - 80	1650 4	385 - 87	1652 2	274 - 13	1657 1	100				
巴 拿	1639 4	100	1643 2	298 - 80	1646 2	88 - 10	1649 4	285 - 10	1650 4	191 - 75	1652 3	305 - 34	1657 1	107 - 40				
罗 昂 布 里	1640 1	100	1643 4	236 - 11	1646 3	94 - 44	1649 4	347 - 22	1650 4	236 - 11	1651 4	361 - 11	1657 1	114 - 58				
锡 耶 纳	1640 2	100	1644 2	207 - 86	1645 1	181 - 78	1649 2	438 - 61	1651 4	183 - 71	1653 2	231 - 09	1660 1	118 - 95				
乌 迪 内	1640 3	100	1643 4	239 - 77	1646 3	148 - 77	1650 2	507 - 50	1654 3	153 - 82	1656 4	285 - 37	1659 3	136 - 51				
利 沃 夫	1641 1	100	1642 3	191 - 67	1643 1	122 - 22	1651 3	1,061 - 11	1655 1	333 - 33	1657 3	916 - 67	1659 1	263 -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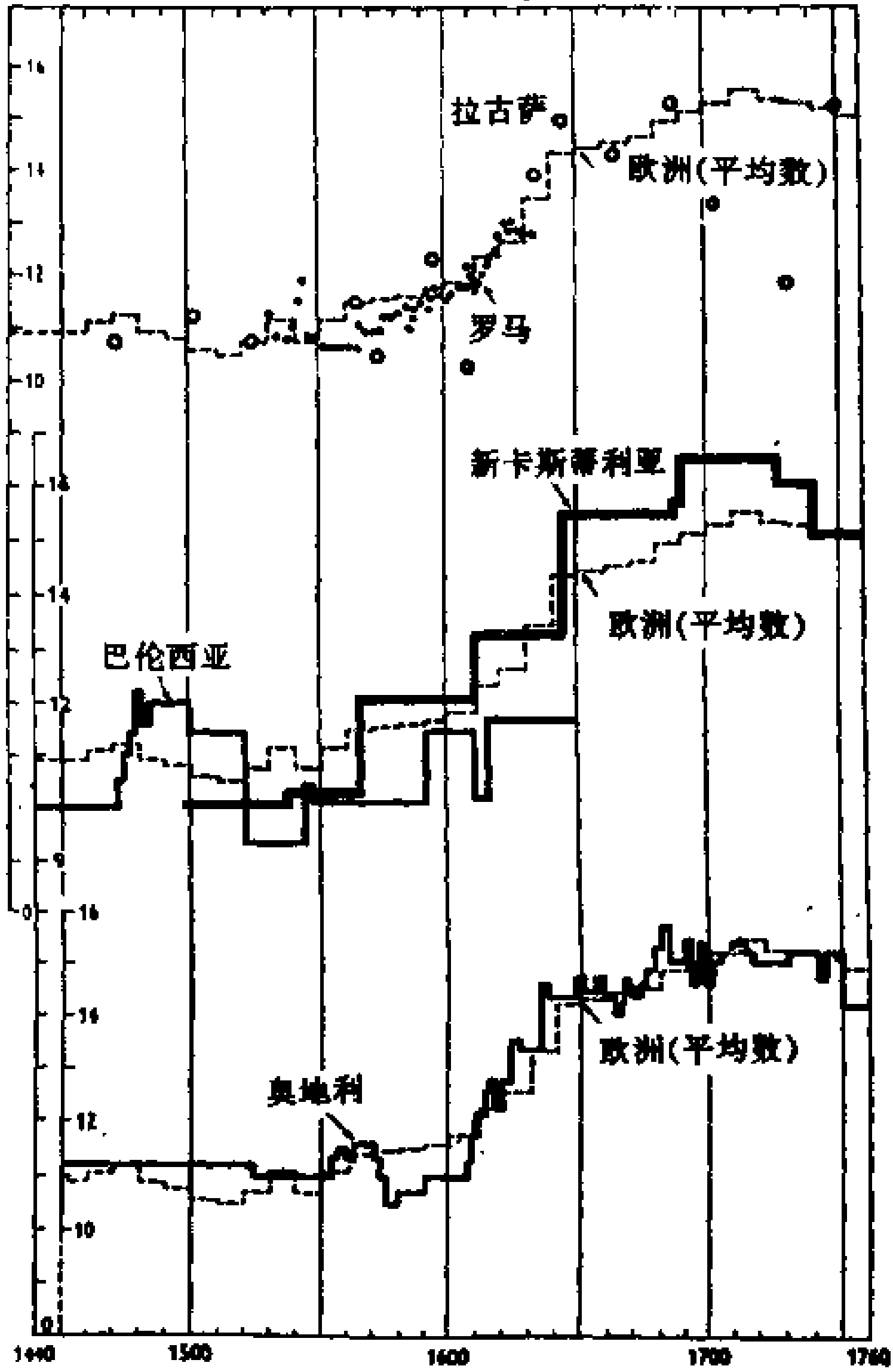
图示 2 今天根据葡萄和橄榄树种植极限确定的欧洲三大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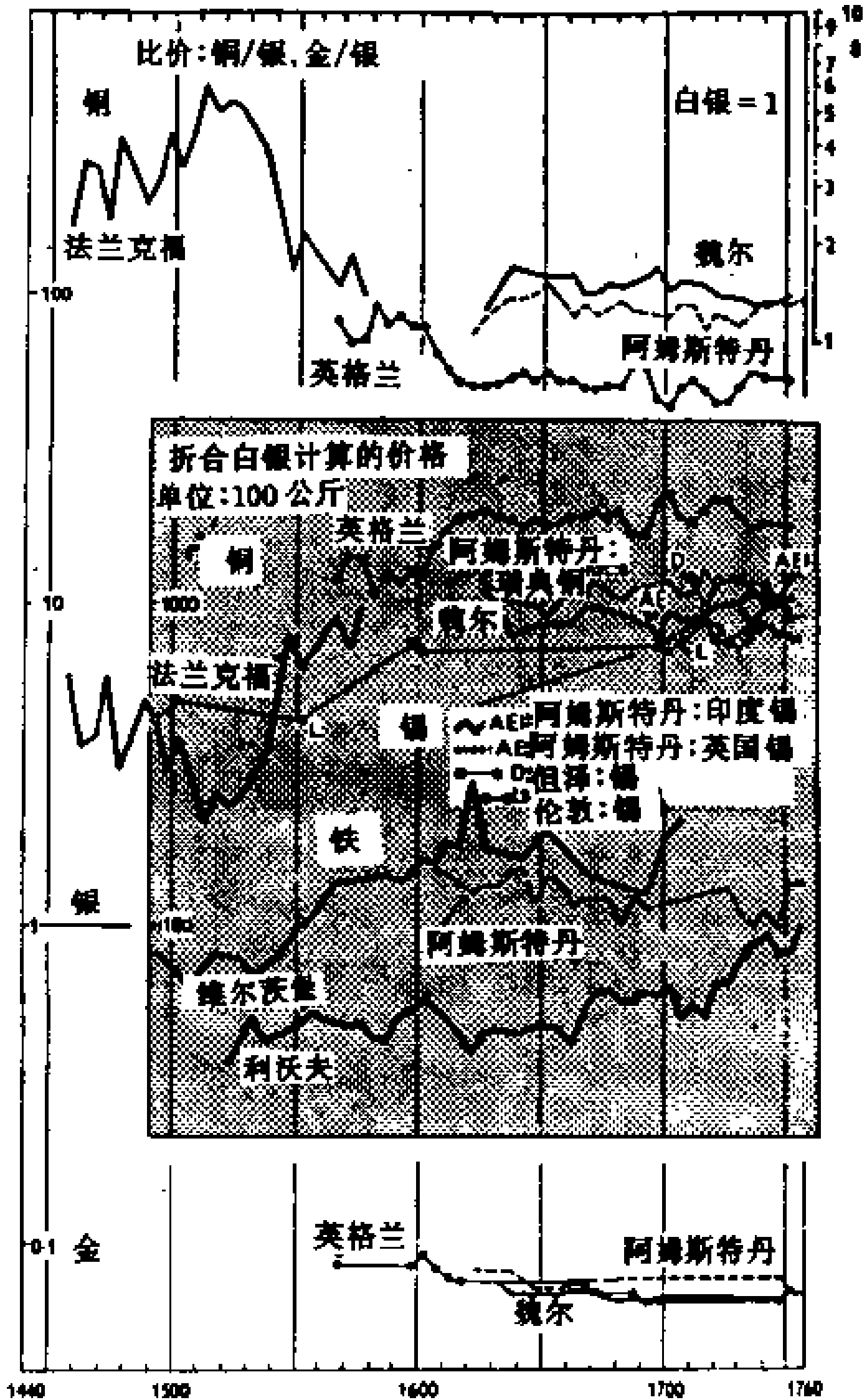
图示 3 威尼斯 1442 年的海上航线：帆桨商船之远航
(地图由 C. 维旺蒂和 A. 特南蒂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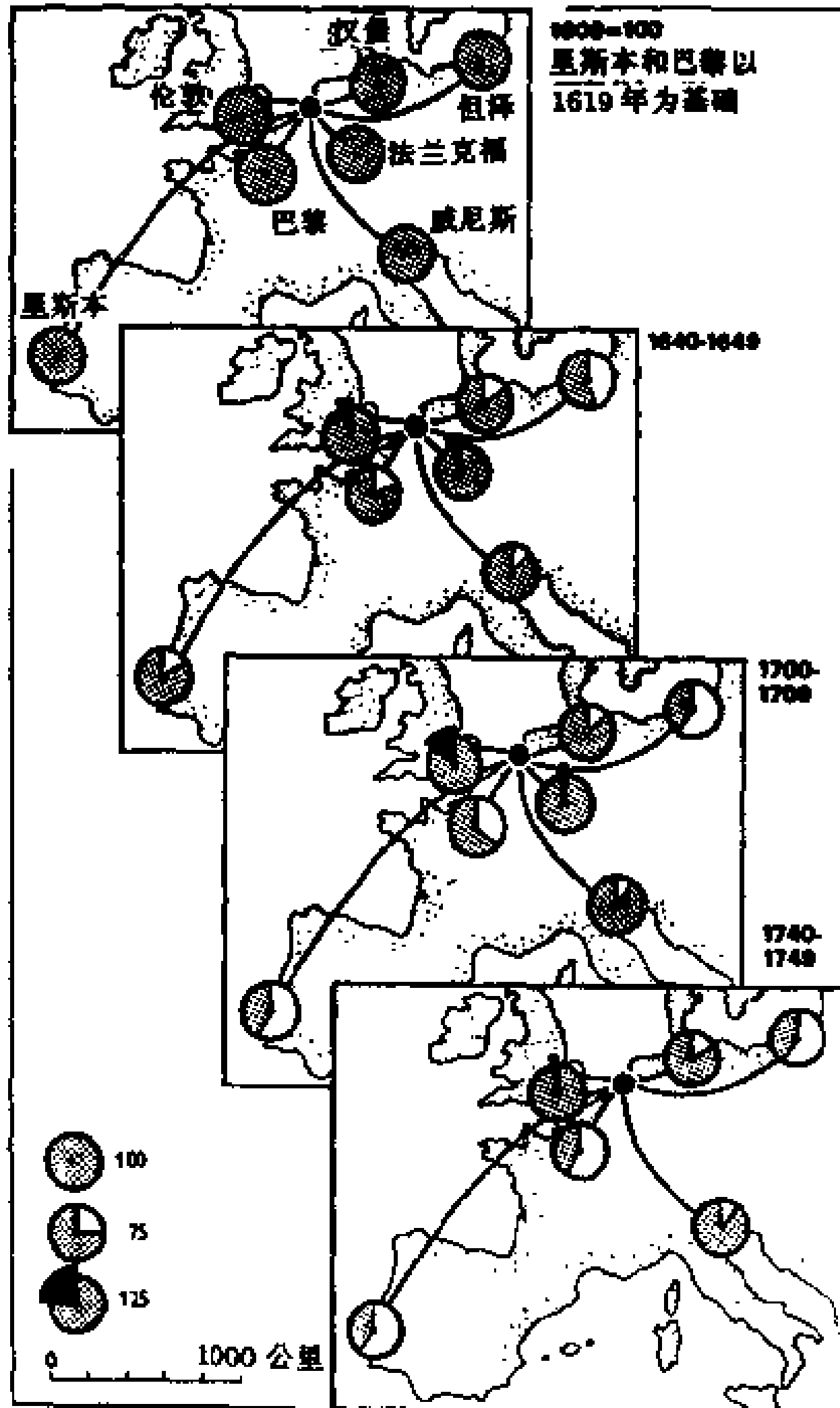
图示 5 欧洲的金银比价
(算术比例尺) 黄金=1



图示 6 金属的价格:5 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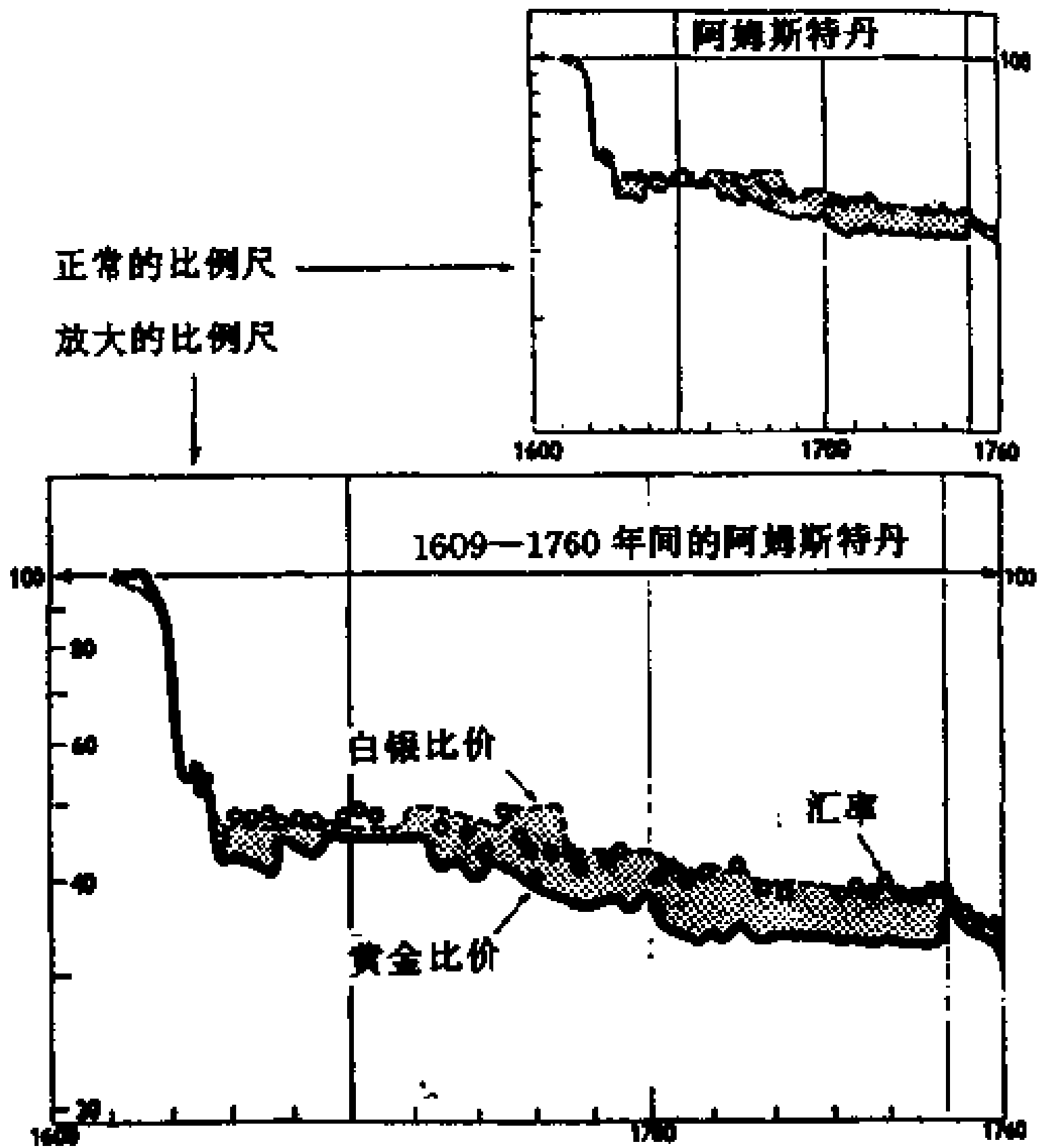


图示 7 阿姆斯特丹汇兑行市
 (地图由尼古拉·威廉·波斯托缪斯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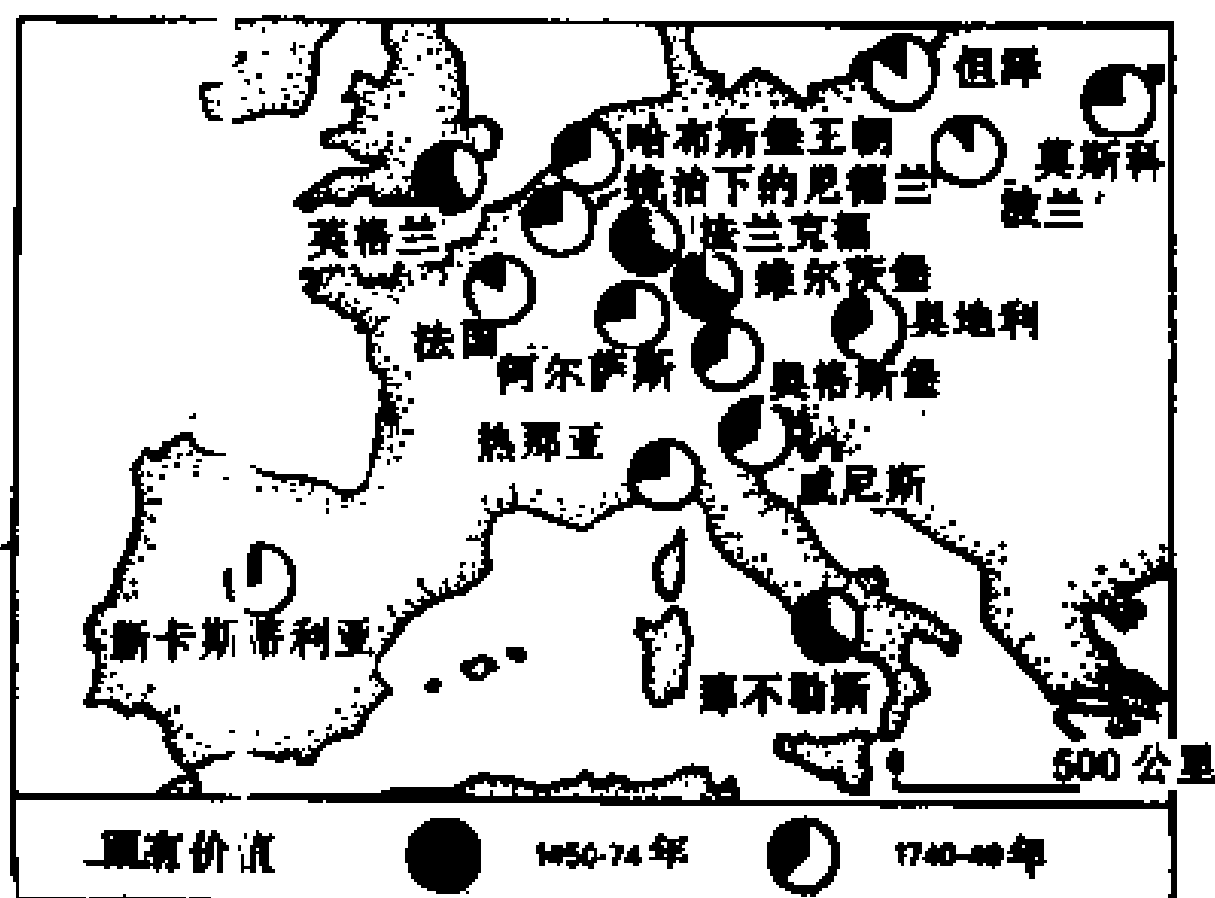


图示 8 但泽对阿姆斯特丹的汇价

1609—1760 年间的阿姆斯特丹(指数 100 根据黄金、白银和计算货币弗罗林的价值同时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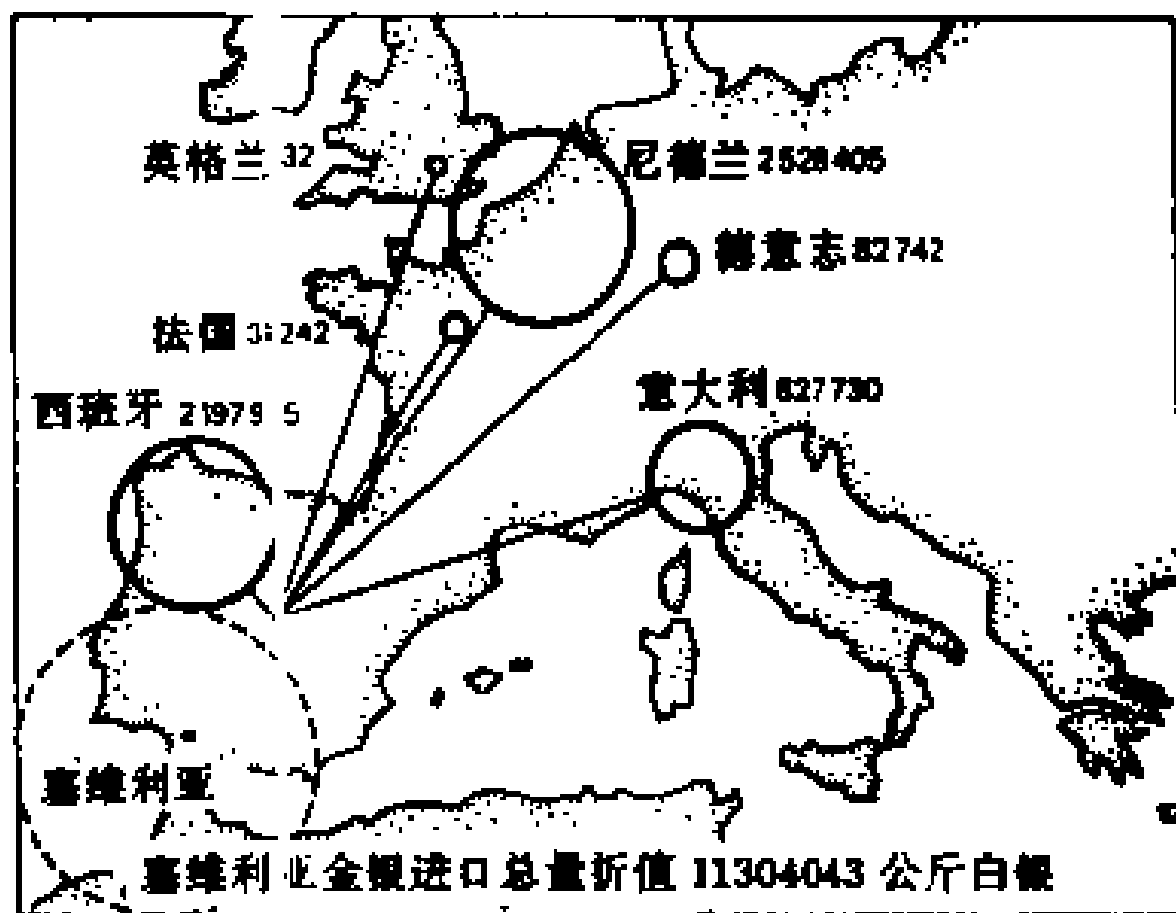


图示 9 1450—1750 年间计算货币按白银折算的贬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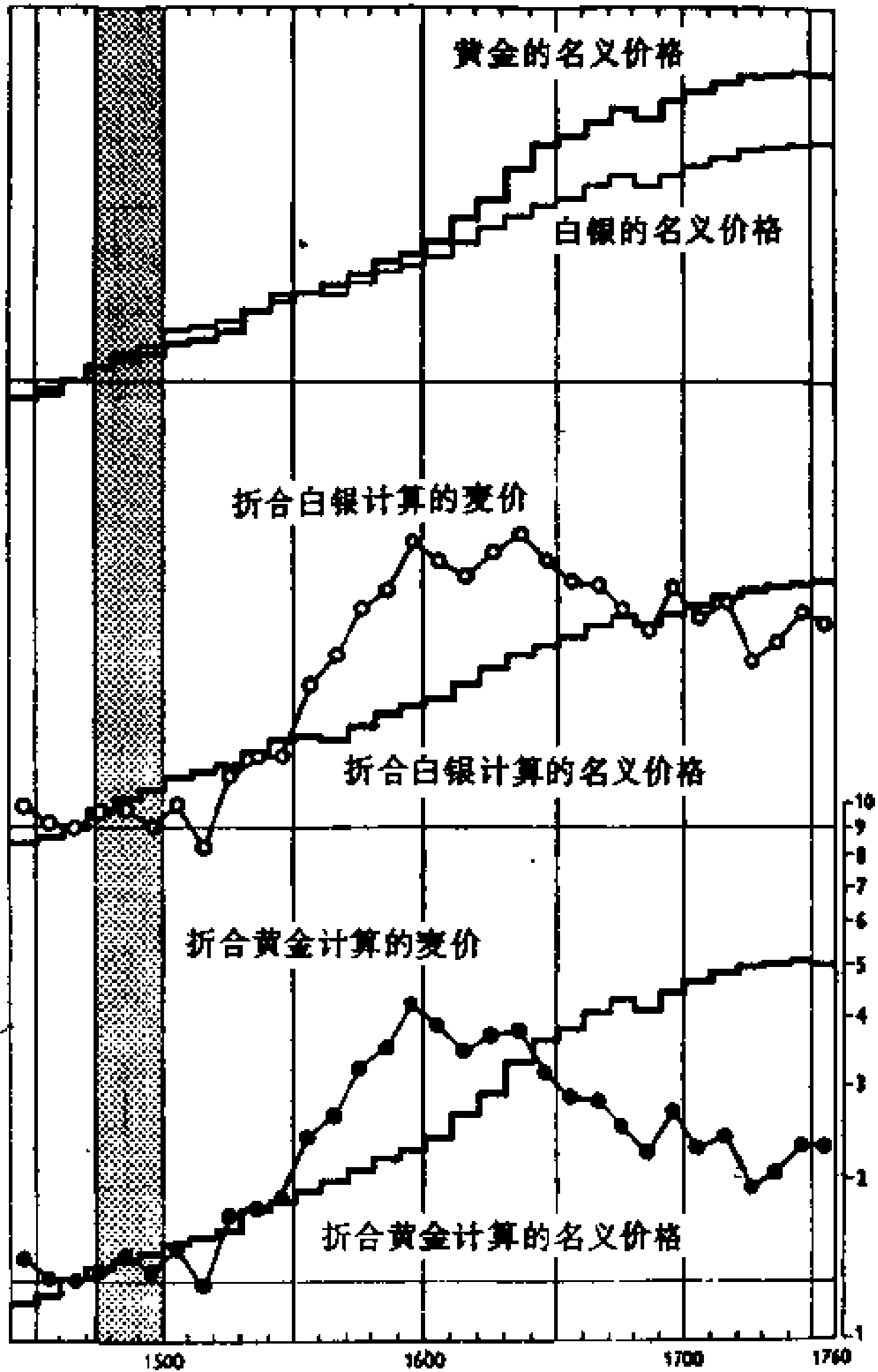
图示 10 热那亚银行家 1580 至 1626 年间为西班牙在欧洲各大商埠支付的款项

计算单位：若干公斤白银(数据由阿·卡斯蒂略提供)



图示 11 欧洲小麦价格:10 年平均数

1450—1474 年间 =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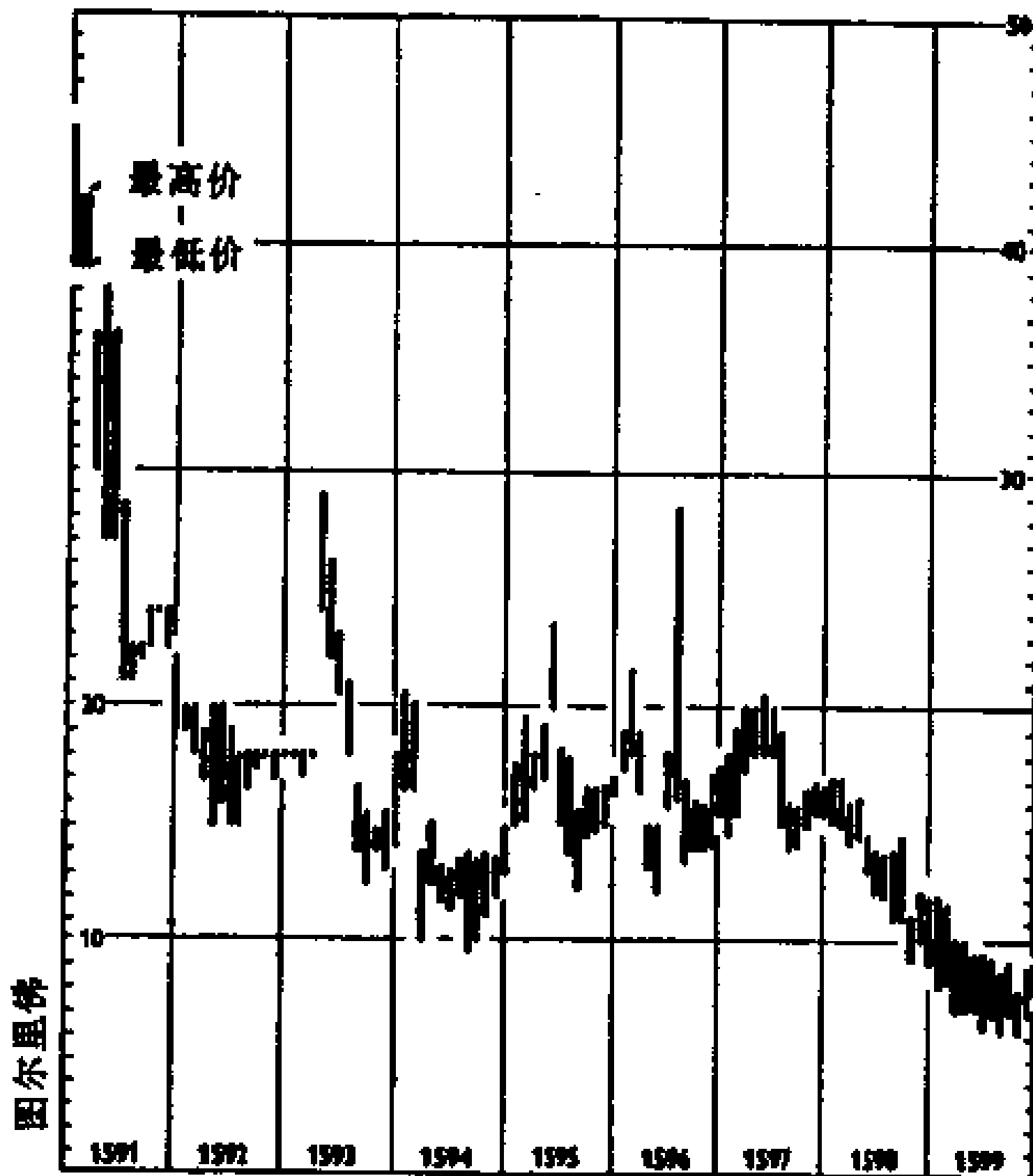


图示 12 小麦最低价和最高价之间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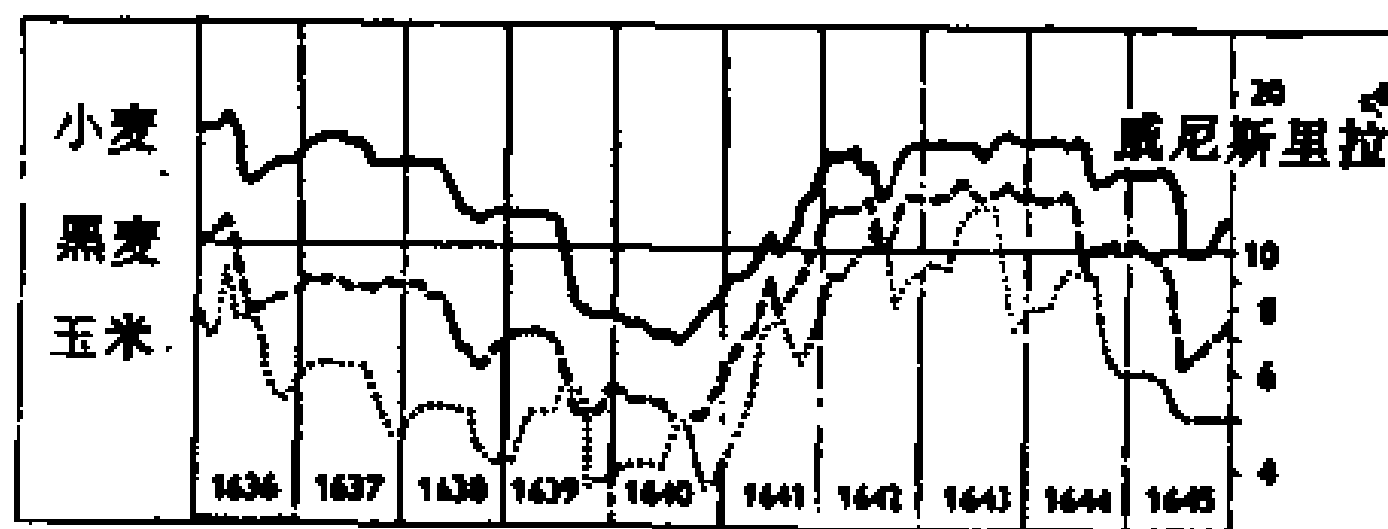
(摘自 1591—1599 年间巴黎《市价表》)

以巴黎食品市场每月初的价格为准, 计价单位为图尔里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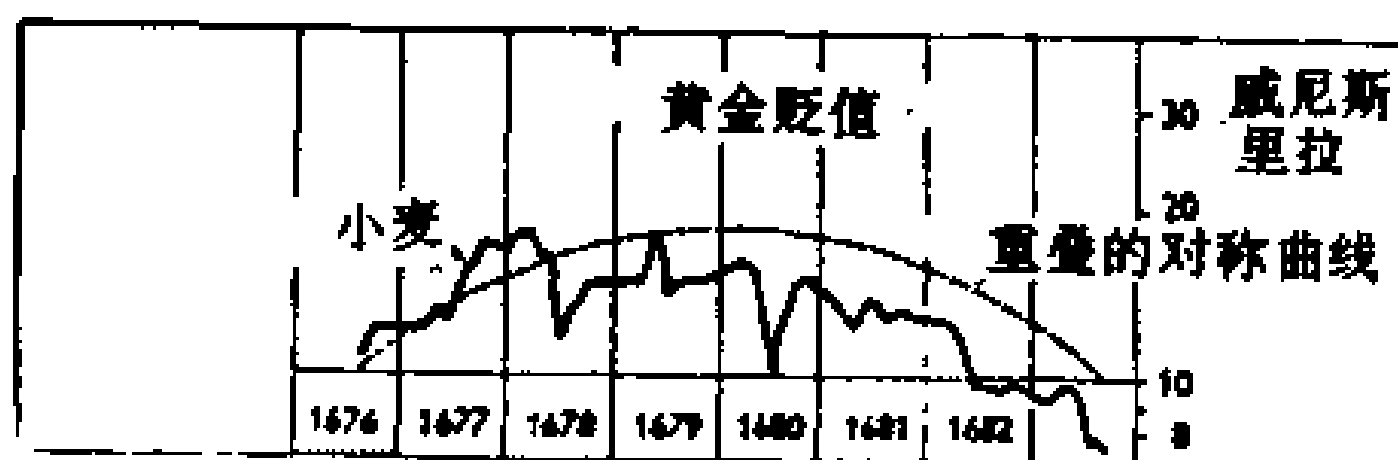
(数据由 M. 鲍朗和让·默弗雷提供)



图示 13 乌迪内 1636—1645 年间粮价的季节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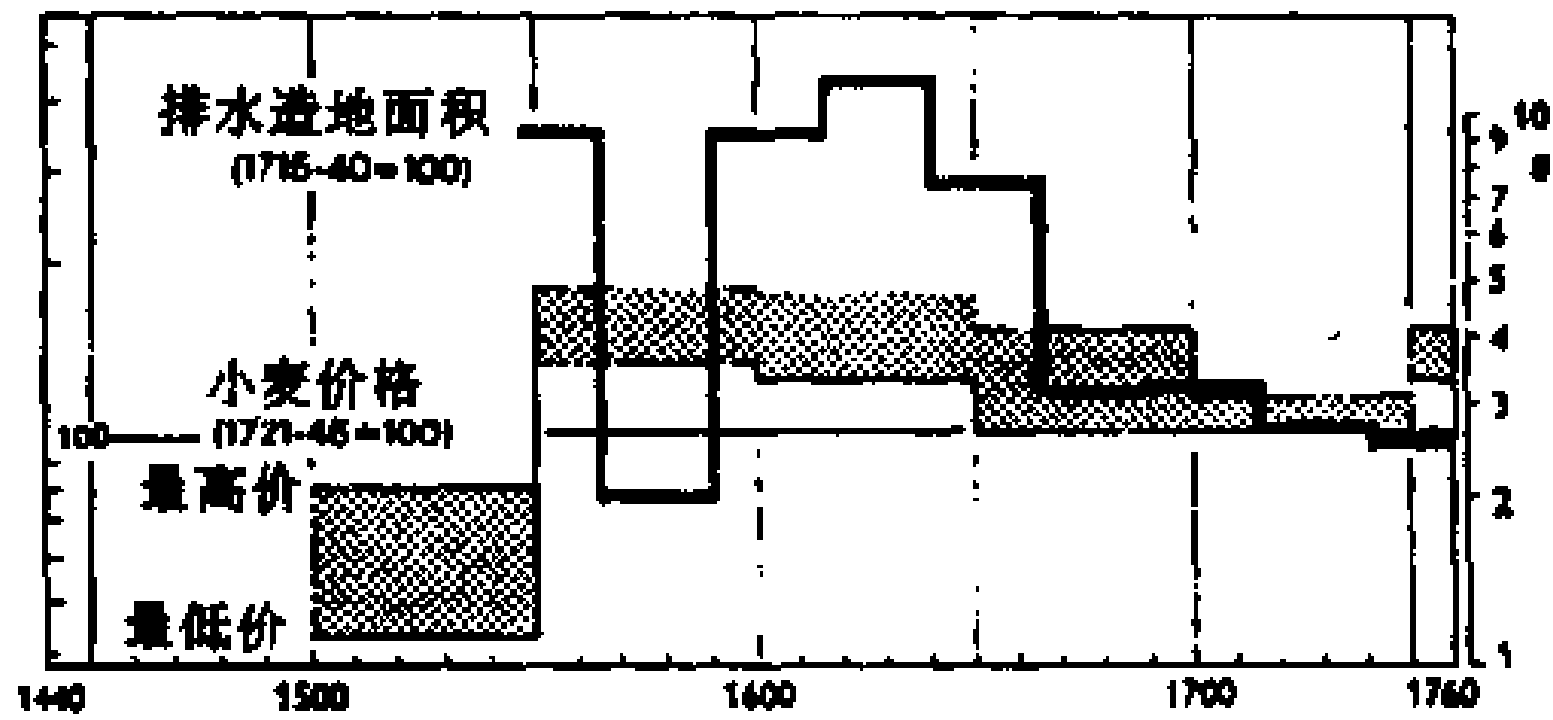


图示 14 乌迪内 1676—1683 年间的小麦价格周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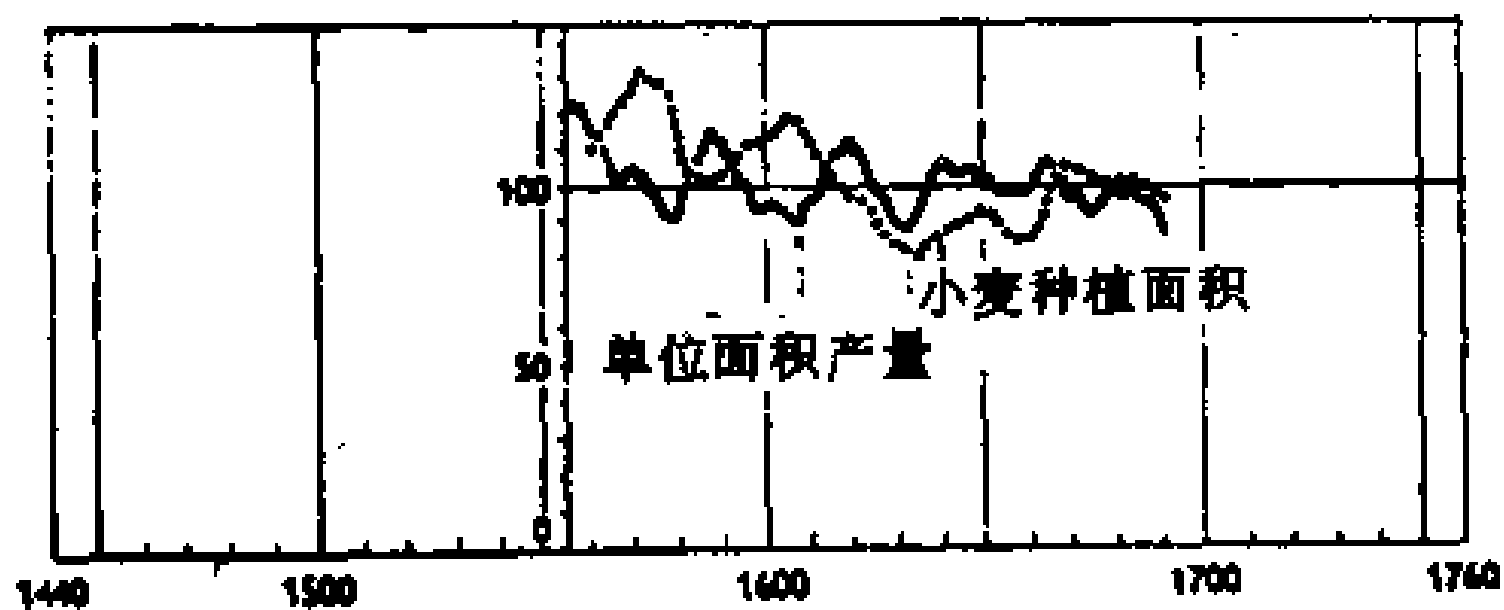
图示 15 尼德兰排水造地的面积与小麦价格

网版区域指出小麦的价格差距(数据由斯利歇·旺巴特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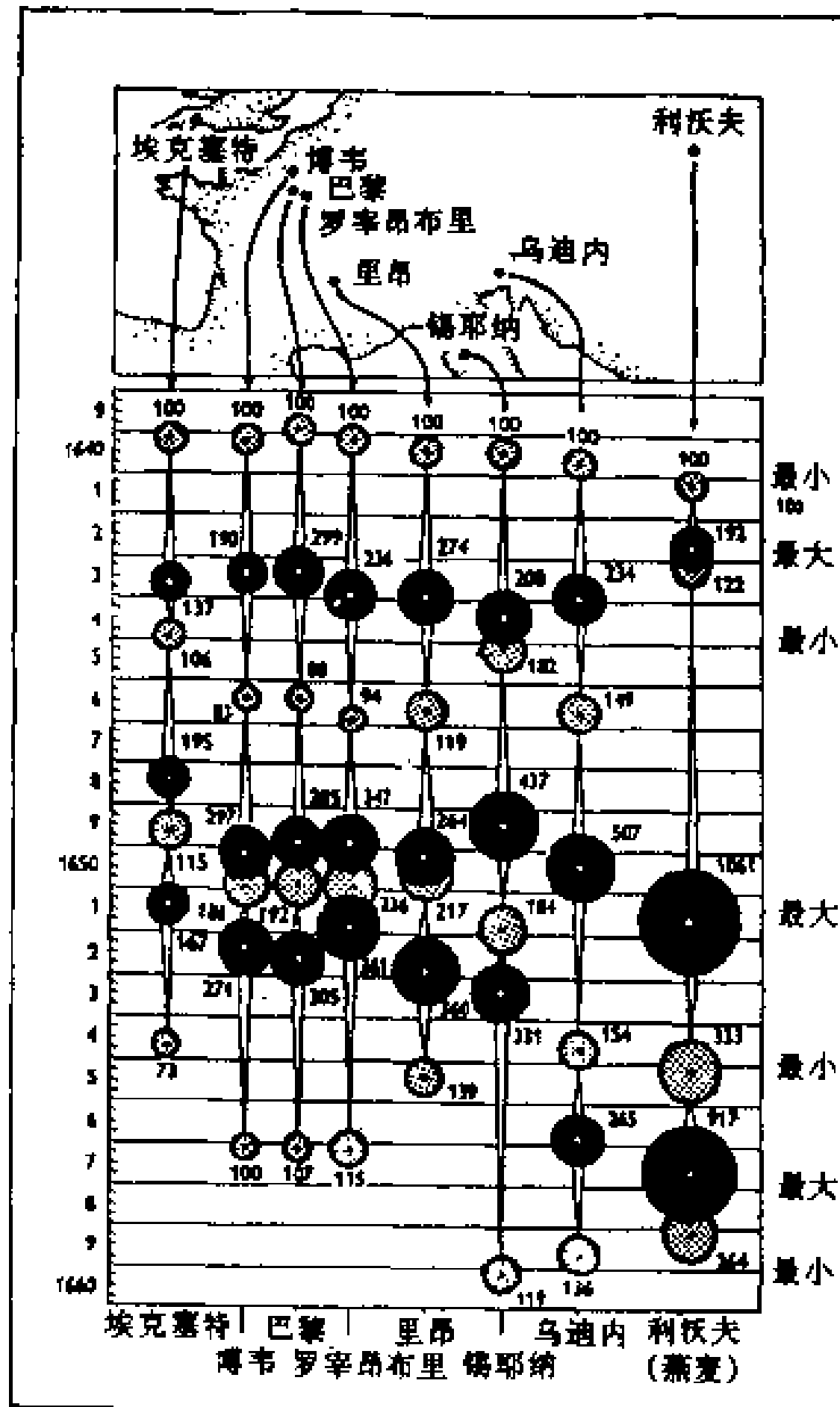


图示 16 东普鲁士粮食生产的变迁:11 年动态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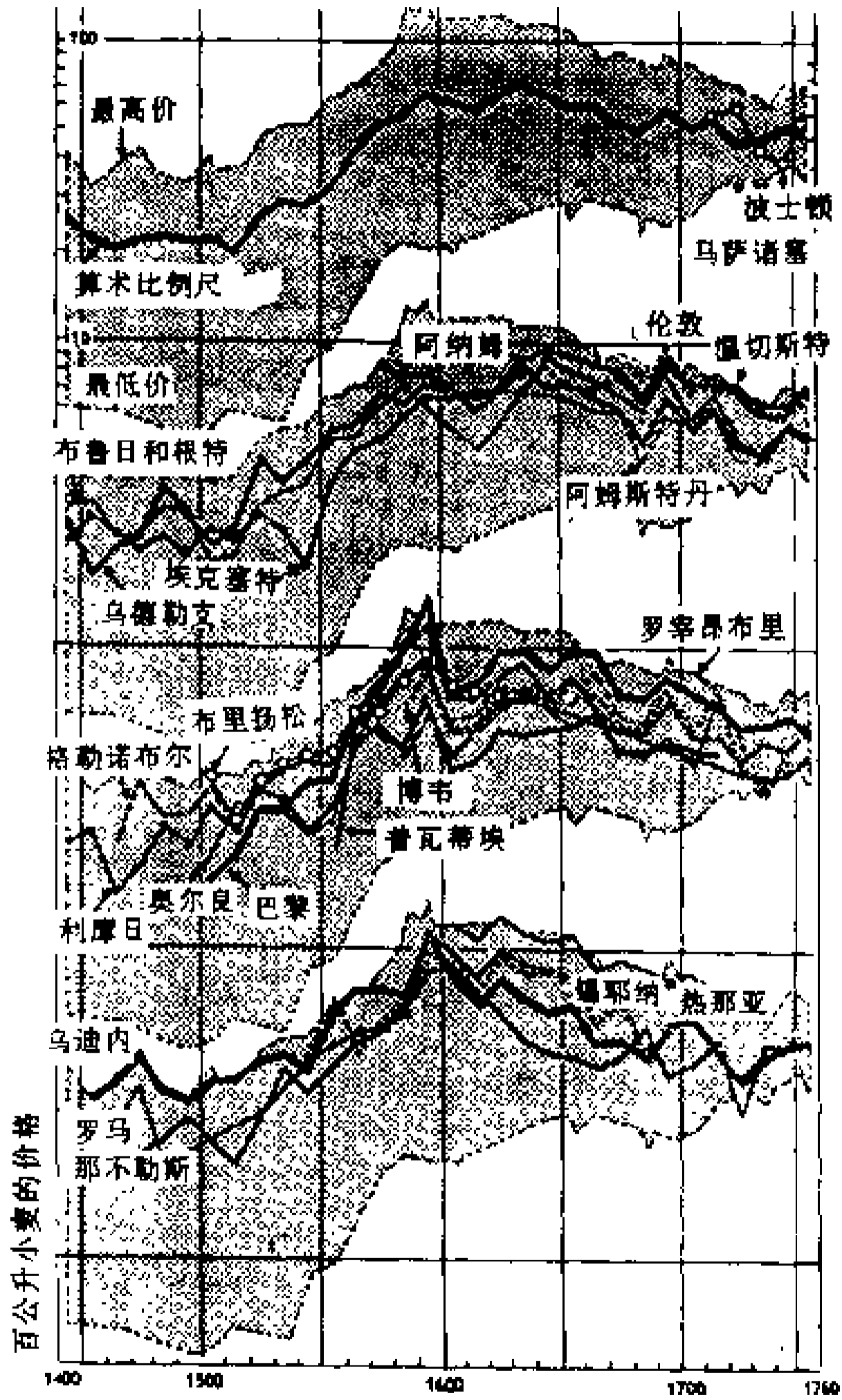
1150—1696 年=100(数据由汉·赫·韦希特尔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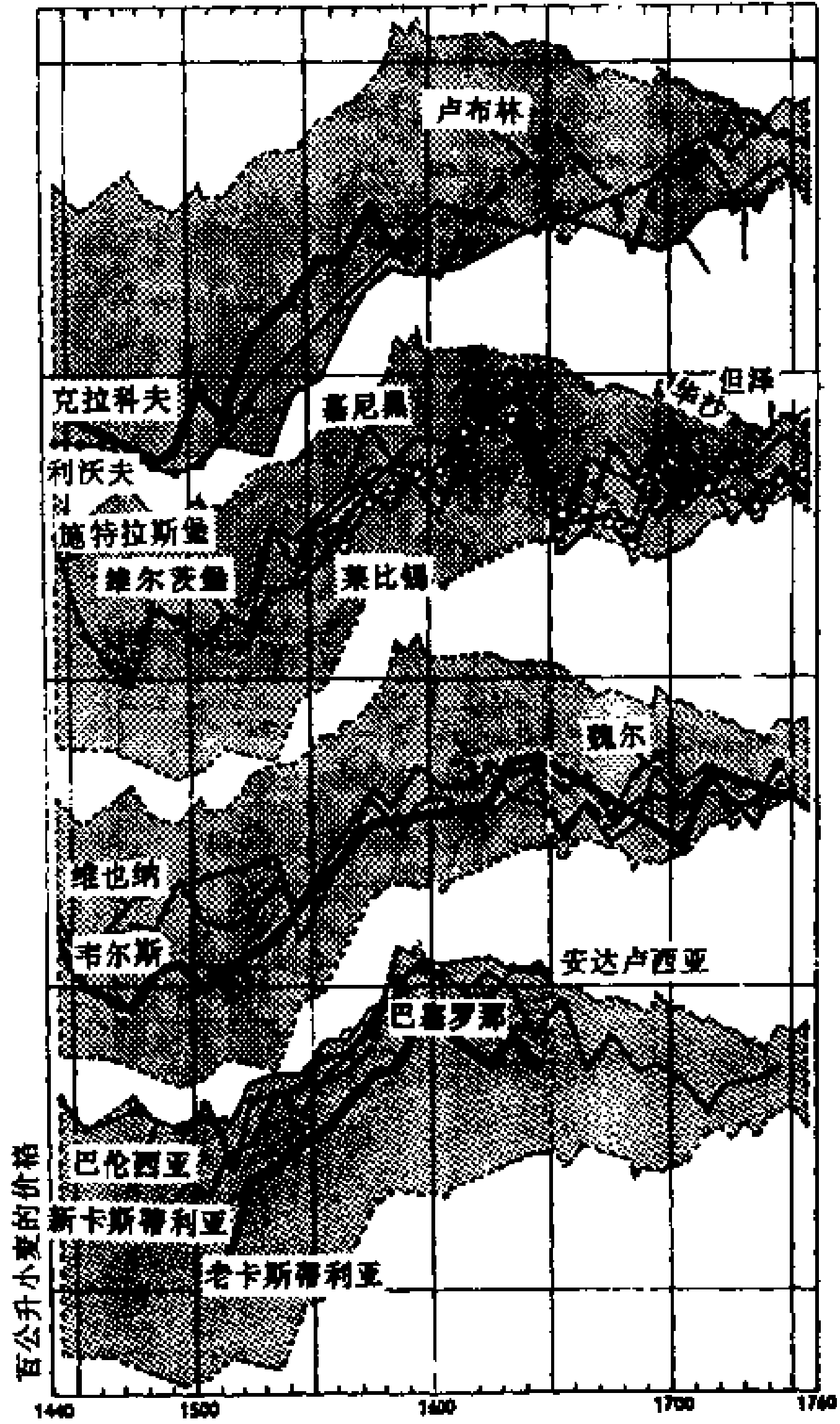


图示 17 欧洲 1639—1660 年间的一场小麦危机
 1630 年第四季度至 1641 年第一季度的参数等于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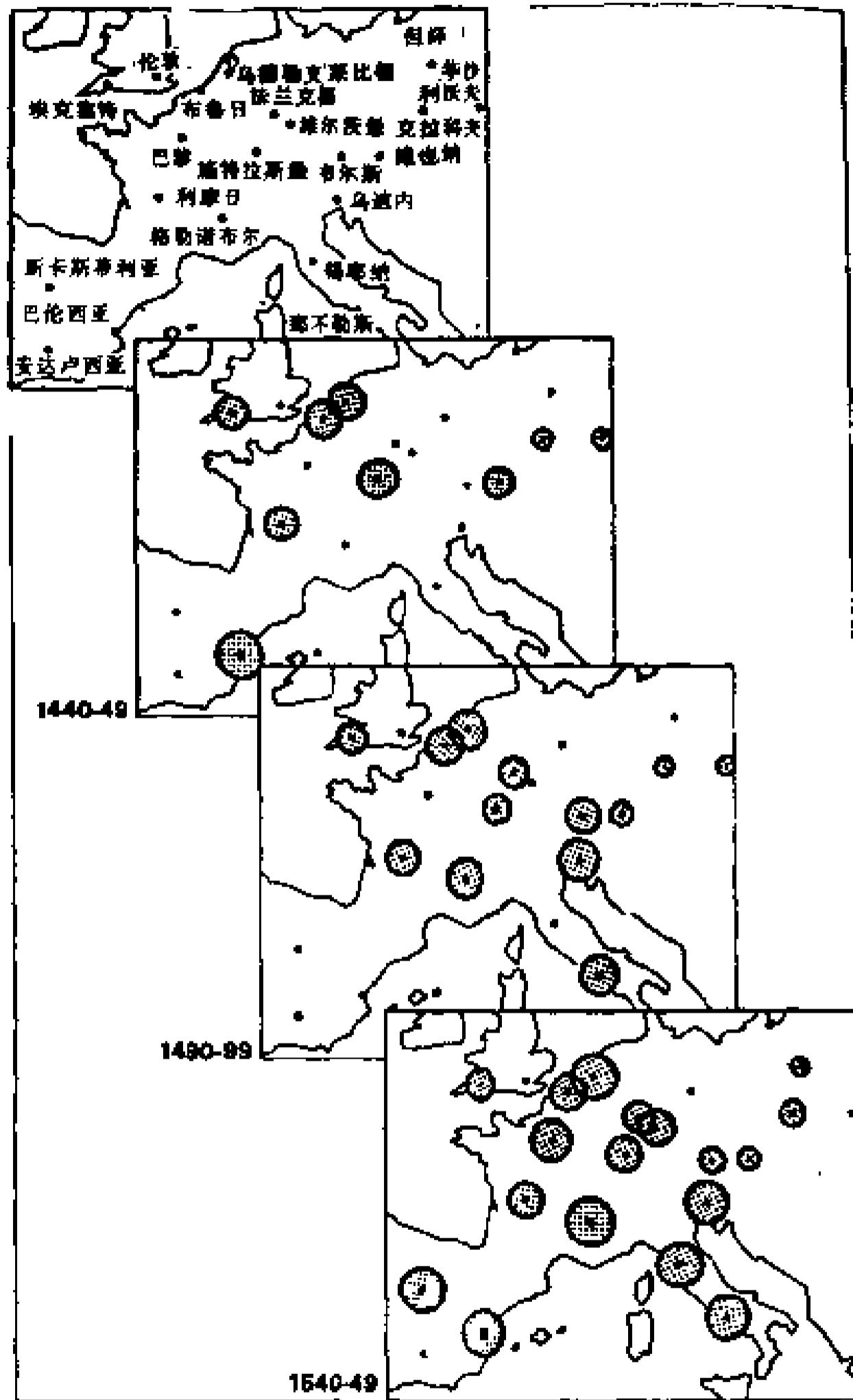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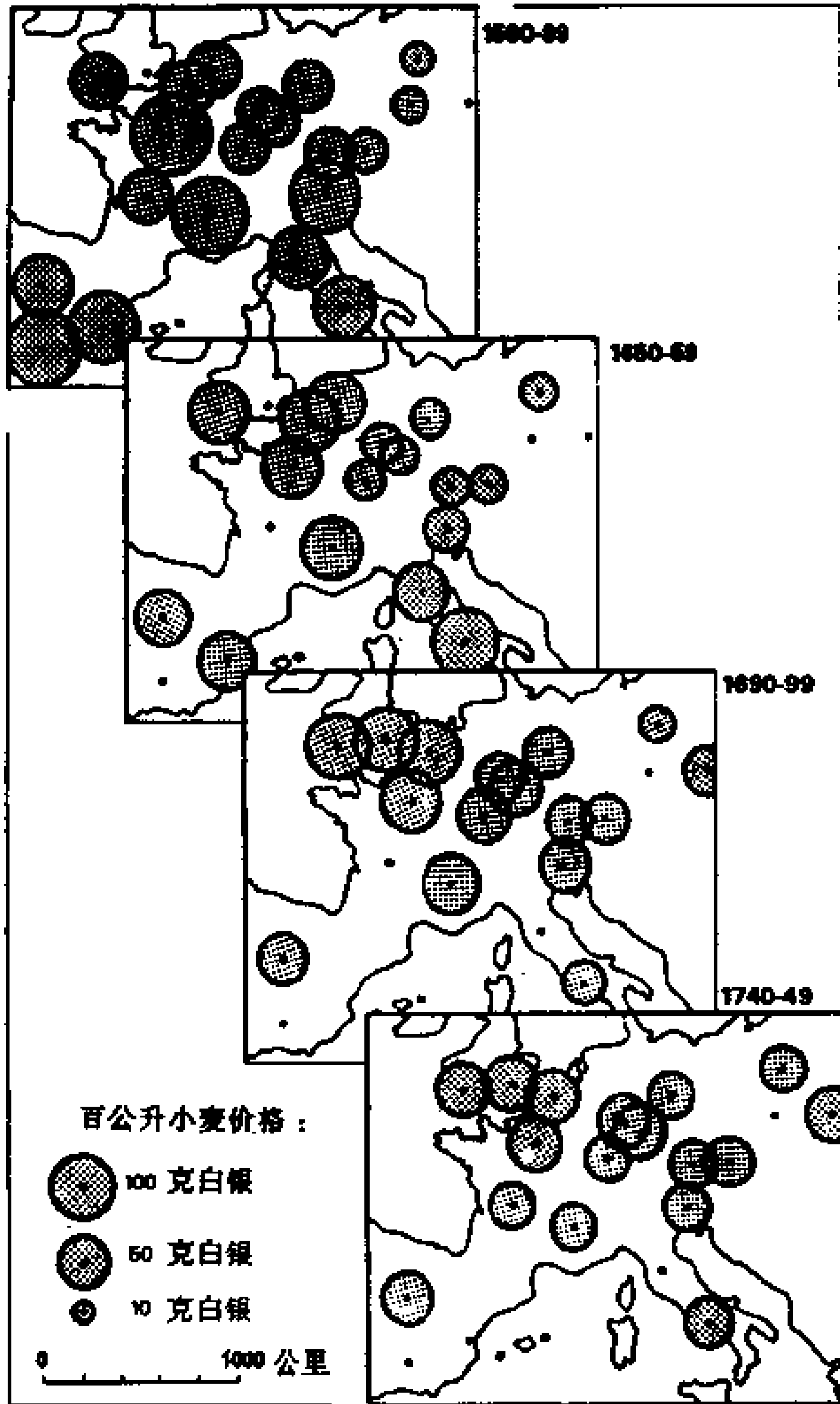
图示 18 百公升小麦价格(折合白银计算,以克为单位)
10 年平均数(网版区域表示最高价和最低价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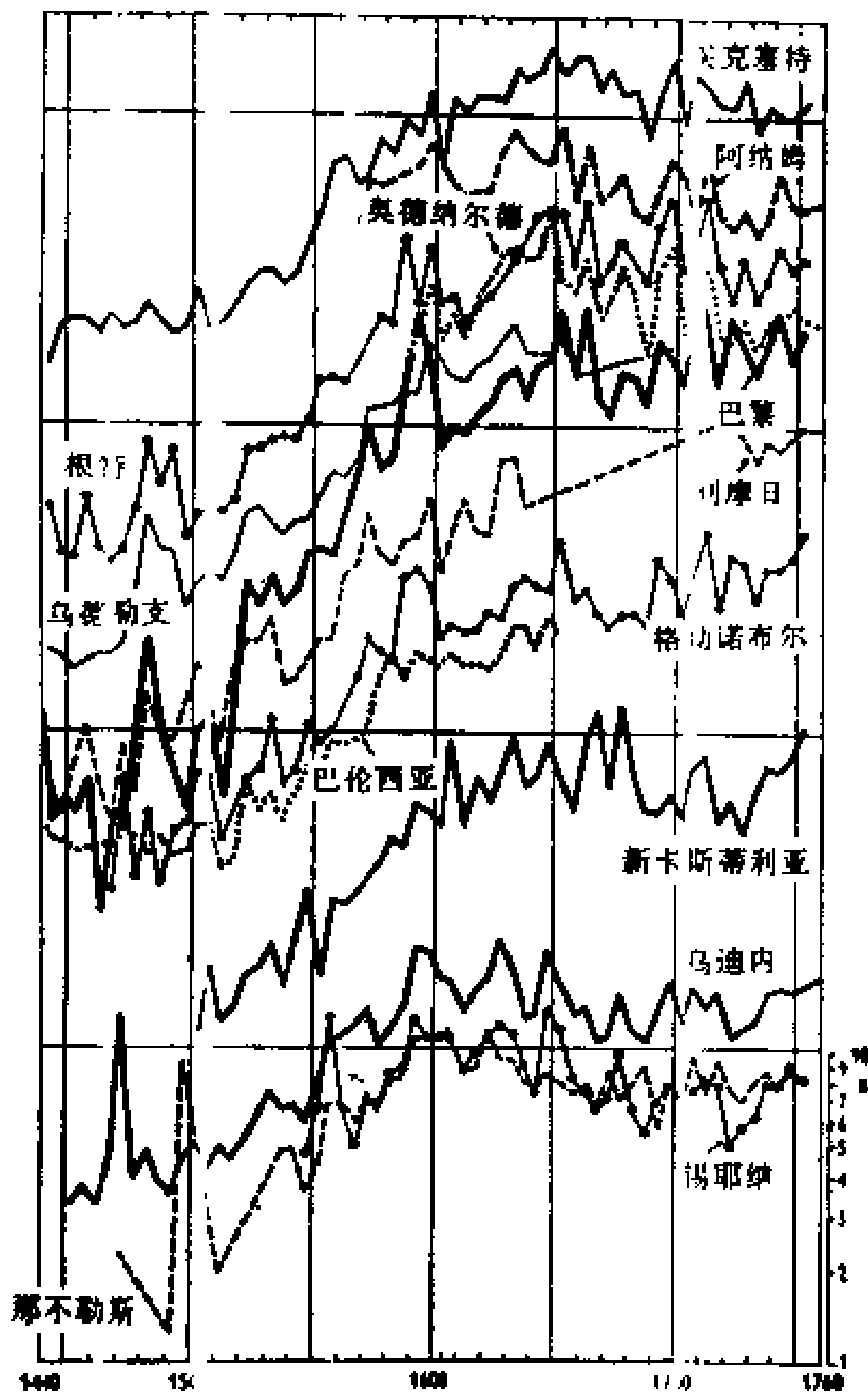
图示 19 百公升小麦价格(折合白银计算):10 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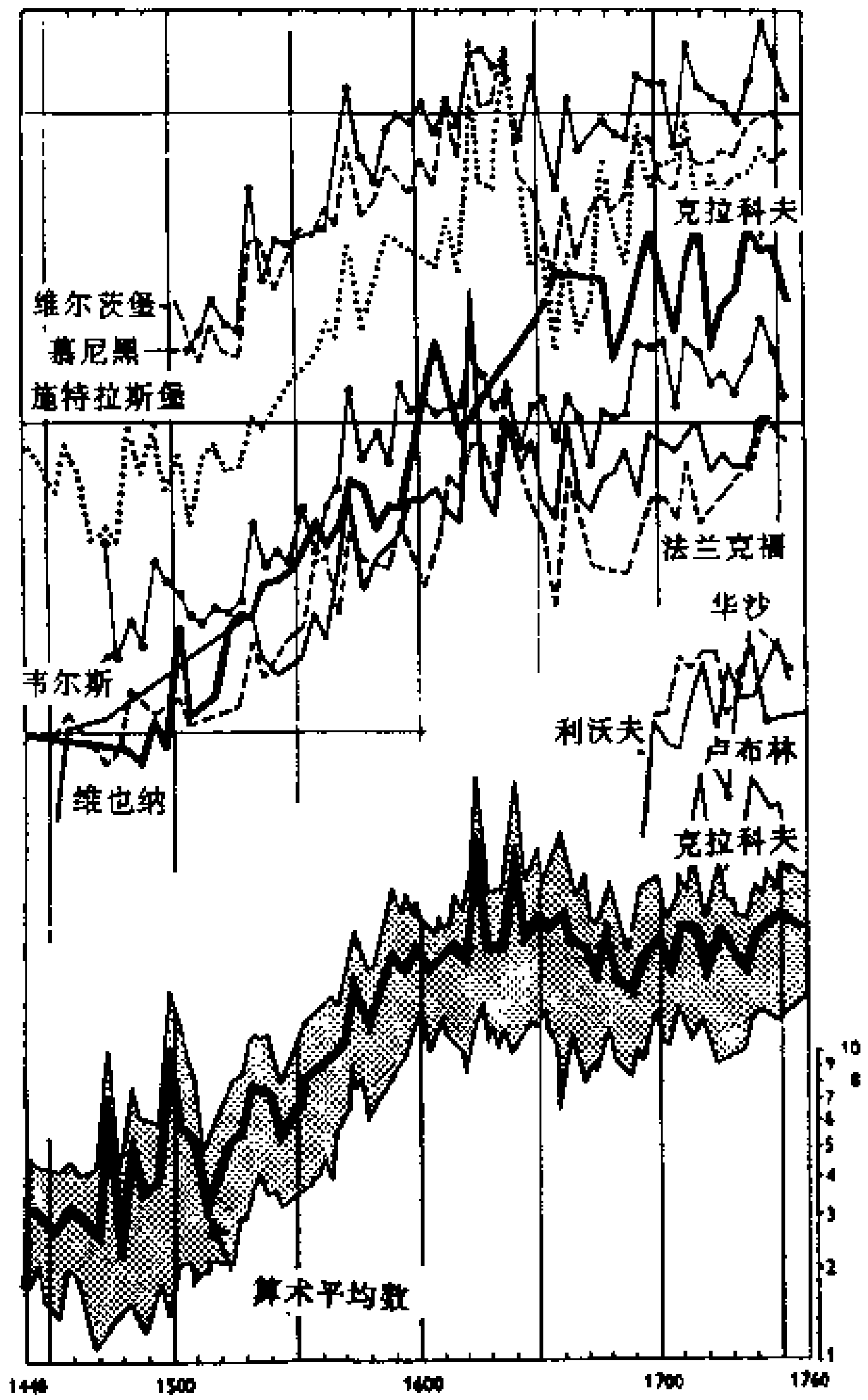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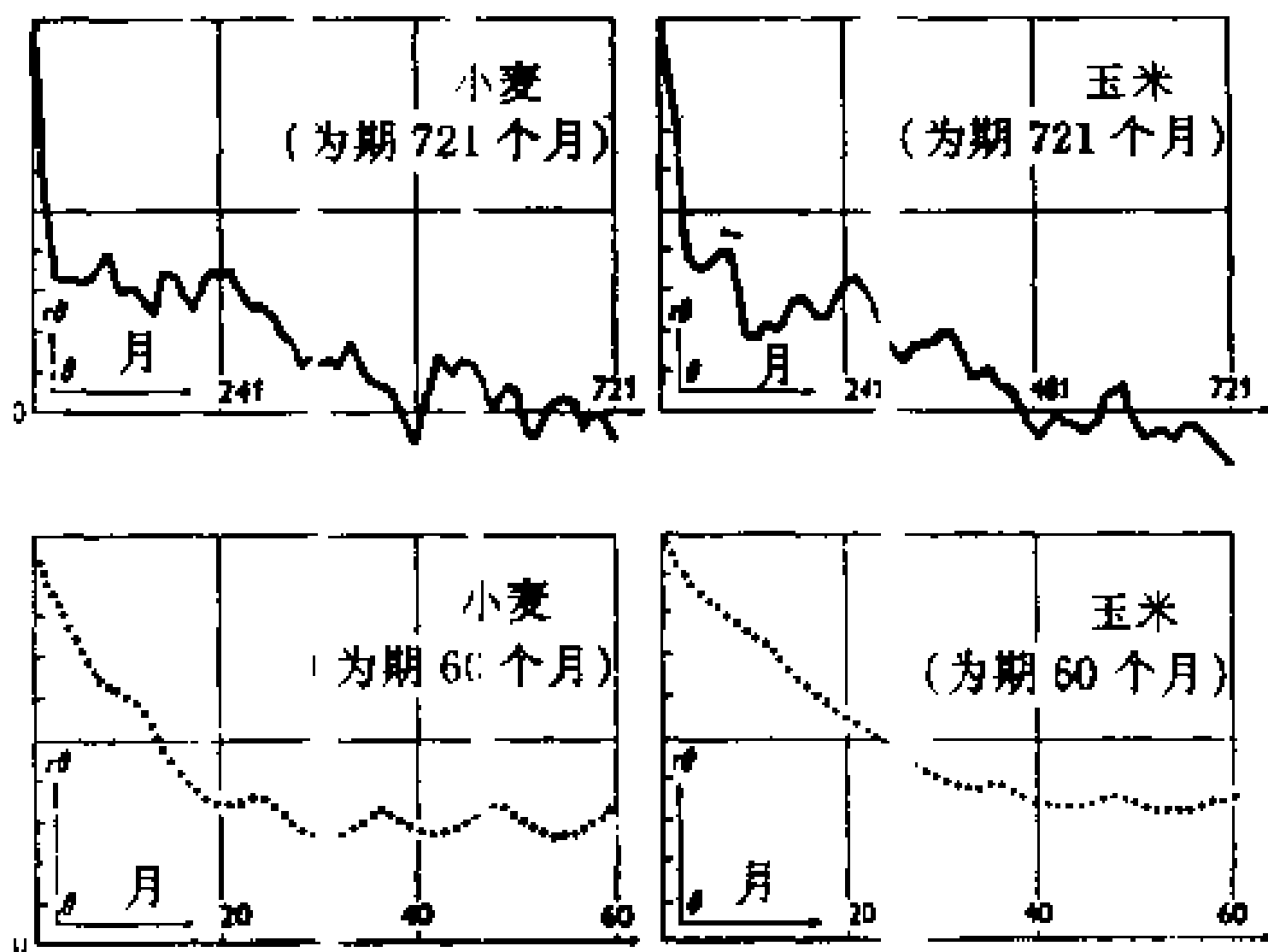
图示 20 按计算货币计值的麦价:5 年平均数

网版区域由欧洲 59 个小麦价格系列的图表所得出，
其中约 20 年系列单列如下。





图示 21 乌迪内 1586—1796 年间粮食价格相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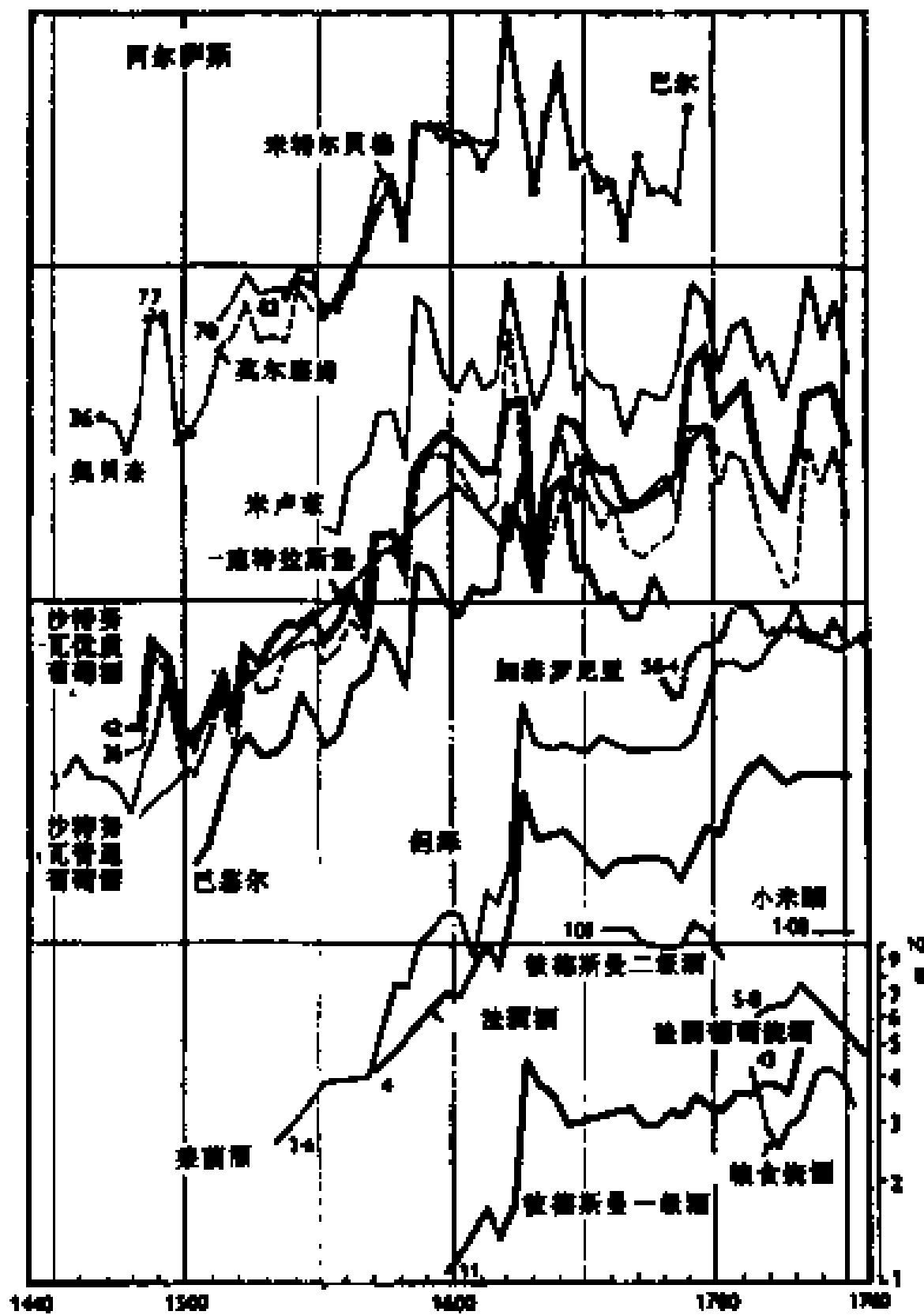
图示 22 阿尔萨斯、加泰罗尼亚和但泽按计算价格计值的
葡萄酒价:5 年平均数

数字代表每一系列的第一个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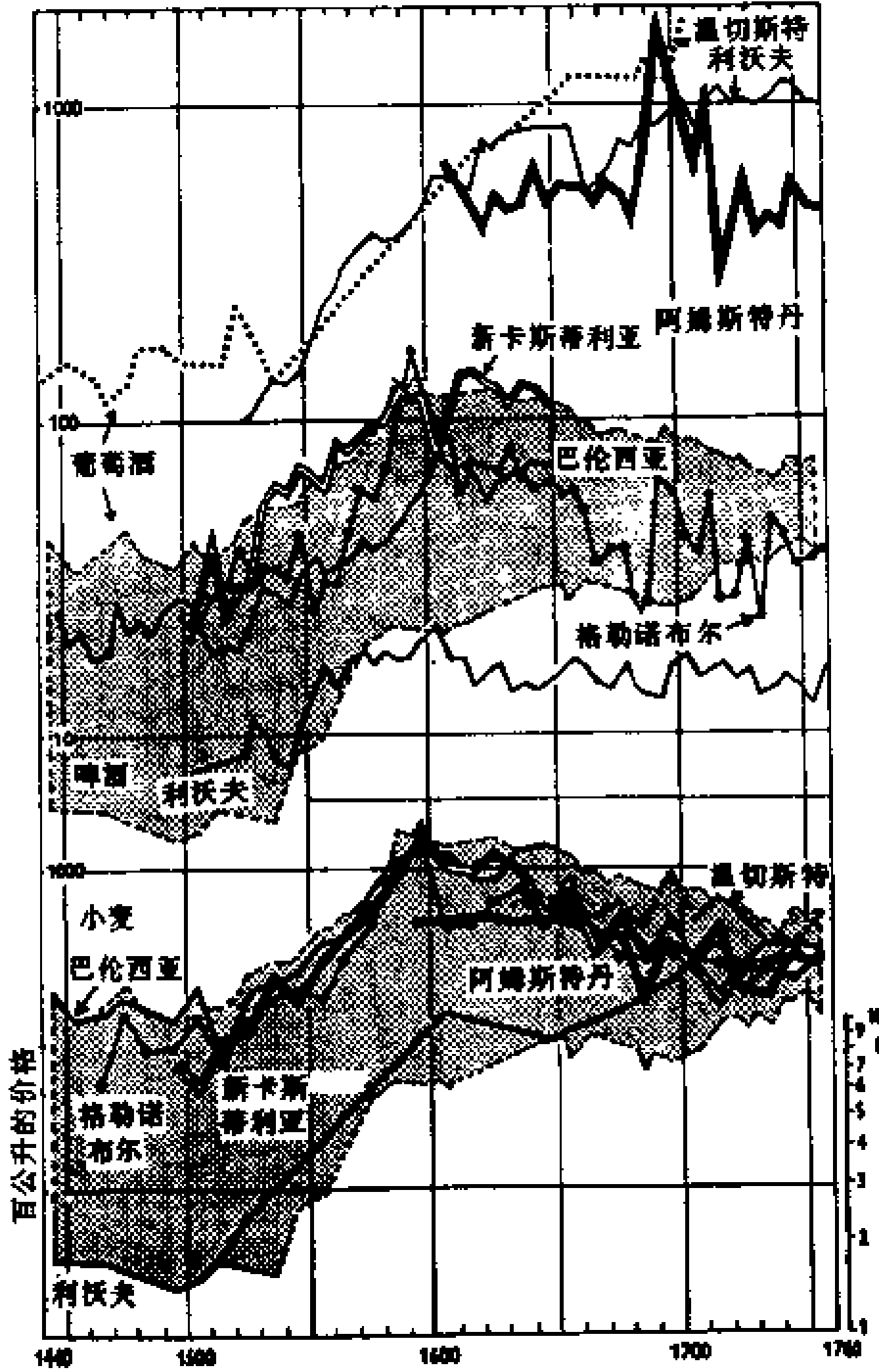
阿尔萨斯:以芬尼计算,葡萄酒计量单位为 mesure(巴塞尔除外,以先令计算,葡萄酒计量单位为 saum)。

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 13 年动态平均数,以“加泰罗尼亚苏”计算,葡萄酒计量单位为 carreg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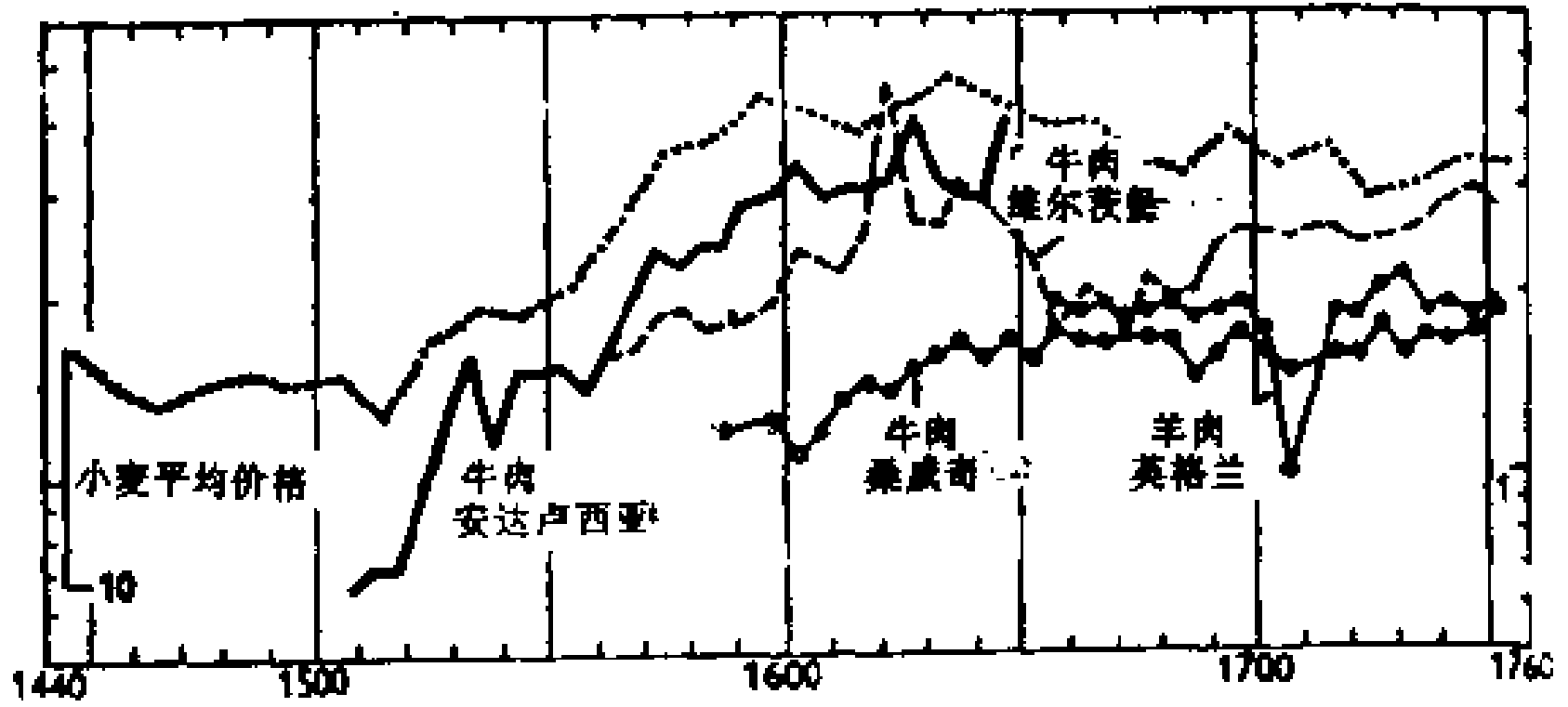
但泽:以兹罗提计算,小米酒计量单位为 sztof,粮食烧酒计量单位为 om,葡萄酒烧酒计量单位为 wiertel;以格罗兹计算,法国葡萄酒、莱茵地区葡萄酒和彼德斯曼一级葡萄酒的计量单位为 sztof,彼德斯曼二级葡萄酒的计量单位为 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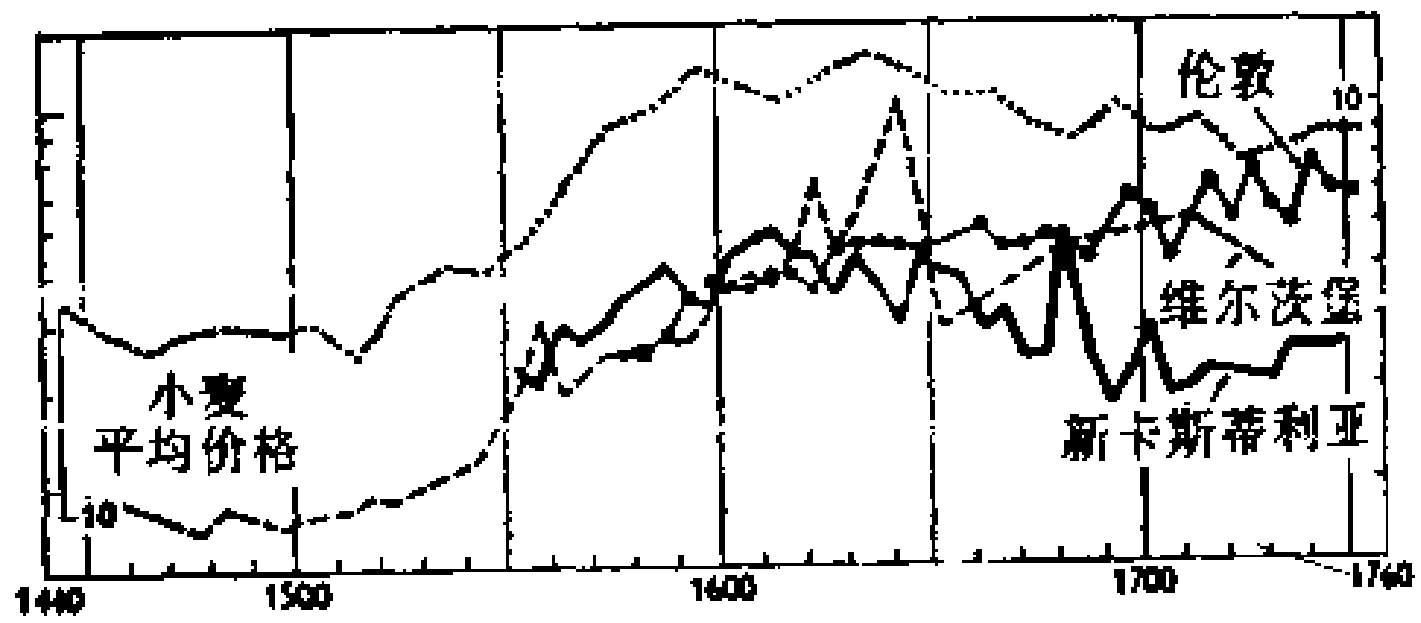
图示 23 百公升葡萄酒、啤酒和小麦的价格
 (折合白银计算,单位克):5年平均数
 网版区域代表麦价的地区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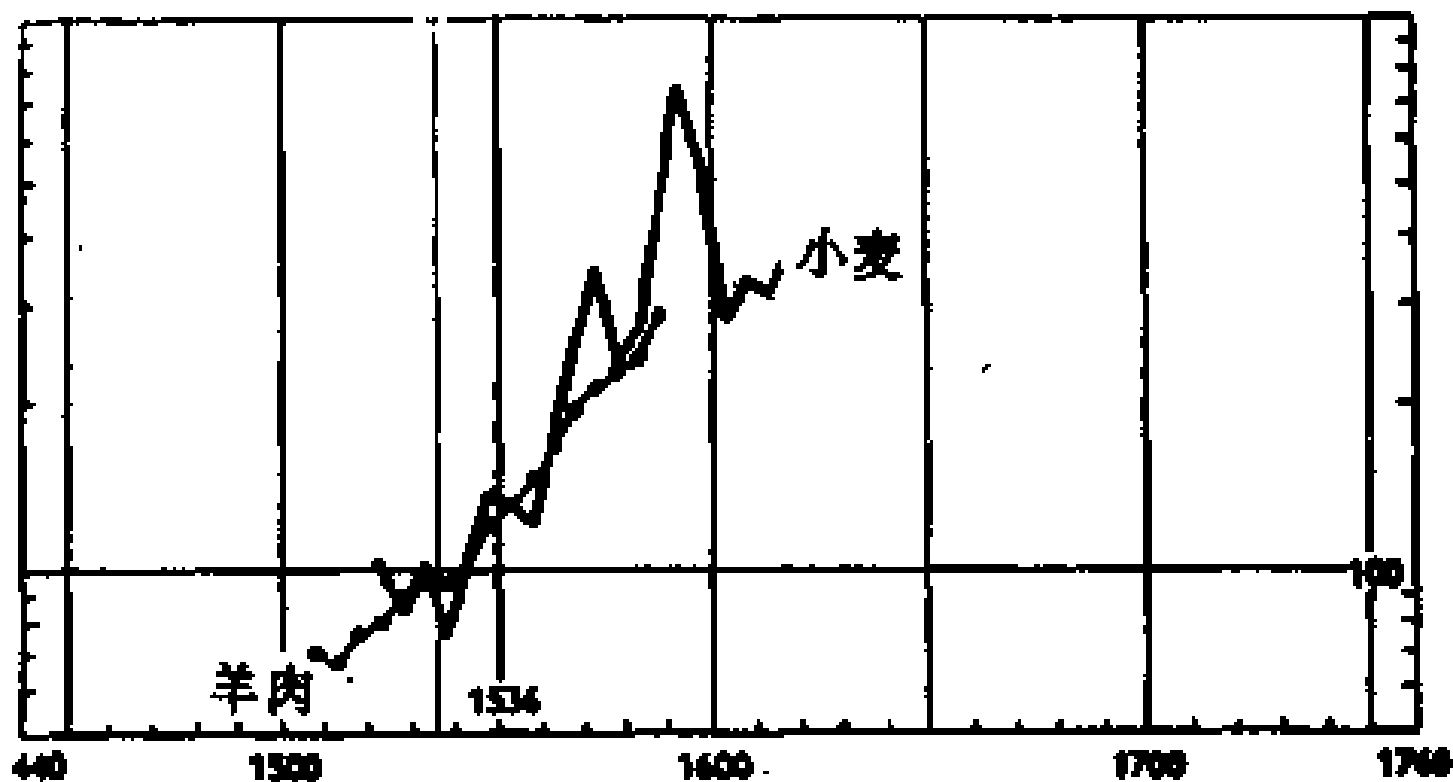
图示 24 每公斤肉的价格(折合白银计算,单位克):5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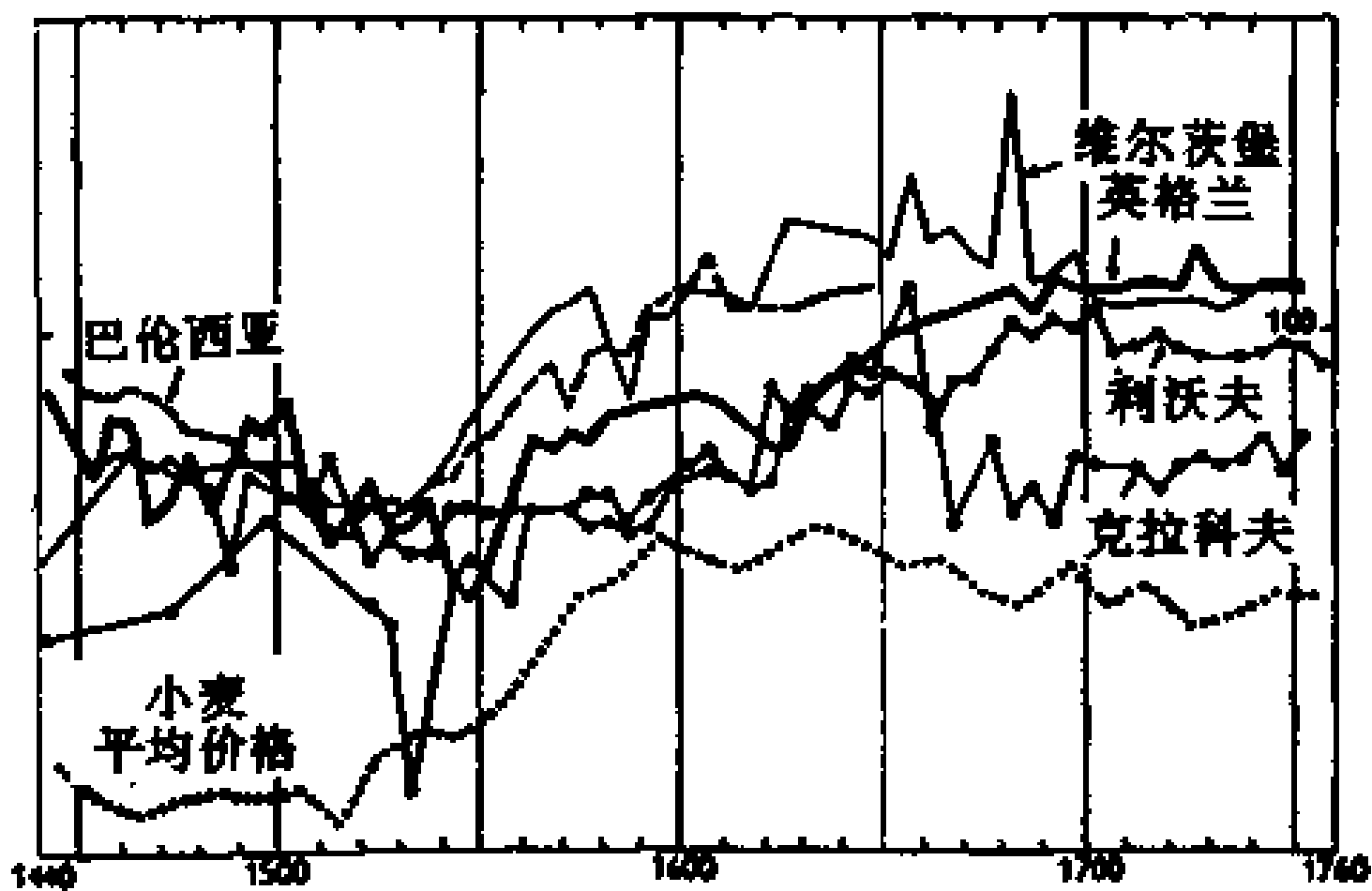
图示 25 每公斤蜡烛价格(折合白银计算,单位克):5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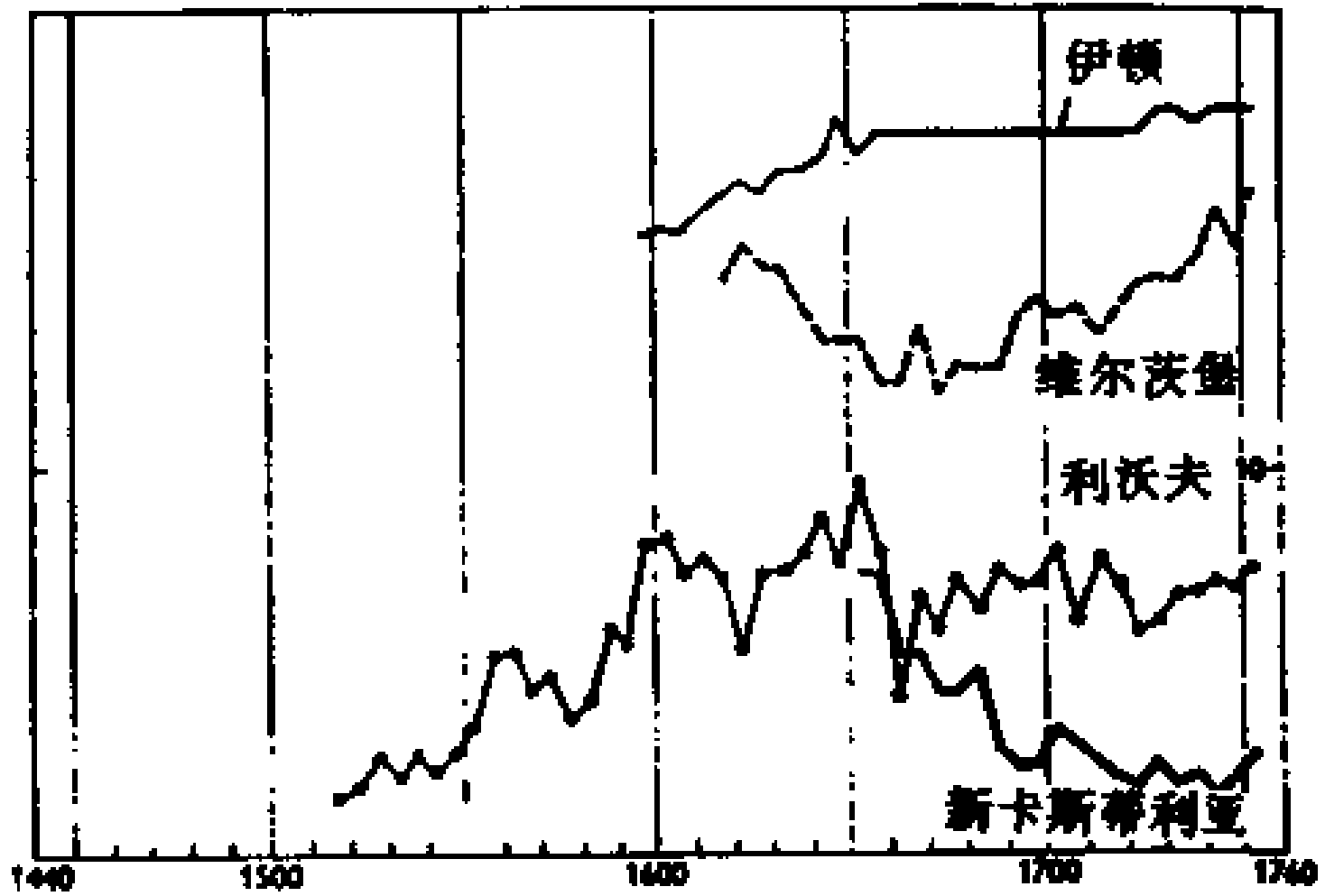
图示 26 羊肉和小麦：巴黎名义价格指数：5 年平均数
1536 年 = 100 (数据由 M. 施朗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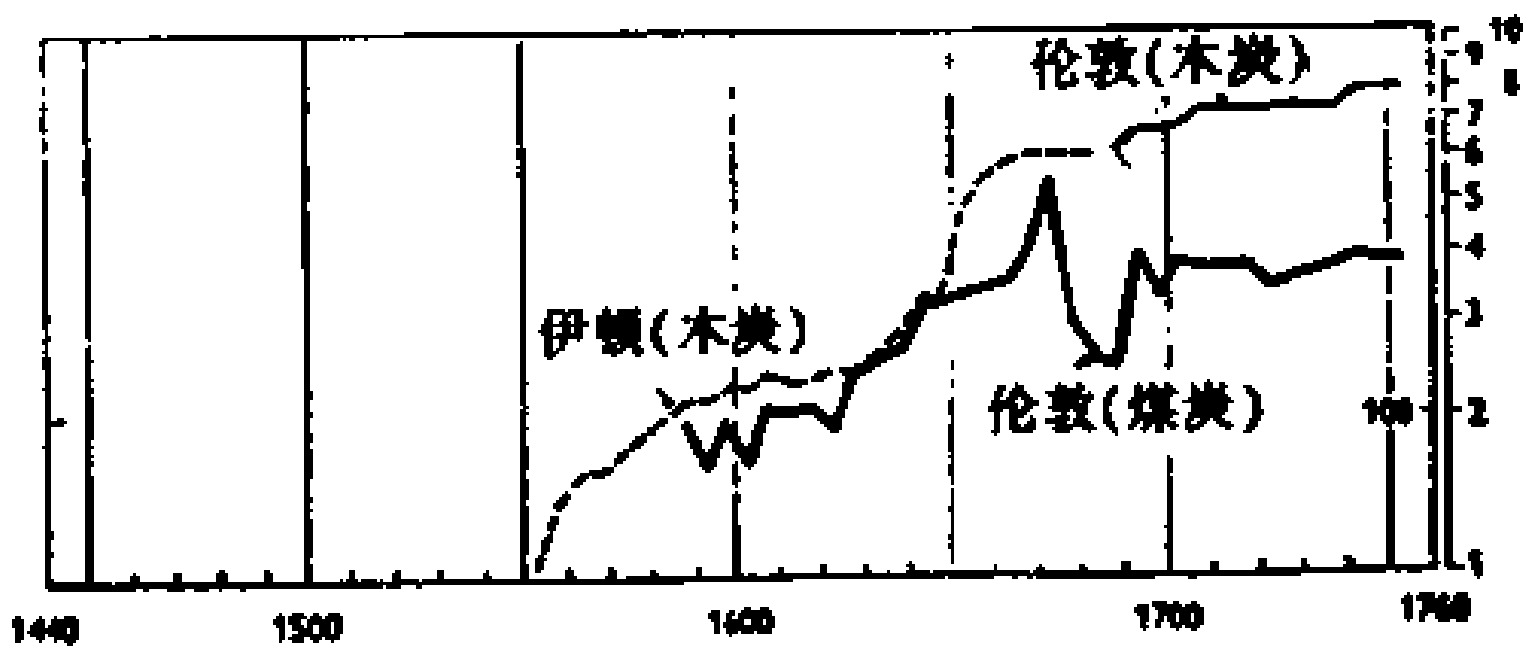
图示 27 每千块砖的价格(折合白银计算,单位克):5 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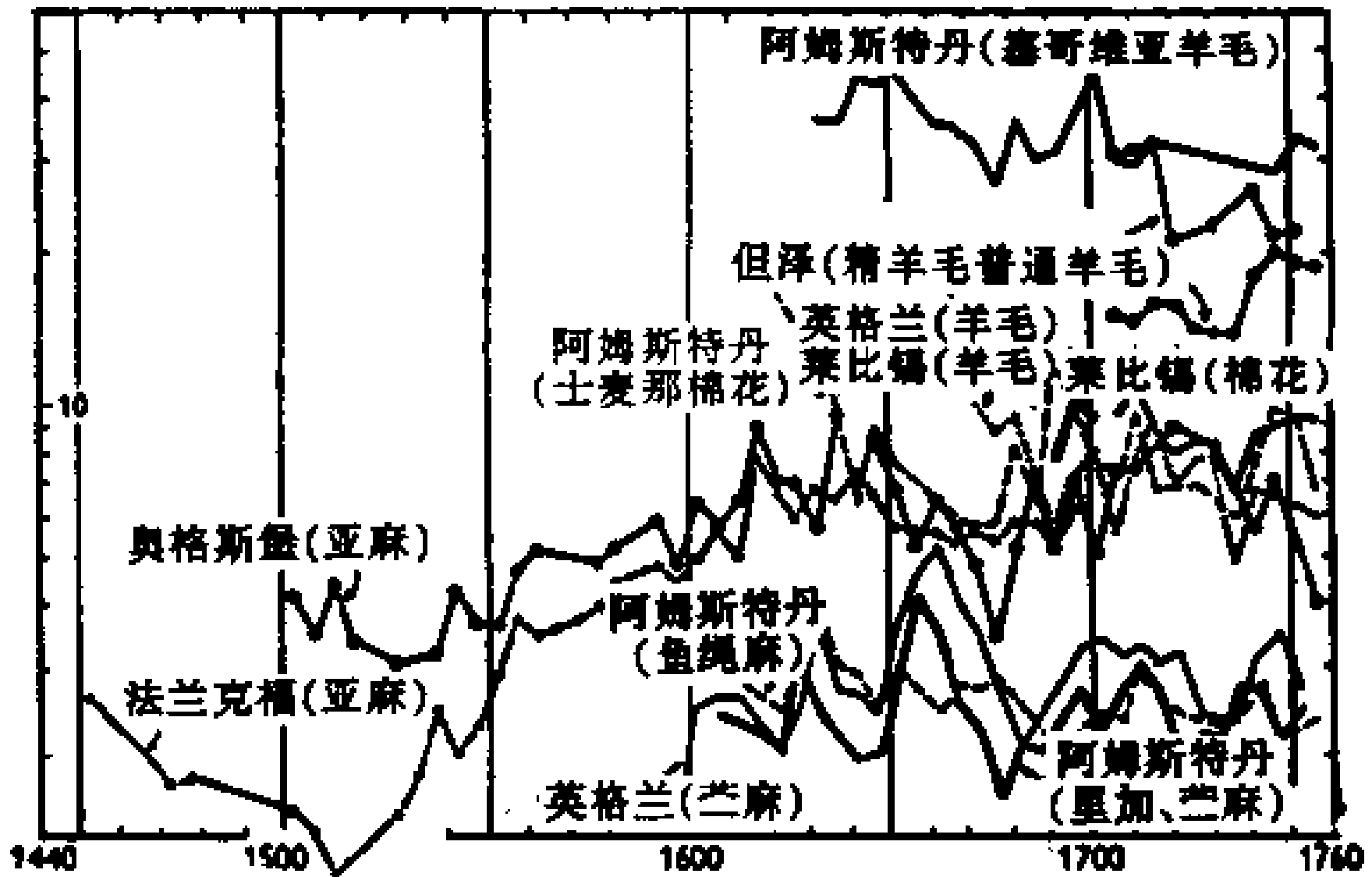
图示 28 每车取暖木柴的价格(折合白银计算,单位克):5 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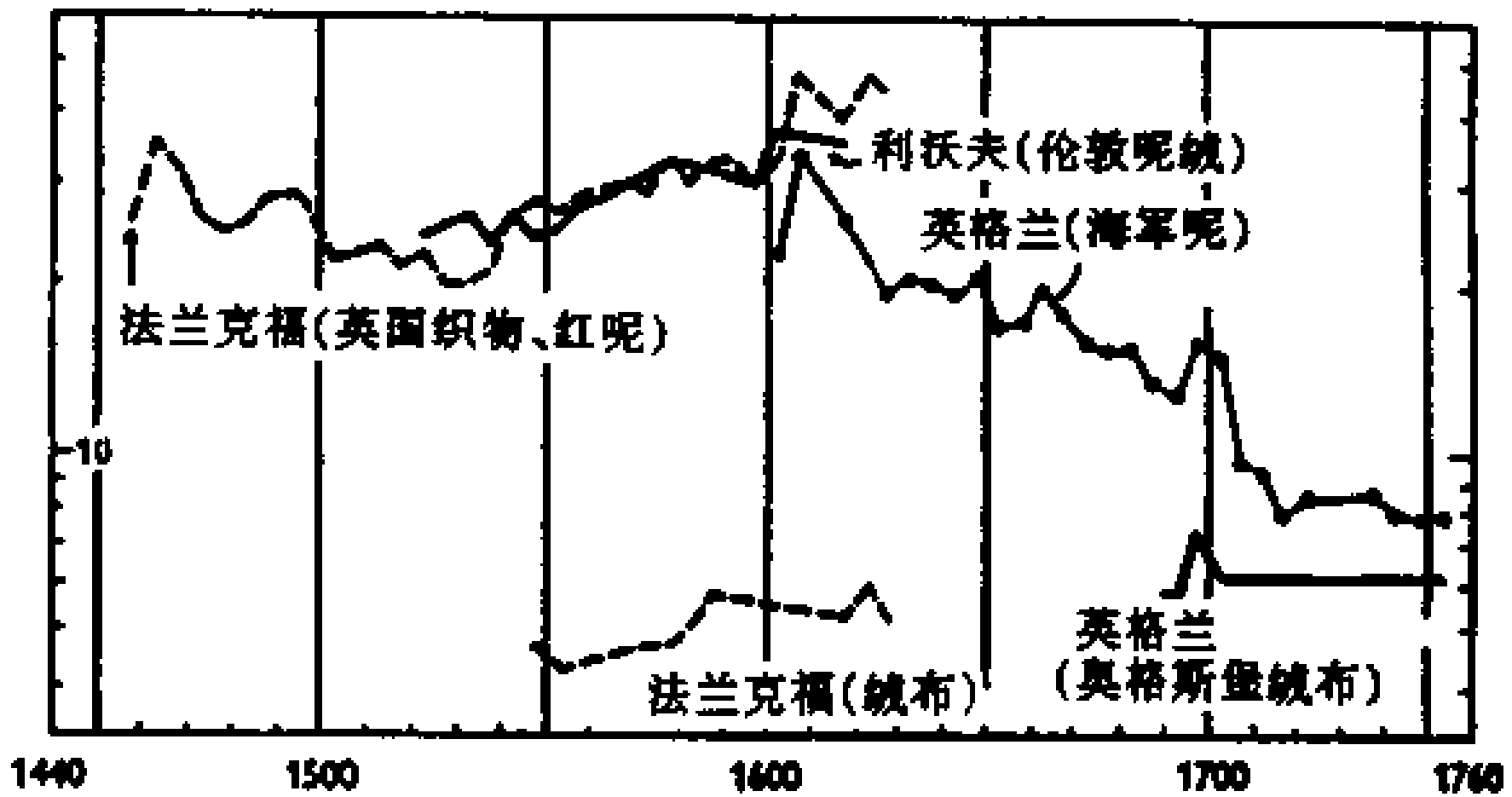
图示 29 英格兰煤炭和木炭价格(折合白银计算,单位克):5 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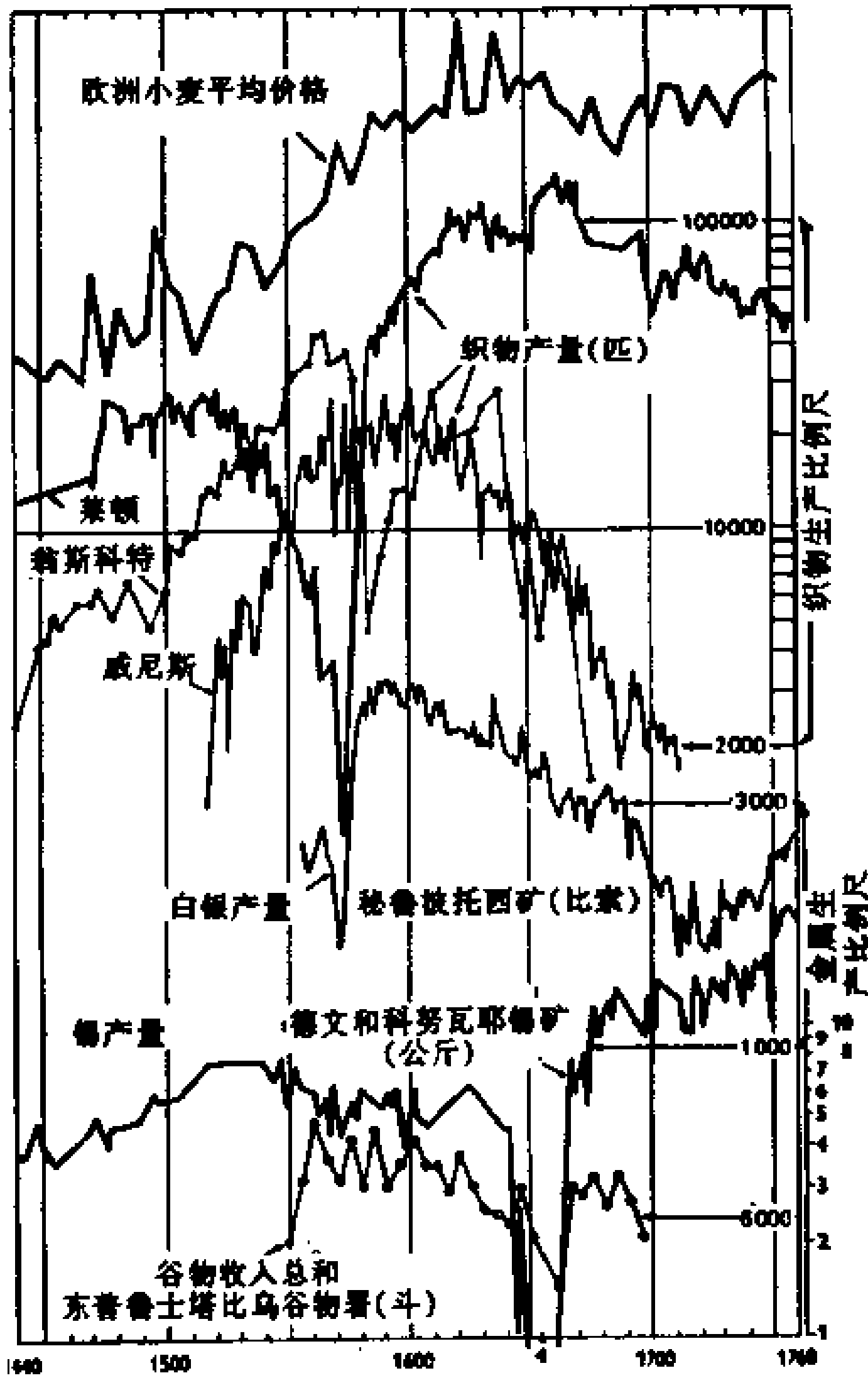
图示 30 每公斤纺织纤维价格(折合白银计算,单位克):5 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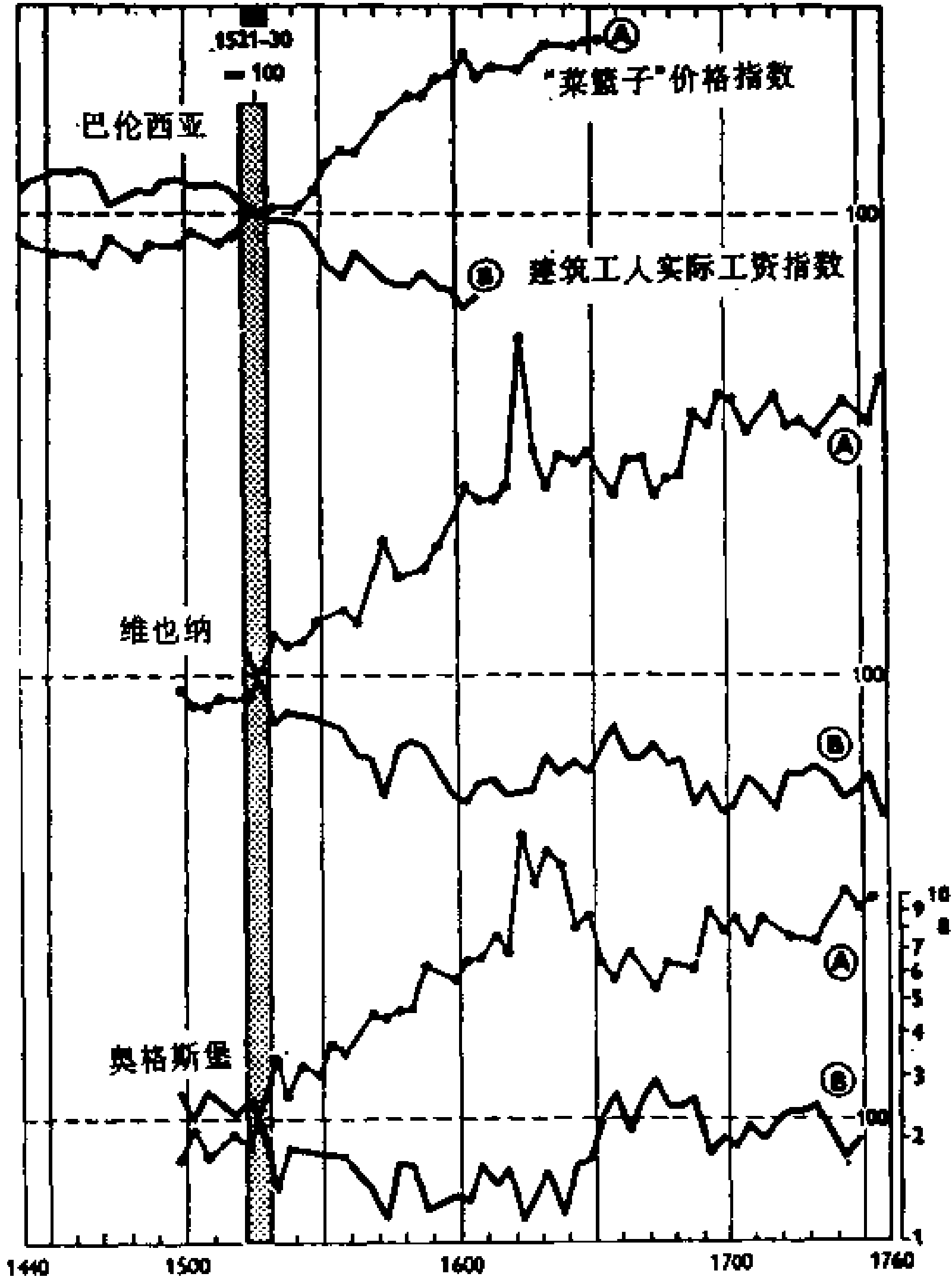
图示 31 每米织物的价格(折合白银计算,单位克):5 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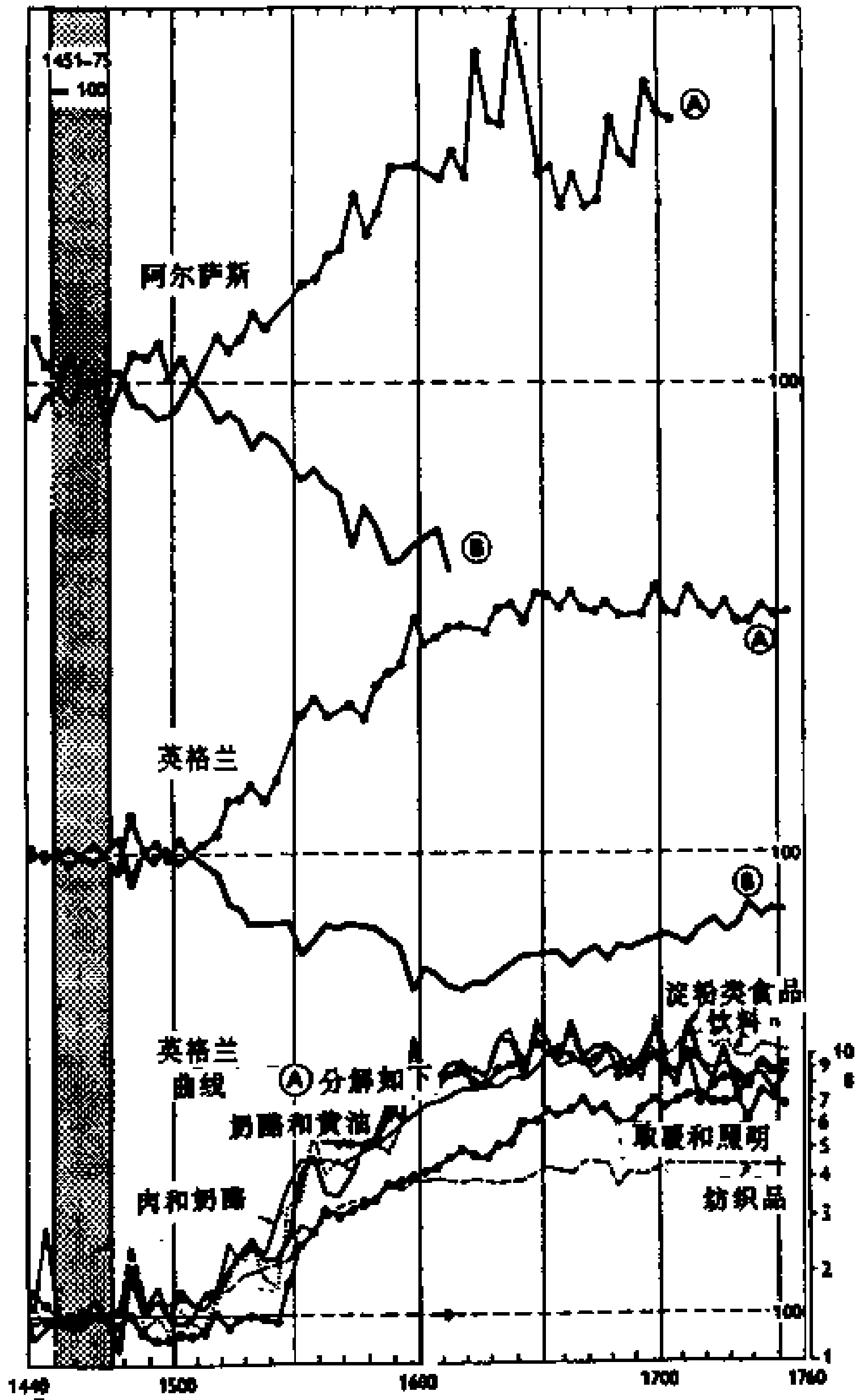


图示 32 价格运动与工业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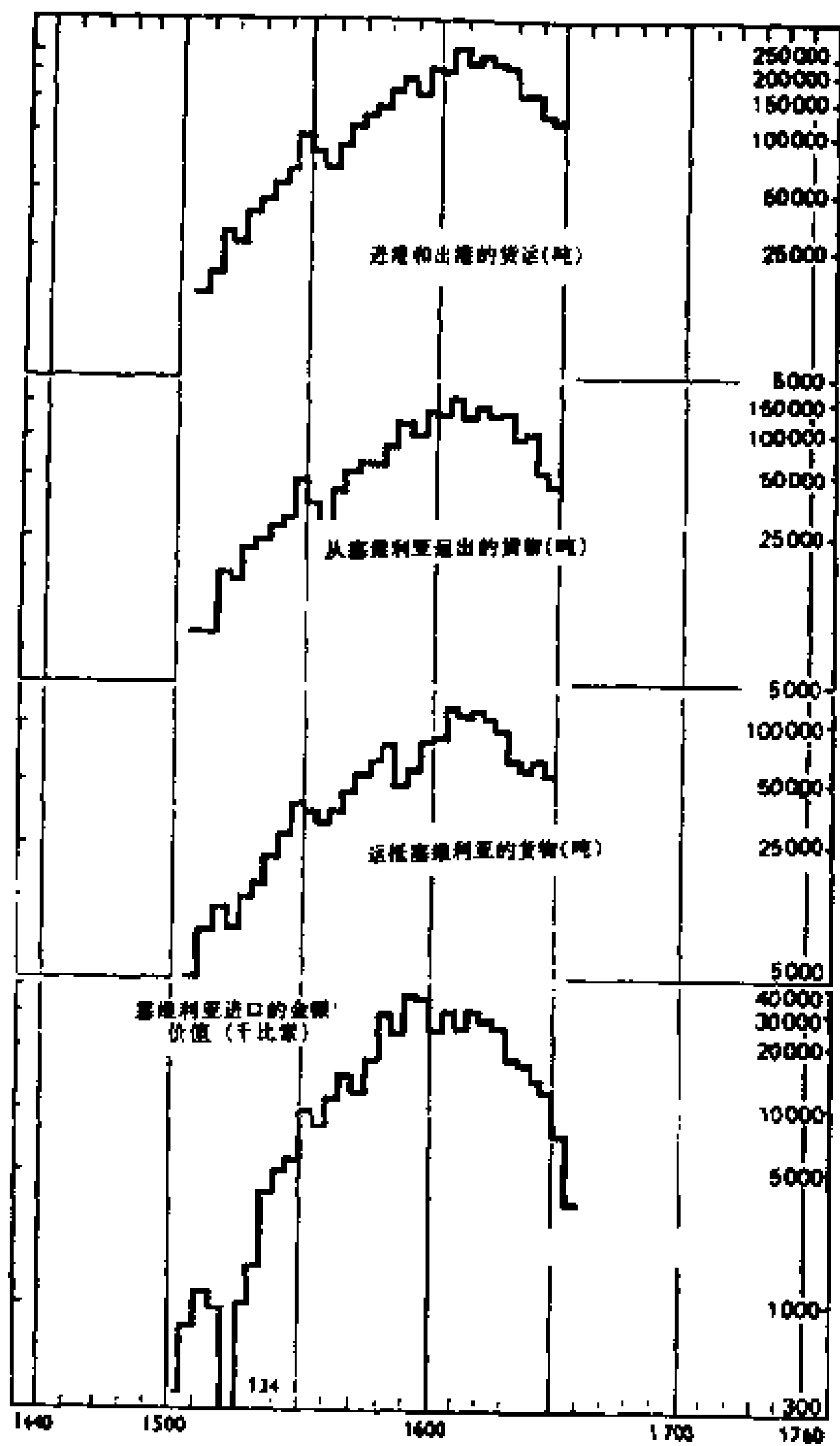
图示 33 建筑工人工资和生活开支:5年平均数
(数据由费·布朗和歇·霍普金斯提供)





图示 34 塞维利亚的港口装卸活动

有关美洲贸易的数据由于盖特和皮埃尔·谢努提供，
有关金银进口的数据由伊尔·汉密尔顿提供。



图示 35 欧洲价格史(1450—1750 年)资料所在地分布图

(注意:许多价格系列的数据估测不尽确切)

